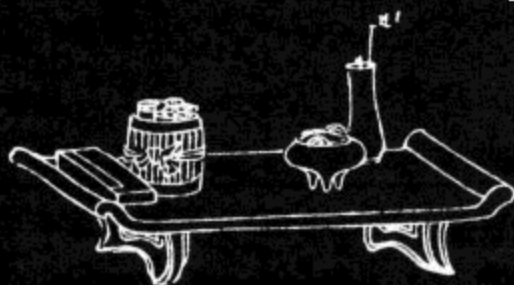


书丛老蠹鱼

沈津



中华书局

沈津先生长期追随顾廷龙先生左右，深得顾老真传……曾任上海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后经香港转至美国各大图书馆整理中文古籍，最后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等多位国际级学者的联合举荐，出任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环顾海内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难以寻觅。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资讯管理系教授 程焕文

2004年底，我作为北大图书馆派出的访问学者，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为其整理古籍和拓片，和沈先生同处一间极小的办公室，朝夕相伴。每天中午吃饭的时间，沈先生都会向我娓娓讲述上海图书馆的往事掌故，他个人的从业经历和经验，顾廷龙老先生对他的谆谆教诲，中外各图书馆藏中国古籍善本的特点和价值……可以说，我每天都在听一堂生动的专业讲座，我听得如痴如醉，大获教益……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 姚伯岳

ISBN 978-7-101-07443-7



9 787101 074437 >

定价：68.00元

孙堂带
图
图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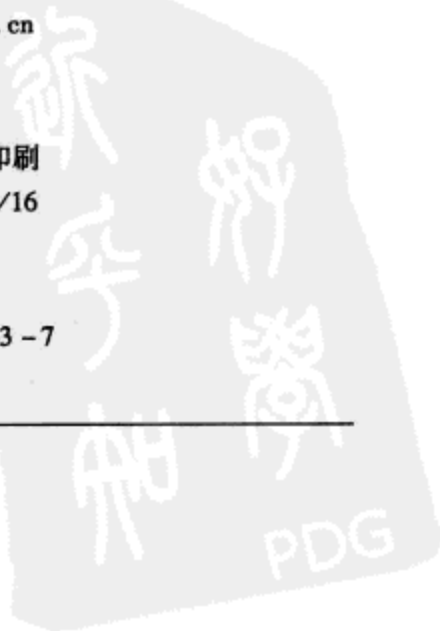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丛老蠹鱼/沈津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1.1
ISBN 978-7-101-07443-7

I. 书… II. 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3669 号

书 名 书丛老蠹鱼
著 者 沈 津
责任编辑 李世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443-7
定 价 68.00 元



自序

深秋的波士顿，天旷云高，湛蓝明净。每天走在去“哈佛燕京”的路上，望着那新英格兰的红叶，真觉得秋天才是最富有诗意的。树上的叶片由绿变黄，各种橙黄、浅绛、殷红、赭黑、深紫的叶子，在光线的作用下，远远望去，明媚撩人，层次不一。短短的一个月里，校园的路径和草地上，已覆盖了大小、色泽不一的红叶。或许在水彩画家们的眼里，这是一次风华绝代的色之绽放，也正因为秋天的短暂，所以才更加无与伦比。而在最后一阵秋风冷雨过后，最后一拨叶片，极不情愿地飘落于屋前宅后和街道两旁。然而，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春天播下的种子，经过各种艰辛的劳动，那就必有“秋收”的情景呈现。

又要为书写序了。序不好写，但自己的书却没有理由推却，所以只得勉力为之。

这本小书以“书丛老蠹鱼”作书名，盖取自我在新浪博客上的网名。“书丛老蠹鱼”这个词，缘于张元济先生《赠静嘉堂藤田昆一君》诗：“我是书丛老蠹鱼，骆驼桥畔自歔歔。羨君食尽神仙字，守静含嘉愧不如。”

当年读张先生的诗文，对这首诗的印象很深。以“蠹鱼”入诗的还有如秦峴为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作《寿鲍涑饮七十》，有云：“名山事业老蟬鱼，万卷琳琅重石渠。”而宜兴任东阁室徐畹芝的《借书》诗亦云：“玉剪堂前万卷储，一编许读乐何如。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蠹鱼。”我以为自己这五十年书丛生涯，也堪称是“蠹鱼”的岁月。用清唐孙华的话来说，现在就是“衰年仿佛烛光余，犹向残编作蠹鱼”（《再迭随庵韵》）。

波士顿，是美东麻州的重要城市，这里有闻名世界的高等学府，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等，每天有来自四方的游客，用他们的眼睛欣赏着这座文化名城。我以为，波士顿的魅力，在于它的宁静，它没有如上海那般城市的喧嚣，这里没有无谓的应酬，却有心情的愉快和写作的自由，这对一个很想“写我所想，写我所知”的草民来说，无疑是适合的。我这辈子都是和古籍善本打交道，想做的事无非有三，一是将所见善本书的部分写成书志；再是将一些难得之本写成书话之类的小文，尽可能写出点所以然；三则想把五十年中目之所接、耳之所闻，与古籍版本有关的人和事，或自以为有点心得的感想写出来，或可补文献学史、印刷史、出版史之所遗。而要想做到这三点，也颇不易，十多年来，写成的善本书志似有三千之数，凡三百余万字，且早有罢手之念，人人老境，力有不逮，尽力而为的小文权作是对社会的回馈。

居美东一十八年，惜见闻寡陋，耳目所及，囿于片隅，虽日览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亦不能广所见闻。“哈佛燕京”创始于1928年，藏弃素有所盛名，搜集东亚文献甚多，中日韩善本古籍即达八千余种，而中文古籍（含善本）达二万二千种，善本书中有二百余种为国内各大小图书馆所不见。进入该馆善本书库，琳琅万卷，如登群玉之山，入万花之谷，

有奇必露，无美不呈。收在本书里的文章，是从我的博客中选出的，所写大多是我经眼的古籍善本和较为难得的旧书，且多为“燕京”所藏，还有就是关于版本鉴定的文字。

这几年，即使如宋元精槧、明清佳本、名稿旧抄，对我来说，好像亦没有多大吸引力了，看不看无所谓。或者是即使看到，也只会说句“难得”、“不错”的话，而不会产生相见恨晚的感叹。与之相反的是，在普通书中时可“捡漏”。小书中的某些小文，所据的底本较之重要版本有另外一层意义，或者说，是一些有意思的书。我以为我的责任之一，或许就在于寻觅机会去揭示“哈佛燕京”所藏的罕见之本。事实上，如延安出版物《严氏兄弟》、范长江签名本《中国的西北角》等，都是我从普通书库中挑出来的。即使如清光绪刻本《人寿集》，也是稀见之书，那可是哈佛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戈鲲化的著作，并钤有戈氏小印，乃为自藏之本。小文中也有应朋友之邀而写，如《傅斯年图书馆的镇库之宝》等。

版本鉴定，实在是一门学问，没有长期而大量的实践，是不可能获得真知的。我深知这几十年来有些许长进，无疑是拜先师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先生之赐教，其次则是经眼了那两万种的中文古籍善本。由于人们生活水平与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近些年来古籍图书的收藏与拍卖持续升温，随之而起的一些版本鉴定专著，有些作为撰者的真知，经验值得借鉴，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似是而非或重复别人的观点，甚或没有实际的举例。老友沈燮元先生时常挂在口边的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史记〉版本鉴定的故事》、《聪明反为聪明误》等数篇，算是呈给初习版本鉴定者的几则“注意事项”。

近些年来，国内出版的书话类图书，少说也有数十种，包括各种介绍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甚或解放前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等的著作，

但写善本书或珍稀版本的并不多。至于文章长短,不拘一格,而写作手法,自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我喜欢书话这类文章,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的《劫中得书记》、唐弢先生的《书话》等,我是把它们当作小说去读的,而且都不止一遍。那个时候,我曾梦想,将来或许我也能追随大家之后,尝试学写这类文章的乐趣。我发在博客上的小文,大多每星期一篇,一个题目酝酿确定之后,于星期六、日完成,工作余暇,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无人干扰,也是人间一乐。

忽然想到“封官许愿”这个词,因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门前两旁,各立有一座六米高的石狮,左雄右雌,外观大气,雕琢质朴,前额突出,目圆瞪,口露齿,有一种强悍威猛、守门壮威的感觉。国内访问“哈佛燕京”的学者或旅游者,多以此为—景,立其旁摄影存念。我每天上班进馆,总觉得那二位被赋予神力的“百兽长”在对我微笑,似乎是认识我,并有一种默契。据说雕刻石狮始于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经常使用的装饰物。两座石狮不知何时舶载美东,我过去的同事张凤曾说过,这对石狮是波丽·柴尔·斯达太太(Polly Thayer Starr)为纪念母亲柴尔太太(E.R.Thayer),特地从中国买来的。但前些年,程焕文教授为撰写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裘开明先生的年谱,曾将“燕京”积年旧档翻遍,似乎也未查知石狮是如何报进哈佛户口的。我写石狮,意在为它“封官许愿”,即拟“封”其并不存在的官名——“燕京镇守使”,“愿”上苍佑我“燕京”,使这座“藏古今学术,聚天地精华”的欧美汉学资料重镇,永远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而尽其所能。是为序。

2009/11/22

目 录

自 序 /1

1. 明铜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 /1
2. 《汪氏第九十二世小宗谱》及其他 /6
3. 翁同龢批校本《常熟县志》 /18
4. 《文庙思源录考》小记 /26
5. 清代彩绘本《黔苗图说》 /31
6. 《飞白录》 /35
7. 清康熙刻本《曹氏墨林》 /41
8. 《萝轩变古笺谱》背后的故事 /48
9. 《选集汉印分韵》 /58
10. 《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 /63
11. 海内竟有“骗子书”——《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 /69
12. 日本活字印本《新刻痴婆子传》 /75
13. 翁方纲写《金刚经》——兼驳代笔说 /80

14. 捕雀童子得宋刻《妙法莲华经》 /89
15. 有图五百幅的《太上感应篇图说》 /95
16. 关于“君王版”《新约全书》 /101
17. 傅斯年图书馆的镇库之宝《群玉集》、《碧云集》 /106
18. 陈老莲的《宝纶堂集》 /119
19. 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 /125
20. 内府刊刻的《御制避暑山庄诗》 /134
21. 红香零帙——《听秋轩诗集》 /141
22. 哈佛教授戈鲲化的《人寿集》和《人寿堂诗钞》 /146
23. 邓显鹤的《沅湘耆旧集》及续编 /152
24. 清康熙刻本《明人尺牍选》 /157
25. 清乾隆刻本《吴江沈氏诗集》 /163
26. 吴兔床的几种稿本 /168
27. 明代的大统历 /177
28. 清代的时宪书 /183

29. 谈善本书中的日记 /187
30. 从王孝慈手抄的两种戏曲书说起 /197
31. 叶恭绰和《清代学者象传》 /205
32. 陈存仁的《光绪皇帝的收场》 /216
33. 也说《采菲录》 /222
34. 稀见珍本——《严氏兄弟》 /227
35. 范长江的签名本《中国的西北角》 /234
36. 新发现的赵景深《中国诗歌原理讲义》 /240
37. 也说《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245
38. 给李肇星看什么 /252
39. 书口彩绘 /262
40. 谈谈摇篮本——答记者问 /268
41. 我和《善本书影》 /274
42. 《史记》版本鉴定的故事 /281
43.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指误 /286

44. 大刀面前舞关公 /292

45. 从一件小事而想起的 /296

46. 聪明反为聪明误 /300

47. 市侩狡诈 诡譎百出——版本鉴定之一 /304

48. 《新笈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的版本鉴定 /310

附录 人品大美书福最厚 学识专深著述三难 (萧文立) /319



明铜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

十年前的9、10月间，我曾受命设计一种贺卡，以备12月圣诞之用，卡的正面要选一种“哈佛燕京”馆藏中文古籍善本的书影。馆藏中文善本，大约在五千之谱，仅明代所刻即有一千五百部，这千余部中，国内没有名目或版本的又有二百部左右，我选哪一部呢？想来想去，倒真费了一番心思，最后就选了《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这部书是明代的铜活字印本，部头大且首尾俱全（后来才失去数册），为世珍秘，而且是当年的校样之本，那更是以稀为贵的了。贺卡印出后，倒还可以看看，也算是留个“鸿爪”吧。

宋赵汝愚辑的《国朝诸臣奏议》，宋代的本子还有几部，为南宋淳祐十年（1250）史季温福州刻元修本以及元明递修本，除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全帙外（也配了九卷清抄本），其他的都是残本。明代的本子，只有华氏会通馆铜活字印本，而会通馆活字印本有两种，即为大小活字二种，小字本为《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弘治三年〔1490〕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有全帙入藏。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聖誕卡

大字本为《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亦为弘治三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上海图书馆存二十一卷，台北“国家图书馆”存二十三卷，又天津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藏皆残本。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是大字本，一百五十卷。今存卷二至七、十一至一百五十，计一百十四册。也就是说，上海等四馆相加仅存六十二卷，仍然不及哈佛本之半。

会通馆的主人华燧的事迹，在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明锡山华氏活字板》、《明华坚之世家》）中可以检得。津尝写有《明铜活字印本的〈诗经〉》（见《书城风弦录》）小文，那个本子也是会通馆活字印的，是个孤本，印的时间比《诸臣奏议》晚七年。华氏会通馆所印活字本约十五种，大部分尚存。而这个本子是今天所知存世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叶德辉曾说，会通馆的本子，“流传至今四五百年，虫鼠之伤残，兵燹之销毁，愈久而愈稀，此藏书家所以比之如宋槧名钞，争相宝尚。固不仅以其源出天水旧槧，可以奴视元明诸刻也”。

铜活字本本来较刻本所印为少，而此本的稀奇之处，更在于每隔数卷之末尾，钤有“校完”红色木记。津孤陋寡闻，所见华氏铜活字本仅有数种，但都未见有这类木记。因此，这个本子当为印刷之后，请专人校对之本，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校正本”。众所周知，过去的所谓活字印本，讹误都是极多的，这本《诸臣奏议》也不例外，虽为初印之本，但可看到错字俱挖去，并有贴补，或以笔填入，或以活字钤上。

按，此本钤有“毗陵董康审定”、“董康暨侍姬玉奴珍藏书籍记”之印，为1942年间董康售与“哈佛燕京”者。2000年，我在台北“国家图书馆”看书，并调阅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二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君道門

君道二

要務十事

錢顛

臣每讀書傳見忠義之臣事聖明之君誠無
所不通言無所不從臣雖至愚未嘗不掩卷
感激思得其位以竭臣子之節庶幾有所補
報也而蒙 陛下不以臣之疎賤使待罪言
職臣夙夜念慮無以答 陛下恩遇之萬分

明銅活字印本《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

的档案（即郑振铎等人致蒋复璁函件等），见到1942年7月25日郑氏等人致蒋函云：“董某售会通馆本《诸臣奏议》于燕京，竟得价五百以上，诚骇人听闻之事也。”我没有去核查五百元在当时是何等的天价，但郑先生用“骇人听闻”这样的词，应该是董康大斩了“燕京”一刀。董是《书舶庸谈》的作者，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清末任大理院推丞，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即任北京大理院的院长、修订法律馆的总裁，还曾任靳云鹏内阁的司法总长代理、总长，后退出政界，任上海法科大学、东吴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惜抗战中出任伪职，抗战胜利后被捕，1947年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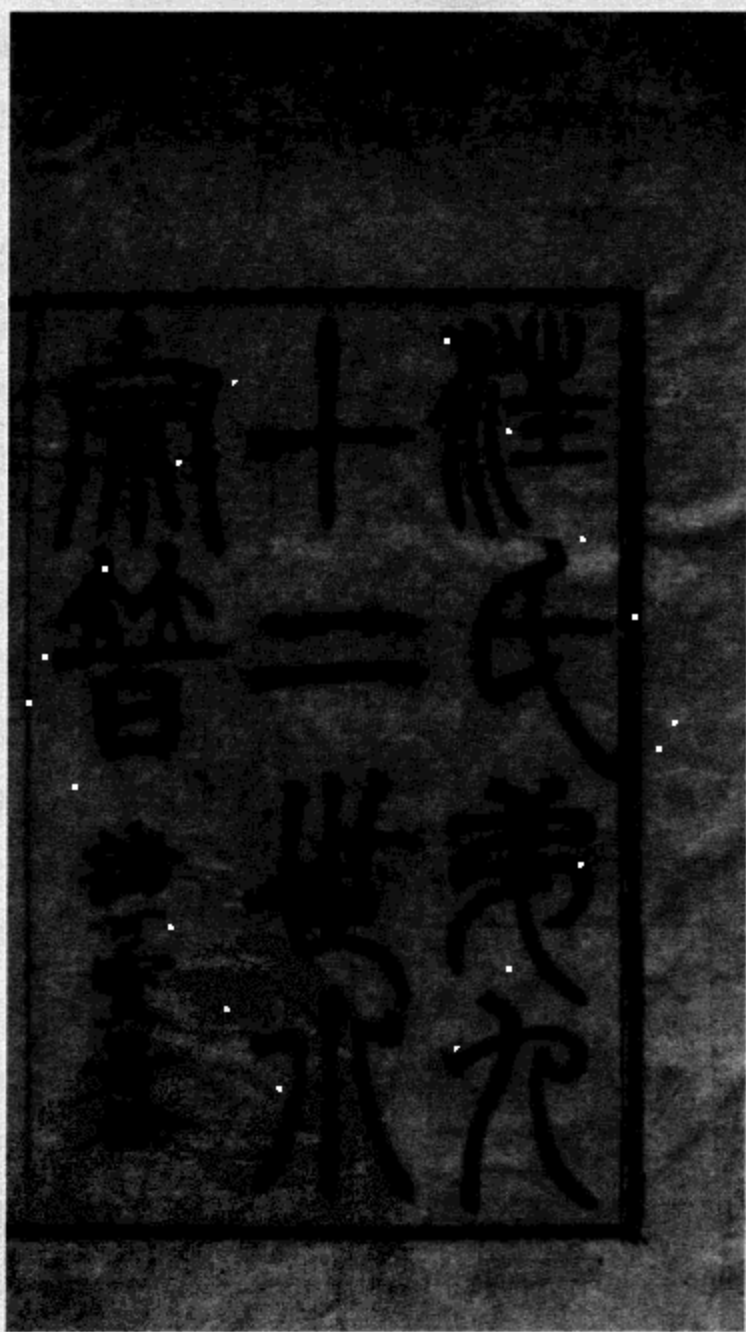
2008/8/1

《汪氏第九十二世小宗谱》及其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始，一直到今天，我大约写了将近三千篇善本书志，约三百万字，但其中关于家谱的不多，连十篇都不到，不过多是难得之本，如明嘉靖刻本《休宁荪浯二溪程氏宗谱》、清初抄本《沱川余氏世纪》、稿本《梯山汪氏家谱》、稿本《管溪徐氏宗谱》、稿本《大兴朱氏家乘》、吴騫批清乾隆刻本《休宁厚田吴氏宗谱》、钱塘丁氏传抄本《钱塘丁氏谱》等，分别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三馆。

前些时，在“燕京”翻得一部《汪氏第九十二世小宗谱》，是光绪六年(1880)刻本。二册。时代很晚，品相却极佳，有触手如新的感觉。但我看中的却是难得，难得在何处？难得在“稀”，难得在书末有“分藏总目”，难得在此本是“第一号”。

《小宗谱》计六卷，卷一世系，卷二前谱，卷三正谱，卷四记说志遗训录，卷五传略，卷六墓图。前有汪曾立撰凡例十一则。同治十二年(1873)汪曾立跋。



清光緒六年(1880)刻本《汪氏第九十二世小宗譜》

其云小宗谱，可见凡例第一条：“徽有宏村旧谱，杭有迁杭支谱，详载分明，数典者考谱了然。兹曰小宗谱，盖仿宋苏明允氏族谱之法也。”又云：“是谱十年一修，修刊各贲出于振绮祭祀公帐。”此小宗谱之编刻，乃有别于汪氏《迁杭支谱》。曾立的跋文中说：“吾汪氏自前明文宇公迁杭，迄今二百数十年矣，椒聊蕃衍，螽斯振绳，道光己丑有《迁杭支谱》之刻，分藏各房者七十部。咸丰庚申、辛酉，两罹兵燹，散佚居多。今天子嗣位之三年，王师奏功，东南底定，收罗支谱，绝无仅有。窃虑后之人数典忘祖，遂致世系、记传、莹图湮没而无考，亟思修葺而重镌之。第丧乱之后，族之耆老都已物故，其存者又散之四方，甚有音信不通者，稽核殊非易易，爰仿苏氏族谱之意，小变其例。”

此支谱卷四崇祀乡贤录、“十村公遗训”十一则及卷五汪宪（鱼亭）、汪远孙（小米）传略最为有用。宪、远孙皆为嘉道间藏书家，《藏书纪事诗》卷五有传，但不详。十村即汪诚，宪之孙，远孙父，乾隆五十九年举人，诰授奉直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一级。亦藏书家，《文献家通考》有传。“遗训”有云：“我无大志，不过要汝等兄弟都有饭吃，和气度日而已。读书固佳，能管理家务亦好，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即败类也。”“儿女定亲，不可高攀门户。为女择婿，人家自然要好些。儿子定妇，只要杭城旧家有闾教者为妙。家业差些不妨，只要不受累而已。总之，择婿娶妇，断不可暴发迹及做衙门二项人家，即盐商亦要斟酌，宁以不定为妙。”“我们人家除开当外，别无一事可做。但我识见卓定，无人向我引诱。汝年轻心活，必有人向汝引诱，或诱汝做别样生意，说得天花乱坠，或诱汝囤何货物，说得赚钱数倍，此等说话，断断不可理他。”“汝等若能从科甲出身做官，是荣祖耀宗，不然有碗饭吃，勿妄动做官之念。”“处

第壹號九十二世曾立收藏

汪氏小宗譜凡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一徽有宏村舊譜杭有遷杭支譜詳載分明數典者考譜瞭然
茲曰小宗譜蓋仿宋蘇明允氏族譜之法也

一世系自一世 顧川侯至八十一世 汝器公於名下詳載
某第幾子字某配某氏八十二世 文宇公以後名下祇貫
系緣餘詳譜內

一世系標 魯顧川侯者重始祖也標 漢龍驤將軍者重彼
江祖也標 齊軍司馬者重遷新安祖也標 唐越國公者
重宗祀祖也標 宋處士儻先公者重始遷縣北祖也標
宋處士公梅公者重始遷宏村祖也標 元處士佳一公者

我家境界，勤俭之外，待人尤以谦抑为先，如此方可自守。”这是他所谓的“一言半语”“留示诸子”者，即“暇时辄书数语，不分头绪，亦无先后，有见即书，在于汝等之寻绎。至于听与不听，我不能为政矣”。遗训说得都很实在，现今的人倒也可以看看。此是汪诚嘉庆十九年（1814）所写，五年后即逝去，年仅四十八岁。

此小宗谱有“分藏总目”：“此次按子姓分给挨编字号，以备稽考。将来子姓众多，修刊刷印，十六岁以上者各给一部。”接下来就是收藏此谱的名单：“曾立第一号、曾唯第二号、守正第三号、曾本第四号、曾学第五号、曾复第六号、曾事第七号、曾沂第八号、曾士第九号、曾若第十号、韶年第十一号、加年第十二号、玉年第十三号、康年第十四号、鼎年第十五号、懋年第十六号、德年第十七号、诒年第十八号、嵩年第十九号、鹏年第二十号、洛年第二十一号、渭年第二十二号、乔年第二十三号、俦年第二十四号、知非第二十五号。共印二十七部，内样本二部，曾唯监刊，存曾唯处，填明不列号样本。”这种分藏总目，清清楚楚，谁若保管不善，或遗失不存，那可是麻烦的事。所以，此《小宗谱》共印二十七部，流传至今，自然不会多，这就是“稀”。又凡例正文框外及跋文框外皆书“第壹号九十二世曾立收藏”。

此第一号收藏者曾立，为迈孙长子，字子望，号幻梅。候选布政司经历。生于道光六年（1826）。刻家谱者曾唯，为通孙长子，字子用，号梦师。附贡生，同知衔兼袭云骑尉世职，湖北补用知州，署理石首县知县。生于道光九年（1829）。

版本中的刻本从大处来说有官刻、家刻、坊刻之别，其中官刻，当有经费支持，所印也不会少；坊刻因要牟利，故计算成本后，所印必多。

家刻相对来说，所印有限，必不会多。家谱属家刻范围，但它又不似家刻的祖先文集，或自己的著作、翻印前贤著述等，还可以在家中或祠堂发售，或寄存坊间售卖流通，或赠送友朋分享。家谱印出后，仅有家族子裔可分得一部，他人则不得染指。故版本在流传的过程中，家谱是十分难得的。除非是特殊原因，如兵燹或自然灾害、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等，不然的话，自家的家谱是很难散出而流落市肆的。

谢国桢先生在他的《明季奴变考》中，曾说到自己是江苏武进人。谢氏是武进的望族，族中印有《毗陵谢氏族谱》，约有三十多册。据他太叔祖谢需说，族谱限制很严，印刷族谱的时节，必须事前报名。例如今年报名的九十人，那么至多印一百部。最大的原因，是恐怕他家的仆人顶名冒替，乱了家族的关系。可见家谱是家族主持编印的，因非外传，更不售卖，所以印行不多，传世也少。

上海图书馆藏家谱中无此本，但有《平阳汪氏九十一世支谱》二卷，清汪曾立纂修，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汪氏小宗谱》三卷，清汪曾立纂修，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杭州汪氏振绮堂小宗谱》七卷，汪玉年纂修，1925年刻本；《汪氏振绮堂宗谱》四卷，汪大燮、汪诒年纂修，1930年排印本；《平阳汪氏迁杭支谱》六卷首一卷，汪怡、汪诒年纂修，1932年排印本。如需研究平阳汪氏，这些书都是必看的。

我不研究家谱，但几十年来，经眼了不少。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那可是大宗的了，真可说是天下第一。八十年代的统计是一万五千余部，九万六千余册（现上图有一家谱研究中心，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当是最权威的）。这些书是如何搜集到的呢？还是回顾一下“历史”吧。1956年

前后，自浙江遂溪等地船运至沪数十吨废纸，其中有不少古旧书籍，当时的上图、历史文献图书馆以及上海市文管会下属的文物仓库即派人去造纸厂，在化浆池旁抢救出约八千种近六万册的家谱，其中残本居多。（这件事，顾师廷龙先生是当事者，他不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告诉我，还将他当年写的一篇文章《我在抢救历史文献中的一点体会》〔《新民报晚刊》1956年1月12日〕交我保存。）1959年至1963年间，从安徽屯溪等地采购约五千余种二万多册。为此，顾先生受到了批判，因为他同意使用采购经费，着人去大肆购买“封建主义”的糟粕。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则收存了一千二百种一万八千余册。

上图的家谱中全本约四千余部。据七十年代顾宗汉先生所做的统计：所收姓氏共三百一十三姓，地区遍及全国。陈姓最多，为六百一十五家；张姓次之，为五百九十四家；王姓又次之，为五百二十九家；冷僻姓氏如吾、寻、师、生、港、青、斜等，也有八十余家。以地区看，浙江省居多，安徽、江苏、湖南等省次之。（详见津撰《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与文献收藏》，载《书韵悠悠一脉香》。）

为了这批家谱，上图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自1958年上图与历史文献馆等馆合并后，家谱就相对集中，最初放在“觉园”，后来都存放在长乐路原历史文献馆的底层书库内。因保管条件较差，十数年下来，发现蠹鱼，于是七十年代中就组织人员除虫，但效果不彰。不久，又发现上图总馆大书库后面有小部分西文书也有虫灾，于是馆方闭馆，请上海市粮食仓库灭虫部门来馆“薰蒸”，所以家谱也受了不少折腾。不过，总算好，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离开），上图领导认识到家谱的作用，且是馆藏特点，所以重视有加，那是后话了。

1986年，我在美国作研究时，对家谱也特别注意了一下。美国收藏家谱最多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哥大馆我去过多次，最长的一次是他们请我两个星期，就是为该馆鉴定版本。哥大藏家谱为一千零四十一部，那是抗战期间，不少人家藏书散出，家谱也不例外，哥大即指派人员在北平、上海等地大肆收购。至珍珠港事变止，四年之间，竟得九百余种。我在该馆见到此批家谱时，只见品相俱佳，均有青布函套，整齐地按四角号码排列在架。前几年，我为写作《顾廷龙年谱》，必须看苏州顾氏家谱，所以乘在纽约开会之际，溜将出来，去哥大馆将此书有用的资料全部摘录了下来。我曾多次建议哥大馆能将家谱编成专目，写成书志，但人微言轻，主持人又是老美，不懂中文，更不重视，只好再搁置架上等待云开雾散的那一天了。

话又说回来，如果单就收藏中国家谱数量（含胶卷）而言，那就要首推美国犹他州的犹他族谱学会了。我在美做研究时，方才知有这么个机构，竟然还收藏了许多的中国家谱，这是很吸引人的。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该学会，客套话之后就说上图藏家谱世界第一，我想去犹他参观访问，并希望将来有条件后，双方可以合作。不久，我接到撒屈尔（中文名字是沙其敏）先生的电话，表示欢迎我去犹他，并谈了飞机票由犹他州杨百翰大学图书馆学系出，条件是必须给一个演讲。食宿由族谱学会负担，实报实销。这当然是好事，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我去犹他访问是在1987年1月，用了一个星期。

从纽约起飞后，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到了犹他州境，极目四望，一片层峰华岳。每一山峰，呈锯齿状，非常锋利，真是难得一见的怪形。犹他州的原文是“Utah”，其原义具有众山之巅之意。犹他也是摩门教

的势力所在，我看了摩门教的博物馆和杨百翰纪念馆等处，略略有点了解它的历史。有一天沙其敏陪我去参观山洞，那地方离市区有一个多小时车程。所谓“山洞”，实际上是在大山里开辟的一座大书库，是族谱学会储藏资料、文献和胶卷的地方。在山洞的门口，看不出所以然，但一入里面，却是别有洞天，只见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在工作，胶卷整齐地放在一排排柜子里。我当时觉得这种大山洞好像在什么007的电影里看见过。据说，当年“深挖洞”时，很花了一些时间，设置也很先进，大铁门一关，即使是掷原子弹也不怕。沙兄还带我去看了一处可滴泉水的地方，即如果外面发生意外，库里还是可以解决水的问题。晚上，沙其敏请我去他家做客，他和我同年，居然有六个孩子，他说，摩门教过去是一夫多妻制，后来才被禁止了。他告诉我，你是中国大陆来族谱学会访问的第二人，第一位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负责人。我在犹他时，沙兄还陪我拜访了学会的会长斯卡特先生，他是摩门教的领袖之一。（1988年7月，斯卡特先生一家在沙兄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华游览，我陪他们去了苏州。数天后，“首届中国家谱研讨会”在山西五台山举行，我们又再次相逢。）

1988年，沙其敏先生来上海图书馆，就犹他和上图藏家谱的合作事宜进行商谈，最后的结果是由上图提供所藏家谱，美方提供胶片、药水并负责训练上图复制工作人员，最后完成拍摄工作后，上图留一套胶卷保存。至于付费是关键，我知道犹他在东南亚及香港、台北地区付费多是十至十二美分，付台北是十二美分。我当时的想法是上图是大馆，家谱藏量丰富，故奇货可居，钱应该较别处高一点，我提出每一拍（一页）应要十五美分。这个意见得到了当时上图主管业务工作的副馆长吴世文、

聂佩华的首肯。所以在和沙兄谈判时，我就咬住十五美分不放。最后的价钱定夺，是沙回到香港他的办事处后，打来电话认可的。他说：我没有办法了，就十五美分吧。第一次的合作，上图提供了一个可供拍摄的书目，由美方查核后定下。后来上图得到第一笔付款九万美金，第二笔是三万美金。这在当时来说，不是小数目。1990年4月，我离开上图去香港，就不再管此事了。

日人多贺秋五郎的《宗谱の研究》(资料篇)，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为东洋文库论丛第四十五种。第一部分是解说，包括宗谱的意义、目的、内容、印刷、机构、保存、分类、分量、间隔、年代、分布及现存的宗谱。第二部分为目录，列日本现存宗谱目录、中国(北京、中科院、南京、上海、广州中山大学馆)及台北地区、美国哥大、哈佛燕京所藏。第三部分为资料，包括义庄规条、家塾规条、家训家范、家规宗约、祭法祠规、凡例谱例等。当然作者在大陆所见不多，只是根据早期书目所列，故收藏数字差之甚远，如上图仅列出六种(当是据五十年代的《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所载)。做研究者读此或可有一些启迪，前些时读《顾颉刚书话》，第二五七页讲到家谱事，云：余姚戚焕垣君为我搜集彼处劳氏、戚氏、谢氏之家谱，来信云：“家谱本数多得很，带时很不便，而且许多本关于某人生死的记载，于先生研究家族上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以为我的意思，倒不如只带头几本，内载章程、族规、族箴等等的。关于传、行状、节孝录的第三、四本，不知也有什么用处否？”答之曰：家谱里族箴、族规自为最有用，但传与行状等也约略可见家族缔造状况，并其发展痕迹，所以我想请你一同寄来。

家谱的提要，不大容易写，我孤陋寡闻，所见到的大约数《台湾文

献书目解题》第三种“族谱类”写得最好。书仅一册，是“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编印。此解题以各族派源流迁移为主，修谱经过、内容大要、祖祠、祭祀公业等为副，后略述各谱特色及资料价值。整整一本，三百四十六页，费时两年，写了四十三篇黄氏族谱的解题，每篇六千至万字，真是详细之极。这种解题对于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所以前几年，我写了一篇《其始也简 其毕也巨》专门介绍此书（见《书城风弦录》）。

“哈佛燕京”善本书库内有中国家谱六十五部（普通书库不计），最早者推明嘉靖十九年（1540）休宁程氏刻《休宁荪渚程氏宗谱》。其他的皆为清代之本。清刻本中也有数种为国内所无者，那是我曾查过《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和《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而知道的（前目不包括上图所藏）。如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灰汤蒋氏族谱》不分卷、清光绪八年（1882）崇仁堂木活字本《桃溪黄氏宗谱》四卷、清光绪三十年（1904）集义堂木活字本《周氏宗谱》八卷、清同治八年（1869）世清堂木活字本《杨锺氏宗谱》十二卷、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修五十二年（1787）续修道光九年（1829）补修诒穀堂木活字本（萧山）《郎氏宗谱》四卷、清同治四年（1865）世德堂木活字本《璩氏族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等十多部。至于清代的稿本也仅有五部而已。抄本多部，有一种是《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不分卷，十五册。书口上书“钮祜禄氏家谱”，红格。首二册为勋绩，盖始迁祖额宜都，十九岁即追随清太祖，崇德元年（1636）赠开国佐运功臣，追封弘毅。

近年来，家谱汇刊印得不少，最大宗者或为《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共收一百四十部，一百册。第四十九册开始为韩国家谱，共五十册，收六十一一种谱。我将之和哈佛

燕京图书馆所藏相较,则差之甚远,盖“燕京”有四百八十六部韩国家谱,占此《丛刊》大部。我曾询之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郭又凌先生,郭说:韩国家谱多藏吉林延边自治州图书馆,是借摄的。当然他也想不到“燕京”居然有那么多。

2008/3/7

翁同龢批校本《常熟县志》

1949年以前的中国地方志，据统计大约在八千种左右（含各种刻本、稿本、抄本、石印本等），而收藏最多者应推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无可置疑的。十年前，我曾做过一件很笨的事，就是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著明为北京图书馆所藏者做了个统计，结果得出的数字为六千零六十六种，如若舍去1949年以后所补充的传抄本、胶卷以及新印本，大约为五千种左右。而上海图书馆所藏为五千四百种，打个折扣的话，或在四千余种。这是国内大馆所藏的数字。像“哈佛燕京”这么个设立在大学里的东亚图书馆，如和大馆相比的话，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哈佛燕京”藏原本地方志仅有两千八百种左右（近些年来出版的新方志收藏最多，那是北京国图和上图都莫能望其项背的，即使是中国社科院图书馆也只能屈居其下），这些方志中乾隆及乾隆以前所刻的大约近八百种，“哈佛燕京”都将之列入善本书了。我曾将这数百种方志略翻一过，发现还真有数十种难得的本子，这里先介绍一种《常熟县志》。

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的《常熟县志》，计二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高士叙、杨振藻修，清钱陆灿等纂。十册。前有康熙二十六年杨振藻序、康熙二十六年钱陆灿序。凡例十则。有修志姓氏。并有扉叶，刻“常熟县志 康熙二十六年重修”。

有道是太平盛世，方大规模纂修地方志。此志之纂修，乃因康熙帝御世二十二年，海内又安，武功耆定，慨然思成文治，故命儒臣修一统志，以资御览。又诏各地督抚檄文郡县，修辑志乘。常熟为吴会岩邑，巫咸虞仲之故墟，季札子游氏所游处，人文历史悠久，山水交辉，景色秀丽，物产资源丰饶，皆享誉江南。*

常熟有志，自宋令鲍廉撰于宝祐间，分类为十，成十五卷，元卢镇续修之，即为《琴川志》，所载止于宋代。明初张洪更辑新志八卷，惜皆不传。弘治年间桑瑜纂有《常熟县志》四卷本，至邓拔纂十三卷本、管一德纂十八卷本、姚宗仪纂二十八卷本皆载笔于嘉万之间，今皆存传本，文献则赖以取征。至于崇祯龚立本纂十五卷本，仅有抄本流传。

此康熙本为清代第一刻，距崇祯时已近五十年之久，纂修者高士叙，字冕侯，北直隶滦州人，康熙二十一年二月至二十三年十月任常熟知县，任上做了不少好事，但因“诬误降调去任”。他的生平可见是志卷十五宦迹。接续的高登先，在任仅半年，即升直隶涿州知州，所以完成此志的是杨振藻。杨号讷庵，辽东复州人，康熙九年进士，初任山西祁县知县，二十四年十月至二十六年五月任常熟知县。

杨振藻序云：“前令冕侯高君，崇请邑献湘灵钱君董其事，佐之以王严诸子，皆博物君子，具良史才。而雠校之际，其难其慎，期于征信，

* 本段与下段文字，系综合数种资料辑成，未及再查考，希读者鉴谅。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常熟县志》

而不期于速成，故泚笔于癸亥之五月，至丁卯三月而始告竣。”钱陆灿是常熟举人，生明季，为诸生，有名于时。其治经，长于言易，为诗古文皆工。客游扬州、金陵几三十年，俨然人师。弟子著录者数百人，率一时知名之士，乡里后进从之，取科名声誉者甚众。其为牧斋族孙，牧斋存时，绝不仰其余光，且讥依倚谦益者。自谦益长东南文坛数十年，陆灿以一穷老书生继之，巍然领袖一方，也可见其成就不凡。陆灿著有《调运斋集》，又辑《列朝诗集小传》别行，补苴是正，为功不少。* 癸亥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丁卯为二十六年，该志自开局修志到完成，共用了四年。陆灿卒于康熙三十七年，年八十七，则此志刻成时，已七十六矣。

此志卷一建置沿革、分野(祥异附)、疆域(形胜附);卷二山、水;卷三城池、官署(仓库附);卷四学校(书院附)、祠祀;卷五乡鄙、市镇、坊巷、桥梁;卷六水利、户口;卷七至八田赋;卷九徭役、税课、风俗(方言附)、物产;卷十官师年表(县令、丞、簿、尉、教职);卷十一选举年表(进士、举人、贡生、荐辟、武科);卷十二封赠、恩荫、监仕、掾仕、兵防(平寇附);卷十三坛庙、寺观;卷十四古迹(名胜附)、第宅(园林附)、陵墓;卷十五宦迹;卷十六至十八人物(邑人);卷十九人物(忠节、循吏、孝友、义侠);卷二十人物(儒林、文苑、武略);卷二十一人物(隐逸、笃行、耆硕、艺学、方技);卷二十二人物(列女、流寓、仙释);卷二十三艺文;卷二十四集诗;卷二十五集文;卷二十六杂记。首一卷为图(县境图二、县治图二、黄官图二、东仓原图一、南仓原图一、虞山南境图二、虞山北境图二、九乡图二)，末一卷为旧序。

* 本书中部分人物小传，乃从数种人物生平资料中辑得，未及再查考，希读者鉴谅。后不一一注出。

包括日本所藏，康熙本的《常熟县志》存世大约有二十余部，因为流传较多，所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没有收录。然而，“哈佛燕京”藏本却因有翁同龢的批校，而显得较为珍贵。在每册封面上均有翁同龢手书书名及卷中内容，如第一册为：“常熟县志一。共十本。康熙二十五年修。钱湘灵编辑。建置沿革、分野、祥异、疆域、山、水、城池、官署、学校、祠祀。”又每册书根也皆为翁氏手书，书中又钤有“常熟翁同龢藏本”之印。

康熙志的编纂，“条分类晰，因桑志者什五，因邓管二志者什三，而参考异同、讨论损益，则龚刑部立本、姚文学宗仪两家私志兼有资焉”。此志十册，翁氏批校甚多，当山居期间所为。翁氏读完此书，在凡例第一条上批有“大略取龚志为多”。卷十五宦迹有曾慎传，文中有“又按《伯广记》，慎初名构，字叔重，清源人。

而各志俱称慎或曾改名，或传写误也”之语。翁氏有按语云：“龢按：是避高宗讳而改耳。”在多处书眉处批有“墨点者以龚志校”。卷十四第宅“副使杨仪宅在迎恩桥东北，有



万卷楼”下，翁书：“楼凡三楹，旁有菖蒲房。”陵墓“言偃墓，《史记·吴世家》注：子游墓与仲雍冢并列。今封树在影娥川北岭上，为邑令杨子器所筑”，此条“北岭上”翁批：“相传即半山亭址。”又“所筑”改为“所设”，并批：“此设字有关系。”据此，翁氏所校底本，当为崇祯龚志也。

翁同龢为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一甲一名的状元公，同光两朝的帝师，官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翁

畫安秀異之乞以為嗣公盡創
 異藻思日發應神童科長乃博極尋
 通浙西憲司碑為棟史憲後錄
 也一日著道士服持文書白事憲
 引去自是絕意仕進放浪湖海所
 三教堂於吳門高僧方士多護
 存前論性命之理愛枕之南山
 為終老計已而倦於應酬歸
 山水師董源晚年變其法自成一家
 以詩酒發其高曠日浩一髮歸於

翁同龢批校手迹



被慈禧削去官职，离京回籍。岁末，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编管。这一年，翁年六十九，次年移居虞山鹤鸽峰下之新居——瓶庐，并在此度过了他的晚年。翁氏工书法，“早岁由思白（董其昌）以窥襄阳（米芾），中年由南园（钱沅）以攀鲁公（颜真卿）……亦时采北碑之华，遂自成家”（马宗霍《霁岳楼笔谈》）。戊戌以后，静居禅悦，书法益横肆，不受羁缚。杨守敬尝云：“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无一稚笔，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洵不诬也。”此志上之翁批，皆为小字，纵意所适，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

翁氏批校此志似于其时纂修常熟志稿有关，盖光绪二十六年（1900），常熟、昭文地区之在籍官绅如邵松年、庞鸿文等人纂修《常昭合志》，聘翁助审志稿。四年后，即光绪三十年，《常昭合志稿》成，并有活字本行世。然而遗憾的是，翁氏却于是年七月去世，不能一睹新志了。翁氏对于常熟志书曾多有参阅，今存翁氏题跋批校者即有七种，一为《琴川志》十五卷，清抄本，有翁校并跋，藏北京国家图书馆；二为《皇明常熟文献志》不分卷，明万历刻本，有翁跋，也藏北京国家图书馆；三为《海虞别乘》不分卷，清赵氏旧山楼抄本，有翁跋，藏上海图书馆；四为《常昭合志》十二卷首一卷，清嘉庆二年（1797）刻本，有翁批校，藏南京图书馆；五为《常熟县志》十三卷，明嘉靖十八年（1539）刻本，有翁批并传录冯复京事略一则，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六为《常熟私志》（存三卷），旧抄本，有翁题记，也藏台北“国家图书馆”；七即为此康熙本《常熟县志》。

2008/8/28

《文庙思源录考》小记

此书为清麻兆庆撰，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二册。有图。前有光绪二十一年荣恒序、光绪二十年麻兆庆自序。又有扉叶，刻“文庙思源录考 光绪甲午桂秋燕平书院藏板 麻兆庆敬书”。因“哈佛燕京”书库空间有限，大量图书移往后备书库储存，所以在即将送走时，我就赶快翻一翻。

文庙即孔子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此可见《旧唐书·玄宗纪下》。元明以后通称文庙。《元诗选》方回《桐江集》中《前参政浙西廉访徐子方得代送别》诗有云：“武林增炳焕，文庙郁岩峩。”

麻兆庆，号馥斋，又号巩华旧友，北京昌平人，回族。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秀才后，在直隶、河北、山东军中做幕僚。后因母亲年高多病，就辞官还乡，做了教书先生。麻氏家有榆荫堂，著有《昌平外志》，那是他遍历昌平数百个村庄，用第一手资料，前后十二年，六易其稿方才完成的。1992年，姜纬堂用刻本

文廟思源錄攷

只六帝甄大

又立嚴烈神

至百吳尊其四

大成殿

至聖

先師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娶魯國陬氏季康子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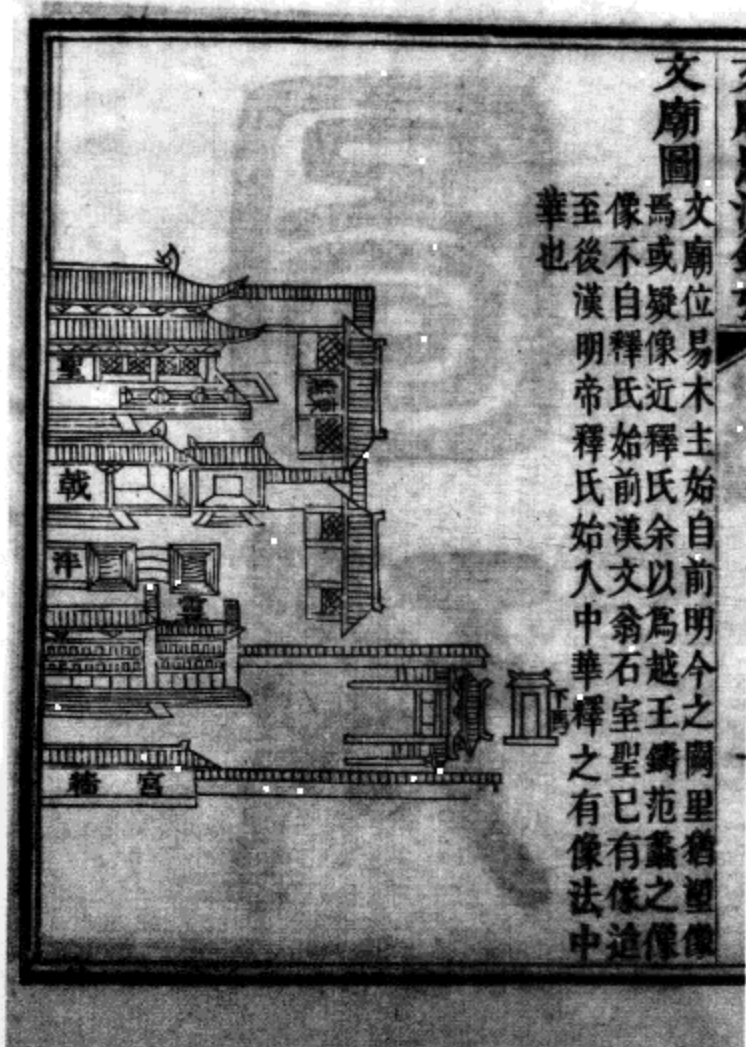
妾生孟皮孔子之兄有足疾不在祀事嫁於顏氏

之女名徵在顏氏既病見蓬私謂尼丘山嶽華十月

月於朔望壬二十六年

漢人本姓字
世系考

清光緒二十年(1894)刻本《文廟思源錄考》



文廟圖

文廟位易木主始自前明今之闕里猶塑像
焉或疑像近釋氏余以為越王鑄范蠡之像
像不自釋氏始前漢文翁石室聖已有像迨
至後漢明帝釋氏始入中華釋之有像法中
華也

知

心

PDG

重加整理校对，由燕山出版社出版。

清代关于文庙之书有多本，可见《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麻氏写此书是因为张西山有《文庙考略》，后叶广文又有《文庙思源录》，较《考略》加详，但其中之阙如者非一（张、叶、麻三书，《拾遗》不载）。麻兆庆于是“强饭之暇，辄搜罗历代诏赞乐章，并采集阙里文庙殿庑、戟门、泮池、灵星、文昌、魁星、下马碑诸考，附之于后，以广厥源，兼摩绘文庙祀位、陈设祭器、乐章各图，冠诸简端，以备省览。至近续祀位，遵照公牒按次增入，余惟恪遵叶文，录不增减，间有所见，附案以别”。麻氏检校捃摭之功，六阅月而稿始脱。

荣恒序云：“麻君馥斋，昌平州人，非公不至，有澹台子羽风。恒摄州篆，下车月余，访州人士，交口称麻君名勿衰，因得接晤。暇时出其所订《文庙思源录考》相示，恒受而读之，虽著录悉本前人，而考定详审，足以补苴罅漏。并增附祭器、礼仪、乐章，以及戟门、泮池、文昌、魁星诸考，以广厥源。使学者读之，慨然想见古圣先贤之得享隆名、膺崇祀，其来有自，用是争相濯磨，于以楸躬行而敦实践，则是编之有裨于世教人心者非浅鲜也。”

此书并不怎么样，记下此书是因为书后有“捐梓姓氏”，也即此书刊刻，需有经济力量作为后盾，方可付诸剞劂氏。麻氏为读书人，并不富裕，所以只好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去求人资助。从姓氏上看，大部分是商号拿钱出来，共十六家，计银三十六两。个人名义捐银者十三人，计银三十二两。总共六十八两银子。捐银最多者为五两，是麻氏老乡昌平廩膳生员蓝枚。捐三两银的有四人，多数是二两，也有出一两的，仅一家。书前有题“赵永命、包建道、刘成庚倡梓”。赵为山西

文水人，从九品衔，捐银二两；包为山东海阳人，监生，捐银二两；刘为宣化延庆人，文童，也捐银二两。

我不太清楚当时纸张的价钱，写工、刻工的工钱，用了多少纸张，印了多少部，因为没有记载。看来，六十八两银子，也不算多，比我想象的要好，总之有钱好办事，书也就会印出来。前阵子翻书，也翻出一些书后有“捐梓姓氏”的书，复印了些材料，将来有暇想想再写，因为这些都是中国印刷史、出版史上的材料，虽然零星，却是弥足珍贵的。

2008/1/14



清代彩绘本《黔苗图说》

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吧，看过一个电影，片名叫《芦笙恋歌》，具体内容记不大起了，但是那苗家悠扬悦耳的芦笙吹奏声，还有些印象。苗族也算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西南地区的土地上，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化。

前些时，翻了几本《黔苗图说》，都是“哈佛燕京”收藏的清代彩绘本，为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生活之图谱及解说，最多的一本有图八十二幅，右图左文。经折装。其他的有五十七图、四十一图、四十图、三十八图等四种，亦右图左文，有的文末还附诗一首。图为写生，文则记实。所绘为少数民族之活动区域、生活情景、耕种狩猎、婚丧习俗等，图文并茂。清李宗昉《黔记》卷三云：“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作。闻有板刻存藩署，今无存矣。”而今刻本久湮，故今存之本，全为传抄之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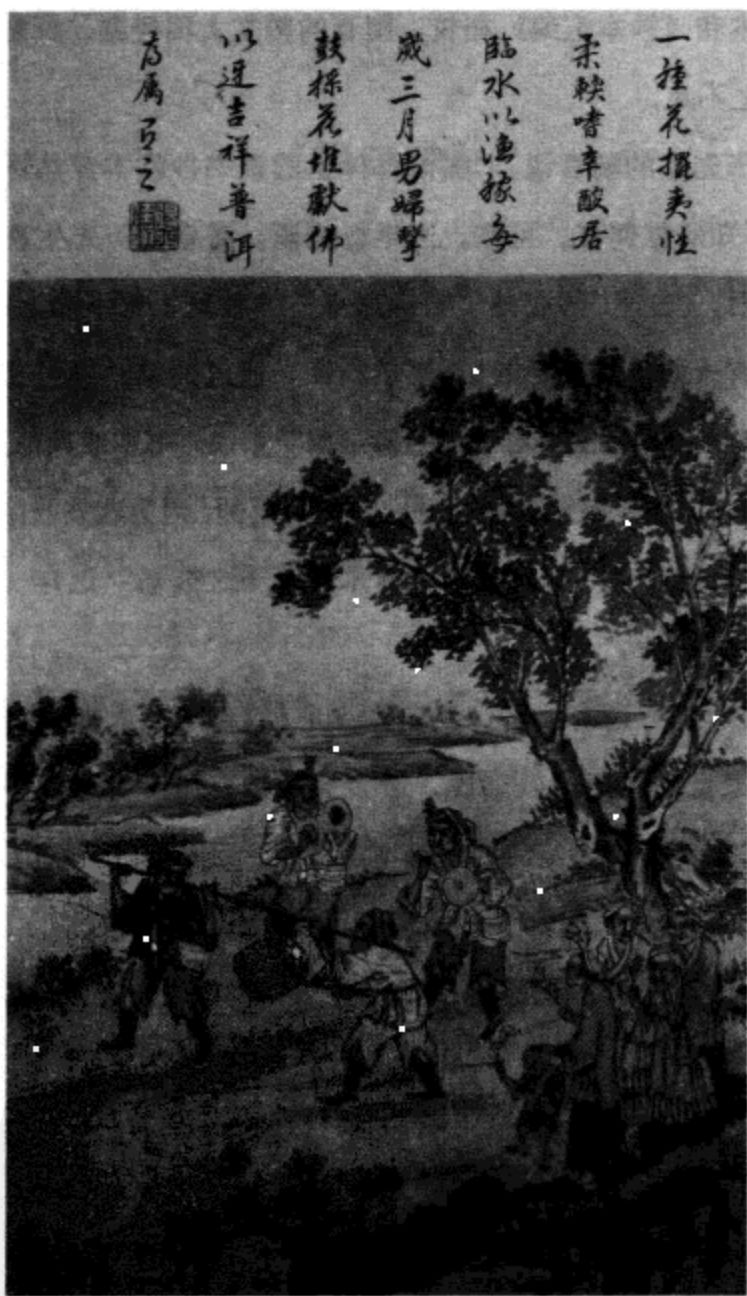
如八十二图本，计猓猓、女官、白猓猓、宋家、蔡家、卡尤猓家、

补笼狃家、青狃家、曾竹龙家、狗耳龙家、马镫龙家、大头龙家、种花苗、红苗、白苗、青苗、黑苗、东苗、西苗、夭苗、狃苗、打牙狃猪、剪头狃猪、猪屎狃猪、红狃猪、花狃猪、水狃猪、锅圈狃猪、披袍狃猪、木狃猪、狃獠、夔人、蛮人、土人、尚人、獠人、杨保苗、狃獠苗、九股苗、番苗、紫姜苗、谷蔺苗、阳洞罗汉苗、克孟姑羊苗、洞苗、箐苗、冷家苗、洞家苗、狃家苗、额子、白额子、冉家蛮、九名九姓苗、斧头苗、洞崽苗、八寨苗、清江黑苗、楼居黑苗、黑山苗、黑狃家、高坡苗、平伐苗、黑生苗、清江狃家、里民子、白儿子、白龙家、白狃家、土狃猪、鸦鹊苗、种葫芦苗、洪州苗、西溪苗、车寨苗、生苗、黑脚苗、黑楼苗、短裙苗、尖顶苗、郎慈苗、罗汉苗、六洞夷人。

第一图猓罗云：“本卢鹿而讹。在大定府属。有黑白二种，黑者为大，白者次之。又名乌蛮罗鬼。亦有文字，类古虫书。好射猎，畜良马。谚云：‘水西罗鬼，击头掉尾。’言相应之速也。”第八十二图六洞夷人云：“在黎平地方。妇女爱穿颜色衣裙，花尖鞋。未婚者，剪衣换带，卜吉而嫁之，约邻近女子执布伞送往，名曰送亲。至男家，欢饮唱和三昼夜。偕新妇归母家，与妇同宿，生子方过聘。女善织纺，男读书。丧葬礼，多与汉人同。”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之本最多，达十一部，题名多有不同，图亦多寡不一。1973年，史语所慎选其二，题为《苗蛮图集》，付诸影印。影印本前有芮逸夫先生序。

大陆收藏当有若干部，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海图书馆藏《黔省苗图全说》，天津图书馆藏《黔省苗民俗图解》，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有人藏。200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庭硕、潘盛之等编著《百



《夷人图说》中的花摆夷

苗图抄本汇编》二册。此《汇编》经过八年的努力，收集了十一个抄本并做研究，终得完成，是研究《百苗图》最重要的著作。如果拿“哈佛燕京”藏本和《抄本汇编》相较，则有的图文大相径庭，真是可补《抄本汇编》之不足。

宋蜀华先生的前言说，“国内外传世的该书抄临本竟然达一百七十多种”，不知所据何在。可惜，当年杨庭硕、潘盛之等先生在版本的查询和收集时，并不了解海外“哈佛燕京”的收藏，也不知上图、津图、北大馆也有入藏（包括台北），不然的话，通过关系，当可获得近二十种的不同绘本。实际上，对于“哈佛燕京”来说，书本或其他文献资料，包括善本书，所有的收藏都是为研究者所利用的，因为这些收藏都是“公器”，而“哈佛燕京”则是秉承“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样一个宗旨为读者服务的。

“哈佛燕京”还有三种《滇苗图说》（或称《夷人图说》），那是清代云南苗家生活之图谱及解说，最多的一本有图一百零八幅，其他为五十四幅、三十六幅不等。此等绘本于贵州、云南地区苗家历史及住所、狩猎、饮食、婚姻、服饰发展和演变以及文化、风俗习惯之内涵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当然，说明文字中有不少丑化苗家的语言，那就是糟粕了。

2008/2/4

《飞白录》

星期六的上午，像往常一样，仍去图书馆的普通书库看书，一口气翻了近百部线装书，呵，居然又找到两部可以作为“善本”的书（这是附带的，并非着意去找）。善本的标准是按照哈佛燕京图书馆过去定下来的，即乾隆及乾隆以前的刻本，或是乾隆以后所刻的较为难得的本子。这两部书是《淮关统志》和《飞白录》。《淮关统志》十四卷，清伊龄阿、吴霖纂修。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淮关刻本。六册。国内仅北京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入藏，流传不多。而《飞白录》是一部关涉书法的专著，二卷，清陆绍曾、张燕昌辑。清嘉庆九年（1804）海盐黄氏擘荔轩刻本。将此书略加细翻，倒还有些意思。

《飞白录》，是讲书法中“飞白体”的书，仅二册。半叶九行十九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书口下刻“擘荔轩”。题“吴趋陆绍曾 海盐张燕昌同辑 同里黄锡蕃参订”。前有嘉庆九年刘星高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入藏。传世亦不广。



清嘉庆九年(1804)刻本《飞白录》

飛白錄卷上

南陵徐乃昌校勘



書齋



印

吳趨陸紹曾

海鹽張燕昌同輯

同里黃錫蕃叅訂

漢

蔡邕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張懷瓘書斷案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丈字宜輕肥不滿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

飞白书相传始于后汉蔡邕，为汉字书体之一种，笔画中有丝丝露白，似枯笔所写。据唐张怀瓘《书断》记载，灵帝熹平时，诏邕作《圣皇篇》成，诣鸿都门，时方修饰，见役人以垩帚成字，甚悦，归而作飞白书。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云，“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故名。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飞白本是宫殿题八分之轻者，全用楷法。”想写飞白者当需特殊之笔，除垩帚（粉刷墙壁的用具）外，或以木，或以毡，或以散毫，据云近时有用竹片作飞白者。

自邕后，代有传人，且见于前人著录者甚多，然未有汇为专书以资考证者。此《飞白录》搜辑颇详，自汉迄清，凡古今人之工飞白书者大致尽于是。为汉二、魏一、吴三、晋九、宋一、齐四、梁五、隋一、唐十七、宋三十五、金一、元二、明九、清十二，共一百零二人。所引之书，皆注所出。陆绍曾、张燕昌所附按语，各署其名，体例也善，间有考订，亦不苟作。

书的作者陆绍曾，字贯夫，号白斋，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尝得白玉蟾像，悬之斋中，因号白斋。工篆隶书，尤善蝇头细书，晚年好飞白。精于赏鉴，平生所见书画碑帖，皆为抄录成编，曰《续铁网珊瑚》，并作小楷书，其精勤于翰墨如此。家道中落，往往携所作书画入市，得资可供数日餐，则楮户不复出，资罄复入市。又有《不惑编》、《游杭书画录》、《刻碑姓名录》等。《书人辑略》卷七有传。

另一位张燕昌，字芑堂，号文渔、金粟山人，浙江海盐人。幼从朱笠亭。天资颖敏，读书日记千言，过目辄成诵。长而蜚声黉序，品学粹然。乾隆四十二年（1777）优贡生，举孝廉方正。性好金石，自周彝汉鼎禹碣宣鼓，以及近代高人韵士之遗刻，殚心搜罗，不遗余力，嗜古甚深，

善八分、行楷书，儻然越俗，别有意趣。又工飞白，飘逸有神，古致磊落。写兰得陈古白意，也善山水人物，篆刻为丁龙泓高弟。又有《续鸳鸯湖棹歌》、《金石契》、《石鼓文释存》等。《书林藻鉴》、《清画家诗史》、《续印人传》有传。

刘星高序有作者编撰此书之大旨，云：“海盐黄椒升先生究心博雅，与其同里张文渔先生、吴趋陆白斋先生并以飞白擅名。虑好古者不能尽法师承，爰广为搜辑，自中郎至今若干人，序其世次，若谱系焉。上而帝王，下而卿相，以及草莽之士，凡见于鉴史及各家诗文集录者，悉以登记，阙者仍之，或加以按，而各署其名。盖古今之人能、人妙、人神者，皆载是书，标其名曰‘飞白录’，务纪实也。今而后，同志之士得是编而展玩之，并神壹志，以求其工，将握管而飞，则亦如风之遇云，波之遇风，且并知自古及今，其为云也凡几，其为波也凡几，无不可悉而数也。”

此本有扉叶，刻“飞白录 嘉庆九年镌 擘荔轩藏板”。卷上及卷下后均有牌记，刻“嘉庆甲子年海盐黄氏校刊于三山官舍之擘荔轩”。此黄氏即黄锡蕃。后附张燕昌《论飞帛》一篇。锡蕃，字晋康，号椒升，浙江海盐人，钱大昕弟子。精鉴赏，工八分书，擅篆刻，尤好蓄古印。黄锡蕃于嘉庆三年（1798）应京兆试，五年，以布政司都事至福建，署上杭县典史，十年后辞疾归。此书之刊刻，当为黄锡蕃闽中所为，擘荔轩应在官舍中。

按，民国沈光莹辑《静园丛书》（1918年排印本）中收有《飞白录》。现代学者中研究飞白最有成绩者推容庚先生，容先生于四十年代对中国罕见字体尤多留意，曾著《鸟书考》，1947年又撰《飞白考》，并以飞白书二十一家补《飞白录》之不及。容文见《容庚文集》。

此书为徐乃昌旧藏，书中钤印有“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积馀秘笈识者宝之”三印可证。按，徐乃昌字积馀，安徽南陵人，熟精簿录之学。缪荃孙曾云，徐氏“学问淹雅，收藏富有，冠冕江南”。光绪十四年(1888)，缪与徐相晤于北京琉璃厂书肆，徐谈及经籍目录，如瓶泻水，致缪大有“余心佩焉”之概。徐氏藏书甚多，据云有百三十二箱，约数千种。1946年徐卒，诸子分析遗书，后多散诸书肆，此《飞白录》是其一也，后为“哈佛燕京”购得。

2007/12/10 初稿

2008/9/16 修改



清康熙刻本《曹氏墨林》

清代徽墨著名者有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四家，曹素功居“四家”之首，民间亦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说。三百多年来，曹素功墨以质量装饰上佳及挥写咸宜而驰名于世。据说曹氏墨配方严格，用料讲究，工艺精良，主要原料为桐油，附着力极强，另外加上麻油、猪油、广胶、天然麝香、梅片、冰片、珍珠、金箔以及其他名贵中药香料，运用传统工艺，共经炼、搅坏、翻凉、描金等十二道工序，精制而成。素功墨色泽如漆，黝黑之中泛出微微紫光。康熙间户部右侍郎徐诰武云：“友自歙至，赠以十笏，余研而试之，光彩照人，藻耀夺目，不啻隋珠赵璧，肆映左右，洵天下之至宝也。”

曹氏制墨有名品十八种，为紫玉光、天琛、苍龙珠、天瑞、豹囊丛赏、青麟髓、千秋光、笔花、岱云、寥天一、薇露浣、非烟、香玉五珏、文露、紫英、漱金、大国香、蓝烟。又有隃麋墨、第一墨、瑞庆墨、大士像赞、依园图、富贵图、天台十景、西湖十景、霍甘园、新安名胜、列宿图、潇湘八景、九畹芬芳、竹燕图、手卷、妙品、万年红等十八种。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曹氏墨林》

藝粟齋墨品贊

紫玉光

應運而生玉淨紫光名我康倫天下
超異過沈獨擅東長國以黃龍煥
芬芳馥郁容緻堅剛先為世寶全玉
崑山徐乾學侯居氏題

总计三十六种。

记载名家制墨之书不多，吴昌绶的《十六家墨说》、陶湘的《涉园墨萃》（收十二种）是其中之最著者。而曹氏制墨，时人多有推崇。前见《曹氏墨林》二卷，即为清康熙间文人为曹氏制墨投赠诗文华章，由素功哀辑成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曹氏制墨“不似方、程诸家，以夸多斗巧为事，而大抵适于实用，故士大夫颇重之”。按，此书为曹圣臣辑，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自刻本。四册。半叶六行，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前有刘楷序、仇兆鳌序、孙勳序、康熙二十七年曹圣臣自序。末有高层云跋、赵执信跋、康熙二十九年（1690）耿际跋。

曹圣臣，原名孺昌，字昌言，一字荃庵，号素功，安徽歙县人。系出谯国世裔，生负异征。及长，攻举子业，过目成诵，人啧啧称之。其后以明经贡于乡，授藩幕。家居数十年，读书谈啸，与诸名流交，间亦静坐小窗，教养子弟。雅擅多才，于古文辞、丹青翰藻，靡所不精。工于制墨，继程、方而起，声重燕台，都人无不知之。康熙帝临幸江宁，进呈所制墨，帝赐紫玉光三字，后充贡选。后曹氏后裔列肆于皖及吴门。圣臣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昔人谓古墨与黄金同价，年愈远而声价愈重，好事者虽断圭折璧亦争购得之。赏鉴家遇旧拓碑版之精者，必辨别墨色，以征年代之远近。至于名人字迹，也以墨色为定衡。故所谓黑玉乌金，尤为近世所珍。古墨之著名者，南唐有李廷珪父子墨，明有方于鲁、程君房等墨，清代诸名家不胜指数，而以曹素功为著。

是书前为艺粟斋墨品赞，计徐乾学、陈廷敬、孔毓圻、翁叔元、彭定求、高士奇、曹贞吉、陆肯堂、阮尔询、查嗣韩、冯云骥、耿际、曹禾、

曹广等题。又孔毓圻、陈廷敬、蒋弘道、徐诰武、周弘、徐乾学、赵廷珪、丁廷樾、彭定求、翁叔元、冯云骕、钱三锡、张士甄、宋莘、汪灏、李应廌、李懋、李天馥、冯廷樾、王鸣、高士奇、孔毓埏、马教思、王承祜、米汉雯、朱彝尊、蔡升元、吴涵、金德嘉、孙岳颁、许汝霖、周金然、胡作梅、江蘩、陆肯堂、黄梦麟、刘伟、查嗣韩、张豫章、王绪祖、张登举、曹贞吉、谢铎、邢谦、靳治荆、陆鸣时、顾宸、胡宗鼎、汪晋徽、洪琮、王仕云、吴苑、阮尔询、曹禾、曹广、丁克懋、苏应秋、宋嗣京、汪锜、凌一飞、王绅等序、引、歌、记、铭。

此编文词藻丽，书法高古，皆出于其时名公之手，于墨及曹氏之研究，皆有参考价值。扉叶云：“墨林初集。本斋制墨，承诸名家藻鉴，锡以瑶章，珠玑错落，集成墨林。以投赠先后为次，不及序尊，幸祈原宥。艺粟斋曹素功氏谨白。”钤有“艺粟斋”印。按，《十六家墨说》内有《徽歙艺粟斋墨品》，列有墨名及价钱，后附按语。

曹氏制墨之史料甚少，曹圣臣自序亦可参考。有云：“余垂髫癖嗜客卿，尝欲聚天下之名烟，袭而藏之，以供把玩。凡得一丸半笏，不敢轻置以负所好。惟时程氏以墨名，天下珍之久矣。余与程氏世好，故程墨余得肆藏焉。然恐拘于一见，不足以上溯古人，因取秦汉而下以墨名者，不下数十家。第未一覩以慰饥渴，徒博空名，以为口实，良足悲矣。嗟乎，物往名存，又焉之非古人之幸耶？”“会熙朝定鼎，首重右文。余方刻意芸窗，副作人之雅化，一二嗜好，谢去不事。迨岁缠乙未，始受知于李衡文。越五年，以明经贡于乡。又七年，授藩幕。考选有定期，不得即入仕版。家居多暇，复寻旧好，用是选烟、修药、计杼、和胶，直欲追踪古人，而垂示来兹者也。”“今年春，铨部截留，余诣燕台谒选，得

晤当代巨公，索我麈尾，而宠以翰藻歌赋序跋词引记赞以及墨铭若干首，辑成一帙。或才如屈宋，或书拟欧颜，披对之下，如身置玉山，灿然琳琅之夺目也。臣不敏，从诸大贤后，得此彪炳之书，敬登梨枣，以示同志，俾后之君子有所取则焉。”

时人米汉雯对曹氏的评价是：“品行高洁，人咸称为有道之士，且诗画篆隶皆入能品。”冯云骕亦云：“新安曹子素功，读书探奇士也，由明经授藩幕，需次之余，寓意于墨，炼质既精，取式尤古。始以自娱，继乃公世，海内临池家莫不珍异之。因共知曹子为以墨名世者，而不知墨乃曹子之余也。曹子学极醇，才极富，怀抱利器，未展厥用，而因其余闲，出其余力，殚精研思，穷极变化，一似不欲稍为留余者。而墨之制，亦遂真觉无余憾矣。”

墨为文房四宝之一。前人造墨，不惜工料，千锤百炼，始底于成。今人若偷工减料，只求速不求质，制出之墨墨色灰淡，殊无光彩。据载，素功所制，坚如金玉。其孙西侯去京师，携其家所制以惠士大夫，人视之其色黝，试之其光炯，掷之则其声铿，故为世宝重。高层云云：“新安曹子素功，深得喻麈三昧，选材取法，咀英吐华，无美不具，临池一试，觉程方诸君皆可废，盖廷珪后一人也。世之识者，宜共宝之。”可见昔人亦有精品意识，后出转精者则更为人所看重。

自有墨以来，就有收藏者，人称“墨癖”。宋德洪《石门题跋》中《跋达道所蓄伶子于文》云：“司马君实无所嗜好，独畜墨数百尔。或以为言，君实曰：‘吾欲子孙知吾所用此物何为也。’达道之畜书，其亦司马之墨癖也。”如今佳墨至稀，旧墨难得。光绪间，墨亦成古玩，价等兼金。昔读《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内有1942年间，张先生为生

活所困，想将所藏旧墨出售事，云：“迩来生计日艰，思效东坡之在海南，尽货酒器，以资衣食。弟藏有明万历、清顺治（此两种真贋未敢决定）、嘉庆及同光间之旧墨，亟思售去。因思今亲湖帆世兄驰誉丹青，当有需用之处。市上所售多用洋灰，色泽欠佳，必不能合名家之选。拟请于晤面时代为探问。如须购用，当以样品送请鉴定，乞勿道及为敝处所托。如不需此，尽可拒却也。”（按此信系张致顾廷龙先生者）后来是否成功则不得而知了。

叶恭绰于1921年至1931年间，颇喜搜集名墨。其时盛伯希藏墨已散，朱幼屏、陈剑秋（时利）等藏墨始出，袁珏生（励准）藏墨遂为一时冠。叶氏虽不以此名，然南北所收隽品不少，亦皆穷搜冥访，什袭珍藏者。海内藏墨者除袁氏外，潘博山承滂喜斋之后，所藏佳墨不下百五十笏，亦属巨观。据叶氏五十年代所统计，专以藏墨为事者，有潘博山、张纲伯、翁斌孙、袁珏生等三十八人，而今藏墨早已散出，难以窥见矣。

《曹氏墨林》传世并不多，此为“哈佛燕京”所藏。《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谱录类存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七十九册收入，底本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也有人藏。

此本钤印有“心齋”、“皎亭改藏”、“雪柯斋”、“雪柯”。

2008/2/5

《萝轩变古笺谱》背后的故事

在明吴发祥《萝轩变古笺谱》（下称《萝轩》）发现之前，所有谈古籍版本和中国版画史的书，都有一章专述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因为《十竹斋笺谱》是明末所编的中国最重要的诗笺图谱之一，其二百八十多幅图中，木版彩色水印，绘、刻、印，都非常精致，尤其是清供、花石、博古、雅玩等，运用“短版”、“拱花”等印制方法，成就极为显著。1934年，鲁迅、郑振铎曾予以翻印，后又编入《中国版画史图录》，影响至大。直到《萝轩》被上海博物馆正式收藏，人们方才认识到这部极其重要的国宝竟然重现人间。

这么一部在印刷史、艺术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的《萝轩》，《中华印刷通史》、《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籍版刻图志》等书中却只有寥寥数行的描述。我无意去专门介绍《萝轩》的价值，我想写的就是《萝轩》背后的故事。而写《萝轩》，就不能绕过徐森玉、方行二先生。

在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郑振铎先生就已经知道《萝轩》了。当年日本藏有《萝轩》的下册，没有序文（序在上册），日本方面的专家

大村西崖误认“萝轩”为清康熙年间的翁嵩年（号萝轩），遂考其生平，写了一篇考证文章，觉得这书很了不起，就将那下半部影印出版了，这实际上是闹了一场“吴冠翁戴”的笑话。据方行说，徐森玉、郑振铎看到了影印本，觉得不像康熙时的出版物，年代应该更早，但也拿不出证据。

1963年初春，浙江嘉兴南湖书画社的臧松年先生在海盐的高可安先生陪同下，在海盐沈荡花三十元钱购得一部《萝轩变古笺谱》，然后以四十元转让给了嘉兴古籍书店。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部当时夹着鞋样的二册古书竟然是一部属于国宝级的海内孤本。范笑我的《笑我贩书续编》曾记载，1974年，臧先生一次酒后和朋友闲谈时说起《萝轩》，两手比划道：“从沈荡回嘉兴的轮船里，戴上老花眼镜对着太阳看《笺谱》，妈妈的，才知道这可是了不得的真家伙！他说这话时咧开大嘴、瞪大眼睛的神态，至今仍使我难忘。”

《萝轩》上下两册，封面有“清绮斋收藏”题签，可知此书是清海盐张宗松、宗棣家旧藏之物。宗松，字楚良，号青在，别号螭庐、寒坪。国子监生，性耽吟咏。宗棣，字泳川，号藕村，又号思岩，尤工词。宗松、宗棣即张元济的六世祖。其家清绮斋藏书在当时很有名，所以马玉堂有诗咏清绮斋藏书云：“给谏文孙独冠时，雪钞露纂是吾师。醉心经典铭心画，清绮阁心夜漏迟。”（《续论书目绝句》之八）

《萝轩》为江宁吴发祥四十八岁时在金陵刻成。上册五十一叶，计颜继祖撰小引三叶，目录一叶，画诗十叶，筠蓝六叶，飞白六叶，博物四叶，折赠六叶，雕玉六叶，斗草八叶，杂稿一叶。下册四十五叶，计目录一叶，选石六叶，遗赠四叶，仙灵四叶，代步四叶，搜奇十二叶，龙种四叶半，择栖五叶半，杂稿四叶。早于胡正言《十竹斋笺谱》十九年，

且印得更精致，是目前传世的“笺谱”中，年代最早的一部。

《萝轩变古笺谱》中的“变古”二字，是很有意思的，变古为更改过去的法制和习俗之意，即不泥古，求发展，再创新的见解，或者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改革”。颜继祖“笺谱小引”云：“吾友吴发祥，性耽一壑，卜居秦淮之干；志在千秋，尚友羲皇以上。闭门闲白日，挥麈自如；饮酒读离骚，唾壶欲缺。尝语余云：我辈无趋今而畔古，亦不必是古而非今。今所有余，雕琢期返于朴；古所不足，神明总存乎人。自结绳易书，笔墨传于楮上；及系帛通问，笺柬出乎人间。或藻绩以争工，偏支离而入俗，于焉刻意标新，颛精集雅。删诗而作绘事，点缀生情；触景而摹简端，雕镂极巧。尺幅尽月露风云之态，连篇传禽虫花卉之名。大如楼阁关津，万千难穷其气象；细至盘盂剑佩，毫发倍见其精神。少许丹青，尽是匠心锦绣；若干曲折，却非依样葫芦。眼界顿宽，笑已陈皆为刍狗；图书有据，立不朽而奉耆龟。固翰苑之奇观，实文房之至宝。”读此序，我感到吴发祥是位真正的艺术家，他高于他人之处就在于推陈出新。

李克恭在《十竹斋笺谱》首卷的序言中云：“昭代自嘉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今日所见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学者尺牍用纸，“鲜华”者不多，而呈朴拙者常见，“哈佛燕京”藏明人手札七百余通可证之。也正是在朴拙的基础上，才可以提供智者进行突变的舞台。我不清楚李克恭和胡正言是否见到过《萝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吴发祥和胡正言都在南京，都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从事着笺纸艺术的升华和创新，说不准胡从吴的《萝轩》里曾得到过某种启迪。这还是留给艺术史研究者去做





研究吧。

那么《萝轩》怎么会到上海的呢？据范笑我告诉我，嘉兴的老干部史念先生是一位懂文献的有心人（后任《嘉兴市志》主编），他知道徐森玉先生是上海博物馆馆长，对文物字画乃至善本书的鉴定是一言九鼎的专家，周恩来总理曾推崇森老为“国宝”。史先生仰慕森老，就和另一位先生将《萝轩》专程带至上博，请森老过目审定。

徐森老是何等人物，他早年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博学多闻。1940年，他受教育部委托，在上海专门协助郑振铎鉴定收购善本以及点收善本的工作，二年中所见善本即达三千九百余种。森老见到《萝轩》，欣喜之极。他知道这是明朝天启年间的版本，是海内外仅存的孤本，是他和郑振铎梦寐以求的宝物！森老那时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他的脾气大得很。这不，老爷子发小孩脾气了，书不肯还了，一定要留在上海。这事马上就汇报到了上海市文化局，方行是主管上海社文口的副局长，图书馆、博物馆、画院、鲁迅纪念馆、中共一大等单位都归他管。方行这时也很为难，对老爷子是一定要礼让三分的，但浙江方面是来鉴定书的，不是来卖书的，老爷子又无论如何不肯还，怎么办？方行想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报告，因为他想到当时浙江省委宣传部的部长是上海调去的，先前是石的部下，好说话。于是，徐森老就说要去拜望石西民。方说石很忙啊。森老说没关系，我六点钟到石西民家门口去等好了。后来石找到方，说老方，那个老夫子找我要干嘛？方说如何如何。石说，让他千万别来啊，他老夫子六点钟等在我家门口不像话啊。方就请石和浙江讲讲看，请浙江省委宣传部做做工作。后来，浙江

方面和嘉兴商量后说，实在不行就交换吧。变通的办法是嘉兴方面开价要十六张明清书画。上海博物馆一口答应，最终以金农隶书轴、项圣谟梅花轴、钱载兰花图轴、郑板桥竹石轴、郑板桥行书轴、文徵明山水轴、李鱓焦石图轴、吴昌硕水墨水仙石轴、吴昌硕行书屏、吴昌硕岁朝清供、吴昌硕七言石鼓联、吴昌硕墨荷、蒲华梅花轴等，换来了这部《萝轩变古笺谱》。

《萝轩》出现于上海时，森老即嘱汪庆正先生让人把此书送到上海图书馆，请顾师廷龙先生、潘师景郑先生、瞿师凤起先生过目。我当时正杖随三位先生习版本目录学，踏足这个领域才三年。三位先生看了原书，都说好。可惜所议论的事，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书放了一天，顾老就让我将书送还给了汪庆正先生。

方行对于《萝轩》的归属上博，以及后来的重印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幕后推手。可以说，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文革”前，上博、上图所编印、影印的一些重要文献，如果没有方行的着力推动，那是不可能出版的，如上图印的《樊锥文集》、《词人纳兰容若手简》、《李大钊同志遗墨》等等。同样的原因，鉴于《萝轩》的艺术、文物价值，方行和森老等人就商量将此书交由上海朵云轩精印出版，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不久，森老被批斗，方行也成了阶下囚（方四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的家一度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所在地），印制工作也就无法进行。

森老因受迫害于1971年含冤去世。1973年，方行（关押了五年）因病保外就医，被释放回家。方恢复领导工作后，得知《萝轩》安然无恙，于是1981年，他决定请朵云轩把书按原样短版拱花套色翻印出来。

据方行回忆，当年曾参与印《十竹斋笺谱》的老师傅已经太老了，只能眼睛看看不能动手了，就招了一些青年人，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同时，方行还提出这项印制工作请谢稚柳先生总负责，每印一张都要谢先生点头才能用，结果被谢先生剔除了许多印得不太好的。

有一个小插曲也应该说说，当时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以及上博建馆三十五周年，赶着要将《萝轩》印出来，但印书的时间来不及了，要加班。当年加个夜班三毛钱，吃顿夜点心都不够，工人们都不愿意加班。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加班费涨到一块钱，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原因，《萝轩》如期印出来了，加班费和奖金一起发下去一千块。要知道，这一千块钱是方行从文化局纪念鲁迅先生的活动经费中设法挪用出来的。于是，上海市财政局有意见了，说加班费超过标准了，违反了财务制度，要从工人手里收回来。将付出的钱再讨回来，等于是收回泼在地上的水，这怎么行呢？方行坚决不肯，气得跟财政局说：实在不行，这一千块钱就从我工资里扣！后来方去找了一位副市长，财政局才撤了回去。可见，当年想做成一件事，真是不容易呀！

如今，我们看到的1981年上海朵云轩的重印本《萝轩》，已能重现天启原本之庐山真面，新本封面为赵朴初题签，内有郭绍虞序、谢稚柳跋，而方行却没有留下一个字。但郭序有云：“但森老之力仅止于是。至此后与原藏者商洽以明清书画十余帧易此孤本，使归上海博物馆，则森老固未必作此想也。迨书归博物馆，复拟复制以作鲁迅诞生百年之纪念，则更非森老力所能及，而为方行同志之措施，又明显之事实也。余所谓非关心社会文化不能知之者，正方氏之谓也。顾方氏以此属职分内当为之事，不欲表述以显其名，则未免矫枉过正。盖此本社会通力之学，不

能无筹备策划之人，故仍书以纪实云。”

上海的文博事业做得如此之好，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一个不漏，这都和方行在位时有莫大的关系。方行走了不久，我才收到方虹寄给我的讣告，看着他的遗像，我是很难过的。我了解方行的为人，举一个小例吧。有一年，我去探望他，只见他家客厅里放的都是旧家具，墙上挂的仅有一张赵朴初题的梅花。我问方行，您收藏字画吗？他笑笑说，我从来也没有向上海画院的老先生们要过一张画，所以他们的画我一张也没有。我是非常惊讶的，方行是主管上海画院的，从1955年至1966年，甚或他重返领导岗位，只要他一张口，什么丰子恺、朱屺瞻、唐云、陆俨少、程十发等等，都会送上门来，但方从不开例。顾师廷龙先生曾告诉我，他到北京休息后，曾送过一幅字给方行。他和方是几十年的相知朋友（方四十年代在上海时，曾去合众图书馆看书），方又是他的上司，但方从未向顾老要过一幅字。话扯远了，打住。

2008/6/4

《选集汉印分韵》

《选集汉印分韵》二卷，又续集二卷，清嘉庆二年（1797）至八年（1803）漱艺堂刻本。八册。半叶六行，四周双边，白口，无鱼尾。题“袁日省予三甫原本 南海谢云生摹录”。续集题“南海谢景卿芸隐纂摹”。前有嘉庆二年谢景卿自序。续集有嘉庆八年谢景卿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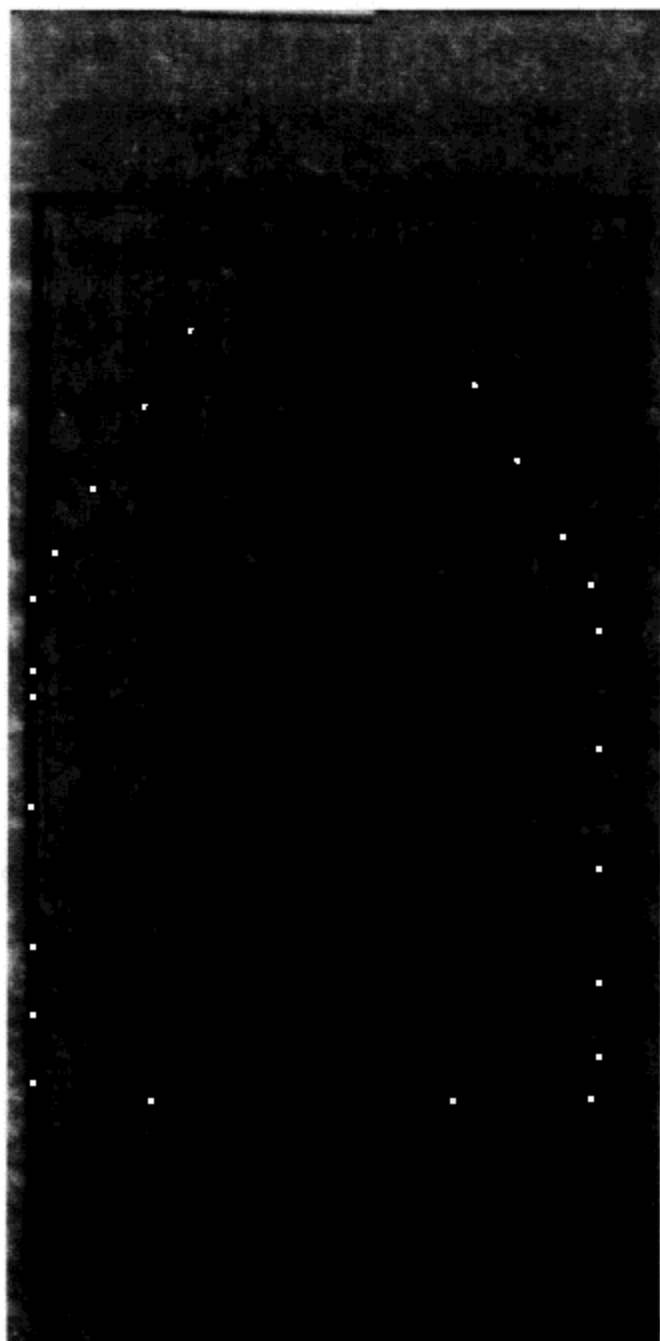
袁日省、谢云生、谢景卿的履历不详，只知道二谢是广东南海人，云生为景卿子。是编顾名思义，分韵排列汉印，分上平声、下平声、上声、去声、入声。诸家所集汉代古铜印谱之外，集字之书当推此本为最早。

印始于三代，盛于秦汉，方寸之地，实本六义，而古朴典雅，奇正迭呈，尽善尽美。汉印中我喜欢结体平直方正者，朴实，不尚奇，不尚巧，文字以平直的线条给人以美感，有的且具庄严典重之意，故后世之治印家莫不探源其印文而摹仿之。有人说，汉印的风味，好似陶渊明的诗，平淡，醇醪，久而不失其味，信然。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徐云叔兄来我家，他是篆刻大家陈巨来先生的弟子，那天，他要求我的二弟篆印必须多临汉印，这点我印象特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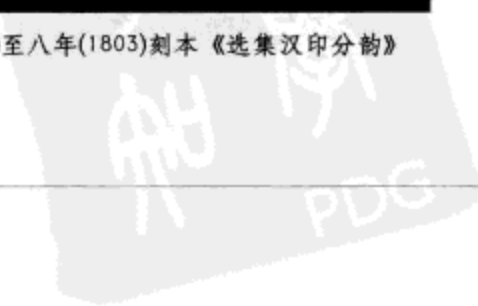
谢景卿自序有云：“宋宣和始作印谱，元明诸名家搜罗益富，而案其所谱，皆官私印序列，未及逐字类聚，排纂成书。间摹形似，或不悉依原印大小长短，俾披卷了然，得备参稽也。予直数十年来，随见即为钞撮，然罕见鲜闻，因循未就。会安邑宋君芷山丙辰游粤，相与论列印篆，出所携袁予三先生《选集汉印分韵》手稿，叹未曾有。而原本编韵尚多讹舛，官私印参错互署，暇日悉为厘订，并命大儿云生摹录成秩，以供玩索。香山刘子南隅一见心赏，力任剞劂，而是书之役以竣。夫缪篆出直汉人，固与碑文款识并垂不朽。而是书分字隶韵，点画形模，悉仍缪篆本来面目，因泮溯源，观其会通，不特为镌摹家所取资，亦以补南阁校书者之缺也。其余字有未收，因就所见续增，推广则俟诸博雅君子。”

续集自序云：“嘉庆二年春，刻《汉印分韵》既竣，窃疑汉篆不止于此，殆前人仅就耳目所及，或选择过严。因检笥中旧藏，并借诸家汉印谱计不下百卷，悉心采录，凡点画与前稍异及前韵未收者，复得五千字，视前集已溢千余。其中一字而多至数十，愈见古人变化无方，灵府独辟，不拘拘说文矩矱也。间有同好录示与杂出他书者，未见原印，概不阑入。至若字形剥蚀，离奇难辨，篆法虽精，亦从割爱，不敢逞臆见以贻误后人。惟是搜罗未富，闻见有限，续貂之消，知不免耳。”

此本字体钩勒甚精，清丽可喜，实为习治印者必备之书。目录后刻“六书斋康二酉刊”。谢景卿自序后钤有“谢印景卿”、“芸隐”（按，后印本无此二印）。有扉叶，刻“选集汉印分韵 嘉庆二年三月 漱艺堂开雕”、“续集汉印分韵 嘉庆八年季春 漱艺堂藏板”。漱艺堂、六书斋、康二酉，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均不载。按1927年，有诸城孟昭鸿者，



清嘉庆二年(1797)至八年(1803)刻本《选集汉印分韵》



選集漢印分韻卷上

上平聲 表日省于三甫原本 南海謝雲生摹錄

一東

東

東

隴東
大守
章內

東

安東
將軍
章內

東

東

東

東

東

以上俱
和印內
後不注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峒

峒 峒

又以谢本之后百余年间，汉印之后出者日益增多，所集印字不无遗珠之憾，于是广为搜辑，凡袁、谢二氏所未见及未收者一依其例，手自钩摹，所得又复七千余字，编为三集。1979年，上海古籍书店有一至三集之重印本，后附索引，颇实用。

此书不多，钤印有“竹亭心赏”、“平龠”、“畏微”。流传较少，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有人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存《选集汉印分韵》二卷。“哈佛燕京”又有复本一部，四册，为后印本，谢景卿序后无印；又有续集四册，亦后印本，均存普通书库。

2008/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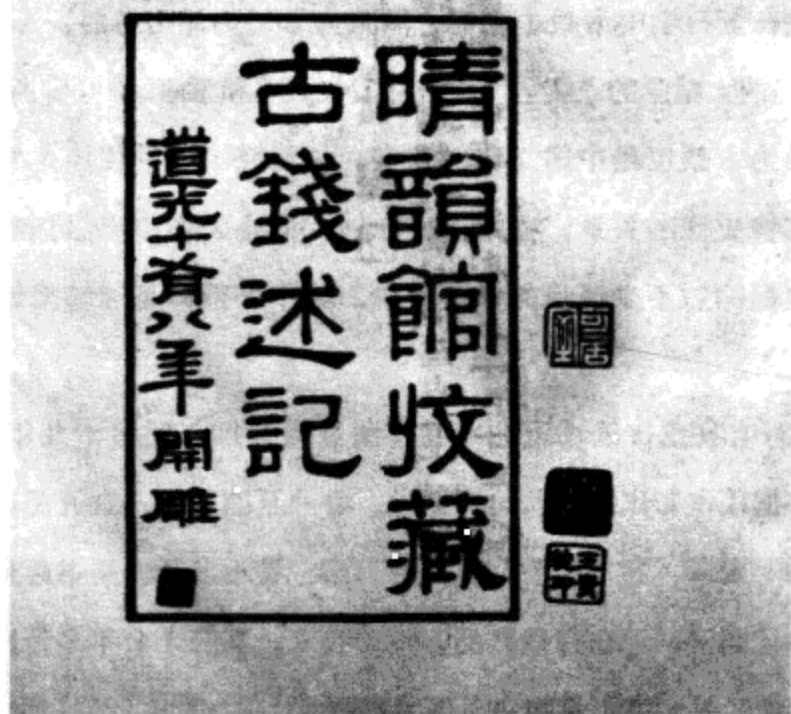
《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

古钱在金石学中为最小之物，然其为学却如深山穷谷，不易窥探。当然，这门博大精深的“泉学”，却是许多收藏家和学者、爱好者所钟爱的。这大约因为古钱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研究不同朝代民生经济盛衰变迁的实物史证的关系。我不研究古钱，但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各种古书中，也翻阅过不少清代的泉币谱录，其中一部即是《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

《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十卷，清金锡鬯撰。民国十九年（1930）中国书店据稿本影印。四册。宣纸印。卷一至四正用、卷五僭窃、卷六外国、卷七未详、卷八厌胜、卷九古刀布、卷十著录。是书起周秦，逮明末，专记圜法，刀布仅载数品，附于卷末。其三十余年辛苦所集，共得八百九十二品，亦可见物之萃聚为难也。

金锡鬯，字甫甫，号菴毅，浙江桐乡人。刘喜海之师。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由广东知县官至嘉应直隶州知州。

《述记》乃金氏于道光五年（1825）之春，顷囊排次，每钱述史志



民国十九年(1930)中国书店影印本《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

晴韻館收藏古泉述記卷一
秦

半兩

秦

史記平準書及至秦中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漢書食貨志卷五天下銅錢皆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注臣瓚曰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鄭樵通志秦一中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溫



旧谱及他书所载者，辄录于钱文之左。又取所收钱文，度其径围，权其轻重，一一详纪之。凡所见诸家之钱，及同好诸君寄拓之文皆不收入。其凡例云：“自古迄今，钱之流传者，不下千百数，乌得尽收而聚于一处？此编非予所收不入，未免寡陋之讥。然而宏揽远征，仍不免课虚而失实，与其博，不如约也。”“古今钱谱刊而传世者，惟洪氏一书具在，余皆佚而不传。即有近世所著一二，见者仅抄本耳，其间湮没不彰，何可胜道。今于所见，辄载之简末，以存其名，或摘录其序与卷次，不敢忘今昔同志云尔。”

据丁福保的鉴定，金氏藏泉，最精者为三铢、建中、重和、阜昌元宝、阜昌通宝、阜昌重宝、龙凤、天启等八品，此外皆易得之品。嘉庆、道光间，交通不便，古泉散居各处，故求之甚难。金氏虽费三十余年之心力，而所得仅如是而已。

《述记》所载约近千品，虽据藏品著录，然引证详赡，颇便初学。但每个人的鉴定能力和眼光多不一样，后代之收藏家应比前人见得更多，因此纠正前人谬误是很正常的。丁福保写过一篇《述记跋》，指出金氏书中的几处扞烛叩槃之误及不妥之处，如卷三末有德祐元宝钱，为宋少帝所铸。但少帝并未铸钱，此乃伪作。

金氏也是有识见之人，他的藏泉，不传后人。金氏病逝前，有遗言云将藏泉全部赠与他的学生刘燕庭，并以手写《古泉述记》定本，嘱付梨枣。刘燕庭服官廿余载，所至不名一钱，而篋中钱币尊彝，载之兼两。他不仅是博古君子，也是藏泉大家，其家嘉荫篋皮藏泉币，半皆金氏之物。刘喜海有《嘉荫篋论泉绝句》，云：“一编述记追晴韵，五十年来辛苦存。准拟开雕传旧谱，春风回首忆师门。”说的就是二人

的关系。

古来收藏者，无积久不散之理，如翁树培、刘燕庭、鲍康、王懿荣等各家藏泉，身后早经易主，鲜有藏及二三世者。刘燕庭所得金氏古泉，至咸丰八年（1858），又赠之吕尧仙，越二年，此泉复归于铁牛老人。光绪年间，铁牛老人藏泉再以九百五十元之价归于丁福保。丁氏即医学书局主人，藏书宏富，藏泉也是大家，他曾为中国的钱币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丁氏汇集了他当时购得的金氏、方氏、袁氏所藏大批古泉，朝夕摩挲后，编纂成了《古钱大辞典》。如今这部书仍是众多钱币爱好者、收藏家、研究者案头上必备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丁福保也是个明白之人，他知道古泉之不易保存，且目睹金氏藏泉在百年中，由刘氏而铁牛老人，又归于己。其间藏泉之岁月，长者不过数十年，短者不及十年，而屡易主人。有鉴于此，丁氏以为此殆不啻烟云之过眼，于是将此批钱币悉数捐赠当时的上海博物馆，而化私为公并陈列之，让公众得以了解。

昔阮元云：“古泉聚之困难，聚而不散，更无其理。是宜笔之于书，传之其人，乃可以有补于前闻，有裨于后世耳。”当年，刘燕庭是很想将金氏《述记》稿本予以刊刻的，而且于卷首题字，且预书封面及开雕年月，云“道光十四年岁次甲午七月七日东武刘喜海谨读于金沙郡斋之十七树某花山馆”。然刘氏虽锐意刊行，而竟不果。1930年，有宗惟恭者，在陈叔通处见到金氏《述记》手稿，认为楷写精良，爱不忍释，乃请于陈叔通，付中国书店影印行世。如此，金氏遗著得以流播人间，且成就了刘燕庭未竟之念。这里提到的陈叔通，名敬第，叔通为其字，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12年被选

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49年后任新中国第一届政协全国副主席、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喜收泉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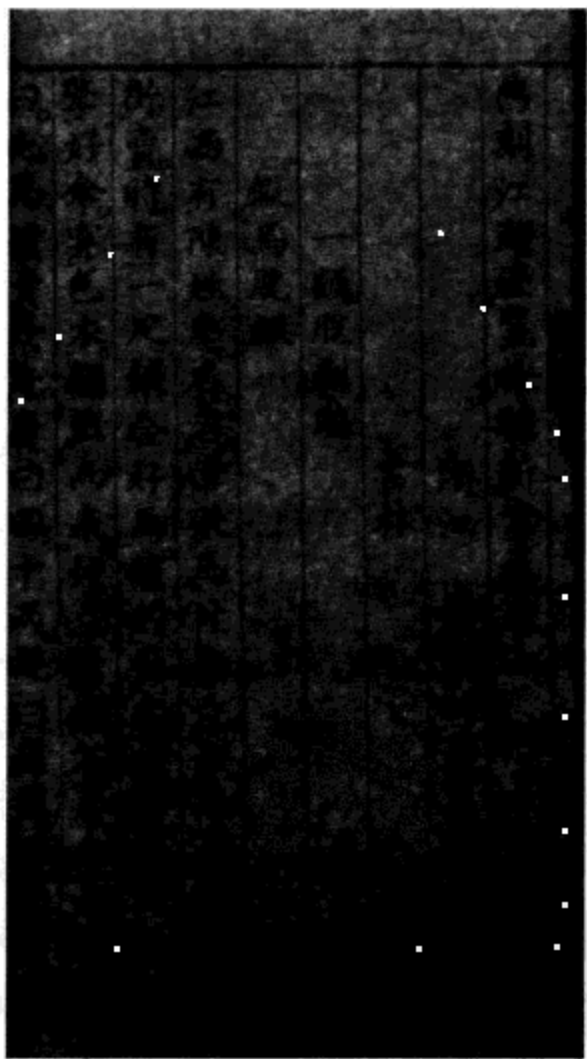
2006/8/30



海内竟有“骗子书”——《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

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没有骗子。以中国来说，不论哪个朝代，都有骗子，且骗术是从不绝于世的。宋人刘克庄的《后村集》卷五十二有一篇《庚申召对》，有云：“臣惟国家三数年来，凶相弄权，以富强自诡，辅圣天子而行霸政，为天下宰而设骗局。”所以人们把将假作真，使人受欺的圈套叫骗局。我还想到，一个人从小到大，似乎没有人敢说，自己从没被人骗过，包括听到的假话、买到的伪劣商品等等。当然，揭露骗术的文章、小说、电影、戏剧的作品，时有发表，但是描写骗子的专书，宋元两代倒是没有出版过，明代才有人去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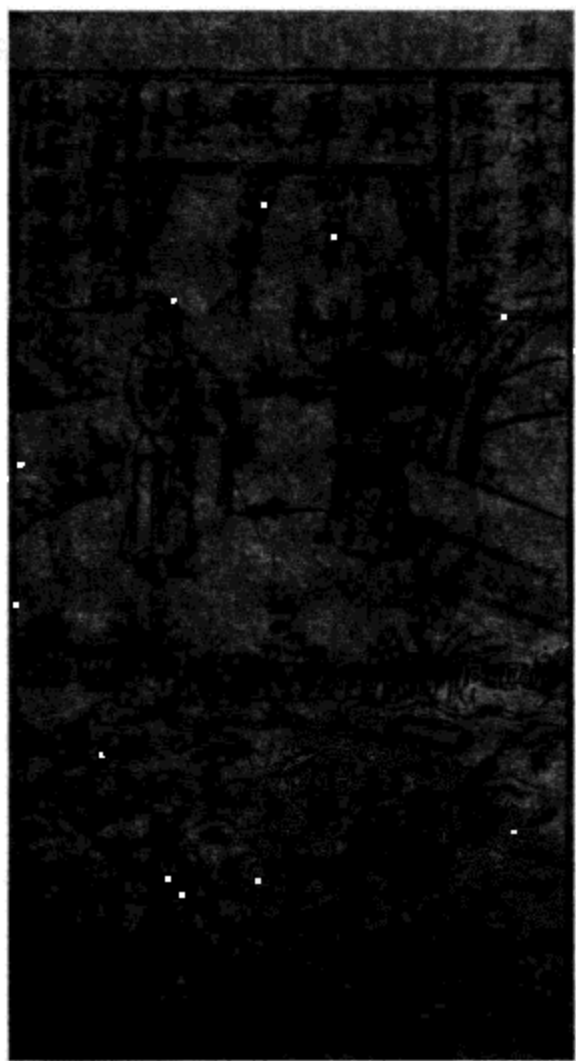
1986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看到了一部《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当时见到这书名，即感到这部书是不常见到的难得之本。果不其然，打开一看，书计四卷，分二十四类八十二则。计分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诈哄骗、伪交骗、牙行骗、引赌骗、露财骗、谋财骗、盗劫骗、强抢骗、在船骗、诗词骗、假银骗、衙役骗、婚娶骗、奸情骗、妇人骗、拐带骗、买学骗、僧道骗、



明陈怀轩存仁堂得板重印本《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

鼎 齋

PDG



舟 夢

PDG

炼丹骗、法术骗、引嫖骗，描述的都是骗人的故事。

明代后期社会的背景，上自皇帝，下至市侩，多奢纵无忌，而社会上的新兴富豪之家，更是承风导流。又由于当时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局面，不少人迷信释道，祈求长生不老，盼望一夜成富。也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腐败，歪门邪道横行，才导致作者用文字来揭露他所了解的各种骗术。只要读一下二十四类的类目，大致上就知道是写什么的了。

书的作者张应俞，字夔衷，浙江人，可惜他的履历我无法进一步去查证，想来应该是一位没有什么功名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位经商者。这部书的特点在于每例后皆有按语，且文字通俗，当为坊间刻印而专售市井百姓之用。有图，皆在每卷之前。刻甚精，两旁皆有对联。所谓“江湖历览”，意为作者在江湖闯荡，目睹耳闻各种骗局的记录。“杜”者，杜绝也。作者在历数每例骗局后皆有按语，告诫世人“水族多妖，一点犀光照破；心灵有觉，百般骗局难侵”。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可见熊振骥序言，云：“是集之作，非云小补，揭季世之伪芽，清其萌蘖；发奸人之胆魄，密为关防。使居家长者，执此以启儿孙，不落巨奸之股掌；即壮游年少，守此以防奸宄，岂入老棍之牢笼。任他机变千般巧，不越奚囊一卷书，故名曰‘江湖奇闻’，志末世之弊窳也；曰‘杜骗新书’，示救世之良策也。”

这部书是明代陈怀轩存仁堂得板重印本。说它是“得板重印”的依据，在于此书卷一第一页第三行刻有“书林□□□□□梓”，□内文字被铲版。据日本东洋文库藏传抄本，该处有“书林汉冲张怀耿梓”。以此推论，此书最早为明万历书林张怀耿刻本，后陈怀轩存仁堂得其板，铲去“汉冲张怀耿”五字。这种情况在书估书肆来说是常有的事，并不奇怪。

陈怀轩存仁堂，应是万历年间在福建的一家书肆，查瞿冕良编的《中国版刻辞典》：存仁堂是陈含初的书坊名，含初字怀轩，存仁堂刻过《新刊月峰孙先生增补音切玉鉴海篇》、《破窑记》及此《杜骗新书》。但据我所知，陈氏存仁堂还刻有《四书顶门针》、《新刻艾先生天禄阁汇编采精便览万宝全书》、《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新镌国朝名公神断狱详情公案》，分藏日本大圣寺藩、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这几部书都是国内所没有人藏的。

江湖上的各种骗术，如果不加以揭露和根除，社会也就不会安宁，更谈不上和谐。作者原以为此书会“其裨世也甚大，其流后也必远”。但很奇怪的是，清代及民国并没有翻刻本，大概是因为此书其时即罕见流传的关系。反之，我倒是见过日本的两种本子，都是“哈佛燕京”藏本。一本扉页上刻“杜骗新书 作者浙江夔衷张应俞 皇都书林五车楼梓”，前有“明和庚寅春三月初吉书于东武萱洲积翠楼 南宫岳为公父撰 收十七则”，末有“文政元年戊寅初冬求版”。汉字旁有假名，一册。按明和庚寅，当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文政元年，当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此当为日本文政元年据明和本再翻刻本，仅收十七则，是删节本。

另一本是此书的日本译解详注本，为《杜骗新书译解》二卷，扉页刻“大清浙江张应俞著 日本河原英吉译解”、“明治十二年五月东京二书房发兑”。明治十二年当清光绪五年（1879），而河原却将张应俞从明人演变成清人了。是本又有岸印国华序，首句即为“前车之覆，后车之戒。是盖刻此书之微意也，读者请莫作与他小说一样看也”。

当今世界，新奇骗术远比几百年前更为狡诈、诡秘，反观书中所述，虽为明代之事，然于今日亦不无借鉴。当今社会，假奶、假药、假酒、假烟、

假币、假文凭、假发票、假字画、假文物、假商标，五花八门，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作假，这些都离不开一个“骗”字。至于平民百姓接触到的伪劣商品更是无处不在，而商场上的骗局，那就更是腐败了。但愿善良的人们，得暇也读些揭露骗术的书，至少也会提高些微的辨识力，得一点避免受骗之法。

明刻本的《杜骗新书》，目前只有五部存于世，国内仅有大连市图书馆入藏，其他四部，分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尊经阁文库、内阁文库以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正因为书之罕见，流传不广，故近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均有影印本出版。如北京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第三十五辑（影印之底本乃为“哈佛燕京”藏本）、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三辑（底本与燕京本同版）。1992年，孟昭连曾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日本皇都书林五车楼翻刻本（不全的本子）作底本，配上“天一”的影印本来作校点，并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而2003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本子，用的底本似乎和天津百花文艺本同，并非是明陈氏存仁堂刻的明刻本。

2006/9/24

日本活字印本《新刻痴婆子传》

《痴婆子传》为淫秽小说，以浅近文言之倒叙笔法，述少女上官婀娜情窦初开，少试私情，至出嫁后伤风败俗，乱伦淫荡，最终被视为“败节妇”遣归母家，后皈依佛门，以清凉之水洗净淫心之故事。书中（第二十八页）有云：“当处闺中时，惑少妇之言而私慧敏，不姐也；又私奴，不主也；既为妇，私盈郎，又为大徒所劫，亦不主也；私翁、私伯，不妇也；私饕，不嫂也；私费，不姨也；私优，复私僧，不尊也；私谷，不主人也。一夫之外，所私者十有二人（一月一人，夫若只可派在闰月），罪应莫赎，宜乎夫不以我为室，子不以我为母，戢戢至今，又谁怨焉！（尚知愧悔，犹有天良）”文字刻画细腻，心理描写甚着力，惜备极秽褻，蛊惑人心。

“哈佛燕京”有《新刻痴婆子传》二卷，题明芙蓉主人辑。日本活字印本。一册。半叶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框高二十一点六厘米，宽十四点三厘米。题“芙蓉主人辑 情痴子批校”。前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挑浪月序。



日本活字印本《新刻癡婆子傳》

芙蓉主人，其名及履历不可考。以《新楔重订出像注释通俗演义东西两晋志传》中雒衡山人（明杨尔曾）序内有“而后之作《金瓶梅》、《痴婆子》等传者”句，故作明人所撰。

上卷目录为“倾谈往事、少妇谈情、属意少艾、情挟慧哥、妹恚逐慧、迁慧就传、目挑俊仆、昏暮佳会、于归栾氏、盈郎奉命、花下传情、陡遇大徒、曲栏遇伯”。下卷目录为“翁私沙氏、探姆遇翁、乐幸双美、克饕探意、子貌不肖、出闺私费、盈郎立遇、二媳称觞、礼聘香蟾、旧好相接、延师课子、隔□□□、青莲私谷、西楼称快、谢绝旧好、众人遗恨、晋逐慧哥、事败见逐、还归母氏、皈依三宝”。

挑浪月序云：“从来情者性之动也，性发为情，情由于性，而性实具于心者也。心不正则偏，偏则无拘无束，随其心之所欲，发而为情，未有不流于痴矣。矧闺门衽席间，尤情之易痴者乎？尝观多情女子，当其始也，不过一念之偶偏，迨其继也，遂至欲心之难遏。甚且情有独钟，不论亲疏，不分长幼，不别尊卑，不问僧俗，惟知云雨绸缪，罔顾纲常廉耻，岂非情之痴也乎哉？一旦色衰爱弛，回想当时之谬，未有不深自痛恨耳。嗟嗟，与其悔悟于既后，孰若保守于从前？与其贪众人之欢，以玷名节，孰若成夫妇之乐，以全家声乎？是在为少艾时，先有以制其心，而不使用情之偏，则心正而情不流于痴矣，何自来痴婆子之消耶？时乾隆甲申岁，挑浪月书于自治书院。”

卷下末段云：“上官氏历十二夫，而终以谷德音败事，皆以情有独钟，故遭众忌克慵，但知有谷而出妻，其余不知，蠢极矣。是书行，乃正闺闾，严防闲之助云。”

此为日本木活字印本。讹字甚多，如“鍾”误为“鐘”、“蓉”误为

“苔”。日本皮纸印。计二十九叶。封面有签条，印“痴婆子传 完”。第二十九叶末有“洛阳耳口王草化户方寿延年植字”一行。查《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未收。

据著录，各种古代小说辞典、百科全书、提要、总目，多云此书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按，乾隆二十九年挑浪月序中未言刻书之事，此外也无任何根据证明为乾隆间所刻。故原作“乾隆刻本”者，似应改作“清刻本”为妥。

在中国，淫秽小说最为风俗人心之害，故清代禁之甚严。清人辑《欲海慈航》之《禁绝淫类》中有云：“传奇小说点染风流，惟恐男子不消魂、女子不失节，此蛊惑人心之最大者。”又云：“开设书林，以取利耳。试思何书不可获利，而必借此坏人心、败风俗之书，以觅蝇头，计亦左矣。万愿将此等书，概不发刻，并不收兑，所谓积功德于冥冥、获福利于昭昭也。”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云：“近日之小说，若《平山冷燕》、《情梦栢》、《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等类，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犹不至于大伤风俗。若《玉楼春》、《宫花报》，稍近淫佚，与《平妖传》之野，《封神传》之幻，《破梦史》之僻，皆堪捧腹。至《灯月圆》、《肉蒲团》、《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间传》、《痴婆子传》，则流毒无尽。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悉当斧碎梨枣，遍取已印行世者，尽付祖龙一炬，庶快人心。”所以，同治元年(1862)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书目》及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计毁淫书目单》皆列入。另浙江杭州在仙林寺设局专门收缴书坊铺户所印卖之淫书书目中也有。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云“存日本刻本。曾见马隅卿

旧藏抄本三十三则”。津按，日本刻本，书名为“痴婆子传”，作者项题“情痴子批校 芙蓉主人辑”，行款同此本。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所载书影，似为另一日本木活字印本。日本藏本闻有明治四年（1871）木规子跋。

2007/11/8



翁方纲写《金刚经》 ——兼驳代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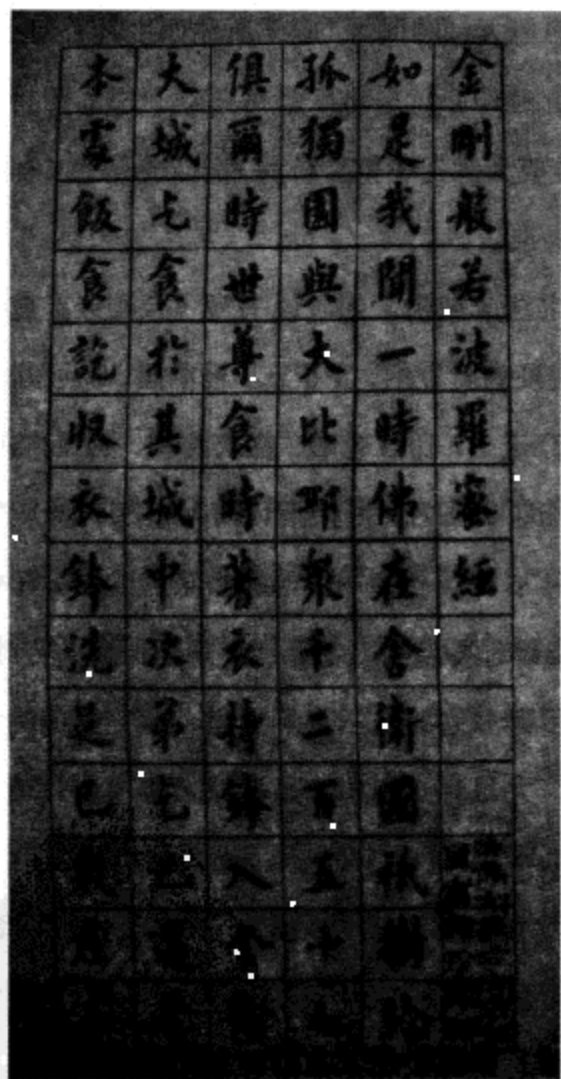
大约是因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统治集团的特殊需要，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提倡信仰佛教，极力支持佛教典籍的整理刊刻，甚至虔心发愿、端楷缮录佛经，以表达向佛之心。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朝廷中的大臣们，薰香沐浴，诚惶诚恐地恭楷写经进呈御览，便成了常有的事。

现今存诸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清代帝王及名臣写经还有一些，都是装潢考究、精美华丽的写本，如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玄烨写《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玄烨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乾隆十二年(1747)弘历泥金写《白衣大悲王印心陀罗尼经》一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弘历写《佛说文殊师利巡行经》一卷等。至于名臣，则有于敏中写《大乘显积经》二卷、王际华写《维摩诘所说经》三卷、沈初写《佛说普门品经》一卷、陈邦彦写《佛说阿弥陀经》一卷、和珅写《佛说无量寿经》等。

然而各种写经中，书写得最多的应该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金刚经》。《金刚经》为《大般若经》六百卷中的一卷，是记录释迦牟尼佛和大弟子须菩提问答对话的一部经书。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教人受持此经即可见性。六祖惠能大师聆闻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因而大彻大悟。其后，禅门更借此经印心，净土宗诸祖并劝上根人受持此经，以期上品往生，持诵此经遂成为佛门中重要日课之一，是佛教中诵读、受持、书写、流通最广的一部经典。

有清一代，书法家辈出，如若说书写《金刚经》成帙最多者当推翁方纲，这是无可置疑的。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北京大兴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历仕乾隆、嘉庆两朝，官至内阁学士。在乾隆、嘉庆间，翁的书法颇负盛名，所谓清代四大书家“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他位居第一。他的书法，初学颜真卿，继习欧阳询，其临写的《化度寺碑》，可窥功力之显著。刘承幹序《复初斋诗集》云：“大兴覃溪翁先生，以碑版题跋之学震烁当世，藻鉴家倚为斗极，今尚流风未沫也。工书法，尤足奔走海内，虽诸城之雄厚、丹徒之华润、钱塘之秀挺，艺林次其高下，称翁、刘、梁、王，翕然无歧声。”

翁方纲写《金刚经》是有记载的。六十年代读张廷济《清仪阁题跋》，中有《翁覃谿学士楷书金刚般若经》一则，云：“大兴翁学士覃谿先生早年不谭释典，中年病痲，颇资佛力，遂极崇信。此乾隆五十一年丙子，先生年五十四，写法精紧，纯从《化度寺邕禅师碑》出。”那也就是说，翁氏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已书写《金刚经》了。七十年代后期，我曾在浙江图书馆读到一册辑有多位乾嘉学者往来手札的《朋旧尺牋真迹》，其中有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翁方纲（时翁七十八岁）致石



翁方綱寫《金剛經》(影印本)

韞玉札，有云：“昨接阮公（指阮元）札云，云林经藏，先以拙集为之缘起。此愚初想不到者，念拙诗得与香厨度阁，曷胜惭悚。意欲将今岁所写《金刚经》一部，再求代送寺中，以忏悔劣诗罪过。此部经写尚未讫，未知可候阮公之便，托其箱篋奉上？”

在上海图书馆，我也曾读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八月二十八日翁方纲致铁保札，云：“再有欲奉劝者，如有稟请尊大人台安家报，乞为淳致，如临池作字时，何不专写《金刚经》，如不写细楷，即装册作界格，随意或一寸内外之楷皆可。日写此经，即日诵此经。方纲每年写四部，写一部讫，即再接写一部，其功益无量，消灾积福，不能一言尽也。古人如东坡，如董香光，皆多写此经，但每见此二先生墨迹，内中尚有脱误（今见尊刻临帖内亦然）。大约每写一行即细校一遍，每写完半部即细校一遍，写完一部再细校一遍，昔人谓作字甚敬即此，可以养福，可以永年。区区私祝，愚陋之见，幸见采择。”那一年，方纲八十五岁，次年即归道山。

《金刚经》为最上乘法，阐扬般若相应的大悲妙行，功德甚深广大。据说持诵《金刚经》，可以延寿、消灾免难、愈病、生子等等，持诵功深，临终时可预知时至，沐浴端坐，或异香满室，或天乐盈空，种种灵应祥瑞，多可得见。翁方纲是信奉佛教的，以他的学识，当非常清楚此经的功用，在养福永年，所以他每年都要写四部。

翁氏于学术是极为勤奋的，所以法式善说：“予于并世士大夫中所见读书好古无片时自暇者，先生一人而已。”方纲留下的等身著作，包括他的诗文集，以及各种题跋、笔记、手札等，较明清两代任何一位学者都要多。这其中也有关于翁氏写《金刚经》的记载。如嘉庆四年（1799）秋八月，翁氏写了一部《金刚经》，后署：“大清嘉庆四年秋八月望日，

鸿胪寺卿翁方纲敬依南唐寿春永庆寺石本盥手书。谨因安邑举人宋葆惇寄奉杭湖灵隐禅寺，永资讽诵。”

再如邵松年编《古缘萃录》，著录翁氏楷书《金刚经》二部，第一部题《翁覃溪楷书金刚经册》，纸本，三十开，计六十页，乌丝方格，每纸七行，行十四字，分三十二章。书法整肃浑朴，无一笔放松处。后署：“大清嘉庆六年，岁在辛酉秋八月之吉，鸿胪寺卿大兴翁方纲依寿春石本盥手敬书。为同邑知州高晟发愿勒石，为母史氏祈寿，永资持诵。臣方纲敬书。吴县支云从镌。”“敬书此经后十四年，静夫复持来求题签，并属书于册后，盖既勒石，广为拓施，欲敬识此，以志净信诚笃无间之意。时嘉庆乙亥春三日望，方纲时年八十有三。臣方纲敬书。”第二部题名同上，纸本，三十一开，乌丝直界，每纸十二行，行十四字，工楷，较前册字稍大，三十二章，一气直书，不分章记目。书法谨严，时有松秀之笔流露行间。后署：“大清嘉庆八年癸亥四月八日，鸿胪寺卿大兴翁方纲依寿春石本盥手敬书。”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十八册中的《翁书金刚经》，则是写于嘉庆十一年（1806）方纲七十四岁时。

翁氏称每年写《金刚经》四部，如以嘉庆元年始（1796，六十四岁），至二十二年（1817，八十五岁，逝去的前一年）止，共二十二年，那他应写有八十八部之多。这些经写竣，多赠与朋友，或送至一些庙宇保存。如清金芝原撰《蔬香馆日记》中即有庚申七月十五日“翁宜泉以覃谿夫子手书金刚经命送虎邱禅林敬谨收讫”的记载。庚申为嘉庆五年，宜泉为方纲二子树培。遗憾的是，如今二百年都不到，所存却是难得一见的了。笔者仅知的一本，是嘉庆二十二年方纲八十五岁时书写的一本，那是见诸于《美国苏富比拍卖行图录》的，如今“经”落谁家，则不得而知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翁氏《楷书多心经册》（《心经》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简称，因卷数太多，内容庞杂，故撮取其旨要而成此经。以心为名，言其最重要，如同人之有心），书于菩提叶上，并装册，款署“嘉庆六年八月七日翁方纲敬书”。这可见诸史树青主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书法卷（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然而奇怪的是，这本绝佳的翁氏手迹，却被天津的所谓鉴定家误认为是出自翁树崑的手笔。在《鉴赏百科》中对翁方纲书法中的代笔作了这样一段叙述：“在文献的记载中，并不曾有翁方纲代笔书一事，因此人们多不知翁方纲书法中有代笔的一种。刘九庵先生曾见翁方纲次子翁树崑一幅《楷书对联》，所书字极似翁方纲。于是他反复比较传世翁方纲书作，发现翁氏晚年书作中颇多翁树崑的代笔。经刘九庵先生揭破，平日略作观察，确实如此。嘉庆六年时，翁方纲已经六十九岁，此册即出自翁树崑的手笔。”又说翁氏“以其为内阁学士，又以书法著称于乾嘉年间，求书者必多，以其子代笔应酬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其子代笔之事，大概是隐讳至深，人多不晓，向不为人识破”。津于书法之鉴定虽略知皮毛，但对刘先生所谈及鉴定家的“新发现”实在不敢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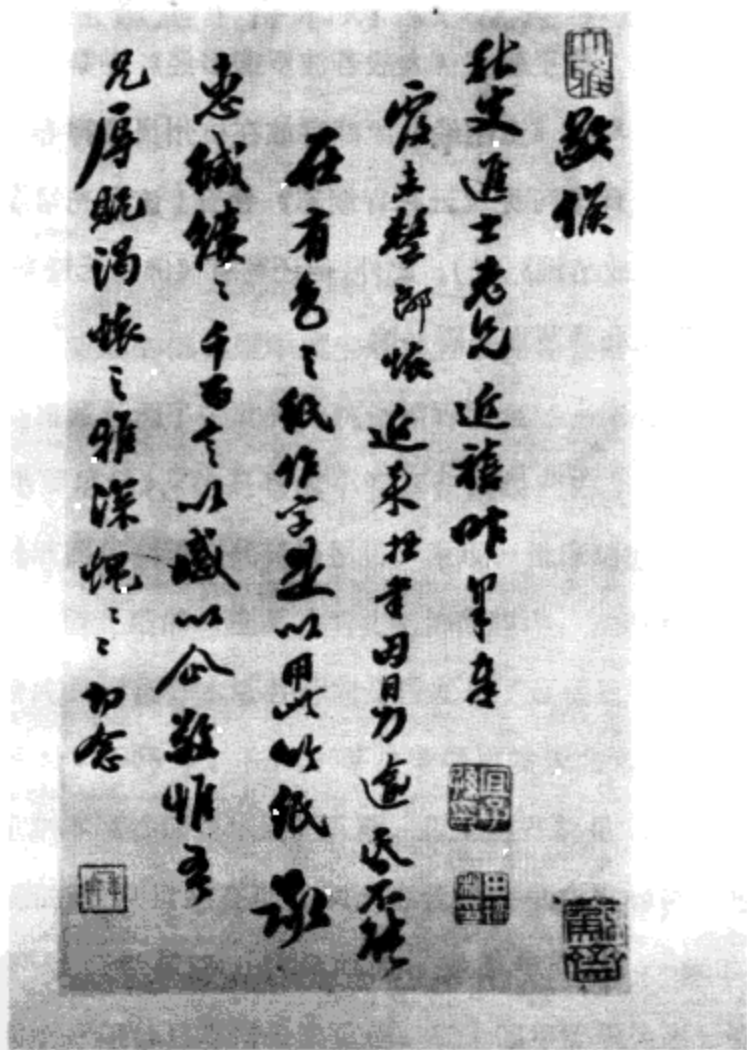
翁树崑为方纲之四子，儿子学父亲的字那是很正常的，就像有些学生的字似自己的老师一般。但是，方纲几十年来，作书写跋从不依赖别人，凡事皆亲为之，何来代笔之说？翁氏在乾嘉学者中是长寿者，限于篇幅，我们不必去考证翁氏晚年从七十岁至八十六岁之事，即以故宫藏翁氏于嘉庆六年（1801）六十九岁时所写《心经》为例。此年，翁氏即作文、写跋三十余事，又为树崑操办婚事，大费心力。翁氏是何等之人，他曾为翰林院编修，又一任江西督学，三任广东督学，一任山东督学，深知朝

廷规矩，这种一笔不苟的《心经》，是供御览的，难道翁氏还要假手于树崑代笔？难道敢于冒犯天威，欺瞒皇上？且用菩提叶写经较少见，菩提树为常绿乔木，原产印度，其叶似白杨，须经特殊处理后，方可书写。翁氏在菩提叶上书写，更是慎重之作。笔者仅知乾隆三十三年（1768）弘历也曾用菩提叶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今亦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而嘉庆五年（1800）四月，翁方纲六十八岁，嘉庆帝召见翁方纲，当面说：“汝文诗皆好，字画亦佳。”嘉庆十九年二月，翁方纲八十二岁，嘉庆帝召见潘世恩，问翁方纲“其精神尚好否”，潘答“尚能作小楷”。请看，翁氏如此高龄，仍能作书，甚至在八十六岁卒前还可以在胡麻上细书“天下太平”四字呢。

树崑之卒在嘉庆二十年八月，翁方纲有诗三首哭树崑。树崑卒后的次年，翁氏八十四岁，有札致朝鲜友人金正喜，文长二千字，笔者所见方纲致友朋手札近六百通，而以此通为最长。翁方纲去世之前一年，他所作题跋序文已知有二十余篇，而诗作竟有百首之多。

刘九庵先生是经验丰富而德高望重的书画鉴定家，经他鉴定过的书画也不知凡几。然而刘先生仅根据翁树崑楷书对联极似翁方纲，即作出“翁氏晚年书作中颇多翁树崑的代笔”的错误结论，此说又误导了文物商店的专业人员，包括这本书法卷的文字写作者。大凡书画鉴定或重要书迹，除了目验，更需查证有关文献资料或著录，这也是要有一些学识的。可惜的是，刘先生忽略了对当时书经背景的考察，如若刘先生能够见到翁氏晚年的众多书法作品，或是见到如今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翁氏手稿本《复初斋集》三十二册（自四十岁至八十一岁时所写题跋、序文、



翁方綱八十四岁时致朝鲜友人金正喜札

楹联、手札的部分草稿及笔记)的话,那他一定也会认为原先所云翁氏写字要树崑代笔之说,实是无稽之谈。

除《金刚经》外,翁方纲还写有其他佛经。如嘉庆十三年(1808),翁氏写了一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二十三,计四十一页,后署:“大清嘉庆十三年,岁在戊辰秋九月之吉,赐加三品卿衔大兴翁方纲依南唐寿春永庆寺本,盥手敬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二十三。”此经及为宋葆懃所写的《金刚经》原都存放在杭州灵隐禅寺,后在太平天国战事中毁去,此事可见《云林寺续志》卷五(该书光绪戊子、丁丙又重刻于《武林掌故丛编》中)。此外,他还写有《佛说无量寿经》二卷,今存卷六,藏诸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捕雀童子得宋刻《妙法莲华经》

在石窟、寺庙的佛像腹中或宝塔内置放佛经是常有的事，最著名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了，此外像杭州雷峰塔藏《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就是卷成小卷塞在藏经砖内小孔里的。1960年，浙江丽水县城西碧湖镇宋代砖塔损毁，发现一批宋刻佛经；1962年，山西曲沃县广福院正殿的一座高约两丈的佛像腹内，发现十三卷佛经；“文革”中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菩萨像身内发现了辽代三十件写经和六十一件雕版印刷品；1968年，在山东莘县宋塔里发现北宋写本《陀罗尼经》一部及北宋刻本《妙法莲华经》五部。以上这些都是20世纪的事。

下面说的是19世纪在浙江桐乡惠云寺院里发生的事。惠云寺，始建于后周广顺二年(952)，称凤鸣院，显德年间(954—960)改名惠云院。明洪武十三年(1380)僧日宾重建，二十四年赐额为惠云寺。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释严洁以《华严经》名增建“华严藏经阁”，咸丰十年(1860)毁于战火。寺里有塔，较之其他民房宅院一类的建筑物都要高，由是也就成为雀鸟搭巢筑窝的最佳选择。



宋代惠云院比丘德求，将云游募来之衣钵钱重新修饰山门前佛塔二所，并奉安《法华经》等及佛舍利在塔上第五层高显之处，其目的是使人天瞻敬，利及有情，至乾道九年（1173）幸遂圆满。然淳熙元年（1174）七月的一场大雨中，雷鸣电闪，击损右边之塔。当年八月，又重新修饰。次年七月初九日夜，有人登上此塔，取下经匣，但启而无物。幸运的是，经匣并《法华经》等仍被归还。这件事使德求甚为不安，于是在淳熙六年（1179）再令工匠重新相轮，端正奉安，并再将《法华》二经匣奉安双塔之上。德求并亲笔跋尾，云：“愿诸天护持二塔，坚固久住世间，建立法幢，光扬三宝。先愿国界安宁，万民乐业。祈求德求袈裟之下，愿无魔事，终始保全庄严，临命终时，愿生净土。在生之日，不值恶魔恼乱于我，乞诸天护持，然后报答十方施主供养舍施外护之恩。”

大约道光七年（1827），有顽皮童子数人，闲着无事，居然想上塔捕鸟。然而，谁也没想到童子的到来，不仅破坏了雀鸟的安宁，而且还找到了一部宋代刊刻的《妙法莲华经》七卷及《尊胜等灵异神咒》二十道。当然，物件还是由寺内保存。

二十年后，有位叫龙岩居士的在桐乡惠云寺消夏。因该寺相传昉于北周广顺间，但无碑版文可考证，于是僧人力请居士补之，为此便出示了捕雀童子找到的那些经卷作为参考。后来经书的一半被该居士以润笔为名索去，剩余部分亦因年久而有散脱，寺僧便请工匠重予装潢。

此宋本《妙法莲华经》，经折装，全本完好，无一字缺损，每开二十四行二十七字，每纸三开有半，纸首有号数，下有“□通”二字，当是刻工姓名。不署书者姓氏，镂板精绝。谛视书法，似东坡，遒劲秀丽。从僧德求自记，可知此经所记多彼教中语，笔墨有士气，非寻常粥饭僧。

《尊胜等灵异神咒》，皆宋体，极工整。道光间魏谦升跋云：“此《尊胜等灵异神咒》共二十道，乃宋孝宗乾道九年，秀州惠云院僧德求装治供奉释迦如来舍利宝塔内者，塔既圯，遂流落人间。有当日德求自跋，墨迹如新，书法秀逸似张樗寮。其咒语书刻皆精，是瘦者学欧一类。芸窗展诵，古香古色，尘心为之顿清，见者当作法帖观，不可徒以寻常经册视之。”

《妙法莲华经》为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佛教经典之一，也是佛经中传写最多的一部。即使刊刻之本，宋代即有二十多种不同版本，最早者为宋庆历二年(1042)杭州晏家刻本，今藏山东省博物馆。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见有宋代杭州刻本一轴(残)，为傅增湘旧藏。那是民国初年，吴江垂虹桥畔某寺塔圯，塔中原藏此经二卷，其完好者归于湖州蒋孟蘋，傅增湘所得即此残卷，多破损，但蝇头细字，雕镂工雅，楷法精妙，似仿东坡。

捕雀童子所探得之宋本原槧，当日即为罕觐。查诸《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载此本，或已湮失不存。津所见即为1923年徐乃昌等影印本，四册。一至三册为《莲华经》，第四册为《尊胜等灵异神咒》。影印本有宋淳熙六年(1179)德求跋、道光二十九年(1849)魏谦升跋、宣统元年(1909)吴廷康跋。民国张尔田、姚煜、蒋汝藻跋。道光二十九年释达受题扉叶。又释道宣书“妙法莲华经弘传序”。卷七末下有“比丘德求受持”。又有手绘莲座牌记，云：“佛弟子姚煜、徐棠、蒋汝藻、徐乃昌发心印造《妙法莲华经》，十方讽诵，以此功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普愿众生，同证法华三昧。岁在昭阳大渊献正月吉，佛弟子徐乃昌敬题。”并绘韦驮像。昭阳大渊献，为民国十二年。

影印本中姚煜跋云：“右宋本《妙法莲华经》七卷《尊胜等咒》一卷，宋乾道间比丘德求置诸秀州惠云院塔，清道光中为捕雀童子所探取。寺僧以赠龙岩居士，流传之迹，已见于魏、吴跋中矣。庚申冬月，真定王君雷夏携以示予，曰：此张溥斋居士守恩故物也。居士籍隶广东顺德，同治癸酉举人，户部主事，博学工诗文，通内典，与杨仁山先生为执友，同创议刊藏经，今金陵刻经卷首有署名张净庸者是也。居士子伯凤、凤篁，皆笃信佛法。凤篁官四川冕宁知县，既歿，家清贫不能有此经，故转徙至海上云。吾友蒋君孟蘋，见而宝爱，奉归度诸斋中。暇日，煜与孟蘋焚香展玩，相谓曰：德师奉经于塔，其藏固矣，而不能不入于童子之手。厥后，自龙岩至张氏，流转又不知几许，外物之变迁，如幻，如电，如阳焰，如浮云，乃欲固之以緘滕肩镞，而冀神物之不失，不亦愚乎？惟印而传之，使一化为什百千万，世之沾溉菩提者，亦什百千万，则历代宝藏者之心亦少慰矣。乃与孟蘋及徐君积馀、徐君冠南共施金钱，以珂罗板印行，如镜取影，不失累黍，传千万载，以利有情，普愿龙天，围绕护持。”

据影印本诸跋，可知道光七年（1827）捕雀童子觅得此经后，即由惠云寺僧保存。道光二十七年，寺僧转赠龙岩居士，后又为张净庸所得。张歿，由海宁姚文甫（甫下加方）作缘，遂为蒋汝藻藏书之冠。1922年冬，姚与徐乃昌发愿影印，蒋与徐冠南赞助之。1923年，影印本印成。徐乃昌等使宋本《莲华经》化身千百，实为大功德，也使我等后人得睹宋本之庐山真面，而今影印本存世或也不多见了。

2008/10/10

有图五百幅的《太上感应篇图说》

2008年4月间在上海休假，某晚去探视王福康、徐小蛮夫妇，他们是我多年的朋友，只是相隔大洋，平时只能以电话及电子邮件互致问候，而这十多年来，见面也仅每年一次而已。这次，他们送了我一本最近出版的《中国古代插图史》，是夫妻档又一次合作的产物。书没来得及细看，但印得很精美，图版也多，从简牍、帛书的插画，到宋元明清各个时代、各种形式风格的插图艺术，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这个题目过去也有人做过，好像是清华的某君，书我也翻过，感觉是对古籍版本涉及不多的学者很难做好这种书。而福康、小蛮则不然，他们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很强，又都是编辑出身，经验丰富，所以做得比一般学者强也是很自然的。

对于古籍版本中的插图，我一直有兴趣，近半个世纪以来，所经眼古籍中的插图也不在少数。最早的应数宋《开宝藏》中的《秘藏诠》了，那是在哈佛的塞克勒博物馆中见到的（详见津撰《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而写成专文的则是《〈圣迹图〉》版本考（详见《书韵悠悠一脉香》）。



太上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一書海內名家後先發明者指不勝屈此刻博採諸家疑難彷彿通得
演義之意訪求名筆每事繪圖又選冠履良工雕鏤三載方得竣事俱用
熟練成製墨扣印日後有翻板者請係好善一念但恐圖畫甚重香想家制
滿文點畫幾毫不可假借外省梓人未諳書法必致以鉛誤版各如有欲
購者不妨自備紙張寬來刷印
因工料不敷未能遍送敬也

清乾隆刻本《太上感應篇圖說》



但我见到在一部古籍中插图最多的应是《太上感应篇图说》，书内的插图竟为五百一十九幅，也可谓多了。

《太上感应篇图说》是八卷本，为清许缙曾撰，乾隆年间的刻本，计八册。题“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秘书院编修加一级许缙曾汇辑”。书中有乾隆年间帅家相、阎介年、李培仁、梁化凤的序，另有顺治十二年（1655）御制劝善要言序、顺治十四年的凡例十则，以及内三院奉旨翻译太上感应篇满文。

许缙曾，字孝修，号鹤沙，江苏华亭人。顺治六年进士，散馆授检讨。又为右春坊右中允，兼内翰林秘书院编修，翻译《大学衍义》。分校礼闱，旋外补江西驿传道副使，官至云南按察使。其母为徐光启孙女，奉天主教甚诚笃。缙曾事母甚孝，自幼领洗，于教会事多所匡助。又有《滇行纪程》、《东还纪程》、《宝纶堂集》等。

《太上感应篇》宣扬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思想，旨在劝善惩恶，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天地之间有司过之神，家中有灶神，人体内亦有三尸神，时刻记录人之善恶，按时上天报告。行善者天必降福，依其行善多少而成各等神仙。为恶者天必降祸，依其罪恶轻重减夺寿算。死有余辜者，殃及其子孙。书中所列善恶标准，皆属儒家伦理道德，是为神道设教之代表作，宋元明清以来，此书流传甚广，影响极大。此《图说》篇首云：“太上，尊称也。道藏诸经皆以此二字为首，盖示人以不可玩忽之意，由此动彼谓之感，由彼答此谓之应，言善恶、动天地，必有报应也。世道不古，人心堕落，礼乐不能劝化，刑罚不能禁止，惟感应二字，庶足以动从善去恶之良心。查顺治十三年，上谕刊刻此篇，颁赐群臣，至举贡监生皆得遍及。是《感应篇》一书，不独检

束身心，实王化所必录也。”

古往今来，善恶之报，见诸史册及稗官野史之所记更仆难数。是编集善恶感应事，文图互见，每事一图，并有笺注及引经。册以金（五十图）、石（六十三图）、丝（六十二图）、竹（八十一图）、匏（七十二图）、土（六十八图）、革（六十二图）、木（六十一图）分。古人著书有图者不少，所谓左图右书，载在往训。他如豳风图、流民图，如长言之不足，则描写以形容之，使人如履其境，若触其容，善恶具呈，涕笑顿集，所以辅语言文字之不逮。据说明大学士张居正为东宫讲官时，就以《学》、《庸》、《论》、《孟》皆绘画图，以备讲筵之用。又荆州守邹迪光著有《劝诫图说》，摭拾前言往行、善恶各百条，绘以丹青，寿之剞劂。则绘图之事由来已久，且少有文化如田夫村妇，或见图而求其故、索其解，所以图文并列，大有裨益也。

许氏撰作此书，有彰善瘅恶，圣贤劝戒之意，凡例云：“感应篇者，非孔孟之书也。乃读其词，绎其义，福善祸淫，深有符于圣贤之旨。且本朝曾命词翰诸臣翻译刊布，则其非异端之书也明甚。自宋以来注释斯篇者，指不胜屈。兹特博采诸家之要，参互考订，为之笺注，为之引经，为之绘图征事，汇成一帙，名曰《感应篇图说》，展卷犁然，雅俗共晓。”

此本有扉叶，上刻：“太上感应篇图说。《感应篇》一书，海内名家后先发明者，指不胜屈。此刻博采诸家纂述，仿佛通俗演义之意，访求名笔，每事绘图。又遍觅旌邑良工，雕镂三载，方得竣事。俱用梨枣镶嵌，制墨扣印，日后有翻板者，诚系好善一念。但恐图画草率，鲁鱼蒙刺，且满文点画，丝毫不可假借，外省梓人未谙书法，必致以错误取咎。如有发愿广播者，不妨自备纸张竟来刷印，因工料不敷，未能遍送故也。”

首幅图刻有“华亭价人李藩写”、“旌邑鲍承勋刻”。

李藩，即李蕃，号介人，一作价人，华亭人。工山水人物，不轻下笔，独叶忠节、李待问九歌法帖、东皇太乙诸像，皆出其手。雍正二年（1724）尝作《柳溪清话图》。鲍承勋，清康熙间安徽旌德人，为名刻工，曾刻有《杂剧新论》三十四卷、《怀嵩堂赠言》四卷、《扬州梦》二卷、《秦楼月》二卷之插图，又刻有汪琬的《钝翁前后类稿》六十二卷（清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等，均工致绝伦。

古籍图书中有图者多至五百一十九幅者当不会多，即使为图谱者也不能多，如《唐诗画谱》、《芥子园画传》等。最有意思的是此书第一事图后有文，曰：“杭州汪静虚志欲刻板广施，以溥宦未果。其子汪源，谨遵先志，自己捐产刻成，多方劝募善士，各出资财，印至万部，施散于人。汪源梦父谓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劝善共施，我已超生天堂，汝母亦享高寿，众人与汝俱已名著善籍矣。”虽然没直说印的是《感应篇》，但已是呼之欲出了。

许氏此书当初刻于顺治十四年（1657），因为凡例中有“不惮繁费，雕梨刻枣，阅三年而告成”的话。顺治本，辽宁省图书馆有藏。后又有重刻本，津所见此本或为乾隆间所刻。再后来还有翻刻本，“哈佛燕京”也有人藏，翻刻本题“关中张铨宗郟重辑”，卷末有“附官允许鹤沙先生覆璞庵原札”，札中的话也很有意思，还是下次有时间再说吧。又此书有满文本，津未见。

2008/7/27

关于“君王版”《新约全书》

数十年前，哈佛燕京图书馆就搜集了一批宗教类的中文图书。这批图书近千册，种数之多，质量之高，或较之国内一般省市一级公共图书馆的收藏都要好。以《旧约全书》、《新约全书》来说，就有三十多个早期的不同版本，前者最早的是清咸丰十一年（1861）上海美华书局的本子，后者最早的是清咸丰十年（1860）香港英华书院的本子。然而这些版本中，最贵重的却是一本所谓“君王版”《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构成。《新约全书》由《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启示录》四部分组成。清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六十生辰，中国基督教的女教徒献了一本《新约全书》，作为贺寿之礼。这就是“君王版”《圣经》。

“君王版”《圣经》，实际上是“慈禧本”的重印本，即是用当时的铅字和纸张重印了若干套。这本《新约全书》印出后，被置放于银制的盒子里，然后再放入一个饰以丝织物的柚木雕饰盒内，以示庄重。

我所见到的这部珍本，书内有美国传教士 1894 年 11 月 12 日的记载：



清光绪二十年(1894)印“君王版”《新约全书》



这样一本装饰精美而又珍贵豪华的《圣经》，价值大约在一千金币左右。这笔钱应该是个大数目。

“君王版”《圣经》的封面为黑色皮面，左上方印“新约全书”，中间印“救世圣经”，均为金字。书背为黑字“新约全书”，另三面均饰以金色。书共七百六十六页。扉页上印有“新约全书 大清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 大美圣经公会托印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上海美华书馆活板”。除“新约全书”字体为楷书外，余皆为宋体。封面封底均框以竹节，节外再金边。封面饰以竹鸟，皆对称。叶茂密，封底则饰以七鸟于竹数竿中，图皆凹凸。

美华书馆是上海美国基督教长老宗亲会在上海创办的出版机构，前身为美华圣经书房。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设立于澳门，后迁宁波。咸丰十年(1860)再迁上海，改名美华书馆。用各种文字(包括满汉文)出版《圣经》和传教书刊，并印行商业簿册表报和学校教科书，为当时最大的印刷机构。前后五十年间，共发行图书四十万册，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商务印书馆成立后，该书馆在出版界的垄断地位才被取代。燕京图书馆所藏宗教类图书中，就有不少是美华书馆的出版物。

“君王版”《圣经》和“慈禧本”有一些不同，即“君”本内里文字的边框，全部都是红色，而“慈”本则为金色。书印成后，大美圣经公会并委托美国、英国公使携回国内赠送有关博物馆、图书馆保存。据知，如今美国除哈佛燕京图书馆之外，耶鲁大学图书馆也有人藏。2004年8月6日，香港“中国教会圣经工展”中拍卖了一本，当时有人开价十万港币，但被婉拒。报载：“由于封面由纯银制成，别具气派，故这版本《圣经》又称为君王版《圣经》，现时全球只有四本，呈送慈禧太后那一本后因

战乱外流至美国博物馆，其余二本则在是次展览展出，并有一本会拍卖，得来收益将捐给香港中文大学作 SARS 研究之用。投标底价为三万元。”8月10日，展览会落幕，“君王版”《圣经》拍得八十五万港币。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是其神学、教义、教规、礼议、节庆等的根本依据。《圣经》被译成汉语时，译者取其“神圣典范”、“天经地义”之义，译作《圣经》。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统计，《圣经》译本有二百六十一一种，《新约全书》译本已有三百八十四种，《新约》又被译成了一千八百余种语言和方言，因此，《新约》是世界上印数最多、发行最广、翻译文种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书。而燕京图书馆藏的“君王版”《圣经》，却是中文版中最珍贵的一种。

2006/9/2



傅斯年图书馆的镇库之宝 《群玉集》、《碧云集》

每次去台北，无论时间短长，我总会去“国家图书馆”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看朋友、看书。上一次去傅馆，因为和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所长有约，时间很紧，于是别的什么都不看，只点名要看该馆的镇库之宝——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群玉集》、《碧云集》。由于调书阅览的手续太繁，而且要给我看胶卷，所以只好找人开个“后门”，索性就坐在善本书库里的桌旁看了，这也省却了每次在楼下阅览室看善本书时，双手要戴上薄型塑料手套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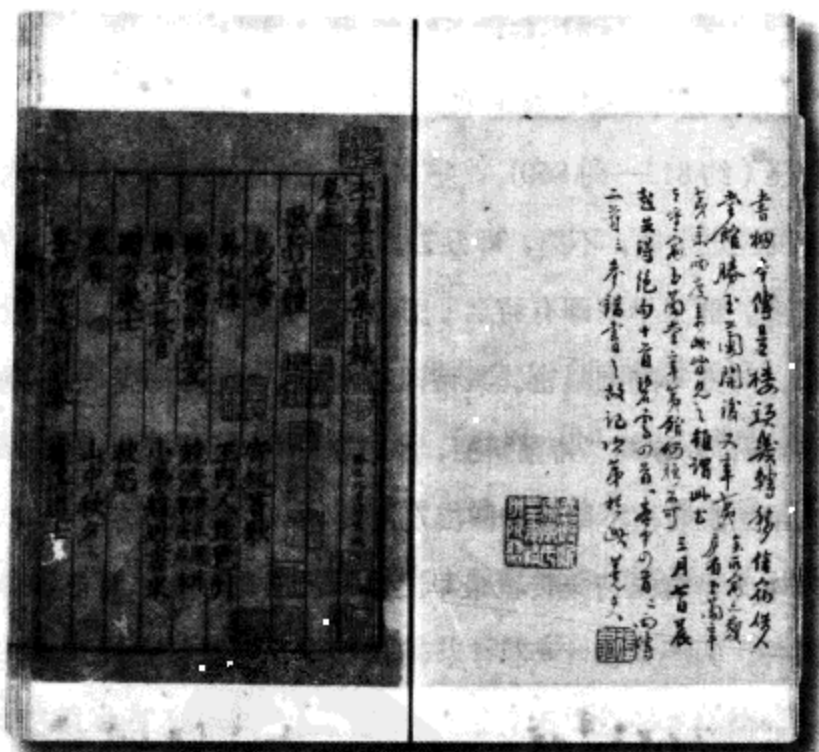
就台湾地区来说，傅斯年图书馆旧籍的收藏，还是很可观的。早在1928年史语所成立时，就刻意搜集图书文献，目前藏有明清以前的善本书约三千八百余种，四万六千余册，其中复本绝少，且多罕见珍秘。如宋监本《史记集解》、宋本《南华真经》、宋刻残本《文苑英华》等，弥足珍贵。而普通线装书十四万余册，以清代及民国初年所刻史部及集部图书居多，其中地方志原本二千余种，二万三千余册。而宋临安府陈宅

书籍铺刻本《群玉集》、《碧云集》二种，是诸多善本藏书中之白眉。

《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四卷，唐李群玉撰。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二册。清黄丕烈、民国傅增湘、邓邦述跋。又翁斌孙、柳诒徵题识。半叶十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进书表”后有“临安府棚前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一行，又后集第五卷后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一行。金镶玉装。“玄”、“弦”、“朗”、“弘”、“匡”、“恒”、“姮”、“桓”、“廓”缺末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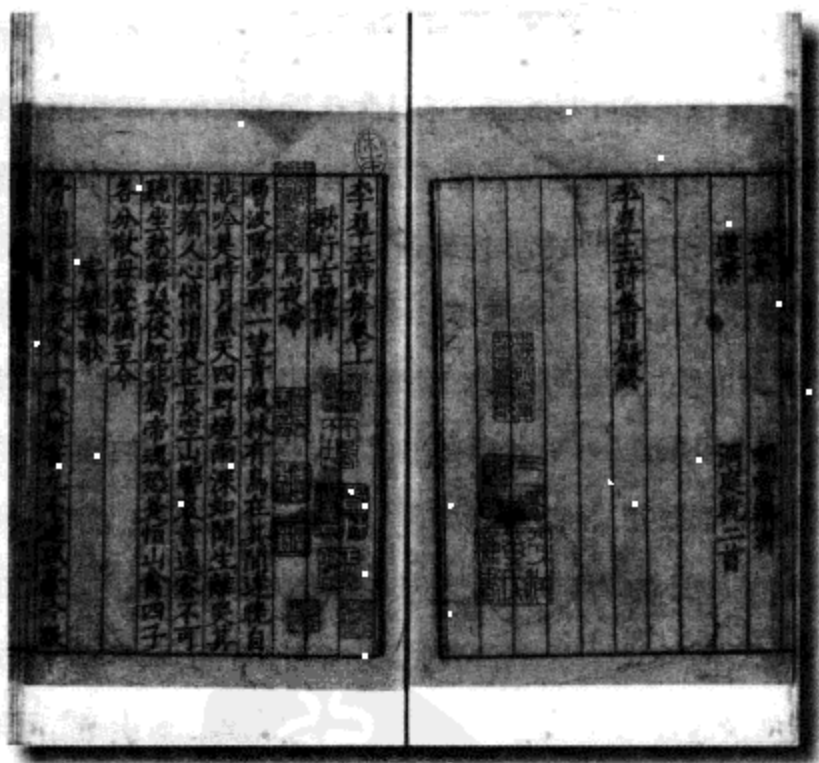
李群玉（约813—约860），字文山，澧州（今湖南澧县）人。性情淡泊，一度应进士举，不第，即弃去。裴休为宰相，荐授宏文馆校书郎，后弃官回乡。群玉早岁即有诗名，好吹笙，擅草书。和杜牧、段成式等均有往来，与方干酬唱最密。其诗风格清丽，含思深婉，别具幽芳冷艳之致。《唐摭言》称其“诗篇妍丽，才力遒健”。清初贺裳《载酒园诗话》谓“文山虽生晚唐，不染轻靡僻涩之习”。

此宋本为李群玉诗集传世最早之本，讹误也最少。黄丕烈曾藏是书旧抄本三种，为明崇祯叶奕抄本、冯氏抄本、毛氏汲古阁抄本，黄氏以三本核之，似冯本较胜，因有缺处其独全也。及得此宋本，遂取诸家抄本相勘，方知叶奕抄本行款与宋刻合。黄跋云：“及取叶本相校，迥非宋刻可比，卷中之诗不可信，则目录尤不可信，莫如宋刻之无目录者为存其真也。且冯、毛两本似出一源，而此后集之诗又似与宋刻近，与叶本又异，即目录冯、毛二本亦与叶本异。总之未见宋刻，诸家各为异同，无可适从。今校宋刻于叶本上，一一存其真。虽宋刻亦有讹舛处，就目验云，然是非又在善读者自能辨之耳。”黄氏又以宋本与毛晋汲古阁刻《李文山诗集》相核，两本迥然不同，“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



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李群玉诗集》

...
...
...
...
...
...
...



信知宋刻之佳矣”，“毛既未详所自出，尤多文理不通之处，有据与否，不得而知，故非所取也”。于此可见宋本之胜于他本之处。

黄丕烈于《群玉集》情有独钟，并有多跋，中有云：“越日不寐，晨起未起时，先有枕上吟四绝句，随意口占，稍纵即逝，故急起书之大旨，言此书之欢喜无量也。”“碧云群玉两才人，宋板唐书鉴赏真。捧出一函有双璧，陇西果是数家珍。”“书集街头无一书，汗筠修绠复何如。可怜湖贾皆盲目，枉说琅环尽子虚。”“良金拣得在披沙，求宝重过郝李祠。玉石磁铜并书画，我无特识信还疑。”“独有群书一顾空，骊黄牝牡态何穷。宋塵百一添清赏，老眼无花我仲翁。”

此书铃印甚多，除邓邦述、黄丕烈印外，又有“宋本”、“竹坞”、“玉兰堂”、“辛夷馆印”、“春草堂印”、“安麓村藏书”、“梅溪精舍”、“乾学”、“张雋之印”、“季印振宜”、“季沧苇图书记”、“良常冯氏汲古斋藏书”等印，可证清初曾藏季振宜、徐乾学诸家。

《碧云集》三卷，唐李中撰。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二册。清黄丕烈、民国邓邦述跋。又柳诒徵观款。半叶十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书口下有刻工。题“登仕郎守新淦县令知镇事赐绯鱼袋李中”，目后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行”一行。

按李中，字有中，九江（今属江西）人。一生多任县级小吏，大约920至974年间在世。马令及陆游两《南唐书》皆无传。《郡斋读书志》卷四著录《李中诗》二卷，《全唐诗》编其诗为四卷。李中与沈彬、韩熙载、张洎、左偃等友善，多有唱酬之作。据说，他情趣高雅，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书法尤佳，善草书。

此本佳处，可见黄丕烈跋汲古阁毛氏抄本《碧云集》，有云：“予今

春送考玉峰，曾获宋槧唐人诗集，《碧云》其一也。适从坊间取毛刻《八唐人集》，此种尚有，对勘一过，毛刻多缺失，宋槧皆有之，毛却未言所据何本。今又得此钞本，知为毛氏旧藏，钤有元本印记，是所据为元本，故与宋槧殊。而以此入刻，未载源流，使人闷闷，今始豁然，可与宋槧并藏。”

《碧云集》亦有黄跋及所作四绝句，云：“客中清况阅春秋，名物还从暗地收。浔寓不知何处所，我来却在玉山头。”“作合奇书在癸年，癸生人更有书缘。一家三癸是书业，叔侄祖孙今已然。”“碧云可作云程望，群玉当成玉局材。自此登龙长声价，诗名合得替人来。”“万物何常尽寓公，人亡人得楚弓同。他年想象藏书者，说是宋廛中一翁。”

此本刻工为何祐、虞才、黄坚、吴才、蔡巳、蔡明、丁明、范和、范午、范生、范崇、俞生、余士、刘尚、刘宗、刘文、刘生等。避讳之字及钤印大致同《李群玉诗集》。

宋刊《群玉》、《碧云》两集，为道光三年（1823）春，黄丕烈送其三孙美镛赴考玉峰时所得者。据说是本邑故家之物，故家不便出面，委托门客开骨董肆于郝李二公祠，肆中之书真贋杂出，但黄氏在众书中凭眼力获得。黄跋云：“忽见书堆添宋板书两部，其一即此宋板《碧云集》一套，开函视之骇甚，何意竟真，且非特《碧云》，兼有《群玉》，珍如双璧，喜出非常。”黄氏在《尧圃藏书题识续录》卷三跋影宋钞本中亦说起此事：“是役也，为三孙美镛入学招履，始得寓目，前此正考时，往观无所见，今再来重观，方遇之。”黄将二书携归后，即命三儿寿凤镌小印曰“碧云群玉之居”，钤于长笺短札，自谓颇得佳趣。

《碧云》、《群玉》两集，皆刊入明毛晋《唐人八家诗》（明崇祯十二



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碧云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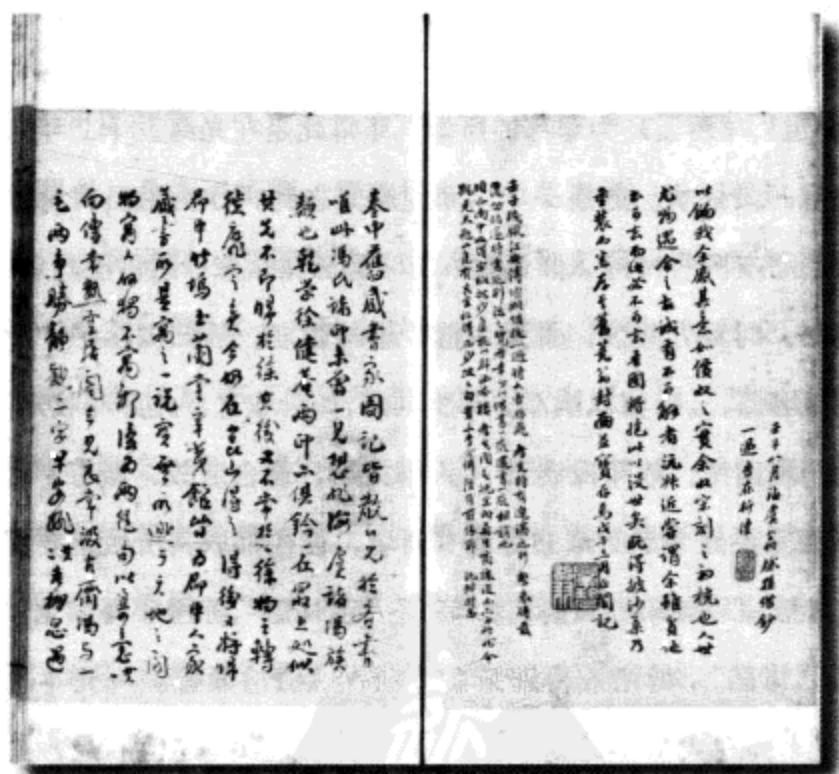
《碧云集》中的邓邦述跋

年〔1639〕毛氏汲古阁刻本)中，然毛刻所据乃为元刻本，不及见宋本。黄丕烈校宋本，有宋本不缺而毛刻反缺，甚至字句有极可笑者，知所据非古刻。

黄氏为乾嘉间藏书大家，凡其藏弃之本多得后人珍赏，如书中得有黄跋，更是珍若拱璧。此二书，黄丕烈前后题跋皆满。其藏唐人小集之宋槧甚多，且多载入《百宋一廛赋》中。这些小集中，黄氏独看重《群玉集》及《孟东野集》，以为“至精极妙者尚有一二种，历经名家藏弃，世罕其匹也”。

傅馆还有一部《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唐李咸用撰。亦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二册。半叶十行十八字，前有绍熙四年(1193)诚斋野客杨万里序，序后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行”一行。此书初流传日本，清光绪时杨守敬携以归国。1912年春，傅增湘旅居申江，访杨于虹口寓楼，杨曾出此书相示，以傅爱不忍释，杨乃割以见让。后傅离申之日，以资斧不继，遂转以归张元济，并储入涵芬楼。傅增湘返津沽，偶与邓邦述谈及，邓有佞宋之癖，坚欲得之，浼傅商之张元济，后驰书往还，张慨然允之，遂归邓氏。邓旧藏李文山之《群玉集》、李中之《碧云集》，皆临安书棚本，尝以群碧楼榜其居，及《披沙集》来归，又改署为三李龠。此本黄丕烈未见。傅增湘曾于1912年在琉璃厂得一影宋抄本，为杨守敬据所藏宋书棚本摹写。傅曾以席刻对勘一过，知席本据棚本覆木，然丹铅既竟，订正讹谬至五十余字之多。其得出之结论是：“其义皆以宋本为长，可知一经传刻，便多差失，校书所以贵原本也。”

宋代刻书除官家、私家之外，就是书肆，而书肆以临安为代表。此宋本二部，虽经数百年之久，然愈旧愈新，真瑰奇之宝。且字体精整，



《群玉集》中的題跋

刷印清朗，纸质坚致，洵为宋刻宋印，若此墨香纸韵者，尤不易得。书皆宋临安府睦亲坊陈宅书籍铺刻本。睦亲坊多宗学，俗称宗学巷，附近书坊较多。陈宅，即为陈起父子所开设的书坊，位于南宋首都临安府御河旁的棚北大街上。陈氏刻书大约始于南宋宁宗中期，即嘉定中晚期，至南宋灭亡后不久也毁了，刻书历史应近七十年，所刻唐人小集和宋人小集不少，且多有牌记，或于序后，或在卷末，其书肆有功于传播传统文化，如今所存都是罕见之本。

《群玉》、《碧云》为邓邦述所藏，邓得此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说来也有一段故事。之前一年，邓应端方之约，作为随员将游欧美，考察宪政。书友柳蓉村持《群玉集》与《碧云集》来，谓黄丕烈重视二李，过于他书。时邓方戒装，囊无余蓄，遂却谢之。后归国至沪，而蓉村又以书送至客邸，云特留以饷邓。邓感其意，如价收之。此亦邓收宋刻之始，亦可谓一段因缘。故邓氏尝云：“人世尤物，遇合之故，诚有不可解者。”

一些重要藏书家的藏书处或书斋名，往往都取其所藏重要图书为之命名，如潘宗周得宋刻《周礼》，而署“宝礼堂”；陈澄中得宋刻《荀子》，而自署“荀斋”；傅增湘得宋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与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题其藏书处为“双鉴楼”等等。邓邦述也如是，他的斋名有好几个，而与此《群玉》、《碧云》两集有关者，即有群碧楼、碧云群玉之居；又有三李龕，前已言及，盖因《群玉》、《碧云》二集的作者为李群玉、李中，《唐李推官披沙集》的作者为李咸用，故邓又有披玉云斋，也是将《披沙集》、《群玉集》、《碧云集》三集中各取一字署名。

邦述，字孝先，号正阁，又号沅梦词人，为金陵之望族，祖上在南京也有藏书，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毁去。少时就婚常熟赵氏，得读天放

楼书，慨然有志于收蓄。通籍后，广事搜罗，倾囊不倦。及从海外归，始收宋元旧刻与精抄本，积书至二万余卷。得一书，必躬加题记，蚕眠细书，录稿盈篋。然而对于藏书家来说，要想使费尽辛苦而搜集来的藏书世守弗失，长保清芬，那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就以江南这个富庶地区来说，明代的吴宽、王文格、都穆、文徵明、毛氏汲古阁；清代的绛云楼、述古堂、传是楼、黄氏之士礼居、汪闳源艺芸书舍等等，都是三代不到，就散失殆尽，宁波天一阁是仅有的一个例外。可见，家族代有藏书之传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邓氏鬻书，是为了偿债，事本平常，无足为异，像邓氏这么一大家人，纵使是万贯家财，也是会坐吃山空的。辛亥不一年，邓邦述辟居津门，无以为活，乃举宋本七八种出以易米。1921年夏，以长安居大不易，幡然归吴中，迄1926年元月，则闭门谢客，家无余财，又举债买一宅于城南隘巷，困支一年，逋负山积，遂不克举火。1927年5月，经蔡元培出面，邓氏的部分藏书以五万元的价格售给了中央研究院。在售书之后，邓无可奈何地说：“余虽不幸，及身而散，然亦有所甚幸者。积书至数万卷，充箱盈笥，担挈弥苦，身遭乱离，不能不委之而去。偶挈以俱，则舍彼取此，致难别择。舟车之费，弃掷方多，盗负雨濡，所在不免。吾书虽南北迢递，安然无恙，即有散失，未同劫灰，此一幸也。不得已而去，遑云择人，海客豪家，非所愿托。然爱书者半出寒儒，希言善价，若零缣寸璧，夕割朝裁，求之惟恐不精，得之惟恐不贱，则千金市骨，既渺知音，九张分机，亦虞减色。适遇研究院者，兼搜故籍，用广国华，琅嬛之储，请自兹始。从此不忧散佚，得慰初衷，永获保存，并叨荣问，此又一幸也。”

邓氏群碧楼中的大部分善本皆售于中央研究院，据说售价五万元，实得四万五千元，以五千为蔡元培寿，盖非蔡氏之力，则研究院断不购此古籍也。丁文江先生曾任中央研究院干事，慨然与叶景葵先生说：研究院应兴之事甚多，应革之事亦甚多，即如邓孝先之书，研究院购之何用，乃费去五万元。若以此五万元研究地质，岂非有益于国计民生？叶笑云：如君言，则琉璃厂肆皆关门，从此无肯刻中国书者矣。二人相与一笑而别。

1939年，邓邦述去世，其家再议售书以维生计。次年，由郑振铎文献保存同志会出面，在上海购得一批邓氏藏书。后邓家又以《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托叶景葵先生估价。叶后有信告其家曰：“兹自寒瘦目，除去王绶珊所购，约略估计尚值二万元，其余普通书，似亦可值一万元，倘购主允八折，即可脱手。”幸邦述如夫人应付得当，竟实得三万二千元。购者苏州集宝斋及北京景文阁、东来阁、文殿阁诸家，其中介费亦达七八千元。

邓邦述卒，叶景葵有诗挽之：“促膝谈心甫两句，如何一蹶已归真！丧余骨肉仍罹劫（长子死于蜀，家人讳不以闻），鬻后图书不疗贫。宁学翳桑成饿莩，独留劲草慰先民。卅年风义如昆季，三复遗笺涕满巾。”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云：“半生仕宦为书穷，可奈书随债俱空。”这也是对邓邦述藏书恰如其分的写照。

2008/5/25

陈老莲的《宝纶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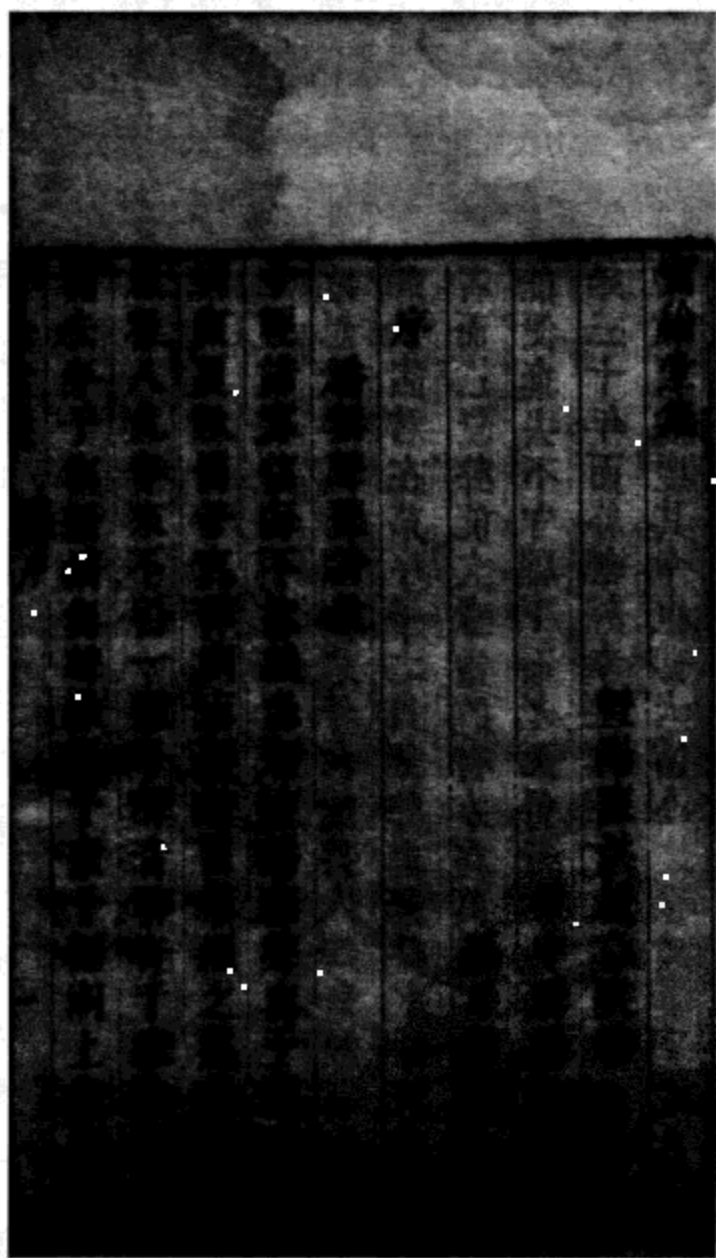
陈洪绶，号老莲，是明末时期的大画家，被尊崇为“代表17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工书法，善山水，尤工人物。诸生，崇祯间召人为舍人，使临历代帝王画像，因得纵观大内书画，技益进。多年前，看老莲创作的《九歌图》十二幅以及《博古叶子》，就为他自创形象、无依无傍、用笔精谨、一丝不苟而心折。老莲的诗，多富人情味，朴实无华，不太修饰，但也是饶有逸致，笔触间有真率之趣。他的诗文之作流传不多，又为画名所掩，故他留给后人的印象，就是一位大画家。

老莲的集子为《宝纶堂集》，据我所知有两个版本，一个就是至今还被陈洪绶的研究者所经常引用的，而且是唯一的清光绪十四年（1888）会稽董氏取斯堂木活字本；另一本则是鲜为人知的清康熙陈氏宝纶堂刻本。

康熙刻本《宝纶堂集》十卷，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题“暨阳陈洪绶章侯著 男字购辑 孙豸对读”。二册。前有康熙三十年（1691）



清康熙刻本《陈章侯先生遗集》（《宝纶堂集》）



罗坤序、康熙四十四年(1705)胡其毅序。又有孟远撰陈洪绶传。末有程象复跋。此本卷一序、传；卷二论、记；卷三书、寿文、铭、杂文；卷四四言古、五言古；卷五排律、五言律；卷六五言绝、六言绝；卷七七言古；卷八七言律；卷九七言绝；卷十词。

1995年9月，翁万戈先生来“哈佛燕京”我的办公室聊天。翁先生的高祖是清同光间名臣翁同龢，前几年他的“翁氏藏书”以四百五十万美金之价转让给了上海图书馆，引起了海内外的轰动。翁先生也是研究陈老莲的权威，他编著的《陈洪绶》二大册后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曾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那天他告诉我，他正在写《陈洪绶》一书。于是我告诉他说，老莲集传世的最早版本是康熙本，您见过否？同时，我取出了原书和旧日所撰书志一篇。翁先生看到书和书志，由初时的惊讶，而变得异常的兴奋，在后来的两个小时中，老人家仔细地阅读，并肯定了此书的价值。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要我代为复制该书的一套胶卷。

老莲集的康熙本流传罕见。在光绪董氏取斯堂本中，有董氏“轶事”小序云：老莲“没后数载，其子无名翁始哀辑刻之，岁久湮泯，板刻不存，传本日希，几如星凤。丁亥夏，余获见精本，既得卒读，亟命工以活字印行，庶几先贤遗著，重显于世。同邑徐仲凡太守，藏先生手书避乱诗一帙，上虞王氏天香楼旧藏也，得诗百五十三首，中有四十余首为前所未见。佚文坠简，尤可宝贵，爰从假录校印，使附行焉。集所已载，则姑缺之，以省纒复”。

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吴敢点校本《陈洪绶集》，吴先生也没见过康熙本。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美术史博士刘晔仪小姐曾作过核对，她写信告诉我说：康熙本较光绪本多出卷一序一篇、卷三铭一篇、卷四五古

二十七首、卷五五言排律一百首、卷六五言绝三十四首六言绝五首、卷七七言古九首、卷八七言律三十五首、卷九七言绝十一首。而吴敢点校本较之康熙本多出五古一首、五言绝一首、七言绝三首。然康熙本所收诗却比吴敢本多出约二百五十首。于此可见康熙本之可贵。

此康熙本的书眉上，还有沈复槃录陈洪绶余诗一百余首。沈复槃有跋云：“右《宝纶堂集》十卷，吾越陈洪绶撰，其子字编。初求是集不可得，予于癸丑始得残本三册，萧山曹明经购采越中诗家。予又访会稽孟氏藻镜楼，藏本完善，集中高眉上遗诗亦孟氏搜辑。校之残本诗文，尚多数篇。今割其所无，合而订之，庶章侯先生之诗文或无添焉。其残本归曹氏焉。嘉庆庚午七月初一日曝书，鸣野山房识。”沈跋在另纸上，跋后钤有“鸣野山房”小印。按，鸣野山房即沈复槃藏书处。复槃，字霞西，浙江绍兴人，博极群书，收藏甚富。据沈跋，余诗为会稽孟氏所辑。余诗中仅三十首见于光绪本，其他则为佚诗，可补光绪本及吴敢点校本之遗漏。按，阮元《两浙辖轩录》云：“老莲初无诗集，生平作画懒于题咏，偶有所题，亦未尝存稿。其老友姜绮季与共晨夕，见有题，辄为钞录，久而得诗一卷，镌于板。老莲见之大喜，因自为序，名曰《陈老莲集》。老莲卒，毛西河复为之序。”又按，老莲序作于顺治八年（1651），次年即逝去。今姜绮季刻本，已不传于世。

此康熙本扉叶刻“陈章侯先生遗集 宝纶堂藏”。扉叶上又钤有“梅花十里读书楼”、“家世枫谿”两印，当陈老莲后人所钤也。

查近人黄涌泉《陈洪绶年谱》，顺治四年（1647）夏秋间，洪绶五十岁时，在山中无可消遣，将四子小莲平时所录己诗，稍加裁删，定名为《宝纶堂集》，寄送诸暨西安乡江藻村王子安是正，并致一信云：“梅

迟雅不以诗鸣，儿子鹿头，私将生平所作编次成帙，展阅一过，可删者十七。昼长如年，山中无可消遣，即将鹿头所编次者删录呈政，知予老见之，必有教正。”据（宣统）《诸暨县志》卷四十九《经籍志》云：“枫桥陈氏授经堂藏有洪绶手录稿本，乃江藻来园故物，末无避乱诗。”来园藏陈氏稿本在王子安去世后归钱氏所有。此稿本后有钱洪□跋，云：“是岁予安师设帐于予家之来园，寻先生归道山，此稿流落余家者三十年。今秋解组归，检点藏□，得是稿。……核所录诗，与董刻无出入，卷面有康熙癸丑春题‘六十一页，序七页’七字，字数与罗、胡两序相当，今佚。无杂文，卷后无轶事。盖洪绶手定稿本，只诗二卷。文与轶事，鼎革命其子字所补辑付刻也。”洪绶手稿，在清末为七世孙陈通声购回，后分装四册，1936年在杭州举办之“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中曾展出。稿本末有钱洪□、吴庆坻、陈通声跋并诗。此稿本今也不知流落何方，或已湮灭不存。

上面所提到的辑刻老莲集子的四子小莲，即陈字，原名儒桢，字无名，又字名儒，号小莲。他是老莲的衣钵传人，书画都有乃父之风。

据说老莲生平喜为贫不得志人作画，若豪贵有势力者索之，虽千金不为执笔。顺治九年（1652），老莲忽归故里，日与昔时老友流连不忍去。一日，跌坐床箦，瞑目欲逝，子妇环哭。老莲急戒无哭，喃喃念佛号而卒，年五十四。老莲的名气很大，但他的集子流传稀少，此康熙本，《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以及《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皆未收。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内仅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

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人物，为文坛祭酒、东林党魁。他是学者，也是诗人，对经史释道都有研究，在他等身的著作中，推《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以下作《初学》、《有学》）为最重要。钱谦益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康熙三年（1664）卒，年八十三岁。对于钱来说，最为人诟病的是顺治三年（1646），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清廷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然而在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之前，《初学》、《有学》这两部著作即遭到了乾隆帝的指摘，迅即禁毁，余波涉及钱氏的所有著作以及钱为他人撰序的诗文集等。

《初学集》一百十卷目录二卷，明崇祯十六年（1643）瞿式耜刻本，为钱在明时所写诗文，虽为诗文，但后十卷为《太祖实录辨正》及《读杜小笺》。《有学集》五十卷，清康熙刻本，为钱入清后所作诗文，始顺治二年，止康熙二年。程嘉燧序云：“岁癸未冬，海虞瞿稼轩刻其师牧斋先生《初学集》一百卷。”扉叶刻“钱牧斋先生初学集 崇祯癸未岁刊行 燕誉堂藏板”。卷一百十末有“宁德府旌德县刘人相字文华督工

镌刻”。

弘历禁钱氏书，纯属偶然，且缘于沈德潜。沈德潜是“大佬”，曾任少詹事、詹事，升值书房副总裁，八十多岁致仕后，又封给礼部尚书衔，甚至到了九十岁还晋阶太子太傅、太子太师，而且弘历多次下江南，几乎多要他来陪护。沈为父母乞诰命，弘历即赐给三代封典。皇上的宠爱，真是令沈德潜有些忘乎所以了。

也真是没事找事，乾隆二十六年(1761)沈选《国朝诗别裁集》竣，其恃弘历与之恩宠，上书弘历求序。弘历见集首列钱谦益诸人，大为不满，以千秋忠孝名教为由，因人废言，不允其诗冠清朝，而降旨毁其原板。云：“沈德潜送国朝人诗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潜老矣，且以诗文受将达之知，所请宜无不允。因进其书而粗观之，列前茅者则钱谦益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问，既求朕序，则千秋之公论系焉，是不可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乱民也，有国法在！至身为明朝达官，而甘心复事本朝者，虽一时权宜，草昧缔构所不废，要知其人则非人类也。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则不可，在德潜则尤不可。且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义，今之所选，非其宿昔言诗之道也。”（《十二朝东华录》乾隆朝卷廿一）

“最高指示”说明弘历对钱谦益有看法是早就有的事，原因之一是认为他在明朝为礼部侍郎，后又投顺清朝做官，于人臣大节有亏，所以深恶痛绝。然而，这只是表现在“选诗”上，他还没有发出进一步的谕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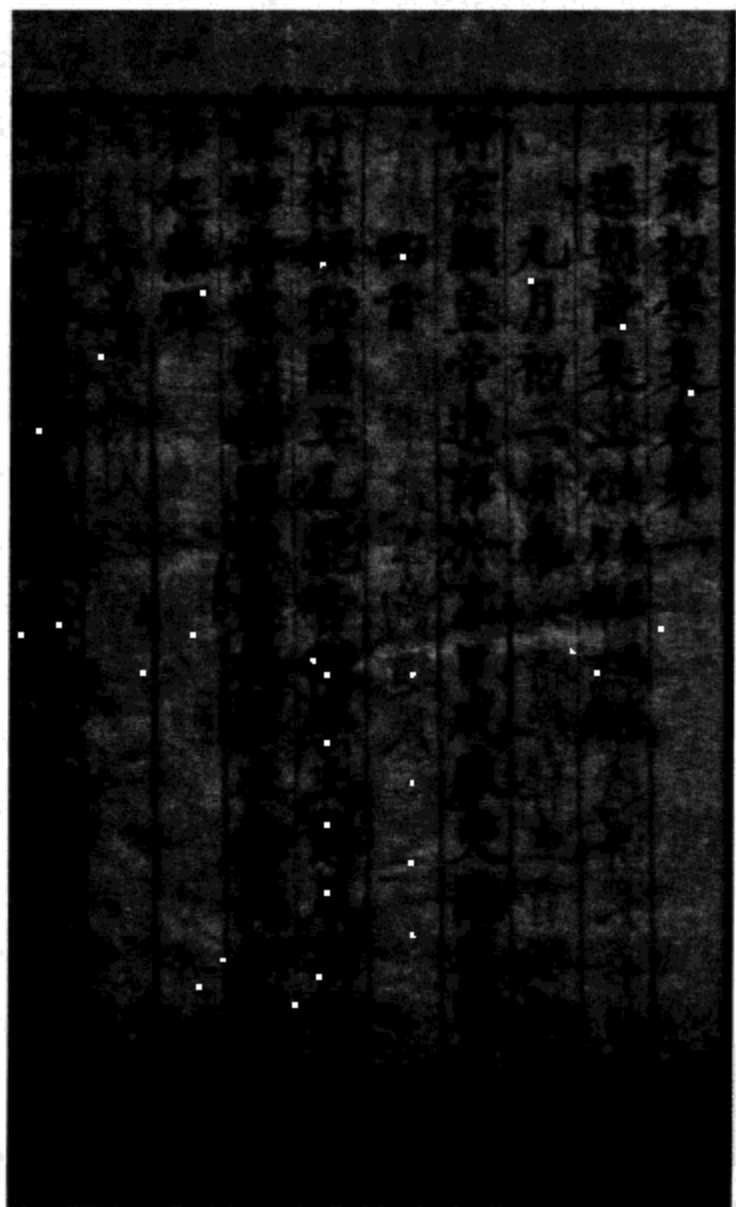
八年后，事情就有了新的发展，因为弘历凭着“阶级斗争”的嗅觉，在钱谦益的诗文集中发现了大量诋毁当朝之处。乾隆三十四年(1769)，

弘历调阅《初学》、《有学》二集，见其中多有记载满洲先世、明清和战史实，及讥讽剃发之语，且于字里行间散布排满思想。至于诋詈之词，如“犬羊”、“奴狼”、“丑虏”、“杂种小丑”、“蛇豕”等含种族之见者，不一而足。弘历认为这些“荒诞悖谬”、“诋谤本朝”之语，实属“悖理犯义”，乃明谕查禁。六月初六上谕云：“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臬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朕从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彼时未经见其全集，尚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著各该督抚等将《初学》、《有学》二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汇齐送京。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谷者，并著广为出示，明切晓谕，定限二年之内，俾令尽行缴出，毋使稍有存留。钱谦益隶籍江南，其书板必当尚存，且别省或有翻刻印售者，俱著该督抚等即将全板尽数查出，一并送京，勿令留遗片简，朕此旨实为世道人心起见，止欲斥弃其书，并非欲查究其事，通谕中外知之。”（《清代七百名人传》、《清史列传·贰臣传乙》）弘历是人君，他已将钱氏恨之入骨，将钱氏辱骂一番，并命销毁其书籍后，又诏国史馆撰贰臣传，列入乙编，也是情理之事。

于是大规模的禁毁钱谦益著作的行动，就此揭开大幕。内阁奉谕即



明崇禎十六年(1643)刻本《钱牧斋先生初学集》



通飭各省督抚一体办理，各省督抚即遵旨会同藩司恭录圣谕誊黄，刊刻告示，通令各府州县遍贴晓谕书肆及藏书之家，如有《初学》、《有学》，即令其即速缴官。没过几天，弘历又降旨云：“今偶阅其面页，所刻《初学集》则有‘本府藏板’字样，《有学集》则有‘金匱山房订正’及‘金閻书林敬白’字样。是《初学集》书板，原系伊家所藏，纵其后裔凋零，而其书现在印行，其板自无残缺转售，收存谅不出江苏地面，无难踪迹根寻。至《有学集》，则镌自苏州书肆，自更易于物色，但恐因有查禁之旨，书贾等转视为奇货，乘间私行刷印密藏，希图射利，尤不可不早杜其源。高晋此时现驻苏城，著传谕令其将二书原板即速查出，检点封固，委员迅行解京。若所属或有翻刻之板，亦令一并查缴，毋任片简遗留。”

钱谦益原籍常熟，所以弘历点名两江总督高晋等遵旨先行查缴。那些臣工也没有辜负主子的期望，江苏按察使吴坛、苏粮巡道朱奎扬将江苏各县民间所送缴钱氏著作编造清册又装成十二箱，其中《初学》七十部、《有学》九十五部、玉诏堂选笺《初学》一百九十三部、玉诏堂选笺《有学》一百九十部，合计五百四十八部，共四千二百十三本，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差员解京。

查缴钱氏著作在全国各地展开，以广东来说，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钟音就令南海、番禺二县在省城各书坊详加查询，对民间所藏的钱谦益著作及刊刻书版尽行呈缴，收得江浙等省书贾带来《初学》、《有学》二集共十二部，又绅士人等缴出《初学》、《有学》集十八部。同时又在书铺缴出十部，每部内有钱谦益诗一本，抽出俱行给价，并据各绅士抽缴六本，此种书集版片查系苏州叶御周家收藏印刷。

关于钱氏著作的书板，李侍尧等在呈朝廷的摺子上说：“江苏省起

获玉宸尊书铺翻刻玉诏堂《初学》、《有学集》板片，讯系浙民劳武曾，在广令沈御璜雇匠翻刻。臣随经饬县传到书贾沈御璜，讯明前项书集系诸在林伙计劳武曾携带来，因广东工价较贱于江浙，托其雇匠翻刻，即将原板寄回浙省，在广并未刷印亦未翻刻。书板序文系诸在林在浙另行刊刻，劳武曾已于乾隆三十二年在广病故。”

是时，《初学》、《有学》二集的刻板，前后起获三副。一在常熟（昭文）县邵士瞻家起出《初学集》板，系钱谦益曾孙钱崢以价抵押于邵氏，即系弘历指出刊有“本府藏板”字样之板。一在杭州林松年书铺起出“金匱山房订正”《有学集》板，此板系金匱县秦洪绪曾祖秦漆原买自钱谦益后裔，复加订正，嗣经秦洪绪之兄秦其云及秦仲简卖给苏州书铺赵鸿儒，赵氏又转卖于林松年者。第三副板系在苏州玉宸尊书铺起出玉诏堂《初学》、《有学》二集板片，有诗无文，此即原集所有之诗，惟间有删削。据称此板系买自浙江嘉兴诸在林书铺，诸在林则从石门县人劳武曾自广东买来。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十七日，大学士舒赫德等谨奏：“查从前奉旨谕令各省将钱谦益《初学》、《有学》等书解京销毁，前经臣等将解到各书奏交内务府烧毁，续据各省解到《初学》等书共二万三十一本，又未钉者四十部，理合奏明，仍交内务府销毁。再查有解到《初学》等书板片共二千九十八块，应交武英殿收查，其中或有尚可铲者，作为刊刻别项书籍之用，其残损浇薄者，即行烧毁。”当日，即奉旨：“知道了。”书是毁了，书板的大部倒是“废物利用”，却也不知道又另刻了什么书。

截止到乾隆四十七年，查禁销毁钱氏著作的事已近尾声，八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管浙江巡抚陈辉祖共查出各种禁书一百八十一种，

计一千五百八十四部，均应解京销毁。其中《初学》二十六部（十七部全，九部不全）、《有学》四十七部（十七部全，三十部不全）；又《列朝诗集》八部，俱不全；《列朝诗集小传》二部，也不全；《牧斋尺牍》一部，全；《杜诗笺注》七十九部，俱全。这时，查禁已进行了十三年，《四库全书》编纂也已进行了九年。

话又要说回来，弘历后来对于钱氏作序之书还是网开一面，以为“其经史及诸集内所有钱谦益序文，语无悖谬者，俱不必撤毁”，而只是“止去其序，无庸概行毁禁”（《十二朝东华录》乾隆朝卷廿五）。

钱氏著作，包括《投笔集》、《吾炙集》、《钱注杜诗》、《列朝诗集小传》、《国初群雄事略》、《楞严蒙钞》等，在《禁书总目》、《违碍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都有著录。乾隆禁毁钱书虽屡下严旨，厉然执行，不遗余力，意将钱氏著述禁绝而后已，如“所有各书坊及藏书之家，原无干碍，各督抚务须详悉谕知，并严飭属员安静妥办，毋任胥役人等藉端滋扰。若士民等因此查办，反以其书为宝，不行举出，百计收藏者，则其人自取罪戾，该督抚亦不可姑息，若将来犯出，惟该督抚是问。其京城地面，著提督衙门、五城、顺天府一体办理，将此通谕中外知之”，但是钱氏著述既繁，流传亦广，为文博赡，又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其为海内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所以在严令缴毁之下，仍有缙绅士子匿藏未缴，那可是“顶风作案”自取罪戾的事。阎若璩云：“吾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也、顾炎武及黄宗羲也。”孟森序《王安石评传》云：“闻故都老辈言：承平时士大夫，有不传之秘两事，于宋则荆公，于清则钱牧斋，其集皆在人袖笼内，心摹手追，口不敢道。”禁，是禁而不绝。弘历能

厄之于一时，而不能厄之于千古。所谓是板销于禁网，书亡于缴送，但是，古语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三百多年后，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牧斋初学集》一百十卷目录二卷，明崇祯十六年瞿式耜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四十九馆入藏，台北有三部。《牧斋有学集》五十卷，清康熙刻本，山东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十一馆入藏。《有学集》又有康熙金匱山房刻本，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八馆入藏。另钱曾注《牧斋初学集诗注》二十卷《有学集诗注》十四卷，清玉诏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十三馆入藏。钱曾注本又有春晖堂刻本，湖北省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六馆入藏。《有学集》尚有清初抄本、清冯武抄本、清抄本等五部；《牧斋初学集诗注》及《有学集诗注》也有清抄本。台北“国家图书馆”又有《有学外集》八卷《续集》一卷《补遗》一卷《投笔集》一卷、《绛云楼文录》、《绛云馀烬集》等，为旧抄本及抄本。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文人不顾禁令，甚至对钱著诗文进行搜集补遗，如集外文、集外诗、补遗文、补遗诗等等。

2008/10/26

内府刊刻的《御制避暑山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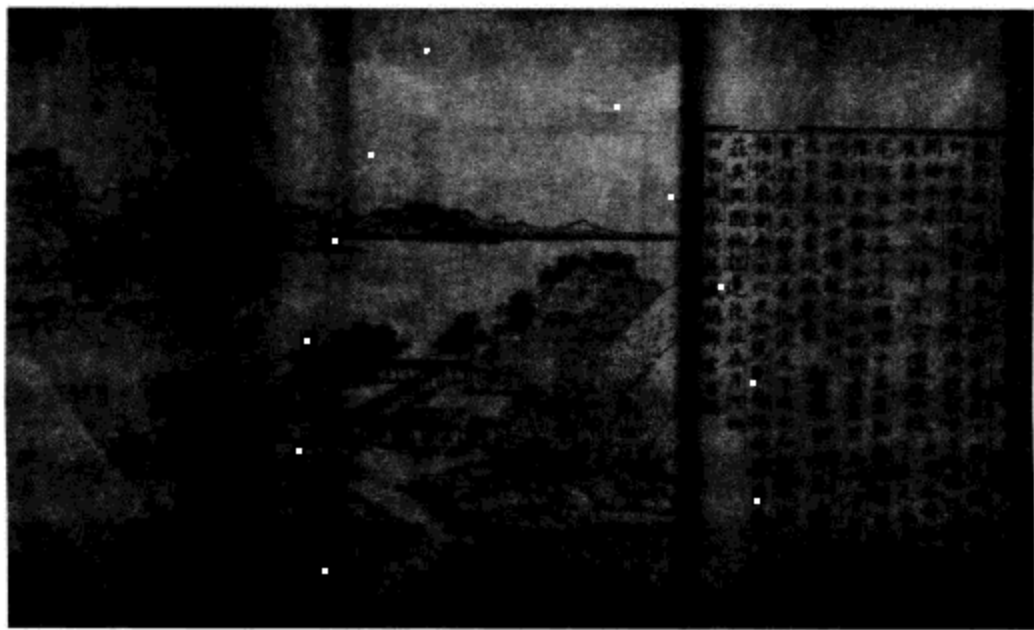
清代皇帝有诗集传世的有：顺治帝的《万寿诗》一卷；康熙帝的《御制诗集》十卷二集十卷三集八卷；乾隆帝的《御制诗》从初集至五集，加上余集，总共四百五十四卷（不包括单刻本）；嘉庆帝的《御制诗》初集至三集、余集，共一百八十二卷；道光帝的《御制诗》初集和余集，共三十六卷；咸丰帝的《御制诗》八卷余集十二卷；光绪帝最少，他的《御制诗》为六卷。这些诗集当然都是内府刊刻。

玄烨为清世祖第三子，八岁即位，年号康熙，乃有清一代颇有作为的君王，其文治武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极大贡献。玄烨诗作单刻者，仅有《御制避暑山庄诗》一种。然此《避暑》却有好几种不同版本，津历年所见，有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朱墨套印本、康熙内府刻满文本、清末民初大同书局缩版石印本、1930年武进陶湘涉园据康熙内府本石印本（满文、汉文二种），以及日本昭和十年（1935）日满文化协会据罗振玉藏本的影印本。然而，是书的最好版本为故宫博物院藏的清康熙五十一年内府刻朱墨套印彩色绘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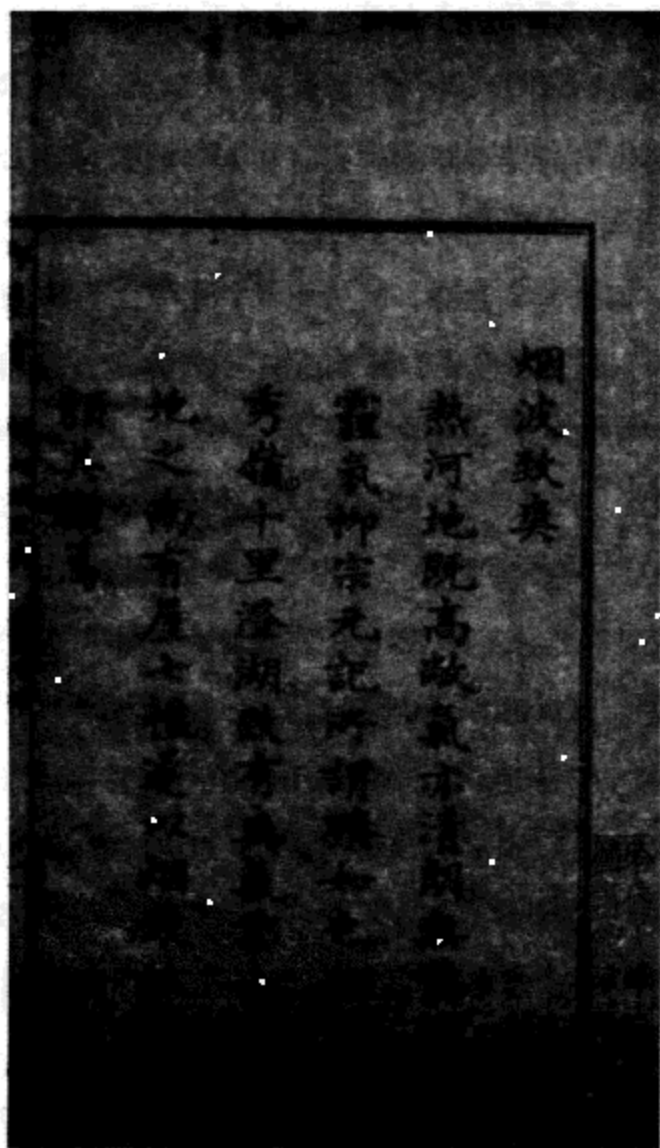
避暑山庄亦称承德离宫、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清代帝王避暑行宫。苑圃之建，首在选址，需得山水之胜。山庄得天独厚，峰峦环抱，秀色宜人，玄烨选中此地，盖因“念此地旧无居人，辟为离宫，无侵民田庐之害，又去京师至近，章奏朝发夕至，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乃相其冈原，发其榛莽，凡所营构，皆因岩壑天然之妙。开林涤涧，不采不斲，工费省约而绮绉绣错，烟景万状”。如此之佳景，加上离北京不远，难怪人主要以山庄作为每年盛暑时，他自己或奉皇太后驻蹕之地了。

清康熙内府刻朱墨套印本，计二卷，卷上诗十六首，卷下诗二十首，写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每景一诗，皆以四字题名，介绍位置及意境，朴素无华，饶自然之趣。每诗之后，皆有图画，山水树木，楼台亭阁，布局严谨，线条流畅，皆为画家如实摄取景色，并无虚构，且刊刻刀法浑厚圆熟，精丽工致，亦版画中之精品。绘者沈嵒，一作喻，字玉峰，奉天正黄旗人。官至内阁侍讲学士，善画山水，尤长楼阁、牡丹。乾隆十年（1745）又绘有《雍正御制圆明园图咏》。

毕竟是玄烨自己的得意之作，所以《避暑》有满文本和汉文本二种，在翻译及雕版刷印过程中，均由和素、李国屏两人负责，但事事处处始终是在玄烨的“关怀”下进行。和素为满洲人，内阁侍读学士，为武英殿总监造，管翻书房。李国屏为武英殿总监造，内务府会计司员外郎。据《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玄烨即要求，热河三十六景每景各画说图二张，一张于绢板刊刻，另一张于木板刊刻。八月初七日和素、李国屏奏上，刊刻工匠由朱贵、梅雨峰（津按：梅雨峰又作梅玉峰，曾为朝廷派往射虎川摹勒文字，噶礼有御书楼，曾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朱墨套印本《御制避暑山庄诗》



将皇上御书“宝”字，请梅玉峰摹勒上石)负责。内府刻书用的木板有梨木和枣木两种，此书刊刻图画用的是枣木板，大约每人二十天左右刻一块。枣木板虽长宽尺寸勉强够，但潮湿，需干后方可刊刻。若干，需十几日。所以工匠以穿山甲、川胶放入水中，和枣木板煮二三日，放阴凉处晾干，亦不易裂。

玄烨将翻译后的文字陆续送去，和素等收到后，大为“感动”，其奏摺云：“奴才和素、常树及所有书房之人并不能受之，奴才等虽惟掐字翻译，但总辞不达意，甚为粗鄙。主子之意深细，奴才等断然不得之词，朱批皆予改正，每个曲圈，皆劳圣心，因蒙尽心教诲，奴才等所有书房之人，较前稍有长进，此俱为主子培育之恩。歌咏避暑山庄之记、诗，甚为奇妙深奥，奴才等遵旨陆续上紧装完，恭谨进览，仰乞主子改定。”

当玄烨撰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缮记完成后，要求“将此作速刊刻，订于先完之书前”。面对御书，和素等奉旨后即交付朱贵等上紧勤加刊刻，并上奏云：“奴才等看得，主子每日照旧万几(机)，仍亲手改正满汉文书籍，所降满汉谕旨，无不亲自缮写。再，亲自撰写之文章、诗，俱系出自肺腑之圣谕，如此高难之文，或出奴才等笔下，必不得其词矣，惟心中叹服欢抃耳。”而李光地、王揆等见到后，也有摺子呈上，云：“臣等再四伏诵，窃以皇上性定而神全，故其发于文辞也，浩乎若江河之沛；恩明而意美，故其发于文辞也，盎然如天地之春。含英咀华，而无文人雕镂组绘之陋；源经本史，而无学者剿说雷同之界。”

《避暑》用什么纸刷印，印多少部，臣工们都是当作大事而要上摺子请示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初一日，和素、李国屏奏明，已刷

之《避暑山庄诗》上下二卷，内奉旨改正五字，改正后，各钉三本具奏。因为《御选唐诗》曾用连四纸、竹制纸刷印一千部。现《避暑山庄诗》用哪种纸，刷多少部，请皇上降旨。结果，玄烨朱批：印刷二百部。

玄烨毕竟是英明至极的人主，大事小事，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笃行不倦，一抓到底。而奴才毕竟是奴才，说的也是奴才话，只要有机会，就会尽情表达，所以阿谀奉承、曲意逢迎的面目也一览无遗。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避暑》满文本一卷刻竣，玄烨认为“刻完之书甚好，甚恭谨。尔等于西洋纸刷一二部后，放下。俟用铜刊刻之画完竣之时，再汇集装订。若西洋纸多，能多印几部，更好。据闻此种纸发绉之处多，如垫起来，墨到不了，笔划恐又易断。将此妥善为之”。于是，和素等到处寻西洋纸，然未寻到。后查得养心殿存有西洋纸二万五千九百余张，其中有可印书之薄纸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张，故将养心殿收藏之西洋纸取来，发绉之处弄平，交与专门善于印刷之领催、工匠，印刷一部后，奏上圣览。并请示此书应印几部。朱批：“只印四部，妥善收藏。画完竣之时再定。”因此，满文本是用西洋纸来印的。

当年，汉文本印了二百部，满文本似乎也印了二百部。后者的根据是同治元年（1862）时，武英殿在清点过去所印图书时，发现《避暑》尚存满文本九十九部，汉文本九十八部。因此，可以推断当时二种文字所印的部数应该相同。有意思的是同治光绪年间，武英殿曾将存留部数较多的书向官员及平民百姓售卖，在武英殿卖书底簿中，《避暑》满文本每部价银为一钱三分，而汉文本则为一钱六分。如今，汉文本传世尚有数十部，除“哈佛燕京”馆外，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国家图

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二十馆也有人藏，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满文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九部，“哈佛燕京”藏有一部。

2008/10/17



红香零帙——《听秋轩诗集》

封建社会中之女性，大约生于官宦人家或乡镇诗礼传家者方能得教育之机会。如若天才高隽者，略经指示，便斐然成章，或观摩父兄之作，也可沾溉余艺，而于针线刀尺之间，略作风花雪月之吟。至于考订经史及讲究经世之文者，则有如凤毛麟角了。

宋元明以来，妇女著作不多，而清代妇女之集，超越前代甚多，据统计，见于著录者数逾三千。然而名媛之集，限于当时之条件，镌印较难，因此红香小册，绿窗零帙，传至今日者甚为稀见，搜集也是不易之事。津数十年所见闺秀著作，仅有百种而已，其中总集多，而别集则较难得，《听秋轩诗集》则其一也。

《听秋轩诗集》三卷，清骆绮兰撰，清乾隆六十年（1795）金陵龚氏刻本，一册。题“句曲女史骆绮兰佩香”。前有乾隆六十年袁枚、王文治序，又有曾燠序。

绮兰，字佩香，号秋亭，又号句曲女史，江苏句容人。少通典籍，能吟咏，诗书皆有天趣，以清节称。旧居广陵，移家丹徒，为袁枚、王



清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听秋轩诗集》

聽秋軒詩集卷一

句曲女史駱綺蘭佩香

古今體詩七十六首

棲霞德雲菴題壁

容鼎大學藏
圖書館珍藏

數椽碧峰下半出青松間
明月常到戶白雲不出山
中有棲禪人蒼蒼冰雪顏
心將繁華謝身與猿鳥閑
門前有流水跌坐聽潺潺

雨花臺春望

山色接平蕪高臺入望無
不聞僧說法唯聽夜啼烏
金粉空前代烟波積後湖
月中漁唱起野艇出菰蒲

文治女弟子。适金陵龚世治，世治也好为诗词，夫妇二人日夕闭门唱和。然其夫早逝，此集所存之诗，多世治逝后之作。

名师出高徒，袁枚、王文治都是乾隆进士，前者入翰林散馆，后者官翰林院侍读，都是诗文冠江南、才华出众的人物，绮兰拜在他们门下，自是日有所益。集中卷一七十六首、卷二六十五首、卷三七十七首，皆古今体诗。绮兰少时即爱静坐，后从事于释氏，故心之所处与身之所历悉超然。其斋名“听秋”，乃见于王文治《题秋灯课女图绝句》，句云：“一灯双影瘦伶俜，窗外秋声不可听。儿命苦于慈母处，当年有父为传经。”骆得诗，故以“听秋”名轩。

王文治序云：“绮兰读书明大意，具卓识，无世俗儿女之态，亦不沾沾为资生计。亲族间有大事，群谋不决，绮兰一言而众辄伏。家虽贫，常能以财贿缓人急，扶危济困，有烈士风。所为诗，伉爽高迈，丈夫之雄杰者不能过也。尝受业钱塘袁子才太史及予，谓予二人之诗，非世间短钉常语，故爱之深，且愿师之。予每与论诗，辄心解其意，或有所弹击，尤悦服不可言……顾其诗益进，其境益穷，白屋孤灯，夏日冬夜，块然载处，与物无求，古所称固穷之君子。”

按，王昶《春融堂集》卷二十二有《闺秀骆佩香绮兰赠〈听秋轩集〉因题其后》云：“句曲溪山似玉京，游仙诗句不胜情。须知标落冰霜冷，正与瑶台一样清。”“落叶哀蝉少日愁，残年梵篋事熏修。何期瓜步东风里，未了吟春又听秋。”

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作考》，乃是费多年之精力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之重要参考书，其著录骆集本为六卷，后三卷为卷四诗九十四首、卷五诗一百二十九首、卷六诗一百三十六首，又附闺中同人集一卷。然

此集仅三卷，目录页并无割裂，或为先印之本耶？又《国朝闺阁诗钞》卷七收有骆诗十二首，并云绮兰有《听秋轩诗稿》四卷。

流传至今的古籍善本中坊刻本最多，由于坊刻多以图利为目的，一般来说，选料粗糙，刻工不精，错讹之处亦多。此本殆家刻本，精雕细刻，纸白如玉，的系初印。袁、王、曾三序，皆为王文治手书后刊刻，书法秀逸天成，颇得董其昌神髓。清代书法有四大家，为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骆集得王氏手书序文，也可见王骆师生之谊。

此书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虽刻于乾隆末年，但亦为清刻本中之白眉。扉页刻“听秋轩诗集 金陵龚氏藏板”，有“徐秋槎赏鉴印”。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大连市图书馆也有人藏，但为四卷之本。有清近三百年间，妇女著作甚少，且刊刻也不多，故流传至今稀之又稀了。



哈佛教授戈鲲化的 《人寿集》和《人寿堂诗钞》

当你走进哈佛燕京图书馆时，会发现墙上悬挂着一位身着清代官服的文人照片，这个人就是戈鲲化。说起戈鲲化，今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也难怪，因为戈氏在清末只是流寓在宁波地方上的一位学者，在全国来说，是没有名气的。不过，话说回来，戈氏却是中国学者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文化的第一人，这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乃至整个中外文化教育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戈鲲化，字砚昀，一字彥员，安徽新安人。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二十二岁时，在黄开榜军中做幕僚。同治二年（1863）前后，任职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二年期满，同治四年他到宁波，又在英国领事馆任职。1879年七月，四十一岁时，戈鲲化前往美国纽约，随后转往波士顿，在哈佛大学三年，卒于美国。

戈氏之所以能去美国，首先与一位美国商人奈德有关。奈德曾任美国驻营口领事，也兼任法国、德国、荷兰等国驻营口的领事或副领事。

1877年，他根据美国在华商务和传教事业的需要，致信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提出募款在该校建立中文讲座的建议，目的是通过学习中文，培养年轻人，以促进将来两国贸易往来。而进一步寻得戈氏来美的是在宁波工作的税务司杜德维。戈鲲化曾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还教过英国、法国学生，并善于同西方人打交道，由此双方在1879年5月签订了三年的合同，写明哈佛聘请戈氏前去教授中文。

戈氏的集子是《人寿堂诗钞》一卷《人寿集》一卷，清光绪三年（1877）至四年（1878）刻本。二册。半叶七行十七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题“新安戈鲲化砚韵”。前有同治十三年（1874）章鋈序、光绪四年黄钰序、光绪三年陈劭序、光绪三年戈鲲化自序。《人寿集》前有光绪三年戈鲲化自序。

戈氏毕竟是一位对地方民生、民众疾苦颇为了解的文人，所以他的诗无论描摹风物，或倾吐心志，多直抒胸臆，不假雕饰，对于社会生活也有所披露。《民有三疾，诗以悯之》之《狎妓》云：“迷津孽浪惨滔天，错认风流夙世缘。梦醒阳台金易尽，空嗟失足误青年。”《纵博》又云：“快意豪情莫与京，逢场兴剧藐输赢。牧猪奴戏原轻贱，况破家资业未精。”《嗜赌》再云：“短榻横眠趣味多，一灯遑问夜如何。膏肓深入医无术，谁信烟魔胜病魔。”

诗中也颇有史料可寻，如《久寓》诸诗之四云：“藏书阁比鲁灵光，劫后牙签半散亡。检点残编珍世守，故家乔木尚苍苍。”充分反映出在太平天国战事后，宁波天一阁藏书惨遭破坏，民族文化受到摧残之情景。

章鋈序云：“新安戈君砚韵，天才踔厉，尤好吟咏，兴之所至，辄濡墨伸纸，顷刻数千百言，空所依傍。是其专主微眇，有真性情以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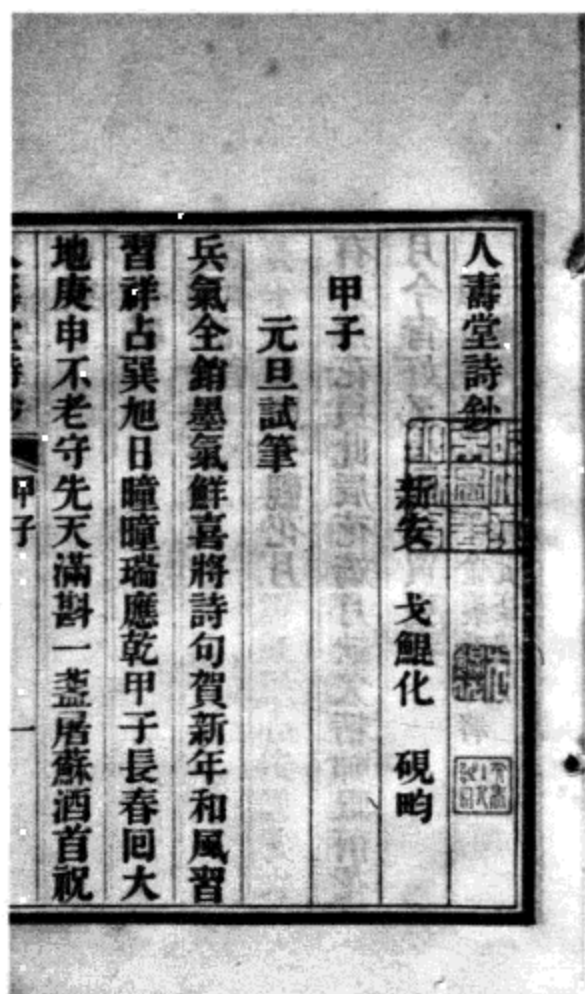


戈鲲化像





清光绪三年(1877)至四年(1878)刻本《人壽堂詩鈔》



复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抒其所见，岂规唐摹宋、务求形似，而神不相属者所能及乎？”黄钰序云：“太守之诗，不拘一格，要其历览山川，胸次高旷，情兴所寄，捭管成章，不屑屑以描摹见长，而渊懿醇茂，风华绮丽，靡不毕集，殆震川所云‘得西子之神而不徒以其颦’者乎！”

此书刊刻的依据可见扉叶。扉叶刻有“光绪四年戊寅春王正月开雕”、“光绪三年丁丑春王正月开雕”。从书的版本来看，此本已到清末了，但老话说，物以稀为贵，《人寿堂诗钞》及《人寿集》虽为近代刻印，然流传罕见，《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均未著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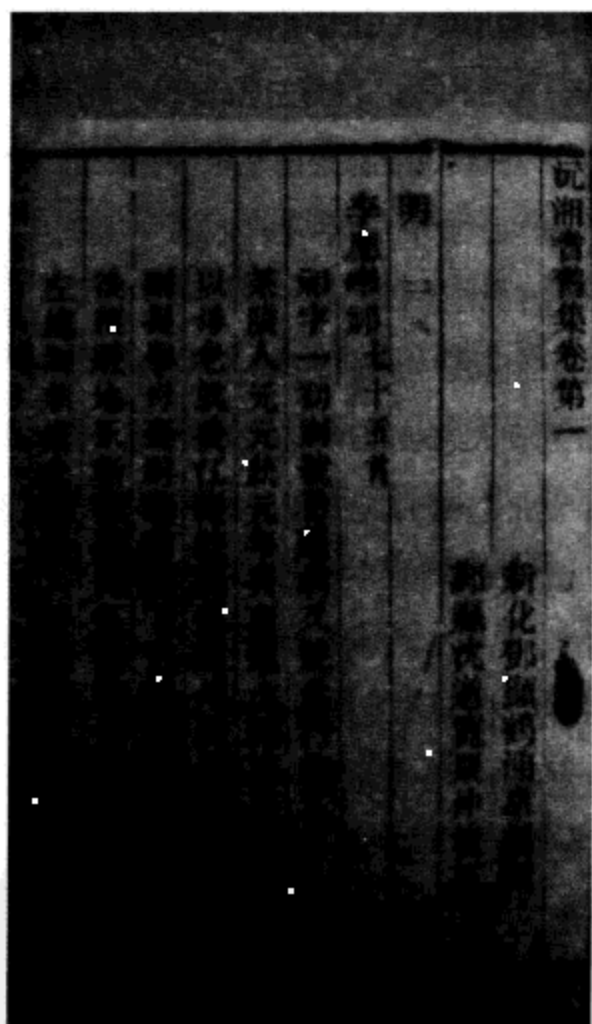
今天的“哈佛燕京”早已成为世界汉学资料重镇，每当看到戈氏的照片，人们就会想起这位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奠基者。这位中美文化的先行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名字却永远留在哈佛大学的发展史上，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戈氏如今在上海还有后人，不过，让人伤感的是这个家庭已经潦倒得很了，经济状况窘迫之极。古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信然。戈氏的四世孙戈承华，现已八十出头，中过一次风，对自己的祖先已全然忘记。实际上，戈的大儿子后来自美返国，他口才极好，曾被郑逸梅誉为中国第一位演讲家。戈的后人曾经写信给哈佛大学，请求经济上的援手。但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好像整个社会已经忘记这位戈老爷子当年对中美教育的贡献了。

邓显鹤的《沅湘耆旧集》及续编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第五期，载岳麓书社将要影印出版《沅湘耆旧集》，我以为这是进一步播扬湖湘文化的大好事。“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是岳麓书院大门前令湖南人为之骄傲的一副对联。湖湘文化，源远流长。也确实是人杰地灵，不少舞文弄墨的书生，既能带兵打仗，又能创造巨大的政治事功。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卓越的人物之中，如曾国藩、黄兴、毛泽东等，都是出自湖南。至于那些文人才子撰写的各种集子，如今多已成为不可多得的文献了。

《沅湘耆旧集》是一部属于集部总集类的湖南地方艺文集，集以“耆旧”为名，乃文献所系。辑者是邓显鹤，字子立，别字湘皋，湖南新化人，学者称之为湘皋先生、南村先生。嘉庆甲子中举人，官宁乡教谕。其人厌薄仕进，笃内行，束身以礼。学极淹博，兼以诗鸣，得唐人正声。尤笃于师友风义，尝以为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乃从事搜讨，此《耆旧集》，即为其蒐集之集。邓显鹤又著有《武冈志》、《楚宝增辑考异》、《南村草堂诗文集》等，辑有《资江耆旧集》等。



清道光刻本《沅湘耆舊集》

《耆旧集》是部大书，八十册，有二百卷之多，集中收录一千六百九十九人，诗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首。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各系小传，用存一方掌故。且集中所载，不拘一格，要以表彰先哲、搜剔遐隐为心。如此，则湖南文献大略皆在。其中不少韦布诸生、骚人逸士之诗，皆有赖此书以存，如春容含蓄、屡征不起的潘应斗，沉郁苍凉、九死不悔的夏汝弼，清婉深秀、刻苦自厉的陈五鼎，整饬雅饬、沉晦无名的程本，格律浑成、负气不屈的王嗣乾，悠然尘外、功高不居的陈宏范等人。《耆旧集》有前编，乃为显鹤子邓琮所辑，始自晋宋，暨于元代，上自公卿，下逮诸生，旁及闺秀释道，计三百三十家，诗二千二百三十余首。

这部工程浩大的巨帙，编辑刊刻实在不是容易之事。我曾细读书中序例，有几段话足可使人感动，即以寻觅文献资料一节，可窥一斑。有云：“家乏藏书，人渺专业，高门右族，手泽既不轻以示人，蠹简鼠编，下士亦各私其祖父，无不视为奇货，秘比琅函。造观既乏响导，借钞绝少写官。下至荒山古寺，委巷农家，村学传钞，老僧粘壁，亦有名章可资采录，自非身历其地不知。又若定哀之间多微词，沅湘之地多激响，忌讳滋繁，嫌畏尤甚。若莲冠道人、食苦和尚、砍柴行者之流，声出金石，光争日月，散在榛莽，飘若云烟，鬼神护持，流风不坠，偶得片语，如获异珍，惊喜狂拜，至于泣下。凡此之类，若没若灭，何有何亡，今欲网罗散失，勒成一编，则旁求之难也。”

古人成一书甚难，刊刻更难。元好问编《中州集》，历二十寒暑，仅成卷帙，无力刊行，后得赵国宝提学资助，始得侵木以传。清渔洋山人王士禛之《感旧集》，也是在其身后久之，方由雅雨山人卢见曾开雕。此《耆旧集》编辑成书后，先由贵州巡抚贺熙龄寄助百金，再由贺氏与

陈本钦联名“致同里诸公书”，之后湖南各地，皆有人寄款助刊，并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在邓宅之祠堂开雕，至次年秋竣工，共用去缗钱一百八十万。为此，邓显鹤非常感慨，有云：“今是集告成，实借诸君子之力。显鹤识暗才疏，因人成事，敢自以为功哉？”

沅湘为水名，魏源有《三湘棹歌》，自注云：“楚水入洞庭者三，曰蒸湘，曰资湘，曰沅湘。”《宝庆府志》卷一百零三，载有魏源致显鹤函，专论《沅湘耆旧集》书名：“承示《沅湘耆旧集》，全书网罗百代，包括全楚，体大思精，不朽盛业，无以复加矣。但鄙意沅湘何以不名三湘？陶文毅序《资江集》，以谓湘在九江，最长且著，必综其首尾核之，而后三湘之名可定。其以潇湘、资湘、沅湘为三湘，论虽创，实确。”此札甚长。魏源此札以为“沅湘”之名，不如“三湘”更妥，然显鹤在核定书名时未采其说。

《耆旧集》刊行后，显鹤还有续编、补编、补前编之辑，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二十年前，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应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前馆长钱存训教授之邀，到该馆一星期，除了安排一场演讲外，其余的时间均由我安排，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把重点全部放在了该馆的善本书库。善本书库并不大，但却汇集了该馆数十年来所搜集的中文、西文的珍藏。钱教授对我可是特别地礼遇，他关照工作人员尽量地照顾我的要求，所以我是早上九点即入善本书库，下午五时关门才离开，中午出来吃个汉堡包。

书库中有二百多部中国的古籍善本，我选看了其中一部分，其中有一部《沅湘耆旧诗集续编》。当时一看这部书的书名是“续编”，就注意起来，因为我过去用过《沅湘耆旧集》，那是普通线装书，从未听说过有“续编”。取下一翻，但见改削添补，满纸涂乙，丹黄盈溢，果然是一部未

刻稿本，计一百六十三卷补编二十卷附前编补三卷，六十五册。如果细细核之，计续编收一千二百六十二人，补编收四百九十五人，补前编收三十九人，合计一千七百九十六人，也各为小传。以一人之力，辑录沅湘诗人三千四百余人，几达四百卷，也可谓胜矣。

续编部分收诗，每人一首至数十首，甚至百首以上。如卷一至六为显鹤诗，即收有三百八十三首。诸如公卿名士、秀才布衣、监生训导、闺阁释道之流，皆有收录。一些不见经传的诗人小传赖此得存，较之方志或他种著述要多且详。中有从友朋手稿借录者、从方志中辑佚者，如《徐教谕荣封二十一首》。徐为嘉庆癸酉科拔贡，肄业国子监，报满议叙教谕，考充武英殿校录，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正，平生著述甚富，《尚书》、《毛诗》、《二十四史》皆有纂录，稿本悉毁于兵燹，诗稿亦沦劫灰，今所见诗数十首，皆朋旧录存者。又如收周昭侃诗二十一首，周为乾隆中岁贡生，官蓝山训导，邓氏得其手稿一册，内有诗五百余首，选其诗二十余首入续集。

续编、补编、补前编从不见于著录，知者也鲜有其人。如若岳麓书社在影印《沅湘耆旧集》的同时，将续编、补编、补前编也予以印入，那不仅是化未刻稿本于千百，亦有了却邓氏未竟之愿的功德。

清康熙刻本《明人尺牍选》

书信,是最能表明心迹的文体之一。少时读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那实在是兼具文学、史学价值的瑰宝。至于各大家之文笔,也是各擅其妙。如通览各家,可见文体源流,足资文事修饰。而文体之美备,如锦绣珍宝之杂陈,目光眩惑而不知所择,如选其有关学问、经济、人品、心术者录之,既可作书牍观,也可作为古文读。

“哈佛燕京”所藏明代刻本中属尺牍类的专书不多,也就十来种,而难得的仅有四种,即明万历建邑书林熊云吾种德堂刻本《新镌注释里居通用合璧文翰》二卷、明末四知馆刻本《鼎镌漱石山房汇编注释士民便观云笺柬》四卷、明余象笈刻本《名公翰墨林》四卷、明末刻本《新刻友花居上林鸿》四卷,都是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的各图书馆未入藏的。这类尺牍书,多是当时的通行本,即编出来给百姓大众看的,书中多是分类编排,诸如什么慰问类、辞谢类、订约类、家书类等,都是告知如何写信,如何称呼,书启定式,而这些也适于习作书简者借鉴,是人们平日交际不可或缺的内容。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明人尺牘選》

明人尺牘選卷第一

常熟王元魚會章

休寧程化縣深泰

答郡守

宋 濂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濂為
五經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
也昔軒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為學官弟子
每行縣益徒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
齊魯為執事亦軒產是宜汲汲孜孜追躡於文翁也
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傳得良傳則正鵠致

清人编的明人尺牍，不这么多，我在“哈佛燕京”仅见到一部，那是《明人尺牍选》四卷，清王元勋、程化騄辑，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碧云楼刻本。八册。半叶十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题“常熟王元勋含章 休宁程化騄汉乘辑”。前有康熙四十四年严虞惇序、康熙四十四年汪绎序。末有康熙四十四年余经跋。

辑录此书的王元勋，字含章，江苏常熟人。程化騄，字汉乘，安徽新安人。两个人的简历都不详，但可以知道，两个人都是好古博雅之士，尤好裒辑古今人文章。先是元勋将手录明人尺牍数百篇示程化騄，而化騄亦向有尺牍之选，于是两人相与参订，摭所未备，并谋诸付梓。

兹编搜采明人书札共百余家，有明一代之人文略具于是，而前辈之流风遗韵，亦有足想见者。卷一宋濂一首、倪瓚二首、方孝孺七首、陈献章二首、岳正一首、杨守陈一首、何乔新三首、李东阳六首、桑悦二首、罗伦二首、章懋六首、程敏政一首、吴宽一首、王鏊五首、储巏二首、罗玘二首、王守仁三首、沈周三首、祝允明二首、唐寅一首、王宠二首、康海二首、徐问二首、魏校二首、陆深三首。

卷二文徵明三首、崔铤一首、杨慎三首、霍韬一首、张岳一首、许宗鲁一首、胡侍一首、王廷陈二首、颜木一首、凌约言一首、徐阶一首、徐献忠三首、陆粲四首、唐顺之四首、陈束二首、孙陞一首、赵贞吉二首、王维楨一首、茅坤五首、张居正二十五首、杨继盛二首、王世贞五首、汪道昆三首、海瑞一首、谢榛二首、徐中行一首、宗臣三首、吴国伦二首、王世懋二首、王锡爵一首。

卷三归有光十四首、徐渭六首、于慎行一首、赵用贤五首、莫是龙五首、王穉登八首、严泽一首、冯梦禎四首、冯琦一首、屠隆四首、汤

显祖十五首、王在晋三首、李贽一首、董其昌一首、高攀龙二首、陈继儒四首、谢肇淛二首、袁宏道七首、王思任二首、熊廷弼一首、王衡十四首、钱象坤一首、杨涟二首。

卷四钱谦益十四首、王良臣三首、钟惺二首、缪昌期一首、范景文一首、周顺昌六首、俞琬纶五首、刘荣嗣一首、袁中道二首、魏大中三首、萧士玮二首、瞿式耜一首、姚希孟五首、祝世禄二首、唐时升一首、程嘉燧三首、茅维二首、魏学洧一首、陈衍四首、章世纯二首、文震孟二首、陈于泰一首、赵士春二首、程先达三首、曾异撰三首、黄淳耀二首、徐世溥一首、陆圻二首、顾炎武二首、释祿宏二首、释德清二首、宋氏一首、余氏一首、顾氏一首、徐媛四首、周氏四首。

我没有核查过上面所列各人之文集，或有集子中未收之文。我曾选了若干篇读之，虽事类不一，但首尾套语皆有省略。字里行间，大之陈国家安危之计，小之谈人伦日用之常，坦率而无虚假，论事则惟的是发，抒情则胸臆洞开，世事之盈虚消长，亦可借窥一斑。且立言多淑世励俗之语，行文之际，没有一丝传世自炫之意，大约是心无挂碍，率情而道，于是神随笔到，也就没有了矫揉造作之态。这些书札读起来，不会有索然寡味的感觉。不过我倒是喜欢读些内涵情事之札，盖多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对处事为人、为文修身也有启迪作用。

书中余经的跋云：“有明三百年间，名人韵士辈出，其所论议著述，久为词坛所宗。至其往来之笔札，或累千百言，或寥寥数语，虽其绪余，而雅有思致。顾具散逸纪载，中而简册浩富，非浅鲜之士所能涉其万一也。程子汉乘，少从余游，具绝世资，于先人所遗书无不披览，每当赏会处，辄裂赫蹄，手书而贮之。乙酉岁，游虞山，与王君含章交善，出

其所钞明人尺牍百余首质之。王君固博雅嗜古士也，以汉乘所褒录不无挂遗，因相与穷搜博猎，采摭成编，删繁剃复，取雅去靡，遂使琳琅错陈，而一代之人文，可一披阅而占其概矣。刻成，邮以示余，为书数语于后。”

明朝人集明代名人尺牍成书的，也有多种，如许以忠辑《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八卷、李自荣辑《车书楼选注名公新语满纸千金》八卷等。而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看，清初人直截了当地编选明人尺牍而刊刻成书的，则仅此而已。

此本扉叶题“碧云楼藏板”，碧云楼不知是谁人所有，只云“藏板”，故此书是谁出资刊刻也不清楚。此书《续修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都未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湖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七馆也有入藏，也就是说，此书传世并不多。

钤印有二方，曰“青田徐则恂藏”、“投戈讲艺息马论道”。

2007/6/18

清乾隆刻本《吴江沈氏诗集》

周绍良先生《绍良文集》上册有《吴江沈氏世家》一文，云：明代后一时期，在东南隐然执曲坛牛耳，当属吴江沈氏，不独人才辈出，而且沈璟、沈自征先后相继，为词家宗主，学曲者无不奉为圭臬。在戏曲史上，吴江沈氏可以说是重要的一家，但对这一词曲世家，钻研者少，“博识如傅惜华先生，编《明代传奇总目》，……沈氏几个作曲家，竟有两人不被人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遗憾的”。

“哈佛燕京”藏清代刻本中有《吴江沈氏诗集》十二卷，为清沈祖禹辑，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五册。题“祖禹谨录 彤谨校”。前有乾隆五年沈祖禹序，并“前后鉴阅诸先生名氏”、“旁采诸名家选本”。末有沈彤后序。

沈祖禹序有云：“沈氏于元末始居吴江，……忠孝传家，而文学亦开其先，厥后遂以诗赋文辞名者众，而诗为尤甚。”族中有沈璟者，为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尝致力于戏曲声律之研究，并编写传奇剧本，后来的许多戏曲作家在音律上拥护其主张，模仿其风格，被称为“吴江派”。



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吳江沈氏詩集》

吳江沈氏詩集卷一

哈爾濱大學
圖書館
祖為謹錄

形謹校

徵仕公二首

公名奎字天祥號半閑為人篤於孝弟母夫人嘗
目貴醫工謂不治矣公舐之數月竟愈以子漢書
贈徵仕郎 國朝雍正中崇祀忠義孝弟祠周恭
肅公撰公墓誌稱公為文辭不失矩度歷世久遠
篇章散佚僅存二詩句句從至性流出風格渾古
直逼漢魏蓋非僅矩度不失而已其亦足闡吾家
文學之先歟

沈祖禹，字所揆，号怡亭，沈奎九世孙，沈俞嘏长子。国子监生。喜为诗，学杜少陵，笔健词达，无哀艳之篇。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于乾隆十六年，年七十。又有《怡亭诗集》。

《吴江沈氏诗集》集明成化至清乾隆间沈氏之诗，卷一六人，诗五十七首；卷二四人，诗八十一首；卷三三人，诗一百零六首；卷四二人，诗一百二十五首；卷五十人，诗六十七首；卷六三人，诗九十九首；卷七九人，诗八十二首；卷八四人，诗六十二首；卷九七人，诗五十八首；卷十二十二人，诗八十三首；卷十一至十二，录闺秀二十人，诗一百三十一首。总计九十人，诗九百五十一首。每人选诗数首，或乃至百数十首，要以其佳者为断。作者均有小传一篇列于诗前，句斟字酌，有裨史乘，间有评论，以见诗律。诗皆选自《列朝诗集》、《姑苏杨柳枝词》、《翠楼集》、《遗民诗》、《玉台遗响》、《松陵文起》等集。

沈祖禹序又云：“……其最著者，顾篇什略见他名家所编，而集之刊行者，十不得二。往者，冽泉公尝撰为总集，尚有所遗，且自明季而止，用是我大父晚香公、从父真崖公，先后罔罗，复补其阙，篇什增多，而业俱未就。今又曰三十年矣，旧所藏者，各有蠹蚀，而诸公别集，转益残缺。每与从弟冠云语及而心伤之。己未夏五，乃敢忘其固陋，发旧所藏，重加搜访。自明之成化，逮国朝之乾隆，凡得七十公，暨闺秀二十人，遗诗计数千首。敬谨翻阅，因三稿而整齐之，复于善言诗者商榷之，定录诗九百五十一首，析为十有二卷，名曰《吴江沈氏诗集录》，并谋诸族人，相与资而刻之。”己未，为乾隆四年(1739)。

此本为集部总集类之家集，自宋至清，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者约二百余种，此其一也。吴江沈氏重要人物之诗皆有选入，又有仅赖此

集存者，如沈瑾，喜为诗古文辞，顷刻立就，稿极多，乾隆时仅存诗十余首，今仅见其尤者一章而已。又如沈永令，曾任潼关道副使，汤斌称其为有才长者，其诗文词曲书画皆有名，所著《深柳堂集》今已湮灭，是书存其诗十五首，似可观其沉雄瑰丽之一面。又如沈璟，除剧作外，又有《属玉堂稿》二卷，今书不存，此集也仅有诗十三首，或可窥其雄健清丽之音。

名公如此，即闺秀亦有因此书而存其诗之灵光断壁者。卷十一有金法筵诗八首，法筵为金圣叹季女，七岁能诗，圣叹爱之，为赋“左家娇女惜余春”句。于归沈六书后，遂以惜春名其轩，有《惜春轩稿》一卷。《历代妇女著作考》云“未见”，今此本存其八首。卷十二沈大荣为王士驥室，沈宜修为叶绍袁妻，叶小纨为沈永楨内助，皆有诗不等。

昔年，津尝辑有柳亚子《磨剑室钞存乡先辈已刊未刊稿本题记》，内有《吴江沈氏诗录十二卷》（见《磨剑室文录》上册九七九页），为亚子先生于1920年7月自芦墟陆树棠处借抄，底本为同治六年（1867）沈桂芬重刻本，后附《勤补书屋诗钞》一卷、《西山诗钞》一卷、《织帘居士诗钞》一卷，又附《小西谏疏》二卷、《吴江沈氏家传》一卷。

此为家刻本，“玄”、“弘”字避帝讳。白纸初印，楷书秀美齐整，刻工精湛，当与林吉人所书《渔洋山人精华录》、《尧峰文钞》、《午亭文编》比肩。有扉叶，刻“吴江沈氏诗集录”。按，（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六《书目》著录此书，云：“沈奎以下并闺秀九十一人。”此本除“哈佛燕京”外，国内北京首都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六馆也有人藏。

吴兔床的几种稿本

我以为乾嘉间的几位重要藏书家中，如以“德高望重”来衡量的话，那是非吴騫吴兔床莫属的。至于黄丕烈、陈鱣、顾广圻等人，即使那么著名，也不会送这顶“帽子”的。黄陈顾对吴尊重有加，这在他们的题跋诗文中时有所见，当是无可置疑的。吴騫是浙江海宁人，他的所谓“千元十驾”即是指藏书丰富，研浙江藏书史者对吴騫也有重点介绍，如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中就有九页的叙述。

前不久，见到台北一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是《吴騫及其拜经楼藏书研究》，已作为专书出版面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六编第一册）。拜读之余，深觉此位先生实在是用功，将吴氏有关藏书活动和友朋来往作了较多的叙述。遗憾的却是他几乎不用吴氏的第一手资料，《主要参考书目》列了百余种，竟没有吴氏的各种手稿本、稿本、抄本，甚至于连《吴兔床府君行述》都没见到，这实在是匪夷所思。这或许是那些稿本、手稿本多收藏在大陆的重要图书馆里，去大陆看书不怎么方便，或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关系吧。



吴兔床八十岁像

也是缘分，昔年我曾上海图书馆经眼几种吴騫的稿本，为《日谱》、《拜经楼续诗话》、《兔床清玩录》、《拜经楼分拨总记》、《尺苑》，因其稀见，弥足珍贵，索性写将出来，或可为研究者所利用。

一、《日谱》，为吴騫手写日记稿本，存乾隆四十八年(1783)至嘉庆十七年(1812)，为吴氏五十二岁至八十岁时所记，前后达三十年之久，1813年吴騫即去世了。据今日所能查到的各种善本书目，史部传记类中著录的日记稿本、抄本大约二百余种，但乾嘉学者所留下来的稿本日记却是寥寥无几，抑且多为零星残帙。

清代名家日记传世者，此稿最为宏富，《日谱》中有多处吴騫批有“当入《桃溪客语》”、“入诗话”、“亦入诗话”、“又收桃溪”、“尖阳随笔”等语。按《桃溪客语》、《尖阳随笔》为吴騫平日所作笔记，内容较为丰富，并已刊刻，可供研究地方史者参考。但手稿中所批“当入《桃溪客语》”等内容则并未刊入，如“薄荷”等条，足见刻本遗漏尚多。

又手稿从不同侧面反映吴騫博学多才、为人忠厚，在江浙一带有着很高声望。吴轻财好施，见义勇为，每当岁歉，农民颗粒无收，必设法为之施赈。《日谱》乾隆六十年(1795)闰月朔日，“时以岁歉，约里中同志为粥饲饿者。是日为始，每日自辰迄申，凡大小二千余口，于兴福庵按票给筹，第三带盐糜给粥”。初二日，“上一夜以煮粥不成，于三带设焰口一坛。是日，粥颇香稠，领者莫不欢抃”。其义举为时人所称善。

吴騫交游甚广，与段玉裁、钱大昕、王鸣盛、卢文弨、陈鱣、鲍廷博、周春等人缔交深厚，过从极密。吴騫尝自制一舟，往来苏浙间，每逢出游，多为访友之行，晤时谈古论今，唱酬什咏，闲则鉴赏书画，《日谱》中时有所载。吴騫读书重考据之学，尤喜搜罗金石及宋元槧本，《日谱》

多处载其所见善本，如《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俱见心得，关于藏书源流、版本考订、异本校雠的记叙，亦多翔实可据。

津尝细读《日谱》乾隆四十五年(1780)部分，仅存二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二日，记吴騫与陈鱣同游武林，逐日记述，时写土风与古相证，并与鲍廷博、卢文弨、奚冈、赵魏诸人往还游燕，玩索金石，摩挲古本，商量扬榷。中又有与陈鱣唱和诗十七首，皆清新可诵。附录前人休宁白岳山记述七篇。按，唱和诸作，未收入吴騫之《拜经楼诗集》。此四十五年部分，有民国间邓实《古学汇函》本(民国元年国粹学报社排印本)，题“吴兔床日记一卷”，稿本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二、《拜经楼续诗话》一卷，稿本。吴騫有《拜经楼诗话》四卷，已为《愚谷丛书》所收。此《续诗话》据《吴騫行述》云：“未刻，藏于家。”计十三则，述陆冰修诗、钱穆父、陈奋永、红线、曾尧昶、杨妃、王右丞诗、中山尼诗、虞文靖诗、罗隐、记锦裾、湖海诗传、瓦官寺三宝。秦瀛尝云：吴騫诗话“无俚辞，无虚言，有伦有要，足为儒者扬扨之资，要非琴歌酒座，仅供才人之谈噓。名士相标榜之，比王新城尚书《渔洋诗话》、朱竹垞检讨《静志居诗话》而后，此其尤雅欤”。此《续诗话》曾经1936年浙江省文献展览会陈列展出。按，台北“国家图书馆”有《拜经楼诗话续编》二卷，一册，卷一三十四则，卷二五十则。

三、《兔床清玩录》不分卷，稿本。为吴騫收藏书画、文物器具之登记簿册。计古帖十册、法书八轴又五册、画八十四轴又二十卷又十七册、写照九册、研二十方、瓦当三件、铜章九方、玉章一方、晶章二方、牙章二方、石章七十四方、陶印四方、铜器二十七件、古泉九枚、古镜五面、锡器一件、玉器六件、玛瑙一件、瓷器五件、雕漆四件、周嵌一件、

英石四块、陶器七件、紫檀八件、花梨四件、竹刻六件、酒器七件。吴騫精鉴赏，所藏名家书画数百件，多属铭心绝品。陈焯《湘管斋寓赏编》也颇多采录，可窥一斑焉。

四、《拜经楼分拨总记》，为吴騫嘉庆三年(1798)时所立分书。吴騫自题云，“我精力益衰，于凡一切生理产业，俱不能身亲照料，是以将资本产业按数开明，除自听膳产存本及配帐生意外，所有两房应得之产业生意资本等，邀请亲族均匀配搭，分为两股”，分给寿照、寿暘二人。《条议》十条及《拨单总记》，可以了解吴氏产业、田地、资本之总和。后附《丁卯以后再笔》，为嘉庆十二年(1807)时房屋之具体分单。最后为吴騫去世前之一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所有“资产及公产、店租、祀产、存公书籍、器具”之具体分单，计二十一条。作为分单，过去流传不多，在乾嘉学者中目前也仅知此《分拨总记》，当可视为今人研究吴氏经济状况以及封建社会内家庭状况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

五、《尺苑》二册，稿本。详见津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

吴騫博学好古，发潜阐幽，其学问在乾嘉学者间多有称颂，不少诗文中多有涉騫之作。陈鱣《河庄诗钞》有《题兔床先生拜经楼》，云：“延陵夙望旧门庐，谷口新开竹下居。四坐宾朋春载酒，一楼灯火夜籀书。文章论世情难已，弓冶传家业有余。环堵萧然真自得，海滨高行更谁知。”“过眼烟云气象超，振衣长啸仰清标。楼高独占千家月，海阔常迴万古潮。世上何须争势利，山中端合话渔樵。到门不少探奇客，三径从游兴自饶。”可知拜经楼在当时也确是友朋聚兴之处。吴騫之名在其家乡无人不知，秦瀛的《小岷山人诗集》里有《遇阳羨人无不知有吴槎客者赋此寄槎客》云：“自昔荆南记寓公，桃溪客话话乡风。只今脍炙

邦人口，团扇家家写放翁。”（《诗集》卷十九）

吴騫卒，秦瀛即有诗二首悼之，一为《哭吴兔床一首》：“拜经老人说经者，其学得之卢抱经。抱经不作竹汀歿，余子落落如晨星。我昔巡海过古庙，逢君海上之邮亭。道左一揖便相识，知交邂逅成忘形。君虽蹉跎貌奇古，议论驰骋驱风霆。中间踪迹颇契阔，只以音问烦修翎。跳丸日月不可驻，屡换春鸠并秋萤。前年我归自京邸，偶泛孤棹维寒汀。东山塔畔白祠下，君亦来鼓双溪舲。预约春三举禊事，别墅丝竹花间听。谁知此会不易得，流莺唤客徒丁宁。闻君前月竟西迈，舟已藏壑归沉冥。君所述作自不朽，愚谷有集垂汗青。只余后死念逝者，不免涕泪当风零。徐娘坟前梅似雪，春水照影何玲竮。拜经楼前吊君处，君若薶骨吾其铭。”（《诗集》卷二十三）一为《追悼吴兔床》：“闻尔幽栖处，一楼江海间。家藏晋人集（兔床刻陶谢二家诗最工），门对越州山。经席生前夺，诗魂死后闲。东湖华表在，几见鹤飞还。”（《诗集》卷二十五）秦瀛曾官至刑部右侍郎、湖南按察使，他的诗力追古人风格，读此可见二人之间的真挚情谊。

实际上，在浙江的乾嘉学者中，吴騫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人物，只是过去一些学者仅仅注意到他的藏书，那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如若有好事者以《吴騫年谱》为题写一本书，或写一篇《吴騫著述考》，那都是很好的题目，而且也不困难。吴騫著作等身，还有一些稿本（含吴氏拜经楼抄本、刻本）存世，但多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如：

《蜀石经毛诗考异》二卷，吴氏拜经楼抄本。

《唐开成石经考》二卷，稿本。

《海宁倭寇始末》一卷，清抄本。

《董令升遗事》不分卷，稿本。

《禺园悼往录》不分卷，稿本。

《陈乾初先生年谱》二卷，清抄本。吴騫校补。

《休宁厚田吴氏宗谱》六卷，乾隆五十二年吴霖等赐锦堂刻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等馆。

《海宁州志校勘记》一卷，吴氏拜经楼抄本。

《国山碑考》一卷，乾隆五十一年(1786)吴氏拜经楼刻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等馆。

《阳羨摩崖纪略》一卷，吴寿暘抄本。

《海宁经籍备考》二卷，稿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书画题跋五种》五卷，(騫编)清抄本。吴騫跋。

《金楼子附校》六卷，稿本(二部)。

《小桐溪随笔》不分卷，清抄本。吴騫校。

《桐阴日省编》不分卷，清抄本。

《尖阳丛笔》十卷《续笔》一卷，清抄本。

《桃溪客语》五卷，清抄本。吴騫校。

《白虎通义校稿》一卷，稿本。

《蠡塘渔乃》一卷，稿本有二部，一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一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国图又有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吴氏拜经楼抄本，有吴騫校。文学所又有清抄本。

《拜经楼诗草》不分卷，稿本。孙毓修跋。

《愚谷文稿》不分卷，稿本。

《愚谷文存》不分卷，稿本。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吴免床稿本《皇氏论语义疏参订》

《哀兰集些》一卷《挽篇》一卷，稿本。

《拜经楼诗文稿》十四卷，稿本。有清朱型家、储徵甲跋，清任安上、魏弼题诗，清陈敬璋题词。内容为：《荆南游草》一卷、《阳羨麾崖纪录》一卷、《徐姬小传》一卷附诗一卷、《一壑小游仙集》一卷、《江上玲珑集》一卷、《可怀续录》一卷、《拜经楼诗稿》一卷、《拜经楼续稿》一卷、《中吴游草》一卷、《七秩赠言》一卷、《寿雪山房雅诗集》一卷、《十三经札记》一卷、《王昭平先生遗卷》一卷。

《愚谷诗稿》六卷，清抄本。内容为：《中吴游草》一卷（清吴騫撰）、《江上玲珑集》一卷（清吴騫、查揆撰）、《东山纪游唱和诗》二卷（清吴騫、沈树撰；清沈树跋）、《述龠古器诗》一卷（清吴騫撰）、《哀兰集些》一卷（清吴騫撰）。

《杂俎》一卷，清抄本。吴騫辑。

《汪义妇辞》一卷，清抄本。吴騫辑。

《涉园修禊集》一卷，吴氏拜经楼抄本。

《沈蘧翁寿杯歌》一卷，清抄本。吴騫辑。

《桐阴小牍》一卷，清抄本。吴騫辑。

《海昌丽则》十卷，吴氏拜经楼刊本。吴騫编。

台北“国家图书馆”有《岁时仪节》一卷，稿本。《拜经楼诗集续稿》不分卷，稿本。

“哈佛燕京”有《皇氏论语义疏参订》不分卷，稿本。

吴騫还有部分著述，可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2008/6/28

明代的大统历

大统历是明代的历书。明初刘基进大统历，洪武十七年(1384)设观象台于南京鸡鸣山，令博士元统修历，仍以“大统”为名。终明一代实际上只用大统历，参用回回历，大统历的一切天文数据和推步方法，都依照授时历。大统历施行以后，交食往往不验，明末传入西法，未及颁行而明已亡。据天文史学家的研究，明代钦天监官员大多不学无术，虽知大统历推算结果很多与现实不符，但无修改办法。

明代钦天监造历，是在每年六月。而颁发大统历，也有规定，明太祖时，定于每年九月之朔，后改在十一月初一日，以新历分赐百官，颁行天下。万历年改成十月初一，是日御殿比于大朝会，一切士民拜于廷者俱可得赐。《万历野获编》卷二十有“礼部先发历样，两直各府及各布政司，依式翻刻，毫无加损，最合正朔大义。而南北各省，又有解京历日，以补京兆所不足”的记载。在颁历日偶然也会发生特别事故的，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颁历之辰，国子监诸生受历不均，争于陛前，喧哗无礼，致使嘉靖帝大怒，而将祭酒张袞谪去官职。大统历的印数，据



影印本《大明成化四年大统历》(采自《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

大明成化四年歲次戊子大統曆

正月大	壬子	歲次戊子	正月朔	壬子	歲次戊子
二月小	癸丑	二月朔	癸丑	二月朔	癸丑
三月小	甲寅	三月朔	甲寅	三月朔	甲寅
四月大	乙卯	四月朔	乙卯	四月朔	乙卯
五月小	丙辰	五月朔	丙辰	五月朔	丙辰
六月小	丁巳	六月朔	丁巳	六月朔	丁巳

记载，明宣德间，共印五十万九千余册，后英宗登极，减为十一万九千余册。

明代几近三百年，经历了十七朝，虽然每年所印大统历很多，但流传到今天却是难得一见。可以说传世的大统历，没有一朝是全的。嘉靖朝计四十五年，可是中国大陆图书馆所存，尚缺嘉靖四年、七年至八年、十四年至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四十年至四十一年、四十三年。即使加上台湾地区所藏，也仅可补嘉靖八年、十四年至十五年、二十八年，还是缺了十四个年份。而万历年共四十七年，在时间上来说，算是最长的了，可是今天所存仅二十八个年份，其他年份都已佚去。由此可见大统历搜集之难得。

存世的大统历中最早的是1416年刻的《大明永乐十五年岁次丁酉大统历》，一卷一册，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次为1444年刻的《大明正统十一年岁次丙寅大统历》，一卷一册，藏日本成篋堂文库。而中国大陆所存最早者，则是1459年刻的《大明天顺四年岁次庚辰大统历》，现藏陕西省图书馆，这是见诸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

多年来，笔者经眼的大统历仅有数种，棉纸印，原装为黄绫包背装，可窥见三百余年前旧式。每册后有编纂官姓名题衔，如监正、监副、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五官灵台郎、五官保章正、五官司历等官员之名。大统历的书面，皆钤有红色楷书木记一方，计六行，文曰：“钦天监奏准印大统历颁行天下，伪造者依法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印信，即同私历。”有的书内还钤有“钦天监历日印”朱文大方印。

明代的法律十分严厉，明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遭戍，造历者

殊死。《镌大明龙头便读傍训律法全书》（明书林安正堂刘双松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中《仪制》，有《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一节，云：“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讖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若私习天文者，罪亦如之，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

明代大统历在流传过程中，尤其是在近一百年间，有着好几位重要收藏者。张珩（葱玉），是世人公认的现代书画鉴藏家，他是藏书家张石铭的孙子、张乃骅的儿子，二十来岁就被北京故宫博物院聘为鉴定顾问。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收旧历，始自《大清乾隆三十四年岁次己丑时宪书》。后三年中所得明清多朝官历不下数十册，其中有数册明代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间大统历，后皆归台北“国家图书馆”。其中有《大明天启五年岁次乙丑大统历》，张珩题记云：“明历多出陕西等省佛腹中，以嘉靖为最多，万历及崇祯则次之，此册天启则尤属罕见者。岁乙亥十二月得之陕客贾子钦。”

近人周越然也藏有四种明代大统历，那是嘉靖元年（1522）、二十九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十七年的本子，周先生也认为“明刻大统历，珍贵难求”，并说清代大儒如钱大昕只见有万历八年大统历残本一卷，而他却藏有四卷，“且有嘉靖元年者，可以自豪矣”。李一氓先生收藏大统历有二十多种，但在他的《一氓题跋》中却没有提及。

鲜为人知的是周一良先生收藏的五十余种大统历，数量和质量都是引人瞩目的。记得周先生曾有一文，说1948年，他去北平省亲，见有某小庙拆售屋宇，并将殿中佛像迁徙，于佛像腹中得明隆庆年历书一本。过去只知佛寺中有和尚将佛经置于佛像肚中，而将大统历也储于佛腹，

或也是有原因的。周先生藏大统历以万历年间的居多，目次为正统十一年(1446)至十四年，景泰元年(1450)、三年至四年、八年，嘉靖四十六年(1567)，隆庆三年(1569)至六年，万历元年(1573)至五年、七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四年、十六年至十八年、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至三十九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崇祯十四年(1641)等。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录大统历八十八种，那是全国八百多个收藏单位所仅有的。而周先生所藏竟有十九种为《书目》所不载，尤其是景泰年间的大统历更未见其他书目著录。1991年，周先生将所藏大统历悉数转让给北京国家图书馆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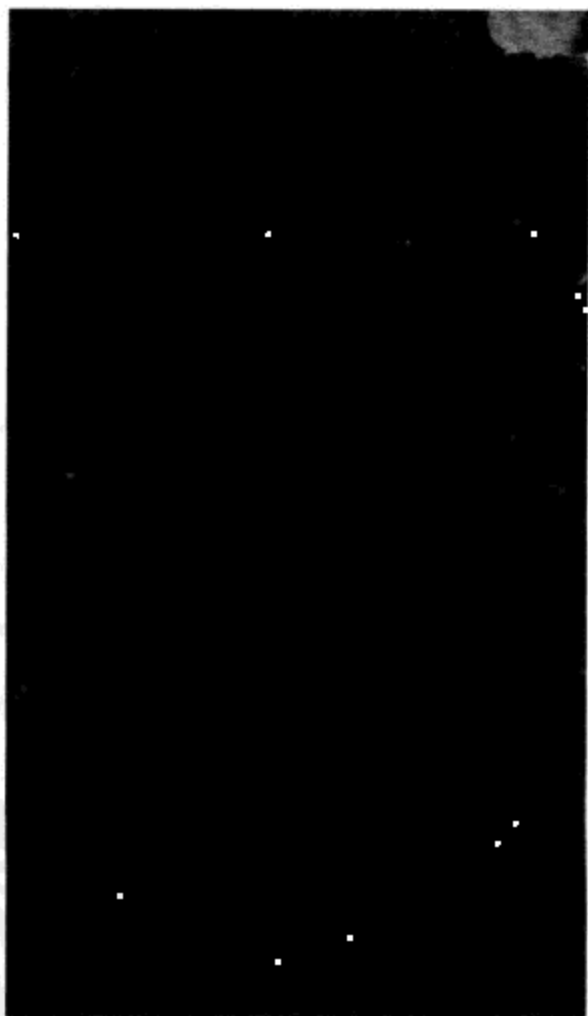
清代的时宪书

前些时，看到了八册朝鲜刻印的历书，最早的是《大清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时宪书》，其余都是大韩光武五年至九年（1901—1905）、十一年以及大韩隆熙二年（1908）的《明时历》，由此想到了中国清代的时宪书。

清朝建都北京后，知道新法历的优点，就命汤若望等人袭用新法历的成数，改名为时宪历，从顺治二年（1645）颁行，后因避高宗弘历讳，改称“时宪书”。“时宪”这两个字，是睿亲王所言：“宜名时宪，以称朝廷宪天义民至意。”

清钦天监每年颁发时宪书一册，而在年前又定期呈次年历样，并于十一月初一日颁历于百官。其进呈御用者，有上位历、七政历、月令历。又上吉日十二纸，每月粘一纸于宫门。御赐诸王有中历，各布政司则皆礼部所颁钦天监印造历，遍及民间。无钦天监印者，为伪造，律处斩。

时宪书在清代民间流传很广，在《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有：“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有的话，共总成一句话。”比起其他朝代，清代算是比较近的，从顺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大清乾隆五十八年时宪书》

治到宣统，总共二百六十余年，国内所存，除了乾隆朝不全外，其余各朝都是全的。而乾隆朝六十年，仅缺十九个年份。有意思的是，康熙朝除了钦天监刻本外，还有不少朱墨抄本，当然，那是内府有关人员奉命所为。到了雍正朝，钦天监偶尔会用朱墨套印，于是演变成了朱墨套印本。而嘉庆朝开始，钦天监有时会印两种版本，一是套印本，一是刻本。光绪朝的时宪书上有时会钤有钦天监颁行印，文曰：“钦天监钦遵御制数理精蕴印造时宪书颁行天下。”

即使是清代的时宪书，今天也不易见到了，像北京天文馆这样的专业单位才藏有数十本清代时宪书。而民国间大藏书家傅增湘，他积几十年的辛苦，也只见到《大清顺治三年岁次丙戌时宪书》、《大清乾隆六十三年岁次戊午时宪书》、《大清祺祥元年岁次壬戌时宪书》三种（另有《大明万历七年岁次己卯大统历》）。傅跋《乾隆六十三年时宪书》云：棉纸巨册，红绫面，汉字题“大清乾隆六十三年岁次戊午时宪书”，首为都城节气时刻，次年神方位图，次各省太阳出入时刻表，蒙古、回部、金川土司皆列后。次各省节气时刻表，次日历，次纪年，末叶列钦天监官衔名。按《会典事例》载：乾隆六十年（1795）皇太子奏进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备内廷颁赏之用，并言现在颁朔以嘉庆纪年，而宫廷之内若亦一体循用新历，于心实有所未安云云。旋“奉旨俯从所请，用备颁发内廷皇太子孙曾元辈，并亲王大臣等。其各省、外藩仍用嘉庆元年，以符定制。嗣后二年、三年皆届期恭进。同时并进翻译清、汉字各一本，刷印清、蒙字各一本，清、汉字《七政时宪书》各一本。外备赏汉字《时宪书》百本，用红绫面，无套”。以此证之，岁在戊午，实为嘉庆三年（1798），而此册仍用乾隆纪元，可断为当时赏赐大臣百本之一也。

祺祥元年(1862)的时宪书，如今传世仅六册而已，其中有两册为套印本，藏北京天文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另四册为刻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三册)、上海图书馆。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的清代历书很多，而且部分朝代是全的。如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1796—1820)、道光元年至三十年(1821—1850)、咸丰元年至十一年(1851—1861)、同治元年至十三年(1862—1874)、光绪元年至三十四年(1875—1908)、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这是很不容易的，比大陆的任何一個图书馆所藏都要完整。

海外收藏的历书不多，笔者仅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清代时宪历多册，其中乾隆朝的有四十二年(1778)、四十七年、四十九年、五十二年、五十五年、五十八年，共六册。其中四十九年一册，可补国内各图书馆之缺。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明代大统历四册，分别为正德六年(1511)、嘉靖三年(1524)、嘉靖十二年、万历四十五年(1617)。

文中开头说到朝鲜刻印的历书，据记载，明清两代，朝鲜所用之历书都是从北京朝廷内领回的，每年朝廷颁发一百零一册历书给朝鲜，朝鲜国王用的是大皇历，政府机构用小皇历一百本。清顺治五年(1648)，朝廷指令朝鲜每年差行人，必须在冬至日赶到北京领取历书。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朝鲜国王改称皇帝，改号大韩，此后即不再派使臣到北京领取时宪书，而改成韩国自己的明时历了。

2006/7/30

谈善本书中的日记

日记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作品，因为在这种文体中，比较能够表现出作者的个性。日记的形式，不外乎“排日纂事”和“随手札记”两种。早期的日记都是十分简单的，最早比较成形的大约是唐人李翱的《来南录》，但是半年时间所记还不满千字。而宋人欧阳修的《于役志》，虽比李氏的“千字文”要详一些，但还是“至简”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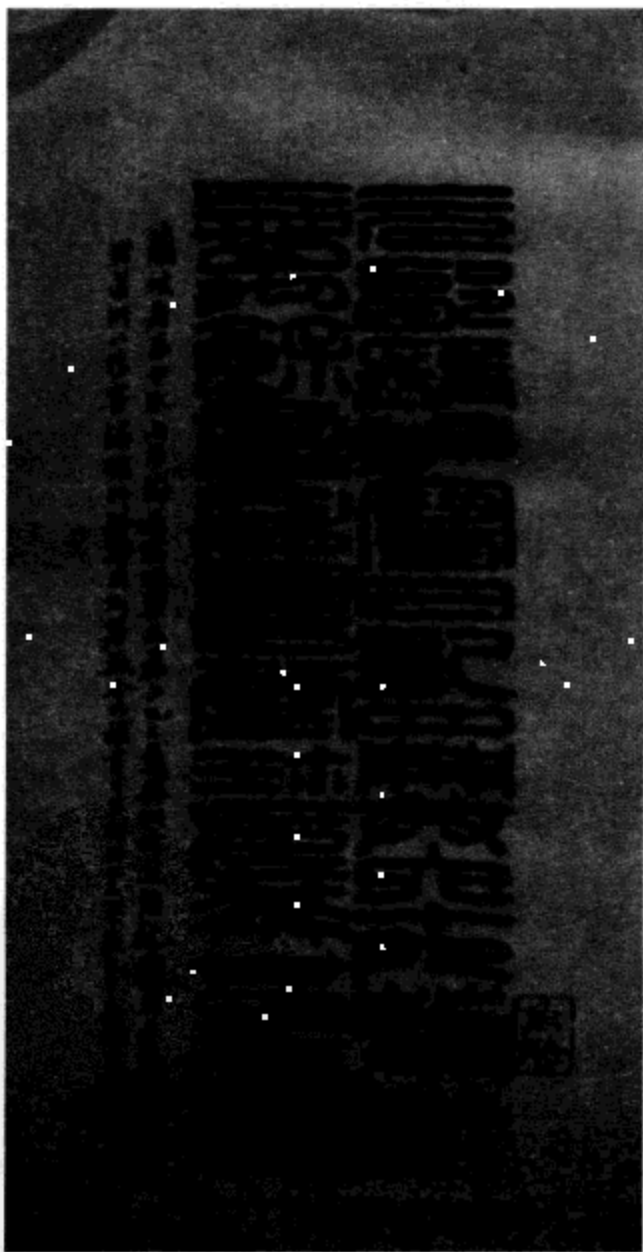
写日记者大多是在不准备发表的情况下所写，所以比较真实。鲁迅说过：“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周作人当年在读了明末叶绍袁的《午梦堂集》和《年谱》后，表示最喜欢的还是叶的日记，即《甲行日注》。叶是天启进士，官至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擅权祸国，弃官到苏南、浙西山中隐居，直至在空山荒刹中贫病而死。他的日记起自顺治二年（1645），止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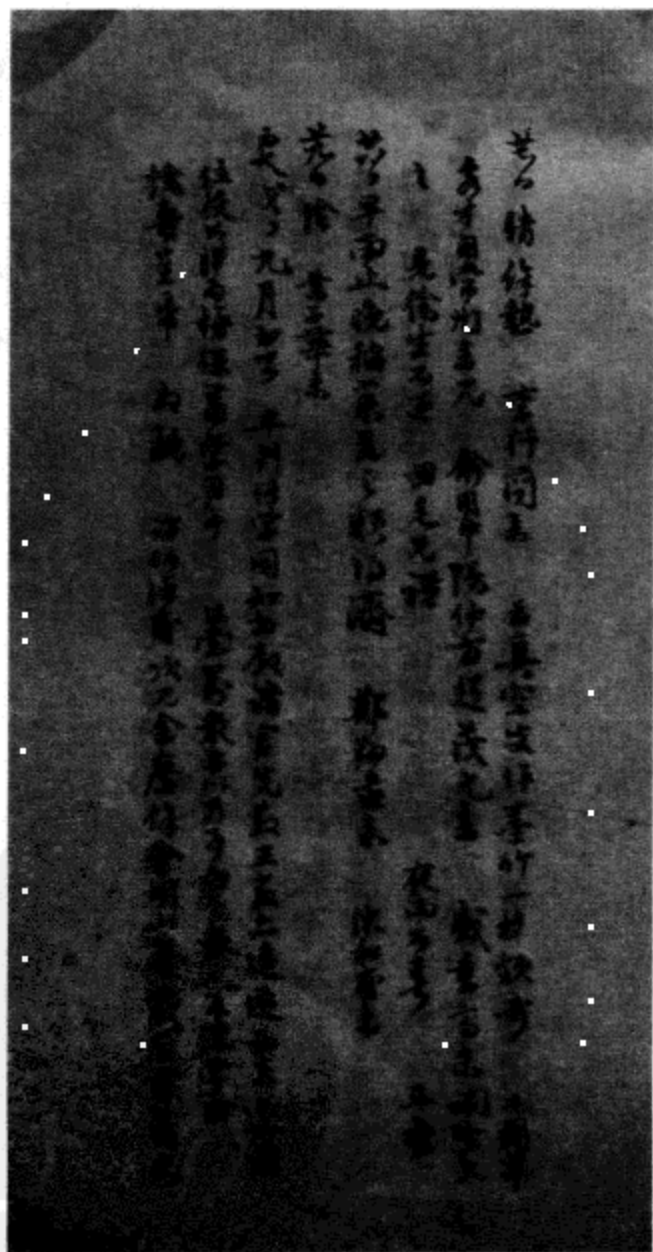
年(1648)九月,记述了作者在当时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对清军之残酷镇压、抗清志士之赴难不屈、地方官绅之屈膝献媚以及流亡贫困之生活多有反映。叶氏的文笔甚好,无论记事、写景或抒情,都是简洁清丽、隽永多姿。所以周作人说叶氏日记“除去不少的杂质与火气,所表现出来的情意自然更为纯粹了”。

那么流传至今的清代以及清代以前的属于古籍善本的重要日记,尚存多少呢?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传记类著录的条目,日记共有三百五十三条款目,也即三百数十人,时间上是从元代至清末。如果以版本来做统计的话,其中有刻本十三种(明刻本五种、清刻本八种)、抄本五十种(明抄本三种、清抄本四十七种)。而稿本最多,计二百九十种。如果以撰者时代来看,则元代一人、明代十二人、清代三百四十人。(注:有时一书有不同版本。)而上海图书馆作为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所藏的稿本日记竟有一百一十一种,几占三之一,这还不包括在普通线装书中的稿本日记。

存世最早的日记原件,为元郭畀的《元郭髯翁手写日记》不分卷,稿本,有清翁方纲、周尔墉、崇恩跋。郭畀有文才,长于书画,和当时名家赵孟頫、倪元镇等都有往还。此稿记元至大元年至二年(1308-1309)事,除了详细记载天气的阴晴寒暑、人事的酬酢往还,以及所看到的书画文物、经历过的名胜古迹外,也较多反映了南宋灭亡、外族入主中国以后的江浙两省的社会情况,以及当时士大夫的思想与生活。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代重要学者翁方纲见到此部日记时,日记讫于二年十月三十日,约三万字。可是到了咸丰年间,却佚去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后数十叶,还存有七十三叶,但时至今日又仅存五十二叶了。我所见



元郭髯翁手写日记（影印本）



元郭翼翁手写日记（影印本）

到的原件藏上海图书馆，属于一级藏品。除上图藏本为稿本外，另有五种传抄本，内容同上。元朝人的稿本日记或仅此而已。

现存最早的雕版刻本日记，有明嘉靖刻本《西巡记》一卷，明陈尧撰，记嘉靖四十一年（1562）之事。还有一部是明都穆的《使西日记》二卷，明刻本，记正德八年（1513）事。二书均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明朝人存世的稿本、抄本日记也不多，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载，仅有十数种，其中较重要的有：

明杨士奇的《南归纪行》三卷《南归稿》一卷，明抄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明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不分卷，稿本，姚光跋。记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586—1601）事。藏上海博物馆。

明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八卷，清抄本，清戴光曾校并跋。记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1609—1616）事。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明侯岐曾的《侯文节日记》二卷，稿本，明侯沅、清金元钰跋。记南明隆武元年（1645）、永历元年（1647）事。藏上海图书馆。

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记》十五卷，明末祁氏远山堂抄本。记崇祯四年至十七年（1630—1644）、南明弘光元年（1645）事。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清初人的日记存世者大约二十余人，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康熙进士、官至御史的陆陇其，他有《陆清献公日记》手稿一册传世，今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可惜未知是何年何月。而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有陆氏日记三卷，是清抄本，而且有清管庭芬的校和跋，还录有清张燕昌的校，是一个不错的本子。此本亦题名“陆清献公日记”，记事时间，是清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1657—1658），康熙五年至六年（1666—1667）、

八年至九年、十一年、十四年、十六年至十七年、十九年至三十一年，总共二十三年，也不算短的了。陆氏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卒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六十三。这些现存日记，起自二十八岁，终于去世之年，当是研究陆氏的重要材料。陆氏的日记还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胜溪草堂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藏本有清姚椿的批点，虽然书名相同，但卷数却为十卷，且记事和前本大致相同，只是佚去了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

清人的稿本日记，多为道咸学者所作，而乾嘉学者所存留者，寥寥无几。我所最为倾心的是见到吴騫的《日谱》，存乾隆四十八年(1783)至嘉庆十七年(1812)，前后达三十年之久。此本日记我已在《吴兔床的几种稿本》一文中详为介绍。吴騫日记所记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为目前所知晓的明清两代学者各种日记所仅见。此日记对研究作者生平和考订作者与乾嘉学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价值，可以提供极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将稿本全部抄录了下来。

三十余年前，我曾读过清代道光进士、四川学政、书法家何绍基的手书日记数册，日记均为行书。按何的行书，确是恣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又如衔杯勒马，意态超然，真是越看越有兴味。杨守敬说他是“如天花乱坠，不可捉摸”，确然。日记除了记录何氏平时的生活起居、友朋往来诸事外，更有记载书法事。惜当年写入笔记中未录其年月，兹录数条：廿三日，写对子廿六副、扁二方。廿四日，写对卅余副、扁二方。廿七日，书对数副。廿八日，写对子卅余副。廿九日，写对子卅余副。日记中记得最多者竟达五十余副，

可见求书者之多。旧时代的书法家书写楹联，多有底本，因此往往雷同，绍基却不然。徐珂《清稗类钞》中云：何“先后为人书楹帖以数千计，句无雷同。于临池时，触兴口占，靡不新隽工切，语妙天下。且其构句，或纪宦迹，或言名胜，或按合时序，或对晤琴书，读之可见其作书时身心之所在及身世之所当”。何的稿本日记，现今所存尚有道光十四年、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三十年，咸丰元年至二年、四年，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三年至四年、十年，分藏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清人日记记宫廷之事者鲜见。1986年，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读到了宗室敬徵的日记。敬徵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卒于咸丰元年(1851)，曾获赏头等侍卫、散秩大臣，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后谥文懿。他的日记起自道光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共十三年，多记生活起居及所见所闻宫中之事。虽多片言只语，然为第一手资料，当可征信，研清史者或可细细研考。

台北“国家图书馆”的善本藏书中有日记十五种，其中稿本十一种、抄本三种、刻本一种。稿本中有三种最有价值，一为清张廷济《清仪阁笔记》一卷，一册。虽题名为笔记，而实际上是日记，记嘉庆十四年(1809)自元旦至八月事。一为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五十四卷，五十四册。记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十五年(1889)事，共三十二年。赵是曾国藩的重要幕僚，日记中记太平天国事甚多。而南京图书馆仅存赵氏的《落花春雨巢日记》六卷，为咸丰二年(1852)至五年(1855)。一为清王秉恩《王雪澂日记》不分卷，三十一册。自同治七年(1868)至宣统三年(1911)止，共四十四年之久。王秉恩的日记，题名都不一致，如《甲戌日记》、《养

云山墅日记》、《养云山馆日记》、《归蜀日记》、《粤游日记》、《息龠日记》、《补管斋日记》、《石桃寄庐日记》、《憩桐书屋日记》、《抱珥山人日记》等，不一而足。王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卒于1929年，年八十七。四川华阳人，曾任广东提法使，藏书甚富。该馆还藏有王氏的手稿本《息尘庵诗稿》六卷。

有些清代学者真是非常值得去作研究的，比如说张廷济，这位嘉庆、道光年间的重要金石学家，所藏的古器物是名被大江南北的，他遗留下来的稿本、手札以及金石题跋文字很多，可是从没有专家学者去进行收集、整理或作有系统的研究。就拿他的《张叔未日记》(不分卷)来说，稿本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时间是清嘉庆三年至七年(1798-1802)、九年至十年、十五年至二十年、二十二年，道光元年至三年(1821-1824)。再加上台北的嘉庆十四年，共有十八年之久。

清人的日记存世是最多的了，学者们也深知它们的价值，可惜的是，研究者还是不多。几十年来，我仅知道陈左高先生曾利用上海图书馆藏的日记，下过很多功夫，也出了不少成果，除此之外，真是鲜有其人。当然，要去大图书馆看这些珍本日记也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很妙的是，台北有一家明文书局，出过一套《清代传记丛刊》，其中第六十二册是《近世人物志》，书中的内容是将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中有关对时人的叙述录出，居然也有六百人之多。据辑者所云：“其中知人论世，发潜搜隐，实可补正史所不及。分摘汇编，各成小传，近世人物，大略备见，亦一代得失之林也。”

虽说是当年在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要求各省市图书馆、大

专院校图书馆将馆藏善本书都上报编委会，但有的馆还是留了一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艺风老人手写日记》三十一册，就不上报，而缪氏日记起光绪十四年(1888)，止1918年(有影印本)。又有《艺风老人日记》，手稿本，二册，也没报。所以《书目》收得并不全。

明人王叔士云：如果日记所记是“真性所流，便是世间真文字”（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十）。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前几年，我在写作先师《顾廷龙年谱》时，就是充分利用了先师的手书日记。先师的日记虽非系统而详细的叙述，却是片段的真实史料，所以我在边阅读边写作的情况下，仿佛有陪侍先师进入那段我尚未出生或在童年时的时空的感觉。那本《年谱》早已出版，其中上世纪四十年代所载，多以日记为基础，而最长的为1942年，大约有四万余字。

从王孝慈手抄的两种戏曲书说起

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关于齐如山先生百舍斋藏书的小文，后收入2006年出版的《书城风弦录》中。去年岁末，忽然收到台北一位研究生的电子邮件，说在台北的一家专售大陆图书的书店里见到《风弦录》，并说那篇关于齐先生的文章，对他正在写作的论文很有帮助。实际上齐先生藏书中的戏曲小说，有好多种是很难得的，尤其是几种明刻本的戏曲以及清中期被禁的十来种小说。然而，我的兴趣却不在此，我倒是很在乎别人不太在意的近人所抄的两种戏曲图书。

这两种书是《环翠堂新编投桃记》、《谭友夏钟伯敬先生批评绡春园传奇》，皆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环翠堂新编投桃记》二卷，明汪廷讷撰。二册。有图。钤印有“王立承”、“孝慈”、“立承写定”、“鸣晦庐珍藏金石书画记”。又有“齐氏所藏戏曲小说印”、“高阳齐氏百舍斋存书之印”。书口上书“环翠堂乐府”。抄本的底本是明刻环翠堂乐府本，《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收有此书。《环翠堂乐府》除《投桃记》外，还有《三祝记》二卷、《重订天书记》二卷、《彩舟记》二卷、《义烈记》二卷。

投桃記卷上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

第一齣 捉網

水調歌頭上潘氏佳公子隨任入臨安黃姝樓對旅
邸閒筵捲簾看正爾目成心許吏喜行春湖上車鼓
接雲鬟投桃因得報詩帕兩情傳郡衙隔音問阻
病魔纏周婆撮合私從天竺締良緣奸計任施罔舅
親命甘違司馬寄髮表心堅福兮翻作福天語賜圓
圓

會盼珠佳人才子

惹風情羌笛胡桃

王孝慈抄本《投桃記》



王孝慈摹《投桃记》图

《谭友夏钟伯敬先生批评绉春园传奇》二卷。二册。四十四出。书口下有“螭麟斋”，书口上有“绉春园”。钤印有“立承写定”、“鸣晦庐珍藏金石书画记”。又有“齐氏所藏戏曲小说印”、“高阳齐氏百舍斋存书之印”、“齐林玉世世子孙永宝用”。底本是明末螭麟斋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均有人藏。

这两部书端楷誊写，一笔不苟，极工整，笔墨匀称。格子全部手画，凡写错的字皆有挖补。封面洒银腊笺，包背，装帧也是很考究的。不仅抄得精美，而且《投桃记》的图更是描绘得美妙至极，说实话，图摹得如此完美者，可谓绝无仅有。环翠堂是汪廷衮的堂名，汪家刻书中的版画完全是徽州一派，线条细若发丝，衣纹折叠、花饰图案以及人物造型，都是福建建阳的图绘本所不可比拟的。昔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是古今绝作，字划、纸张、乌丝、图章无不追摹宋刻。而此本之图精乎之精，一勾一划之微，绝不轻率从事，实得原本绘图之神韵。

从书上的钤印看，可知这两种书都是王孝慈所抄的。恕我无知，刚见到王立承这个名字，很是陌生，真是不知何许人也。查了很多民国以来人物的工具书，都没有发现有关王立承的记载，诸如《现代支那人名鉴》、《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最新支那官绅录》、《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以及前些年出版的《辛亥以来人物字号别名索引》、《民国人物索引》等，都付诸阙如。后来竟然在《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一集（北京数文社，1920年）查到了他的简历。原来他字孝慈，号鸣晦庐主人，河北通县人。监生。广西法政学堂毕业，曾任度支部主事、检查纸币清理财政处帮办、大总统府秘书、政事堂机要局佥事，一直做到国务院秘书厅的佥事。大约是工作成绩卓越，很得上司赏识，故还曾获得



王孝慈抄本《缩春园传奇》

过五等嘉禾奖章。其父名芝祥，号铁珊，前清举人，曾任广西桂平梧道署理广西按察使布政使，卒年五十四。

在各种文章中，提及王孝慈最多的大约就是郑振铎了，虽然郑振铎和他是仅见过一次面的朋友。最初是郑先生在马隅卿先生处见到了由王孝慈收集整理《明代版本刻工姓氏录》，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1934年春，郑先生和鲁迅先生辑印《北平笺谱》将成，郑告知鲁迅曾在马先生处见到王所藏《十竹斋笺谱》，那是中国木刻艺术之精华，如若重镌，即易流传，而北平的印工也能愉快胜任。鲁迅先生听后力促其成。郑乃托赵万里先生借得王氏所藏，并交北平荣宝斋复印。是年岁暮，《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竣，王至北平，郑遂以复本贻之，所以郑说那“是为余与孝慈订交之始”。

《十竹斋笺谱》的印制工作，始于1934年春末，而竣工则在1941年夏六月，此时王孝慈已经逝去，整个民族正在经受抗战的磨难。所以郑先生会有感叹：“此七载中，大变迭起，百举皆废，余又南北迁徙，卒卒鲜暇，故镌版之业，作辍靡恒。盖困于资力者半，而人事之乖迕亦居其半焉，然终于斯时得竟全功。丧乱之中，艰辛备尝，同好之士初赞其议而未能睹其成者，不只一二人也，前尘回顾，悲忻交集。”1952年5月，郑振铎撰《重印十竹斋笺谱序》云：“《笺谱》印行于明崇祯十七年，即公元一六四四年，迄今三百余载，传本至为罕见。予尝于王孝慈先生许一遇之，时方与鲁迅先生编《北平笺谱》，知燕京刻工足胜复印之责，遂假得之，付荣宝斋重刻，时历七载，乃克毕功。鲁迅、孝慈二先生均不及见其成矣。”在笺谱前扉页上专门印有：“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假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编者鲁迅、西谛；画者王荣麟；

雕者左万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经理其事者，北平荣宝斋也。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

又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序》中说：“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竞诸氏；在平有王孝慈、马隅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视，或一见奇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孝慈竟因书发病死。”郑《劫中得书续记·十竹斋笺谱初集》说：“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之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亦绝。”

王孝慈是一位很低调的收藏家，喜欢收藏戏曲小说以及套印本图书，据说其藏本精品甚多，如《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六卷（明陈所闻辑。明万历三十二年陈氏继志斋刻本）、《鸳鸯缘传奇》二卷（明路迪撰、明醉竹居士评。明崇祯刻本）、《遥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二卷（明阮大铖撰。明末刻石巢传奇四种本）等。王氏爱书如命，轻易不示人，可惜没有什么书目传世。从上面说到的《环翠堂新编投桃记》、《谭友夏钟伯敬先生批评绡春园传奇》，可以看出一位藏书家会自己亲手抄写，而不假手他人，也可见这两种传奇在当时也确为难得之本。王是1936年2月逝去的，年仅五十三岁。王氏故去后，遗书散出，《十竹斋笺谱》归之北平图书馆，其他的则卖给了旧书店。在《绡春园传奇》里另夹有一小条，上写“狮麟斋抄本绡春园传奇 一函 五百元 文友堂”，当是王孝慈书散，文友堂得到了不少，其中有些又售与齐如山者。而1953年，齐氏所藏之戏曲小说价让哈佛燕京图书馆，也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王氏的一些往事很少人得知，我仅知道他曾从陶湘处得到一部《鸳

《鸳鸯传奇》二卷，是明崇祯刻的有图本，上卷有图七幅，下卷六幅，图画刊刻细腻传神。《禁毁书目》曾有著录。昔涉园陶氏得于沪上，傅增湘告知王氏，盛称其图画精工，摹刻灵巧，王心志之。厥后陶氏付之影印，以一本赠王。王后来在天津特谒陶氏，始见原本，摩挲爱玩，迄难忘怀。陶氏素喜闵刻，尤喜有图之本，以王藏有《还魂记》、《红梨记》二种，曾欲以此交换，王则以精刊殊难再覩，遂未允许。然此书往来王之心中，终未去怀。不久，王得闵刻《艳异编》，前有摹刻仇十洲图六页，益萌互易之心。1933年夏，王大病初起，其老友尹石公屡来慰视，尹与陶亦谳熟，因乞为介。遂以《艳异编》归之涉园，换来《鸳鸯传奇》。一部书使王氏结想八年，方得插架，对于王氏来说，也是“何幸如之”的事了。后来王氏为此书写了一段跋语，并做了一首诗，诗云：“喜逢春与广爱书，同被亡秦付烬余（《喜逢春》、《广爱书》皆明季人所撰传奇，与此曲同见《焚毁书目》）。独爱惠期词隽爽，玉签插架壮吾庐。”按，《鸳鸯传奇》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录之或可为书林一段掌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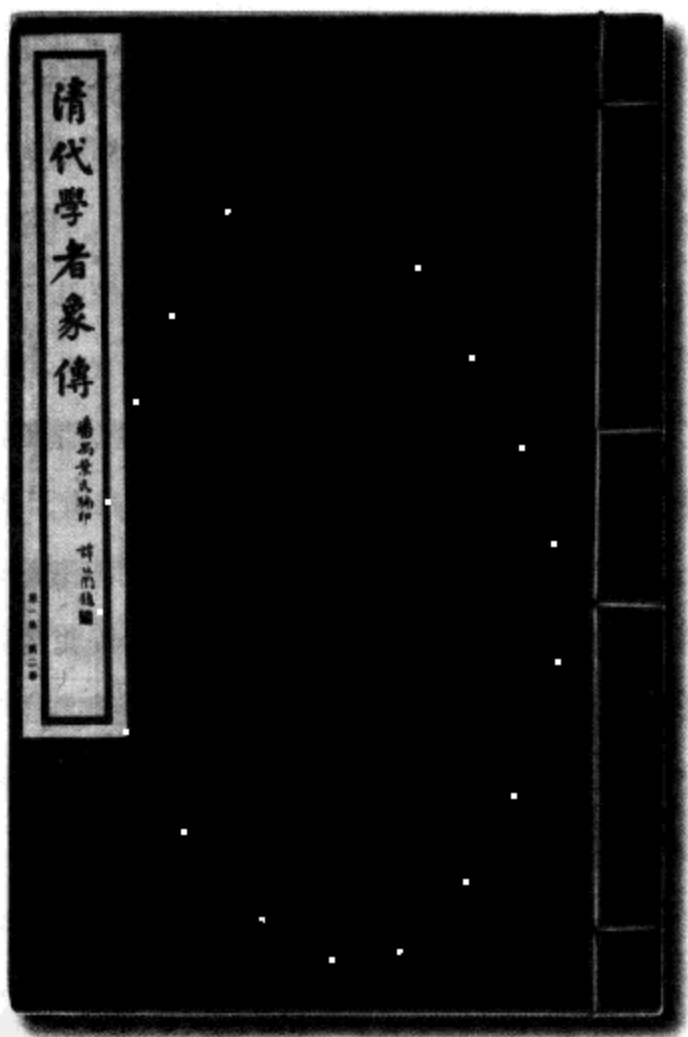
2007/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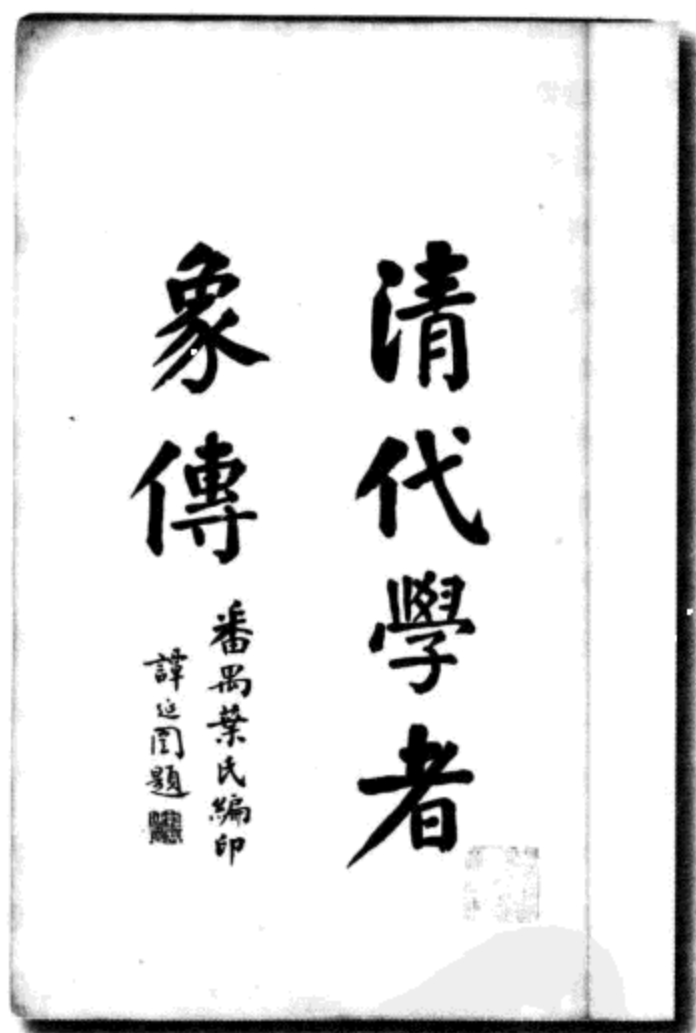
叶恭绰和《清代学者象传》

摹绘名人图像的风气，由来已久。楚国宗庙壁画上即有人物图像。晋傅咸《卞和画像赋》云：“既铭勒于钟鼎，又图像于丹青。”清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云：“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据载，清代宫中南薰殿藏有名人图像绘本多轴。有清一代，人文之盛，媲美唐宋，为清代重要学者立像作传，是筚路蓝缕的工作，自是意义重大。《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由叶恭绰的祖父衍兰先生精选慎择，网罗荟萃，收一百六十九位清代学者小像一百七十一幅（冒襄、朱彝尊、袁枚、阮元各二幅，黄与坚、禹之鼎合一幅，陈裴之、汪端合一幅），像后皆有小传。

叶衍兰，字南雪，号兰台，广东番禺人。先世浙江余姚人，曾祖谦亨，游粤久，遂家焉。咸丰二年（1852）举人，六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户部江西司主事、贵州司员外郎、云南司郎中。考取军机章京，倅直枢垣二十余年，以与当道不洽，请疾归里。后主讲越华书院，以金石书画文艺倡导后进，奖进秀彦，成材尤众。善填词，体格绵丽。工小篆行楷，摹古人书，往往乱真，间作丹青，亦嫣然深秀。精鉴赏，所藏书画皆人



《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第二册



《清代學者象傳》第一集第一冊扉頁(第一集另三冊扉頁題簽者分別為蔡元培、于右任、羅振玉)

妙品。七十五岁卒。又著有《海岳楼诗集》、《秋梦龠词集》。

《象传》绘者为叶衍兰及黄小泉。衍兰“素工六法，人物仕女，尤精摹写”（王秉恩《象传序》）。小泉，北京大兴人，从衍兰游“凡二十年，工人物花卉，歿于光绪中”（叶恭绰《象传序》）。《象传》之人物图像皆有所据，“或得之故家收藏，或其子孙世守以供岁时瞻拜”（冒广生《象传跋》），悉心临摹，竭三十余年精力方成。细阅人物之图像，展转钩勒，笔力工致；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大小一式，各各不同，真可谓是瞻对之下，前贤之音容笑貌，一览无遗。

叶衍兰生前，《象传》并未付梓，恭绰父仲鸾公（佩珩）继之多年，筹印亦不就，叶恭绰《象传序》中云：“计征集资料，速参稽定稿，所糜时日精力不可胜数，歿时犹殷殷以流传继续为念。”叶恭绰秉承先志，克绍祖芬，于1928年交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正式出版，凡四册，甫面世即风行海内。第一集有两种版本，一为“夹贡纸印华装本”（每部定价三十二元），一为“彩图纸印和装本”（每部定价二十元）。

鉴于《象传》所辑断自清同治以前，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学者未及列入，且同治前诸学者像也缺之多多，所以，叶恭绰亟图赓续，期成完帙。1927年8月，叶在《文字同盟》第六号上刊出致编者札并《叶遐庵征求清代学者遗象启事》。札云：“□□先生执事：奉示敬悉。辑刊清代学者遗象一事推出，颇属烦难，承允助力，至所感荷。兹将启事及名单附上二分，敢祈宣布。为幸。八月十九日。”

《启事》云：“先大父南雪公，辑集有清一代学人之象，自顾亭林迄魏默深，凡得百八十人，手自摹绘，各系以小传，选择至精慎，恒有一象而重枕三四、一传而屡易稿者。盖耗三十年之精力，稿本盈两笥，歿

时尚以未得大成为憾。恭绰不敏，思承先志，以日月易得，世变无常，谨将遗稿付之影印，以广流传。窃意有清一代学术，盖极古今之蕃变，其间魁硕辈出，迄于易代，尚未有荟萃而扬榷之者。先大父所编《象传》，实足为清学术史之先河及缩景，其有助于学术之研究者不鲜。顾同光以后，未及搜录，又同光前摄影术未入中土，画像颇稀，其间尚有求而未得者。兹拟继续访求，以期完备。谨具已有各象氏名及待访各象氏名各一分，奉呈照察，敬乞赐助采集，蔚成巨观，岂惟叶氏一家之幸。凡例数则，敢列左方：一、小象不拘尺寸及摄影或写照，最好能附以事迹小传，统寄天津英租界小孟庄舍下查收。一、小象如须辗转钩摹复印，请先示知。如果需要，谨当酌奉应需费用。如愿以原本寄绰钩摹复印者，谨当妥慎从事，并将原本奉还，不敢污损毁失。一、两单以外诸贤，倘诸公认为有应增入者，亦望不吝赐示，当为酌列。”

编者有注云：“前交通总长叶遐庵恭绰先生，晚近以来，不谈政治，寄迹津门，闭户读书，其高怀并非时流所及也。先生先大父已有搜集清儒遗象之事，自顾亭林至魏默深，凡一百八十人，已得索影。先生继志述事，再通告海内有志，征求遗象，行拟辑刊成册，以供献于学界云。”

此名单分“已有各象”（二百零七人）、“待访各象”（二百一十人）。正式出版的《象传》第一集收一百六十九人（一百七十一幅），其中汪端不见于“已有各象”，而“已有各象”中陈维崧、嵇璜、顾莼、张埏、汪如洋、戴宸、陈澧、谭莹、曾国藩、黄彭年、杨文会、张之洞、翁同龢、杨守敬、俞樾、谭献、吴汝纶、文廷式、张百熙、袁昶、缪荃孙、易顺鼎、梁鼎芬二十三人为《象传》所失载（后多人第二集）。

二十五年后，即1953年，第二集终于由上海安定珂罗版社影印出版，



第一集首幅为顾炎武像



第二集首幅为钱谦益像

印二百部。叶恭绰序云：“一九二八年，余影印先祖南雪公所手自绘写之《清代学者象传》，曾风行一时。其时余拟续辑第二集，经廿年之久搜集，又得二百人，以时局不定，资力又窘，且各人传记不易着笔，故迄未付印。解放以来，从事文史，方温旧业，而精力已衰，恐及今不为，后无可托，不但已集诸象虑致湮没，有乖夙愿，且无以慰频年亲友相助之劳。因斥卖烬余藏物，以各象先付影印，其传则待续编。行藐躬短，景所能为者仅此，亦聊备治近代史者之参考而已。”

第二集中的图像是江西人杨鹏秋所绘。图像取诸家传神像暨行乐图，或遗集附刻及流传摄影，皆确有所据。然而，在制版中，却出现谢兰生与徐松、谭莹与谭献四像次序互误，又陆燿误为陆耀。

当年8月5日，叶先生将新出版的《象传》第二集赠送毛泽东，信云：“主席钧鉴：恭绰年来渥承光被，稍获新知，然结习未忘，囊时所业，有可供参考者，仍随宜掇拾，冀附轻尘之助。兹印成《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一种，方始出版，谨上呈一部，期承乙览之荣，并赐训诲。附致崇礼。叶恭绰敬上。八月五日。”毛泽东收到叶函和书，非常高兴，十天后复函，除了感谢之外，还提出希望借阅《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然而《象传》的第一集，在商务出版后，经历多次兵燹，所存无多，即使是叶先生自己所存都“毁于变乱”，所以对毛泽东的要求，只得想方设法从他处觅得送呈，当然叶先生也声明：“奉请存阅，不必交还矣。”

第二集共二百人，津曾核之1927年叶氏所拟“待访”名单，其中张尔岐、阎尔梅、王铎、万寿祺、顾栋高、李颙、周亮工、龚鼎孳、洪昇、李渔、全祖望、刘献廷、万斯大、梅文鼎、阎若璩、马骥、计东、李因笃、丁澎、宋琬、王源、李雯、笪重光、崔子忠、叶方蔼、梅清、

王猷定、赵执信、李光地、徐夜、罗有高、方苞、崔述、汪缙、臧庸、邵晋涵、卢文弨、张弨、臧琳、郝懿行、陆锡熊、冯敏昌、吴敬梓、刘大櫆、邵齐焘、江藩、江声、刘逢禄、赵翼、王昶、顾广圻、吴騫、凌曙、瞿中溶、彭绍升、陈奂、张惠言、张琦、袁廷桢、王筠、刘嗣绾、王太岳、朱士琇、恽敬、章学诚、刘宝楠、龚自珍、舒位、戴望、邹伯奇、邹汉勋、潘德舆、管同、梅曾亮、邵懿辰、邓显鹤、林伯桐、陈遇夫、张际亮、何秋涛、侯康、侯度、丁杰、胡培翬、胡承琪、严可均、郑献甫、陈庆镛、陈介祺、吴嘉宾、谢兰生、宗稷辰、汤鹏、郭嵩焘、梁于渭、黎庶昌、洪颐煊、雷浚、薛福成、谭宗浚、钮树玉、钟文烝、陆心源、洪钧、林旭、于式枚、谭嗣同、陈宝箴、萧穆、丁丙、顾印愚、端方、刘师培、张謇、曹元忠、邱逢甲、夏曾佑、罗惇融、曾习经、叶德辉、王国维、刘光贲、纪钜维、丁惠康、黄体芳、黄绍第、李瑞清，共一百二十七人，不见《象传》第二集，也即是说，这些学者的画像可能仍未寻得，故付诸阙如。不过，如若将来有人想再延续叶先生的工作，这份名单则有参考价值。

按，又曾见第一集书中所附《征求清代学者象传启事》插页，分“已印各象”、“已有未印各象”、“待访各象”三部分（据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本）。其“已印各象”，均已见诸第一集。“已有未印各象”凡八十五人，其中阎尔梅、万寿祺、张廷济、冯桂芬、曾国藩、黎庶昌、陈宝箴、端方、丁丙、顾印愚、谭嗣同、刘师培等二十五人未见于第二集。“待访各象”凡二百二十六人，见于第二集者为五十二人。

第二集中只有画像，而无小传，和第一集不同。这一点，叶先生在略例中云：“本集先印各象，其传文俟编就续出。”但据我所知，第二集中的小传是有的，而且是叶先生委托顾廷龙先生撰写。1937年8月日寇

侵沪,11月叶先生即离沪赴港,至1942年又自港返沪,《叶遐庵先生年谱》1944年里“先生往岁所辑《清词钞》及《五代十国文》、《清代学者象传》仍继续从事,且请陆君维钊、王君庸、潘君承弼、顾君廷龙为助”的记载。1943年1月17日,叶先生告诉顾《象传》二集的像,已画成二百余人,前虽有人撰得二百余篇,但于体例不甚佳,拟重撰,则欲委顾先生成之。这之后,叶即将《象传》二百四十五人嘱顾代订,顾也去叶宅,谈《续编》纂例,又取回《象传》资料两包细读。下半年的7月9日,胡文楷至顾处,述及叶先生对于《续编》颇望早就,然也许以从容为之。顾先生当时的工作甚为繁重,但因叶以其初稿交来后尚未动笔,而叶又将其所藏地理类图书赠与合众图书馆,顾先生便与潘景郑先生尽速为之撰传,以酬叶之盛意。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顾先生撰写了丁谦、丁晏、叶德辉、陈庆年、王葵园、谭嗣同、刘光贲、改琦、刘鹗、邹伯奇、谢墉、孔广林、张睿、王同愈、袁钧、胡玉缙、冯煦、吴大澂、叶昌炽、王颂蔚、陈豪、冯煦、钱恂、屠寄等传,约为总量的三之一。潘景郑先生所撰约三之二。顾先生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景郑撰者居多,历时九阅月,余所撰约三之一。”完成的小传计二百六十八人,由潘景郑先生送至叶处。

叶为了答谢顾先生,赠银一千元,但顾先生次日即却之。后来,叶又赠六色食物,以代撰小传之报。在完成了《象传》第二集的撰写工作后,顾将有关《象传》资料二札、原稿十一本送还给叶。叶又嘱甥严敏之面致顾一函,并赠顾与潘礼券万元,以示酬劳。

如今第二集却没有小传,或是当年顾潘二先生所撰之稿在叶处佚去,而且底稿也一时寻觅不着,不然绝不会如此。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顾

先生曾嘱我寻找过。1961年年初，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我都会追随顾先生去上海图书馆的长乐路书库读书、查材料。长乐路书库过去就是合众图书馆的所在地，顾先生对“合众”所搜集的每一本书都倾注了感情，即使是“合众”的建筑，那一砖一瓦，都是顾先生看着工人们一寸一尺地往上砌成的。从1941年8月“合众”建成，顾先生全家就搬进新馆，开始了“以馆为家”的生活。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迁至西康路寓所为止，十多年中，顾先生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所以，后来的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会去长乐路，那是他多年的习惯。某个星期天的上午，顾先生对我说，《清代学者象传》二集中没有小传，我曾有底稿，大约是放在一个什么大信封内，你去楼下书库找找看。楼下书库就是地下一层，堆有一些未编的书，还有于右任先生所藏大宗碑帖等，很乱，我找了半天都未寻到。顾先生知道寻不到的结果后，只好说：算了，将来不知会不会找到。

1989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清代学者象传合集》，那是将第一集和第二集合并，共收三百六十九位清代学者。如以当年的印本和上古本对看，后者图像的清晰度差得就太远了。书签为顾先生所书，但是书内还是缺了小传。大约，小传真的是湮灭不存了。当年印成第一集及第二集的稿本，更是珍贵之物，而今仅仅几十年的时间，恐怕已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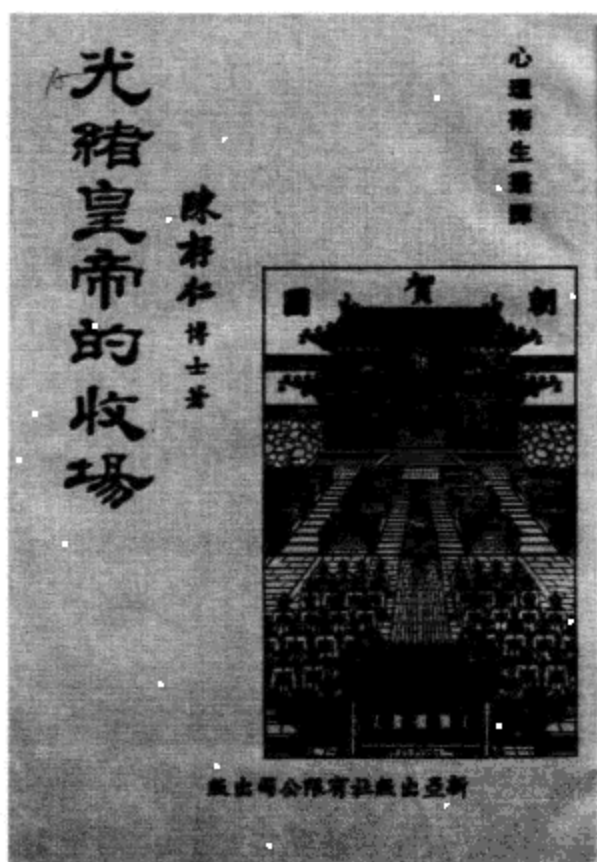
2008/11/2

陈存仁的《光绪皇帝的收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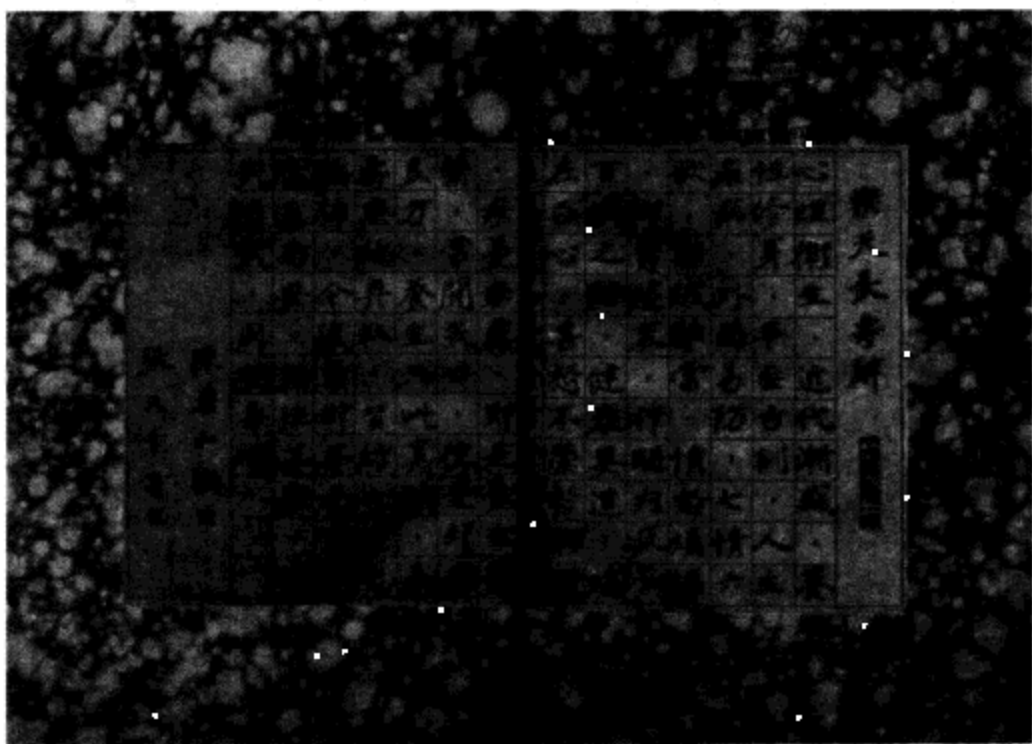
在中医卫生界，陈存仁绝对是位著作等身的人物。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已成为上海的名中医，三十岁不到主编出版了《中国药学大辞典》、《皇汉医学丛书》。前几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由于多为作者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再加上资料翔实、文字生动，所以深受读者欢迎。后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津津有味谭》（素食卷、荤食卷、食疗卷）三册，凭借扎实的中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以通俗的语言将各种食材药理药性进行了精要的说明，同时辅以奇闻趣事，是一部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饮食指导手册。

陈存仁一生勤奋，笔耕不辍，他的不少文章，多见于《陈存仁博士论文选集》（非卖品）。这里要说的是陈另一本很多人不知道的小书《光绪皇帝的收场》，那是1970年台北新亚出版社出版的，为“心理卫生丛谭”的一种。薄薄的一百三十二页，十万字不到，很快就可看完。

中医界有不少著名中医师留有医话，那是他们毕生实践的宝贵记录，



1970年台北新亞出版社版《光緒皇帝的收場》



《光绪皇帝的收场》书中所附陈存仁撰、张大千书《乐天长寿辞》

山平知
船
PDG

对于后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陈先生的小书也可视作医话来读。陈行医四十年，有感于近世有名的人物和一般民众，多因生活不合理、情绪不正常，以及任性任意的纵饮纵欲，而不能尽享天年，又由于他所见所闻太多，且许多事情因为涉及名人隐私，不便形诸笔墨，所以便借古喻今，将历史上若干著名人物的疾病和死因，根据史料一个个加以考证，用来说明心理卫生之重要。小书共写了十二个人，分十二章，即《光绪皇帝的收场》、《李太白狂妄而死》、《屈原汨罗江自沉》、《杜工部穷愁潦倒》、《元微之好色轻狂》、《龚定庵心理变态》、《黄仲则贫病而死》、《冒辟疆胃病缠绵》、《袁世凯活活急死》、《曾国藩烦恼伤身》、《洪秀全死于纵欲》、《杨秀清自伐丧目》。

唐代诗人元微之，与白居易齐名，是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可惜纵情色欲，自暴自弃，以致多病早故，时年五十三岁。陈先生在元氏《长庆集》中得知他曾患过脚气病、头风病、失眠、疟疾、视力衰弱、种种神经衰弱之病，尤其是三十岁以后，头上已经有了白发，而且筋骨酸痛，多病瘦弱。元诗中有无数诗句把自己写成是一个多愁善病的伤感者。元氏有着盖世的才华，但他的私生活很不检点，陈先生考证出元氏在离开“莺莺”之后，另娶豪门之女“韦丛”，婚后依然喜欢冶游，风流事迹不胜尽述。韦氏逝世，元又与“裴姓女”结合，中间又纳“安氏女”为妾，再与女校书“薛涛”相昵。和薛生子后，又移爱于容华绝世的“刘采春”，而其他新宠都成了无名氏了。陈先生从医学上认为：元氏一生，用情不专，不断玩弄女性，也造成他自己疾病满身，不能尽其天年。故陈先生的结论是：年少风流，放浪不羁，未老先衰，穷愁苦吟，肾虚足肿，神志昏乱，多病而死。

又如清代大诗人黄仲则，他的诗沉郁清壮，神致超旷，这可从他的《两当轩集》窥见。黄一生命运不济，流离困顿，贫病交迫，年仅三十五岁即去世。黄离世前，穷到一钱不名，不能延医诊治，所有四季衣服典质殆尽，留下的仅有几顶破帽和残缺的诗稿。其身后事宜，皆为朋友赠恤料理。黄有年谱，但死因却始终没有提到。陈先生细研黄诗，从三首诗中考证出黄是因肺癆致死，因为诗中谈及虚汗、郁热、喘促、咳嗽、嘔吐等症象。陈的分析写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你不得不服。

再比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冒文名籍籍，又因慕名妓董小宛，引出一段文人韵事而名被大江南北。陈先生从冒撰哀悼小宛的《影梅庵忆语》中，发现冒患有胃出血，陈所下的结论是：文章盖世，生于忧患，郁郁寡欢，万虑千愁，疾病缠身，胃病严重，长夏忧郁，不能自解，血下数升。

写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一章，也极有意思。曾氏治军方法和组织天才，确有过人之处，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在危急之中领导湘军，使清廷转危为安呢？研曾氏者不知凡几，但很少有人对曾之死因有过考证。曾氏过了五十岁之后，就疾病缠身，不久竟死于两江总督任内。陈先生疑惑于“他的寿命何以不能克致高龄，尽其天年，因此我要查出他生平的疾病和死亡的原因”，于是从《曾文正公日记》中找出曾氏曾患皮肤生癣、睡眠不安、咳嗽咯血、一目失明以及水肿过膝。经过详细分析后，陈以为太平天国战事结束之后，功高震主，曾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惴惴不安，再加上西太后对曾的疑虑，使曾在烦恼的环境中心理大受折磨，所以平日精神上的修养功夫、心理上的卫生方法，都被这种情绪所毁灭。

陈先生是医术精湛、妙手回春的“神医”，他的不少有关考证的长

篇文章，都是详尽地利用史料，让证据说话。再加上他的医学理论以及实践，完全可以将古人放在面前，将他们患过的疾病娓娓道出。陈的文字很流畅，也不摆噱头，所以，这本小书读起来毫不枯燥，如果在卧游时一读，必能解闷。

小书的前面有一篇《乐天长寿辞》，是陈存仁撰，张大千书，曰：“心理卫生，近代渐盛。养性修身，早垂古训。人生疾病，外因易防；七情六欲，内贼难当。愤怒烦恼，抑郁悲哀。神明内疚，百病之阶。健康要道，端在正心。喜怒不萦于胸襟，荣辱不扰乎方寸。纵遇不治之疾，自有回天之功。毋忧毋虑，即是长生圣药。常开笑口，便是却病良方。养生只此真诠，长寿无他奥秘。昔时七十已称稀，今后百龄不足奇。随遇而安，无往不乐。优哉悠哉，同登寿域。”

书末还有一首《知足长乐歌》，写得也很实在，是陈存仁自己总结出的“真谛”：“人生原无病，不少因自作。想想疾病苦，无病即是福；想想饥寒苦，温饱即是福；想想生活苦，达观即是福；想想世乱苦，平安即是福；想想牢狱苦，安分即是福。莫羡人家生活好，还有人家比我差；莫叹自己命运薄，还有他人比我恶。为非作歹内疚苦，多愁多虑病来磨；行善积德福泽多，吉人自有天相助。为人在世一生中，无病无灾应知足。烦恼都因想不开，忧愁只为看不破。本是长寿人，自使命短促。奉劝世间人，知足便常乐。”

2007/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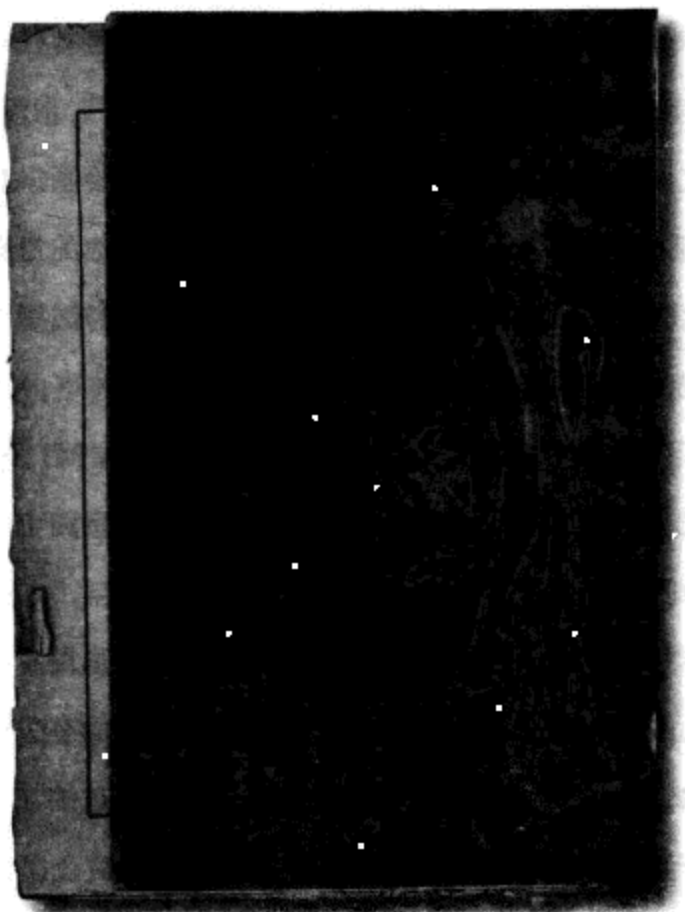
也说《采菲录》

拜读程焕文兄的博客，里面有一篇是写《采菲录》的，于是也来凑凑热闹。

《采菲录》，姚灵犀编，1933年天津时代公司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妇女缠足史料的书，后又续出三册，凡四册，有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曾追随潘师景郑先生、瞿师凤起先生去上海海关、上海古籍书店检查出口图书，可以出口的则打上火漆印。二位先生告诉我，除了出版时间的卡线外，如遇到清末民初的书中绘有或影印有妇女小脚的书一律不许出口。我一直记着这话。

我知道《采菲录》这部书是在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没几个月，人们多已人心惶惶，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说不准什么时候灾难会降临到你的头上。有一天，我很惴惴地被告知要去人事组一下，去后方才得知，领导上信任我，要我去整理葛正慧的藏书，做一份清单。这件事并不难，就我一个人在小房间里工作。

事后我才得知，原来有人向馆领导报告，说是前晚十二时左右，在



1933年天津时代公司版《采菲录》

采
菲
录

PDG

火车站（北站）附近看到葛正慧，手里还拿着一包东西。这本来没有什么正常不正常，可是在那个年月，有人就会从阶级斗争这个观点着眼，想到这个时候别人都睡觉了，你还在那里干什么，想必是干什么勾当。那时，也正好是抄家之风刚开始之际，有人怀疑葛正慧会不会转移什么东西。于是党支部当机立断，派人抄了葛家，带走了两大麻袋的图书。

葛正慧是上海图书馆书目部的副主任，单身，虽有些怪癖，但确实是一个博学多才、无所不晓的“杂家”，人称“活字典”。他没有大学学历，但精通日文，也懂英文、德文、拉丁文，还会设计绘画。在办公室你是找不到他的，只有到大书库和旧平装书库才能看到他的身影。至于他因为指出“狄克”即张春桥，而受“四人帮”迫害，身陷囹圄之灾，那是后话了。我非常佩服他的“博”，曾经请教过他几件事，他都说得你不得不服，所以觉得他真的是什么都懂，是属于那种“万宝全书缺只角”的人物。现在是再也找不出像葛正慧那样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和事那么殚见洽闻的“杂家”了。

两大麻袋的图书，都是旧平装，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很奇怪、很吸引人的书名。那时我见到的只是很少的有关史学、文献方面的工具书、参考书，而葛的书是我过去从没有见过的，很新鲜，也有少部分属于“禁书”，是见于解放后有关部门查禁黄色、反动图书的数种目录中的。

《采菲录》是麻袋中的一种，上图有好几个复本。说它有问题，大概是因为缠足是封建时代的陋习恶俗，开摧残女性肢体之风气，影响民族健康关系至巨，罪莫大焉；而且书中有不少叙述带有“黄”的成分，所谓缠足女子能使男子“春弓一握魂消千古之类”，也有不少表现达官

显宦拜足狂者的文字，所以此书过去就作为“黄书”处理，不可公开，读者如需借阅，要持单位介绍信并得批准方可阅览。

1985年年初的一天，我去上图东大楼206室。206室当时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审阅经部、史部的办公室，而二楼则全是参考阅览室，读者多多。我走在楼梯上，后面有人叫住我问：“同志，206室在哪里？”我一看，是个五十左右的陌生人，就说：“有什么事吗？”那人说：“我要找沈津同志。”他从包里拿出一张介绍信，原来是重庆某医学院的，专程来看《采菲录》，并说是传达室要他去找沈某的。我问为何不在成都四川省馆或重庆市馆看。他说整个四川都无此书。因为他是做研究的，并非猎奇，又是专程，所以我掏出笔来就在介绍信的背后写上“同意”，并签上贱名。他一看就说，“原来你就是沈津同志”。那年春节前，我收到一张贺年卡，就是这位重庆人寄来的，除了“新年快乐”，就是感谢再感谢。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研究出什么成果，看出什么道道。

我到“燕京”后，因为要写善本书志，几乎每天都要在中文书库里查资料，有时见到属于“革命文献”（根据地出版物，今称“红色文献”）的书刊，或是旧平装中较稀见者，我也会抽出来，请编目组的同事在计算机内改加“T”，就可以以合法身份，堂而皇之地在善本书库里安家了。前几年，在书架上又看见了《采菲录》一套四册，每册里面的图片都已脱落，原书纸张又脆，看看有些不忍心，于是“我佛慈悲”，将其转到善本书库去保存了。199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将此书重新排印，不过已删去属于“精神污染”的内容，大家看到的已经是“洁本”了。

姚灵犀著的书还有几种，有一种是《思无邪小记》，又名《艳海》，为“姚灵犀秘笈之一”，1941年天津书局出版，1974年香港有翻印本。作者搜

集古今小品中涉及香艳者，上起经史，下逮说部，并加笺注，汇为此书。所谓“思无邪小记”者，意即郑卫之音不删，而以邪僻之思为戒也。当然，用道学家的眼光来看，又要打入“黄”书中去了。还有一种是《未刻珍品丛传》（含《闺艳秦声》、《塔西随记》、《麝尘集》），1936年由姚氏编校印行，所述率多房帷燕昵之私、曲巷狎邪之事、姬侍怨诽之语，流传倒是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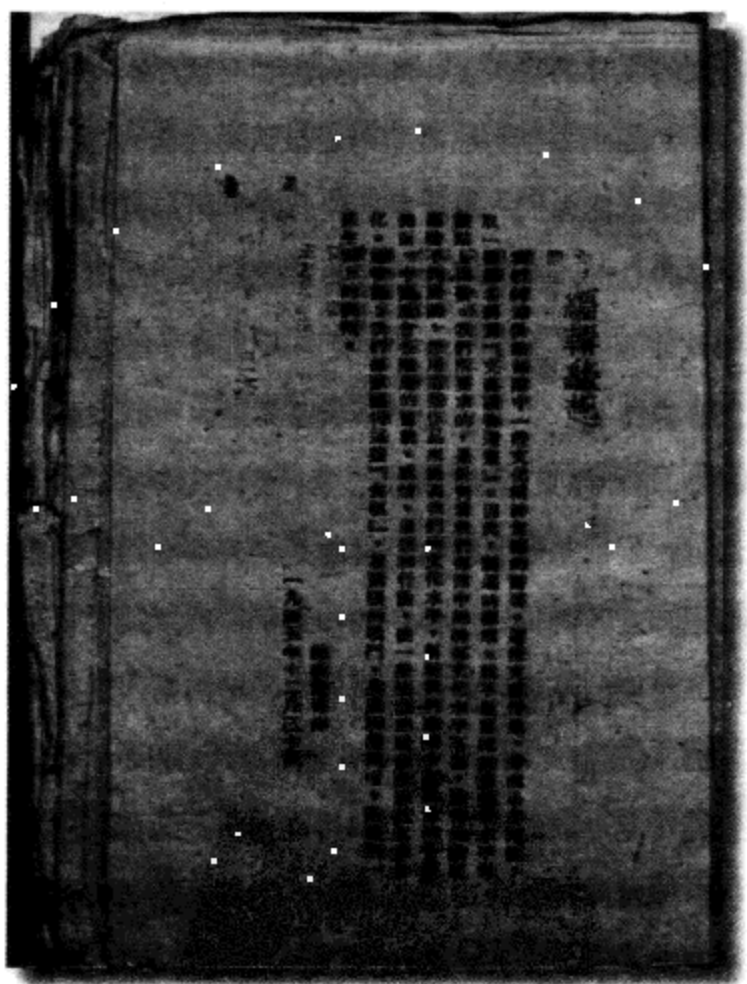
稀见珍本——《严氏兄弟》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革命文献中，有一部分是延安时期的出版物，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社会科学、政策法规、文艺读物、医药卫生、教材课本等等。其中有一本很不起眼，书名也很普通，却是国内除国家图书馆外各大图书馆极少人藏的稀见书，这就是《严氏兄弟》。

《严氏兄弟》实际上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计有《王凤姐过生日》、《贾琏偷娶尤二姐》、《文制台办外交》、《统领剿匪》、《知县审案》、《钦差查案》、《苟才讨差使》、《严刑逼孤孀》、《严氏兄弟》、《闲游君子邦》、《女儿国》十一个短篇，分别选自清代以来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二篇）、《官场现形记》（四篇）、《镜花缘》（二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各一篇），每篇故事之后都有注释。《严氏兄弟》是《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故事，通过对严氏兄弟的描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土豪劣绅虚伪、凶残、吝啬的特征。此书由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选编，三十二开本，一百四十一页，土纸印刷，1945年12月由延安印工合作社出版，列为“文艺读物选丛之九”。



1945年12月延安印工合作社版《严氏兄弟》



《严氏兄弟》“编辑缘起”

我们今天要想看这些小说，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在当年的延安却是不容易的事。当时虽有图书馆，但书刊寥寥无几。这本书最引人注意的，是每篇正文前都有编者按语，用词非常犀利，一针见血地揭示故事的“实质”。如《王凤姐过生日》按语云：“这是写大家庭的奢侈与荒淫生活的。给孙儿媳妇过生日，吃酒唱戏，就要花去一百五十两银子。凤姐正在过生日的兴头上，却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丈夫在屋里偷伙计媳妇。而贾琏的荒淫行为，在贾府是被认为合法的，虽然不是公开的。这里还有高高低低的人们——从主子到老妈子和丫头的虚伪的看眼色行事的多种多样的丑态，也是清白的平民人家所没有的。”

又如《钦差查案》按语云：“官吏一天到晚干鱼肉人民的事，舆论太坏了，民怨沸腾了，于是皇帝派下钦差大臣，大张旗鼓地去办案。但皇帝自己晓得，这原来只是敷衍敷衍，并不要认真去办，因为‘通天底下，那里来的清官？’钦差到了外省，打的是‘破除情面，澈底根查’的幌子，但暗地里却差人讲价钱。等到钱一到手，就拿几个官小的、出不起钱的出毒气，革职的革职，严办的严办，一场雷雨，就此完结。而歌功颂德的奴才们，还要借此题目大讲澄清吏治，德被万民的鬼话。这样现象，在今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大后方，依然是官场上的普遍现象。每当官场上丑事四扬，无可掩饰，激得民怨沸腾，不可开交的时候，舆论界就大叫‘借人头’的口号，要求‘杀几个人头以谢国人’，而政府也就向几个小官开刀，企图借此以平息人民的气忿，这是官僚统治的一种手段。”

书的后面有一篇《编后记》，写于1945年6月1日：“这本集子，是从几本清代小说中选集而成的。从《王凤姐过生日》、《贾琏偷娶尤二姐》两篇中，可以看到官宦家庭内的奢侈生活，和那些公子哥儿的荒淫

无耻。衣冠禽兽，是他们的恰当称号。从《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所选的几篇看来，使号称‘为民父母’的官吏们原形毕露。在满清末叶，西欧资本主义的势力侵入了古老的中国，使镇压中国人民官僚制度进而商业化，因之，官场上的卑鄙龌龊，钻营奔走，较之前代都更加‘青出于蓝’。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暴露官场罪恶的小说特别‘脍炙人口’。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制度，以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成为目前相互抗争的解决中国问题的两条不同的道路时，多选几篇这样的东西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独裁政治统治的一个角落里，现实地还摆列着这些肮脏的东西。从《严刑逼孤孀》一篇中，更使我们了解了官僚制度的必需打破。《严氏兄弟》，给我们刻画了当时读书人（即士绅）的形象和一般的社会人情。而《闲游君子邦》和《女儿国》，则是感于当时社会的某些不合理制度，而希望有所改变。这种变革，是百年来中国人民所渴望和努力实践的。”

仔细阅读书中的按语和编后记，我总隐隐地感觉到此非大手笔不办，且能用那种大无畏的高屋建瓴的气概写此种文字者，定为党内高层领导人所为。由于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人（包括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传部长萧向荣）都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回忆，为此，我又重新读了毛泽东的不少著作、讲话、题辞、按语和书信，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论证作者身份。这书中的按语和编后记究为何人所写，还是留给众多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者和党史、军史专家去作研究吧。

《严氏兄弟》出版的时候，延安已经历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并且广泛传达和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严氏兄弟》是“文艺读物选丛”中的一种，为什么要编这套书呢，只要看看

署名“总政宣传部”的《编辑缘起》就知道了：“我们纯为供给部队中一些文化精神食粮的需要，选些文艺作品，分成小本印出，取一个总名称，为‘文艺读物选丛’。因此，编选的标准，就不是单纯的从艺术水平的观点上出发。我们所要求的，是针对着我们部队中的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知识与经验不够广阔，想用这些作品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面貌、感情、思想和行动，使一些抽象的社会阶级概念形象化。并希望：我们部队获得这些‘食粮’，在紧张的战斗、生产和整训中，能得到一些生活上的调剂。”这篇文字充分说明了中共军队领导机关对文艺作品的社会作用、思想教育功能的重视和了解。

我们常见的根据地或解放区出版物，多由党的出版机构解放社或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印工合作社的资料却非常之少。我只知道该社设在陕北的穷僻山沟——延安北关文化沟口，这或许是“总政宣传部”下面的一个出版单位，曾经出版《器乐曲选》、木刻连环画《炸桥》、苏联游击队故事《复仇火焰》、剧本《苏沃罗夫元帅》以及《三年来苏德战争形势图》、《四年来地中海战争形势图》、《太平洋战争形势图》等。有意思的是，“印工”出版的这个“文艺读物选丛”，鲜有研究者提及，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也没有著录。

据我所知，“选丛”的第一种，是鲁迅著《一件小事》，也是由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选编。内收鲁迅小说五篇，即《阿Q正传》、《一件小事》、《故乡》、《孔乙己》、《祝福》。正文前有“总政宣传部”1944年8月1日写的《编辑缘起》，书末有写于1944年7月1日的《编后记》，对鲁迅的评价很有见地。五篇小说，正文前有导语，文后有注释，这和《严

氏兄弟》的编辑体例是一致的。遗憾的是我目前仅知“选丛”的第一种和第九种，其他几种则不得而知了，抑或还有第十种或更多？



范长江的签名本《中国的西北角》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1928年建立的，在八十年的历史中，藏书不断递增，目前已超过一百万册（不包括复本）。对欧美地区的东亚图书馆来说，这个数字是比较可观的，而且该馆藏有许多国内图书馆所没有的善本书，那就更能吸引众多的学者前来“觅宝”了。这或许是“哈佛燕京”被称为海外汉学资料重镇的原因之一吧。

“燕京”的中文书库在地下一层，由于空间的原因，书架是密集型的，除了善本书，各种中文期刊、新旧图书大部分集中于此。这其中的不少旧书（包括线装书），在今天来说，就有“善本书”和“新善本”混杂在里面。这不，前几天的中午，我在楼下书库里转悠，偶见架上有几个不同版本的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于是抄起一本较旧的翻看，嘿，竟然是范先生的签名本，这太难得了。

这本《西北角》的扉页上有作者的毛笔手迹：“子英吾兄正之 弟长江敬赠 一九三六、八、廿 天津总馆”。书是1936年8月天津大公报馆出的第一版。子英，则不知何许人。推想起来，新书刚面世，范先

生就签名送亲近的朋友了。书前有范的一段说明：“记者此次旅行的完成，和本书的出版，此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各地朋友们力量，其余百分之五才是机会和我自己的微力。为了顾及读者读书时的兴趣起见，恕我在书中不能一一举出名来，表达我的谢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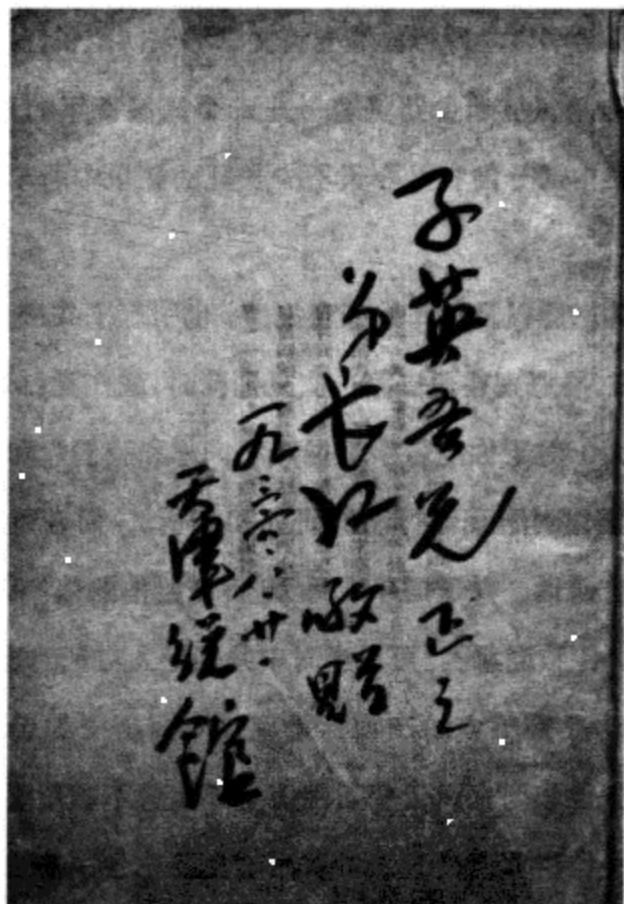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西北角》是一部轰动全国的新闻通讯名作。那是在1935年7月，年仅二十六岁的范先生，以《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只身前往大西北采访。他凭借过人的毅力和勇气，跋山涉水四千里，克服了不可言喻的困难，以敏锐的观察和流畅的文笔，揭开了蒙着神秘色彩的西北地区的黑暗政治、人民的疾苦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并且第一次在《大公报》上公开如实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报道比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长征的报道还早一年多。范长江的系列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也由此成为名记者。那时候，范长江每天为天津《大公报》所写的文章，引得多少人翘首企盼，那种“纸贵洛阳，不胫而走”的气势，是其他报纸的新闻记者们望尘莫及的。

《西北角》中的每篇文章都是题材新颖、内容丰富，而且议论纵横，上下古今随手拈来，这类脍炙人口的佳作结集出版，也必然是畅销书。从1936年8月初版始，9月、10月、11月，竟然印到第四版，而次年的1月、3月、4月、6月、12月，至1938年的1月，已经是第十版了。在那个年代里有什么出版物能像此书这样，同类书中又有哪一种的发行量能望其项背呢？

此书第一版是没有序的，到了第三版，才将周飞的《评〈中国的西北角〉》用作代序，而第四版方有范先生的自序，那是1936年11月他



1936年8月天津大公报馆初版《中国的西北角》



范长江题赠手迹

在绥远时写的。第七版上又有署名“墨卿”的代序，也是评此书的。

范氏西北之行，撰写了不少关于红军和长征的报道，第一次以客观的立场，对红军长征的过程和动向作出记述、评论和推断。这些文章对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有些文章并未收入《西北角》，六十余年后，范先生的妻子沈谱方以“红军与长征”为题，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等七篇文章编入《范长江新闻文集》中。其中最为可读的是《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叙述了长征的艰辛，其中部分内容是今天不少长征回忆录中所未涉及的，颇有价值。

范长江对共产党以及红军的客观报道，也引起了共产党高层的注意。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在西安第一次见到范时，就作竟日长谈，并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而在延安，毛泽东又和范长江作通宵谈话，并于同年3月29日在给他的信中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可见当时中共领导人对范的重视。

范长江的作品是历史的产物，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忠实记录，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他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历史环境中不避艰险努力探索的过程。范先生是一位讲真话的人，讲真话难免要吃亏，甚或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1949年后，曾有人建议范将自己过去的作品修改之后重新出版，但他拒绝这样做。他说：“修改后就不是原来的面貌，也不合乎历史的真实性。错了就错了，不必乔装打扮，借以骗人。”遗憾的是，范先生没能逃过“文革”那场劫难，英年早逝。

范先生的《西北角》第一版，如今已很难得了，您看，《民国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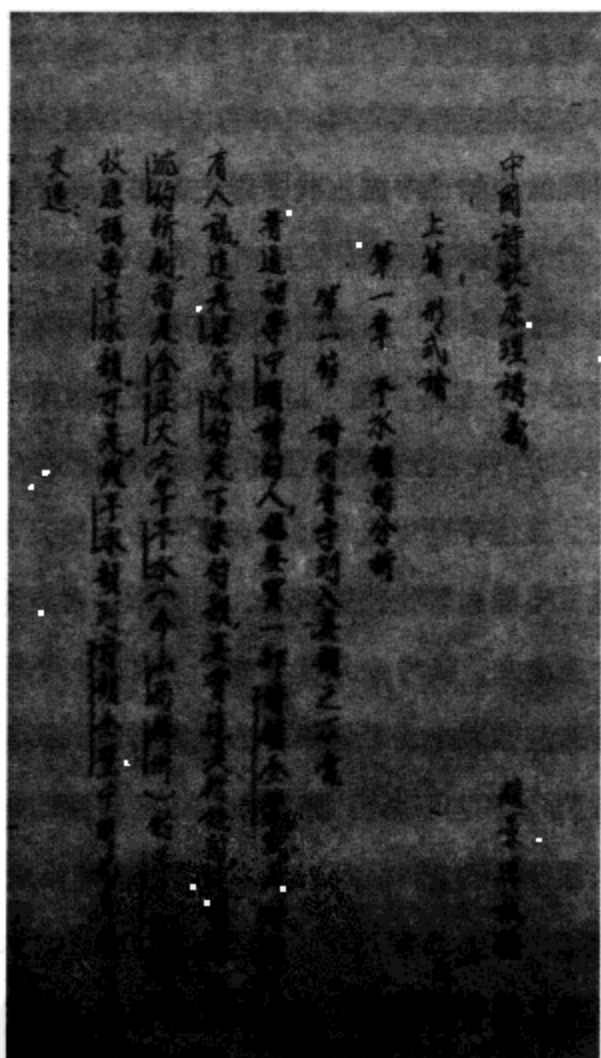
三编所收的本子是第七版，而《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四辑所收的也非初版。所以说，范长江的初版签名本，当然是珍贵的“新善本”，它进入“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库，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2007/4/16

新发现的赵景深《中国诗歌原理讲义》

我对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书库特别有兴趣，几乎每天都会因写善本书志而在里面转悠，因而时不时地发现一些想不到的“宝贝”。记得1986年，“燕京”馆邀我前去两星期，专门从普通书中挑取善本书，那时选的不仅有明末刻本唐伯虎的集子，还有清顺治刻本的一套《说郛》，而我以为最得意的是将何绍基批的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拎”了出来。

不是说北京的潘家园里有不少人在星期六清晨“觅宝”、“捡漏”吗？或许真有人找到了一二件别人未识的宝贝，一转手就不是翻两个跟斗的问题了。而我想的很简单，只想将“燕京”普通书库里有价值的难得书选出来，送往善本书库去，那是我的职责。如果不选出来，或长睡书架，或被送后备书库(HD)，也可能发生不安全的事。比如说，前几天东亚系的田晓菲教授到我办公室来，送给我一本她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晓菲是众所周知的才女，九岁出诗集，十四岁上北大，去年4月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她专门讲陶集手抄本的事，内容新颖，真让我耳目一新。所



《中国诗歌原理讲义》内页

以当晚就翻了翻这本新书，里面有一段说她曾利用过燕京馆的一本《陶靖节集》，并说那是著名作家废名送给闻一多先生的签名本。但第二天我去书库找这册签名本的时候，书已经失踪了，或许是一位懂行的“君子学者”未办手续而顺手牵羊了。

言归正传。也真有意思，上星期五，我又从楼下的普通书库中找了三本书上来，一本是胡适的签名本《中国文学小史》，一本是朱希祖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时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还有一本就是赵景深编的《复旦大学中国诗歌原理讲义》。

拿赵先生的《复旦大学中国诗歌原理讲义》来说吧，油印线装一册，九十七页，二万五千字左右，题“赵景深试编”，封面上还印有“廿四年春季”。油印本，当然是指在钢板上用特殊的笔将文字刻写在蜡纸上，再用油墨油印的，又由于是讲义，绝不会多，数十册乃至百册而已。讲义分上编形式论、下编内容论两大部分。因为似乎没有人提到过，所以我把它的内容全列出来，供专业人员参考。

上编：第一章平水韵的分析（第一节论同音字列入异韵之不当；第二节论同韵列入异音字之不当）、第二章四声的区别与练习、第三章律诗的平仄、第四章律诗的变体、第五章古诗的规律（第一节古诗的用韵；第二节古诗的平仄）、第六章对句、第七章双声叠韵、第八章八病说、第九章新诗的形式（第一节悬足协；第二节双声叠韵、第三节西洋体式）。

下编：第一章诗的意义、第二章诗的分类、第三章诗的制作（第一节律诗；第二节绝句）、第四章诗的理解、第五章诗的风格（第一节皎然的《诗式》；第二节司空图的《诗品》；第三节诗话中的风格论；第四节朱宝莹的《诗式》）、第六章诗的研究（第一节历代诗话的读法；第二

节历代诗话的整理；第三节诗歌原理书目）

讲义的书眉上有一些钢笔字，还有几处关于平仄的记号，如五言律平仄偏格处，上书：“宰相升知府，将军背大旗。老爷怕小的，和尚抱山妻。蝴蝶吱吱叫，虾蟆队队飞。小猫吃老虎，蚂蚁拖雄鸡。”四声的区分上写着：“两董同床，西董翻身东董冻（平上去）。二猴上树，前猴用力后猴吼（去平上）。”这应该是授课者在上课时对讲义内容的补充。我以为讲义上的钢笔字应是赵先生所写。为了证明此点，我将《赵景深印象》中赵先生的手迹影印件“最早的京剧总集《醉白集》”放大并作了比较，确为赵先生手迹无疑。赵在讲义中的钢笔字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写，但之后的字迹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赵先生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大家，一生创作、翻译、编辑过各类书籍大约有一百五十种左右，这其中有早年的童话创作、译作、民间故事、文学概论、小说闲话、小说戏曲新考、弹词考证等等，但就是没有中国诗歌原理一类的著作。

赵先生的哲嗣赵易林曾编有《赵景深先生年谱简编》，但奇怪的是，1934至1936年没有任何记载。赵先生在1930年始任复旦大学教授，至1942年离开复旦去安徽金寨，1946年返沪仍任职复旦，这本讲义应是赵先生33岁时在复旦时所写。赵易林还编有《赵景深先生著译年表》，言其1932年有《文学概论讲义》（上海文化函授学院），但1935年只有《元人杂剧辑逸》（北新书局）一种，或许是赵先生在复旦授课的讲义多已散失了。我不知道赵先生授课时用的这本讲义，是怎么流落到美国来的，时间、经何人之手、过程，都是谜。我只了解到，讲义是1972年10月被“燕京”馆编目入藏的，那时中国大陆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时期，但这

并不代表何时入馆。不管怎么说，我们将这本讲义看成是赵先生的佚著也未尝不可。可惜，隔行如隔山，我不研究中国文学，更不懂诗歌原理，将来有兴趣者，或研赵先生者，当可看出个所以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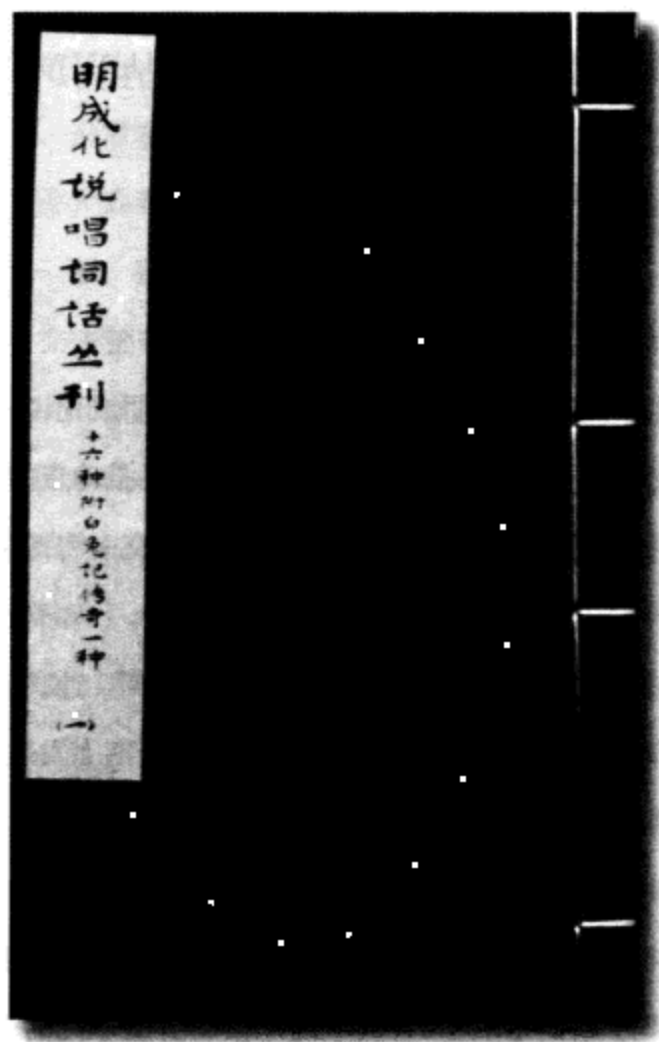
赵先生的大名，对我来说是如雷贯耳，但我却无缘向他请益。和赵先生有点关系的事只有一件，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复旦方面要求上图派人到复旦，去看看“文革”中抄赵先生家的书中有没有什么好的善本书。我奉命去大致看了一下，印象中，其中一部《金瓶梅》并非清初刻本。顺便说一下，我还为书的事，专门去过复旦两次，一次是1966年夏，我和卢调文去接收乐嗣炳教授送上图的书，乐教授资格很老，他的藏书中有不少极难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以及宣传品，我们共取走了两纸箱，有百余册之多。还有一次是八十年代初，蒋天枢教授要将陈寅恪教授早年的一些笔记本送给上图，笔记是写在解放前的练习本上的，多少册已记不清了，内容是学习希伯莱文(?)的记录，我取回后就放在上图特藏书库的后面空的樟木橱里，如今这些文献不知安在否。

2008/3/30

也说《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藏书报》2007年5月28日刊登罗君《略叙〈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言及“上海书店于1972年在上海郊区嘉定收到一批珍贵的出土文物——刊印于明成化年代的说唱词话和传奇，便及时送交上海博物馆鉴定收藏”之事。

在罗文之前，已有两篇文章专门谈及此成化本《说唱词话》事。一为上海书店前经理俞子林在《世纪》2007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坟墓中发掘出珍贵古籍》，谈到此《说唱词话》是在1972年即“文革”已进行到第六个年头时所发现的，“书店把这些出土古书送到上海市文管会，由上海博物馆收藏”。二为2007年4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刊发宣稼生的《一辈子收购古旧书》，其中的一段“价值非凡的《说唱词本》”，说的是1972年7月，他和同事在上海嘉定县发现此书的经过，并写道：“此唱本经顾廷龙、赵景深、韩振刚、王兆文、马栋臣、韩士保等专家鉴定，确认是海内孤本，价值非凡。”“后来，这套珍贵的明版《说唱词本》全部无偿送交给了上海博物馆。”此三文读后，觉得在发现的时间上及某



1973年影印本《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词话丛刊》中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

些过程有些出入，由于此书甚为重要，今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写出来，或可供参考。

1967年夏天的某日下午，我接到上海古籍书店韩振刚的电话，说是他们最近收到一部书，因为是从棺材里发现的，所以觉得有点“恶心”，能否请上海图书馆利用设备帮忙消毒。由于上图善本组和古籍书店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所收到的古籍善本，基本上都先送上图供我们挑选，以补充馆藏。有时潘景郑、瞿凤起两先生也会携我去古籍书店选一些善本书，所以互相之间很熟。上图的夹层书库（普通线装书库）办公室里有一小间，有紫外线消毒设备，所以我答应了。

半小时不到，韩振刚、高震川就骑自行车来了，他们带来一包书，打开后，我发现有的已成饼状，有的尚可翻阅。韩、高说，这部书是同事从嘉定乡下收来的，原为农民挖宅基地在一具棺木中发现的，书就在尸体头部旁，看着这几百年的古书，有点心理障碍，所以想先消消毒，并请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先生鉴定一下，是什么版本，过去见过否，价值如何。消毒后，我即将韩、高二位带到上图食堂旁边的“俱乐部”乒乓桌旁，然后去请顾、潘、瞿三先生。

那时，上海图书馆比较乱，行政工作和对外开放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馆内两派互打“内战”，而顾、潘、瞿三先生都靠边审查，在“牛棚”学习、劳动。顾先生等来到后，韩、高简单地介绍了情况，三先生都细细翻看了这包书，皆认为过去从未见过，是极难得的好书。顾先生还让我去大书库（基藏书库）里调阅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看看郑先生有无提到这些书。后来我告诉顾先生，郑著里没有涉及。韩、高离开后，顾先生即将我拉到一旁，说此书很重要，是研究中国俗文学史、戏曲史

和版画史的重要材料。他要我尽快打电话给上海博物馆老上海组的杨嘉祐先生，告诉他这部书是上海嘉定县出土的“地下发掘物”，要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出面，将书收归公家保管。我马上照办了。

两天后，杨嘉祐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已持文管会的介绍信去过上海古籍书店，并出示国务院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文物法令，即凡地下发掘物一律归国家所有，任何个人、集体都不得保存并应上缴有关部门保管，并说，在上海古籍书店领导的配合下，书已带回文管会。杨又对此事表示感谢之意。这件事，我在1994年所写的《论新发现的孤本小说〈出像批评海陵佚史〉及其他》以及1998年所写的《学术事功俱隆 文章道德并富——回忆先师顾廷龙先生》中都有过叙述（二文俱收入《书韵悠悠一脉香》），2004年10月出版的《顾廷龙年谱》1967年里也记载了这件事。

上海市文管会收得《说唱词话》后，一直存放在库房，那时的形势不适宜公开这部书，因为不久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所谓的“革命大批判”等令人十分不安的“触及人们灵魂”的种种运动。直到七十年代初，业务工作才陆续得到解冻。由于这部《说唱词话》深埋在地下棺材里数百年，受到微生物的侵袭，品相大为受损，有的书叶已无法揭开，有的就是一块硬邦邦的书饼。为了维护这部难得的善本，在1972年7月，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上海博物馆出面，请上海图书馆协助，物色专业修补人员进行修复，最后决定暂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补组潘美娣女士前去上博，当时参与修复的工作人员还有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两位专业人员。此项修复工作，前后共三个月之久。在修复工作中，先对这些书做了前期处理，如洗、蒸等必要的工序，处理一部分，即修一部分，直到

最后全部修复，并以金镶玉装订成书。

所以说，上海古籍书店的专业收购人员在嘉定县收得此《说唱词话》的时间应是1967年的夏天，而不是1972年的夏天。如1972年夏天得到的话，那在修复的时间上就赶得太紧了，于理说不过去。而顾先生在1970年秋，即由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借调，前去从事抄家图书的清理工作，直至1972年10月方回上海图书馆工作。

此书修复完成后，原来不堪入目的“书饼”变得焕然一新，以旧复旧的传统修补方式又一次得到完美的验证。次年，也即1973年，上海博物馆将此书命名为“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十六种附白兔记传奇一种”（分别是《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等三种、《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新刊全相莺哥孝义传》、《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的名义，为“供有关方面专业工作者进一步研究”而内部影印出版，封面题签以及出版说明、目录，均由书法家承名世先生用唐人写经体书写。在《出版说明》中也明确写道：“一九六七年上海市嘉定县出土了一批明成化说唱词话和传奇刻本。”

1979年6月又由北京文物出版社据以重新影印出版。因此，此《说唱词话丛刊》影印本有两种版本，分别为上博版和文物版。至于《丛刊》学术价值的叙述，在七十年代初期，即由汪庆正及赵景深先生分别以“记

文学、戏曲和版画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为题，先后发表在《文物》杂志上。

《说唱词话》也是明初北方地区小说插图艺术的仅见物证，但罗文说，“这批刊印于明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和传奇中的插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戏曲小说的插图版画”，则似有不妥。按，我国现存最早的戏曲小说插图版画，尚有元代刊印的《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二集（元至正间建安刻本）、《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三卷（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李氏书堂刻本）、《全相平话五种》（元至治间建安虞氏刻本），后二种是上图下文的形式。由于尚未发现明代成化以前的戏曲小说插图的佐证，将《说唱词话》插图视为明代“现存最早的戏曲小说的插图版画”，则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2007/6/10

给李肇星看什么

前两天，报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南开大学招收了一名研究生的消息，于是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执笔写来请列位看官一读。

2000年的某月，总之是李肇星调回北京出任外交部长之前的一天上午，“哈佛燕京”的馆长郑炯文先生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下午三时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先生要来“燕京”访问，你作些准备，拿几部书给李大使看。

拿书还不容易？过去在上海图书馆时，尤其是“文革”以后，接待的外宾很多，还有一些是“党宾”，来者都会参观善本书库，而我们准备给那些外国朋友看的善本古籍有好几套“菜单”，不同的对象看不同的书。我拟的几套“菜单”事先都请顾师廷龙先生审定过，而且“菜单”中的每部书都写好说明。所以，这种事情做起来并不困难。

但给李大使看什么书，倒实在动了一下脑筋。拿宋元刻本、《永乐大典》、明代活字本、套印本、版画、清代精槧本，这些书给李大使看有什么意思？“哈佛燕京”所藏明刻本中有近二百种是中国大陆、台湾

地区、香港和日本没有的，但估计李大使也不会有什么兴趣。李大使是何许人也？那不是我们这号人走南闯北地乱看，他可是时常陪同国家领导人东西两半球各个国家跑，什么地方没去过，什么东西没见过？他要去看宋元佳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经卷，去一次中国国家图书馆，还不是“举足之劳”？所以，我要给李大使看些他想不到的东西。

李大使在“燕京”善本书库参观、看书，原定的时间是十分钟，所以当他在我的小办公室时，我就捧出准备好的几件不经眼的“宝贝”请李大使赏鉴。

第一件是李鸿章出使美国时的名片及美方招待李鸿章的菜单。名片是红色的，上面印有“李鸿章”三个楷书大字，没有官衔，那可是李大人亲笔手书上板刻印的，很有点派头，不像我们现在用的像小卡片似的。堂堂李合肥的名片，当年即不易得，他可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之下万人之上的重相，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见的，他的名片也不似我们可以随意送人的。我拿李鸿章的名片请李大使看，一是名片难得；二是二人都姓李，“五百年前是一家”；三是都代表中国，前者是大清，后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不知道李大使用不用名片，不过我想他用不用都无所谓，“天下谁人不识君”，他2000年11月任满返国，任外交部长，电视里时常“露脸”，无论走到哪儿，那张脸就是“名片”。

我对李大使说：这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作为大清公使第一次赴美，而一百年之后，又是您了。您们二人都姓李，一是李合肥。话没说完，李大使马上笑着说，我是山东胶南人。

菜单有两张，印得很精致，上面绘有美国和大清国的国旗，背面还印有“李鸿章”的金色签名。一张是1896年9月5日的午餐，一张是9



美方招待李鴻章的菜单



李鴻章出使美国时的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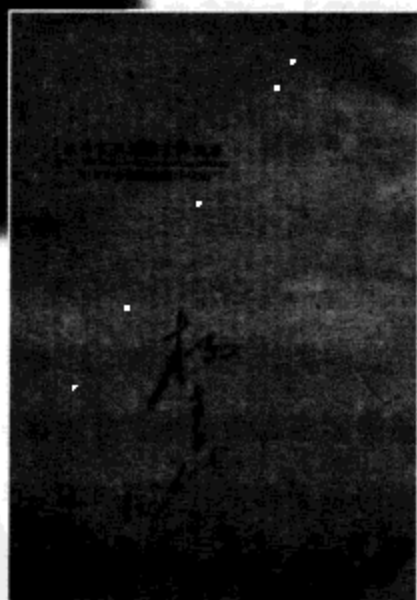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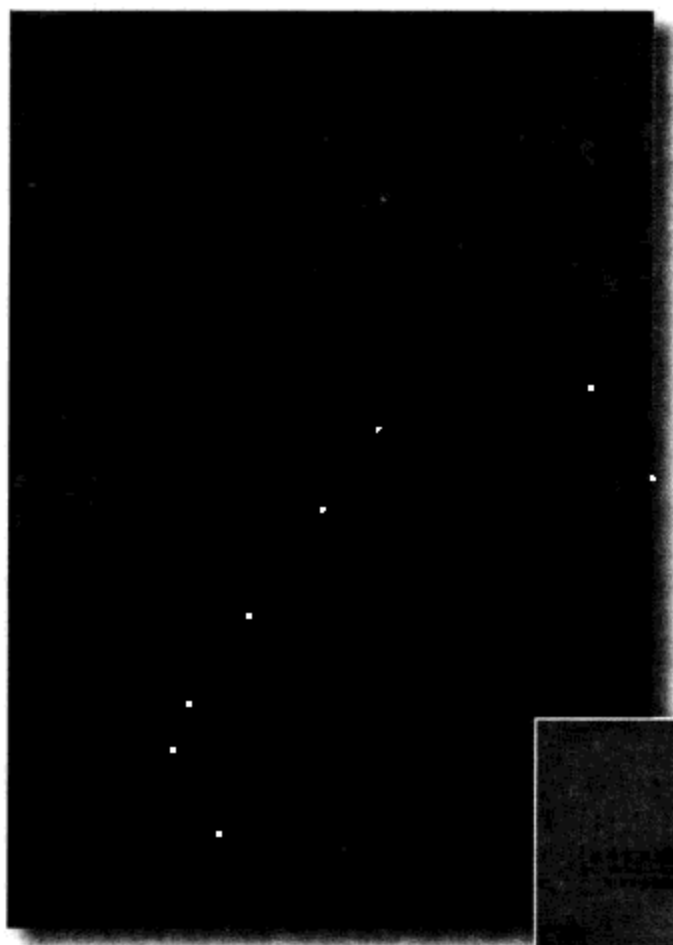
月6日的早餐，是李鸿章离开华盛顿去加拿大途中，在火车上用餐的英文菜单。午餐有牛肉、鸽子、贝壳、鸡蛋、鱼汤、蔬菜色拉、法国小青豆、玉米、土豆、番茄、鸭、米饭、苹果饼、奶酪饼干、甜点等。早餐则是燕麦粥、火腿、羊肉、牛排、烤鱼、面包、鸡蛋、土豆、米饼、巧克力、水果、牛奶、绿茶、英国茶等。

李大使对这两张菜单非常有兴趣，看得很仔细，有的菜还读出声音来，时而会意地笑笑。我以为他想知道一百年前，李合肥在美国吃的是什麼。不过，有一点我没说，因为李鸿章是3月4日离开北京的，3月27日乘法国邮船放洋，访问俄、德、比、法、英、美。出差六个多月，也难为了李大人，据说，他刚到美国，就要求纽约华埠的华人饭店赶快做中国菜，大约是在访问的几个国家中多吃西餐，实在不够味儿，这对于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来说，吃惯了中餐，突然间换了口味，怎么能适应得了呢？不要说李大人了，就是在下居美十余年，每天还是吃太太烧的中国饭菜，那味道不知比所谓的“美餐”好上多少倍了，好就好在“落胃”。

我没有去细考李鸿章在美做了什麼重要事情，只知道他是8月29日凌晨抵达纽约的，后来去过费城，在华盛顿待的时间较长。有一件事还是应该写的，那是事后我在《庚子西狩丛谈》中看到的一段记载，说的是李鸿章在美期间，曾接受美国前总统格兰忒夫人致送格氏遗赠李氏手杖。云：“公自出使回国后，常自持一手杖，顷刻不释，或饮食作字，则置之座侧，爱护如至宝。此手杖亦颇有一段历史，先是公任北洋，有美前总统某君（忘其名）来华游历，公宴之于节署。美总统携杖至，公即接而玩之，反覆爱弄不忍释。美总统似知其意，由翻译传语曰：‘中堂爱此杖耶？’公曰：‘然，此杖实可喜。’总统曰：‘中堂既爱此，予

本当举以奉赠，惟此杖为余卸任时，全国绅商各界公制见送，作一番纪念者。此出国民公意，予不便私以授人。俟予回国后，将此事宣布大众，如众皆赞可，予随后即当奉寄致赠，用副中堂雅意。’公委曲谢之，后来亦遂不相闻。此次公游历至美，闻某前总统已故，其夫人尚在，独居某处，公特以旧谊前往访问。夫人甚喜，即日为公设宴，招致绅商领袖百余人列席相陪。席散后，夫人即把杖立台上，当众宣告，谓：此杖承诸君或其先德，公送先夫之纪念物，先夫后来旅游中国，即携此同行。当时李先生与先夫交契，见而喜爱，先夫以出于诸君公送，未便即时转赠，拟征求诸君同意，再行邮寄。未及举办，先夫旋即去世，曾以此事告余，嘱成其意，辗转延搁，已隔多年。今幸李先生来此，余敬承先夫遗嘱，请命于诸君，是否赞同此举，俾得为先夫完此夙愿。于是满堂宾客一致欢呼拍手，夫人遂当众以双手举杖奉公。公以此更为得意，故爱之独挚。此杖首间镶有巨钻，大逾拇指，旁更以小钻石环之，周围如一钱，晶光璀璨，闪闪耀人目。通体装饰，皆极美丽精致，殊不识是何质干，闻亦一种绝贵重之材料。据言以价格论，至少当值十数万金。其实公当时不过视同玩物，殊未辨其价值轻重。而美总统如此慷慨，亦属难得。”手杖当然是贵重的，可如今则不知去向，似也不见他人再写过有关手杖之线索。

我请李大使看的第二件“宝贝”是《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1937-1942)，此书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1942年7月延安铅印，土纸本一册。始《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



1942年延安铅印本《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及杨尚昆签名

共收抗战以来中共重要文件六十六篇，其中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决定、声明，指示，宣言、通电计三十六篇。又毛泽东的演说、谈话、讲演提纲、文章等十三篇，其中《参政员毛泽东等为华北视察团事致国民参政会电》，为《毛泽东著作年表》失收。

这本书今天当然也是难得的了，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的《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仅著录一部。但我拿给李大使看，还因为书里有杨尚昆的签名（红墨水）。其时杨为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1年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这时，他也是中央政策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1942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泽东为主任。中央学习组的四十八位成员分成九个小组，杨尚昆和任弼时、王若飞、李富春等六人为第三小组。杨时年四十二岁。

此本无序跋，无版权页，当为发给党内高级干部和高级指挥员的内部读物。有杨尚昆的签名，说明此书当年他曾读过。事实上，翻开书本，在目录页有许多红笔、蓝笔做的记号，也应当是杨所为。李大使细细翻了这本书，说：杨尚昆的书怎么也会到“哈佛燕京”来了？是呀，“燕京”的一些珍贵革命文献，如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文件、标语、宣传品等，多是美国作家斯诺在延安时收集的。但这本《重要文件汇集》好像不是斯诺得自杨尚昆，而是1947年1月从美国胡佛图书馆转来的。杨后来作为国家领导人，当然有很多的批示和指示，李大使是相当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应该对杨是很熟悉的，但杨在早年战争年代读过的书，却是李不知道的。杨在1988年八十一岁时任国家主席，1998年九十一岁时逝世。

我请李大使看的第三件“宝贝”是《红军长征记》，上下两册。打

开函套，封面上映入眼帘的不仅仅是书名，而且还有朱德的毛笔签名。李大使一见，就说“哟，朱老总”，似乎特别亲切。是啊，老总是红军的总司令，后来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不过不管他官多大，他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小时候念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朱德的扁担》，大约囊括了两三代人的童时记忆，读书的孩子没有人不知道这位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卓越创建者的。十五年前，我在书库的一角发现了《红军长征记》，我预感到这是一本难得的书。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图书馆工作，又是司特藏之职，经眼的善本书、珍本书，包括各种各样的名人书札、签名本实在很多，但朱老总的亲笔签名本，却是第一次见，它一下子就把朱老总那慈祥宽厚的形象映显在我面前了。

《长征记》是1942年的延安出版物，缘起和编辑过程不在这里说了。李大使看了这本书的目录页，许多著名的重要将领都有文章，后来的中将、上将、大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赫然在列。李大使时而读出一些人名，大约是他所熟悉的人。

我曾读过其中的一些篇章，是当回忆录读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也读了不少回忆录，包括《红旗飘飘》，受到不少革命教育。但几十年后再读《长征记》，却实在为之感动。回忆录贵在真实，如今有的回忆录，可能是作者为了追求记述所发生事件的完整或结果的完美，多方引用他人的回忆，甚或对立方数据，有的则是安排创作人员进行人为的文学加工，并非自己当年的实际记录，所以在真实性上有一定折扣。又因为不少人的回忆录是在进入老年后写的，或找人捉刀，时间愈久，记忆愈模糊，许多亲历的事情，或许在时间上具体的印象都不清楚了。正因为如此，这一本由众多将士参加创作的《长征记》，是记述这一伟大事件



1942年延安版《红军长征记》，上有朱德签名

最具真实性文字的结集，当比十多年后甚至几十年后的回忆录更有权威性。

几年前，我想到应该将此书写成文章予以披露。后来，陕西的《收藏》杂志发表了拙作，继而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又在第一版头条的位置予以转载报导。这应该是《长征记》出版后几十年来第一次揭示该书的存世，而且是朱老总的签名本。现在好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去年将此书影印出版，我为之写了前言。书化身数千，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长征不是简单的一件事、一群人、一条路，也不仅仅是一幅壮丽的画卷，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

李大使已经在我的办公室坐了二十五分钟了，他的兴趣很浓，但是陪同的人员早就催他了，毕竟后面还有“节目”呢。李大使离开了，我想他到“燕京”转转，还是满意而归的。（给李大使看的“宝贝”还有几种，也很有意思，但我不想着笔写了。）

2007/11/14



书口彩绘

您见过善本书吗？或许您见过很多，也可能还收藏了不少，但是书口上有彩绘的善本书，您有收藏吗？或您见过吗？如没有，那我就给您唠叨几句。

彩绘者，彩色绘画也。书口彩绘的画，是使用颜色在书口上所绘的画，当书本平放时，您是看不出图画的，只有将书稍微弯曲时才会浮现。书口上有彩绘的善本书非常罕见，我见到的也仅有两部而已，一部是《世说新语》八卷，为明万历间凌濛初刻四色套印本，四册。一部是《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三十卷，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于承祖刻崇祯九年（1636）于道南重修本，七册。这两部书都藏在哈佛燕京图书馆。

《世说新语》，四册，书口上的彩绘分别为仇十洲的《秋江待渡图》、王绂的《秋江泛艇图》、唐寅的《山路松声图》、文徵明的《雪景图》。另一部《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七册，则没有标出取材于哪七位画家的画卷，但其书口所绘与《世说新语》彩绘之人物、小舟、树木、山水具异曲同工之妙。审其笔墨，或为一人所为。这两部书书口上所绘设色层



《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书口彩绘

宣和
博古

PDG



蘇州
蘇州
蘇州

PDG

次分明，一笔不苟，极为工致。

据傅熹年先生云，以上摹作的原本大半藏故宫博物院，当是近代故宫开放诸画后，后人据以临摹。按，傅先生所说极是。这类书口彩绘，实际上是民国间北京琉璃厂某书肆雇擅工笔画者为之，以故宫博物院影印的古画为底本，全景缩小临摹，极为逼真，拿在手里，放远一点看，还真有立体的感觉。此为书肆老板想出的要在书口上搞点上海人说的“花露水”，用广东话说就是“搞点新意思”，来投外国人所好，可以多卖点钱，故大陆本土颇为稀见。我没有细查这两部书是何年由北平哪家书肆卖给“燕京”的，不然的话大致上就可知道是谁家制作的了。

我曾读过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里面有一节是《故都访古籍》，提及富晋书社的王掌柜时说，那时琉璃厂的一些店铺，曾找相熟的画家摹仿古画，可以摹得一模一样，连皇帝的印和藏家的印，都由专人制作。王还说，这些摹仿假画的老先生们，已逐渐凋谢，然而假字假画也是很贵的。目今还有一位老先生能仿写乾隆御笔，请他题一首诗，或是盖一个“御览之宝”之类的玺印，要价不便宜。所以说，琉璃厂书估要找一位相熟的绘画高手在一些善本古籍书口上临摹几幅名人画作，当是不难的事。

《世说新语》的凌刻四色套印本流传很多，从版本上来说并不稀罕，因为中国大陆各图书馆所藏即有四十六部之多，还不包括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即使是“燕京”馆，也还有复本二部。《重修宣和博古图录》的万历刻崇祯重修本，中国大陆所藏有四十三部，台北“国家图书馆”也有二部。《世说新语》套印本和《博古图录》的明刻本虽传世甚多，但“燕京”馆这两部有近代以来之彩绘摹于书口，则较他馆

藏本多了一层价值。

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过去，“哈佛燕京”的老馆长吴文津先生陪同来参观访问的较重要的人物时，总是让我拿几部书来“献宝”，每次都少不了这部书口彩绘本《世说新语》。当然，观看者无不赞叹，以为“开眼”，长见识。对于外国人来说，那自然更是惊奇的目光加上闪光灯，还有就是大拇指竖起来了。这大概就是应了上面的那句老话“看热闹”。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香港的名记者、作家罗孚先生来“燕京”访问，我也给他看了这部《世说新语》，他特感兴趣。他是博学多才的学者，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这样的书他也说实在是难得。后来他回到香港，在《明报》上写连载，将此书叙述了一番，当然用的是新闻记者的手法。

顺便说一句，前年我在芝加哥开会，看到刚出版的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前面的书影中有两种也有书口彩绘，一为《三才图会》（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清黄晟重修本，存卷一至四，一册），一为《甌甌洞稿》（明万历刻本，存卷四十至四十五，一册），但是《图会》书志中居然说彩绘“约画于康熙间，时西洋风气影响所及，于此图约略可见也”，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书口上有彩绘，只能是民国年间所为，而绝不可能在此之前。又《甌甌》的彩绘同“燕京”的二种，似出自一人之手。况且“康熙间”的依据不知道是怎么看出来的。为此我还请艾思仁先生（美籍瑞典人，美国中国古籍善本数据库主持人）去看那张书影。他一看就说，不可能，著录错了。

国内的各大图书馆似都没有人藏书口彩绘的善本书，我在上海图书馆时，曾在1961至1965年间，参与编制《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当时翻看了一万四千种善本书，以后又看了不少，但都没见过有书口彩绘的书，直到1986年4月才在“燕京”见到。1992年，我将这两部有书口彩绘的书，写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去了。七八年前，我还曾询问过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冀淑英先生和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沈燮元先生，他们两位都是资深研究馆员，也说没有见过。书口彩绘的书，只是“以稀为贵”，好玩好看而已。

实际上，书口彩绘是外国最早有的，我所知道现存最早的是1250年（中国的南宋淳祐十年）法国人用法文抄的《诗篇》。美国著名的旧书收藏家爱德华·纽顿，他的藏书中有几部装帧得很不错的本子，其中他最视若枕秘的一本，是用一整块直纹深红色摩洛哥羊皮装帧的《葛雷先生诗集》。那本书上有纽顿生平见过的最精致的书口彩绘，款款呈现《挽歌》中永垂不朽的场景——史多克·波奇斯教堂的墓园。我相信，那一定是绝佳的书口彩绘了。

2007/10/14



谈谈摇篮本

——答记者问

王雪霞(以下简称王):沈先生(以下简称沈),继上次采访您关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革命文献后,又过了一年,这次又要聊聊摇篮本了。

王:什么是摇篮本?

沈:摇篮本(Incunabula),这个词原来是拉丁文,原意是摇篮期(Cradles),故又称此时期的出版物为摇篮本。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欧洲的图书流通,都是依靠抄写来进行,除修道院僧侣抄写外,或读者自抄,或向抄书铺订购。而古氏的活字印刷术,借助工具印刷图书,借以取代缓慢的人工抄写。1639年,德国教士马林可柔(Bernard von Mallinckrodt)率先使用此词,来泛指15世纪中叶印刷术首创时期至该世纪结束五十年间之欧洲活字印刷的出版物。这个说法后来为世人所接受,并沿袭至今。15世纪末,欧洲出版摇篮本最多的地区,应该是威尼斯、

巴黎、罗马、科隆、史特拉斯堡，而印坊最多以及出版数量遥遥领先其他地方者，又非威尼斯莫属，所以将威尼斯冠之为摇篮本之都，也不为过。

王：谈到摇篮本，必定会提及古腾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作些简单介绍？

沈：欧洲活字印刷系德国人古腾堡 (Johann Gutenberg) 约于 1450 年发明，他是德国莱茵河畔梅因斯 (Mainz) 人，生于 1395 年左右，卒于 1468 年，年七十余。他是当地贵族之后，其父为当地大主教的金匠，并与铸币厂关系密切。世人对古腾堡的早年所知甚少，但从其家族的状况和财富来看，古腾堡应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冶金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当是从其父处学得，此种技术可视为古氏发明印刷术之重要基础。

王：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有什么意义吗？

沈：他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印刷术的发展，并于 1464 年传入意大利，以后相继传入荷兰、瑞士、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直到 1476 年才传入英国，1491 年又传到东欧的波兰。至 15 世纪末，欧洲从事印刷业的机构，已达二百多家，从业人员达到一千人左右。不仅推动了当时已蓬勃发展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对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古腾堡的活字印出的第一部印刷品是四十二行本的《圣经》，习称古腾堡《圣经》，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沈：古腾堡《圣经》是以拉丁文印行的，采用歌德体大号活字，每

页两栏，各四十二行，书中并未注明出版于何时、何地、何人印行，也没有书名页。整本书厚达一千四百八十二页，从头到尾没有标明页码。据学者考证，这部《圣经》最初印了一百五十部，其中三十部印于羊皮纸上，一百二十部印在其他纸上。截止到2000年的普查，全世界现存四十八部，其中只有二十一部是全帙，这些本子以德国、英国、美国所藏最多。两种本子，至于哪一种印制时间较早，目前并无定论，但一般认为纸本印制在先。

王：如今古腾堡《圣经》的价格如何？

沈：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我先举一个例子吧。去年年底时，美国放映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后天》，内容是说气象专家的儿子和一群民众因躲避大风雪灾难，而进入纽约公共图书馆，并度过了生平最难忘的几天的故事。其中有一个片段，描述了图书馆馆长在最困难的时候，都要守着该馆的镇馆之宝——古腾堡《圣经》，因为这位馆长认为古腾堡《圣经》代表了人类的知识因印刷术的发明而得到普及，象征着文明的传布。直升飞机来救他们时，他就抱着这本《圣经》上机，而绝不让它受到损害。据我查到的材料，1926年，罗森巴在一场拍卖会上以美金十万六千元购得一部，现此本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1978年，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会上，拍出了一部原藏纽约高等神学院的全帙，价格为美金二千二百万元。同年，美国德州大学人文中心，以美金二千四百万元也购得一部。1987年，美国加州的一个纪念图书馆所藏残本出现在克里斯蒂拍卖会上，被人用美金四百九十万元标得。目前，不管是全帙抑或是残本，几乎已不在市场上流通。

王：那么摇篮本的印刷有什么特点呢？

沈：摇篮本的字体、标点符号、版式以及纸张等方面，均和后来的印刷物有所不同，据此可大致考证其印刷年代或作为鉴定的根据。摇篮本的形制与面貌，是以当时的写本为宗，力求无二致，期能吸引习于写本之读者购买，故最初期的印本自活字字体、彩饰图绘以及版式装订等，均与传统写本相似，稍后的印本又发展出其他各种面貌。以字体来说，有二种，一是哥德式，字形直竖少圆柔，棱角突显，下脚曲钩而上端带刺或棒状，较难辨识；一是罗马式，1465年首见使用于罗马，字形较哥德式易于辨认，以后又经重新设计，才广泛为各地印坊复制采用。摇篮本有很多都有插图，1470年以前出版者，多线条简单，人物也拙朴。后来者则版画技巧及印刷技术越来越精，如1493年出版的《纽伦堡纪事录》，有六百四十五幅插图。至于装订形式，初期是先缝线成册，外加木板，覆以皮面，通过特殊手段在皮面上饰以人物花纹图案，考究者镶以包角，或饰以珠宝，添加搭扣，则成华丽之本。1480年后，因书籍需要骤增，则趋向于轻便经济，而图案之装饰也改为铜板压烫，以省工时。

王：目前流传的摇篮本还有多少？

沈：15世纪欧洲出版物的确实数字谁也说不准，据专家估计，大约总数在三万五千到四万种，包括图书、小册子、传单等。大约17世纪中叶，欧洲有些藏书家开始收藏摇篮本，18世纪末在英国达到高潮。现存摇篮本总数约在三万五千种以上（不包括活页文献、传单等），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均在一万种以上。

王：您是否了解美国及国内收藏的摇篮本情况？

沈：据报导，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的摇篮本不少，也有古腾堡《圣经》。而哈佛大学里有一个贺腾珍本图书馆(Houghton Rare Book Library)，那里的收藏有许多是难得一见的孤本，该馆有属于摇篮本的出版物两千余册，而古腾堡《圣经》也藏有二部，是1454年的版本。至于中国国内的收藏，我相信不多，私人所藏摇篮本更鲜闻其事。即以上海图书馆来说，它的馆藏外文善本有一千八百余册，但都是1515年至1800年期间的欧洲出版物，均藏于徐家汇藏书楼，并没有摇篮本入藏。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北堂书库情况我不清楚，但即使有，也一定不多。

王：关于摇篮本，有什么目录可以检索？

沈：最早出现的摇篮时期出版物的目录，是在18世纪，由潘则尔(Georg Wolfgang Panzer)所编的《活字印刷术发明编年史》，共五册。此目录之排列方式首依印刷者，其下为出版物之名称，并按出版年先后次序排列。1904年，在德国柏林开始调查并编制的《摇篮时期出版物总目》，收录了四万种以上可考的摇篮本。如以当时每种平均印刷五百册(件)来计算，则15世纪的出版品数量约在两千万册(件)左右。这些欧洲印刷的古本至今尚存多少，无法确知。据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调查，美国有七百多个团体与个人收藏了这些古本，总计有四万八千多册(件)。

王：谢谢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沈：不用谢。实际上，活字印刷早在中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

即由平民毕昇创制，印制方法记载在沈括的《梦溪笔谈·技艺门》中。古腾堡在德国发明的铅合金活字印刷术，晚于中国四百年。所以一想到四大发明，中国人确是应该为之骄傲的。



我和《善本书影》

我的办公室有两排书架，都是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的参考书及工具书，有中国（含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善本书影几十种，其中最薄而又最不起眼的是一本上海图书馆编的《善本书影》。它不像其他书影一样装潢考究、彩色印刷，大开本煞有介事地摆在书架上，但我却对它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为了说清来龙去脉，还得话说从头。

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已在病重期间，对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仍很关切，作出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重要指示。1978年3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南京召开会议，传达周总理指示，研究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工作步骤，制订了书目的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及分类表等。

1978年11月上旬，上海图书馆古籍组为配合是月中旬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在顾廷龙先生的提议、指导下，编辑了《善本书影》。所谓善本书影，顾名思义，是从一些古籍善本中，选取一至二页显示书的版式和部分内容的书影而编成

的印刷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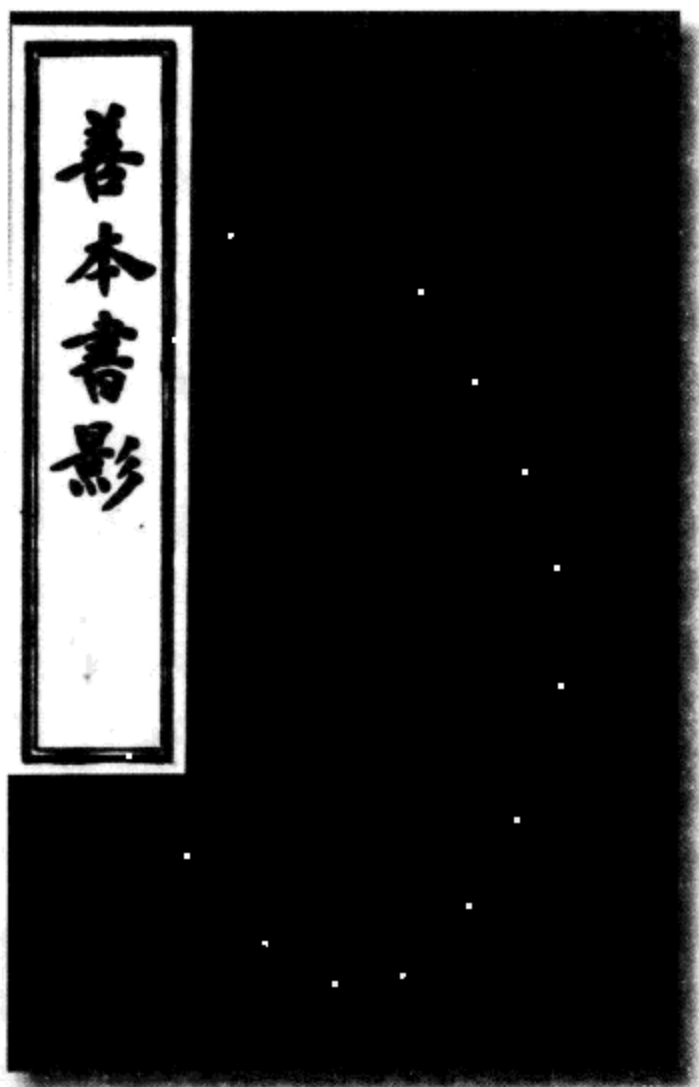
这本《书影》自筹划、联络、选目、撰写简说、刻写蜡纸，一直到上海古籍书店复印成书，总共用了一个星期。参与的人也仅有顾廷龙、潘景郑、任光亮、林星垣诸先生和我。顾先生是出谋划策的领导者，他和潘景郑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编有《明代版本图录》，所以有经验。潘先生和我拟定目录，并撰写简说。任光亮负责联络出版，林星垣先生则刻写蜡纸。

《书影》的编辑，考虑到时间的迫切，故只选了三十种，计有宋刻本六种、元刻本四种、明刻本四种、清刻本四种、明抄本四种、名家校本四种、稿本四种，版本的类别都略有照顾。当时，上海图书馆藏善本书一万六千部左右，仅宋元本就达八百余部，另明刻本七千部、清刻本三千部、稿本一千七百部、抄本二千五百部，所以编《书影》时，选什么样的书，书品如何，有无代表性，都成了关键。我记得，这件事一天就落实下来了。接着就是写说明，也就是两天的工夫而已。我大约写了三分之二，因为潘先生是半天工作，那时老先生已是七十三岁了。我写的初稿由顾、潘两先生改定后，发下去请林先生刻写。顾先生其时七十五岁，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主编，而潘先生则是编委会的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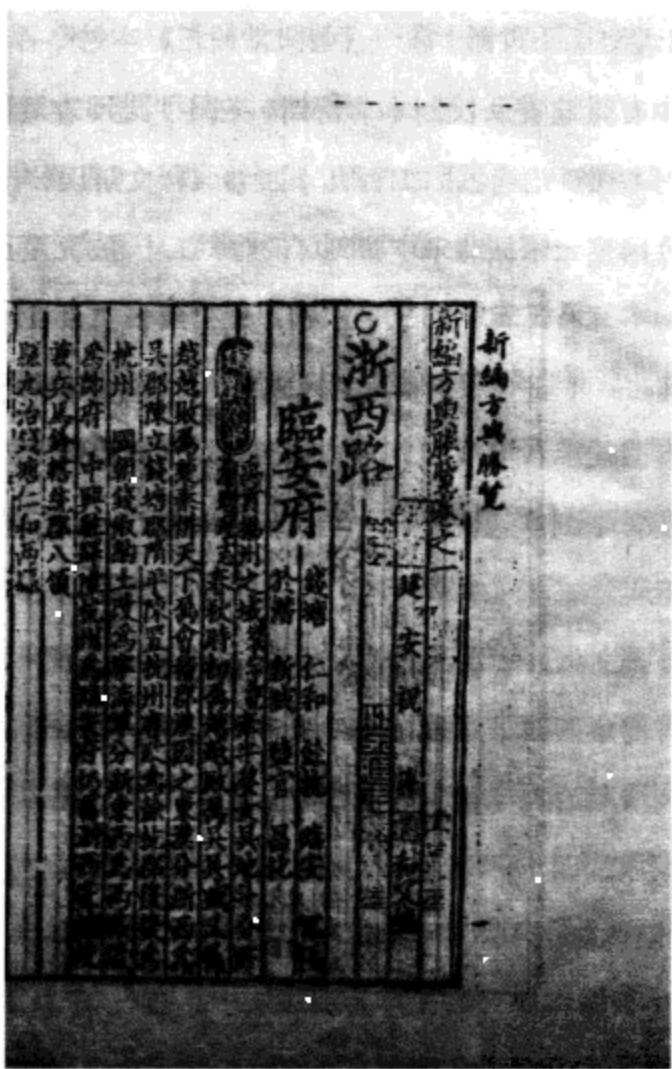
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很艰苦，计算机、复印机、数码相机等先进的科技设备，听都没听说过。而上海古籍书店为了业务的发展，专门买了一台国产的静电扫描机，可以将稀见古籍逐叶扫描成书。我们听说后，认为很不错，才去联系合作出版《书影》的。

由于《书影》较难得到，所以我把所收的版本开列如下，以供参考。

宋本书中有宋咸淳三年(1267)吴坚、刘震孙福建刻本《新编方輿胜



1978年上海古籍书店印《善本书影》



宋咸淳三年(1267)福建刻本《新編方輿勝覽》书影

览》七十卷、宋开禧元年(1205)赵不谏浚仪重刻本《金石录》三十卷(存卷十一至二十)、宋浙江刻本《唐鉴》十二卷、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洸四川临邛刻本《元包经传》五卷、宋乾道二年(1166)浙江刻本《韵语阳秋》二十卷。

元刻本中有元建安余氏刻本《诗缉》三十六卷(存卷一至八)、元至元兴文署刻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释文辩误》十二卷、元大德七年(1303)河南云谦据北宋本覆刻《说苑》二十卷、元至正六年(1346)嘉兴路儒学刻本《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元福建书林云坡家塾刻本《类编层澜文选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

明刻本有明景泰六年(1455)重刻本《四时气候集解》四卷、明成化十年(1474)汤鲁宝刻本《使规》一卷《使缅附录》一卷、明万历十八年(1590)金陵胡承龙刻本《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明成化十一年(1475)项璠刻本《存复斋文集》十卷《附录》一卷。

清刻本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扬州诗局刻本《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三百四卷、清顺治六年(1649)驯雉堂刻本《(顺治)长兴县志》十卷《补遗》一卷、清康熙四十年(1701)宝翰楼刻本《忧患集偶钞》不分卷《子遗录》一卷、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放鸭亭小稿》一卷《环溪词》一卷。

抄本有明无锡姚氏茶梦斋抄本《续高士传》十卷、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无锡秦氏雁里草堂抄本《铁围山丛谈》六卷(清钱谦益校)、明嘉靖十四年(1535)常熟杨氏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二卷、明会稽钮氏世学楼抄本《蓉塘诗话》一卷。

批校本有清浙江重刻武英殿聚珍本《傅子》一卷《附录》一卷(清

卢文弨校)、清歙县鲍氏知不足斋抄本《柴氏四隐集》二卷《续集》一卷(清鲍廷博以朱墨蓝三色笔手校并补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胡申之南益堂刻本《唐音戊签》二百一卷《馀问》六十四卷目录三卷(清何焯校)、清钱唐吴氏绣谷亭抄本《玉照堂词钞》一卷(清黄丕烈校)。

稿本有清钱大昕撰手稿本《演易》一卷(王国维跋)、清顾祖禹撰稿本《读史方輿纪要》一百三十卷、清焦循撰手稿本《里堂书跋》二卷、明钱穀辑手稿本《吴都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一卷(残)。

实际上,编辑《书影》的目的,可见此书之后记:“通过实践,我们感到对于初次参加编目工作的同志,在版本著录方面最好能提供实例,参证对比,有所借鉴。为此,从我馆藏书中选出宋、元、明、清刻本和抄、校、稿本共三十种,略具简说,汇编书影,以应急需。”“以应急需”这句话,是指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下,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和编辑工作已迅速开展,但有不少参与者过去没有和古籍版本打过交道,不熟悉古籍版本的鉴定,所以才会编辑此《书影》。

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11月12日下午,刚印好的《书影》就由上海古籍书店的人专门送至上海图书馆,当时拿在手上还真飘有一股油墨的香味呢。而当晚,这批《书影》就由津与任光亮带上开往四川成都的列车,并于11月16日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领导小组会议开始前售卖。参加会议的多为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和重要大专院校图书馆的负责人或具体工作人员,他们几乎都买了《书影》,有的买了两本或更多。

这大约是自有善本书影以来,出版时间最短的一部了。1978年,粉碎“四人帮”才两年,人们欢欣鼓舞,工作热情高涨,这促成了《书影》

的迅速出版。《书影》线装一册，前有目录及简说，书名为顾廷龙先生拟定，书签也为顾先生所书。每册定价二元八角。由于是内部出版物，印的不多，所以外面基本上没有流传，今天要再找到一本，已是不容易的事了。



《史记》版本鉴定的故事

很想把自己四十多年来经眼古籍善本中一些有趣的事记下来，尤其是书估的作伪，或许对后人有点用处。我是想到什么就先写什么，也没有什么顺序，待积得多了，再作整理。

大约是1973年夏天，我在上海图书馆接待了来自福建某大学图书馆的两位干部，其中一位是军宣队的。他们带来一部书，想请上海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的专家鉴定一下是否宋代的版本。打开旅行包里的包袱，原来是一部《史记》，书中有“开山第一家藏书画印”、“脱脱”、“廉夫”、“王伟”、“景濂”、“鄞姚安道师德静学斋”等名人之印。据说是陈宝琛的旧藏，是当年陈老夫子归隐闽中时从宫中带回家乡的。

我先将书呈请顾师廷龙先生、潘师景郑先生审核。二位先生看了后没有表态，而是不动声色地让我先查查馆藏有无明王延喆翻刻的《史记》。我一查，馆藏有好几部，但都因“备战”的原因，已送往小三线保存。于是顾师又嘱我打电话询问上海古籍书店有无此书，如有就借用半天。

次日书取来后，顾师即将建藏本与沪藏本放在一起比对，然后告诉

我说：你看是否一块版子。我一看，两书果然相同，连断版都一样，惟一不同的是，沪藏本上有一块牌记，而建藏本上却被人做了手脚，剝去了牌记。如此，真相也就大白了。原来建藏本是明王延喆刻本，是据宋黄善夫刻本重新翻的本子，字体、讳字都一样，书估又在此翻刻本上钤上了伪造的元明人印记，为的就是把明本当宋本卖，好赚一把“银子”。当时，我又让刚到古籍组工作的几位年青同事都看看，因为这种实例很能说明鉴定的问题。

《史记》的版本很多，最著名的本子当然是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可惜国内所存没有全帙，一百三十卷的书，只有北京国家图书馆存六十九卷、上海图书馆存一卷而已。而日本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是全帙，九十册，于1966年被“日本文化财审议委员会”确认为日本国宝。另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二册残本，是潘宗周的旧藏，这可见《宝礼堂宋本书录》。1966年，台北艺文印书馆设法得到黄善夫本的全帙，予以影印，方得以化身千百，供学者使用。

明嘉靖四年至六年(1525—1527)王延喆刻的本子，是据黄善夫本翻刻，摹雕至精，初印者楮墨尤明湛可喜，当年傅增湘求之十余年始得，也是很不容易的事。王本目录页后有“震泽王氏刻梓”篆文牌记，在集解序后有隶书“王氏刻于恩褒四世之堂”牌记，而索隐序后又刻：“延喆不敏，尝闻于先文恪公曰：《国语》、《左传》，经之翼也。迁、班书，史之良也。今吴中刻《左传》，郢中刻《国语》，闽中刻《汉书》，而《史记》尚未板行。延喆因取旧藏宋刊《史记》，重加校讎，翻刻于家塾，与三书并行于世。始嘉靖乙酉腊月，迄于丁亥之三月，林屋山人王延喆识于七十二峰深处。”

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卷二十二有一则关于王刻《史记》的记载，说：“一日，有持宋槧《史记》求鬻者，索价三百金。延喆给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值。乃鸠集善工，就宋版摹刻，甫一月而毕工。其人如期至索值，故给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既而复来曰：此亦宋槧，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数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有震泽王氏摹刻印，即此本矣。”渔洋所说或有此事，但时间则非是。因为据王刻牌记，此本刻印费了十六个月始竣工，而渔洋说一个月则完，当有误。

也正是由于此王延喆本覆刻精善，书估往往去其牌记以充宋刻。清钱泰吉的《甘泉乡人稿》有跋王本《史记》，云：“世传《史记》明刻本，以震泽王氏为最善。余求之有年，所见都无刻书序跋，如此可见王氏雕刊之精，固不下真迹一等，而书贾狡狴作伪，亦层见叠出矣。”傅增湘在故宫图书馆时，曾见《天禄琳琅》著录之宋本《史记》，如嘉定六年（1213）之万卷楼本、秘书省正字张耒校对本，也是取王延喆本改刻牌记。傅先生历年阅肆所见，有王刻牌记存者甚少，大约都被书估做过手脚了。而昌彼得先生曾见王本不下十部，仅在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的五部之中就见到二部尚保存王氏刻书本记及题识，其他的都有书估作伪痕迹。

王延喆刻本，流传还比较多，国内所存大约有四十部左右，至于台湾地区的“国家图书馆”，有五部。福建某馆之本，确实是清宫里的旧藏，这是见于《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的。《书目》后编卷四宋版史部有《史记》四函二十四册，有云：“是书真南宋本，多钤元及明初人印章，如元之绰克托、杨维贞，明之宋濂是也。”说的就是此本。丁丙曾藏王刻

《史记》二部，尝云：王本牌记，天禄琳琅所藏多为书估割去，伪为宋本。可见，清宫中的这部书估造假的书，早就有人道破了。而过了若干年后，竟还是有人会相信《天禄琳琅》此本的著录，把明嘉靖间王延喆翻宋本当成了真宋本。

附带说一句，《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著录的善本书，很多都是有问题的。后编遗存的善本，曾经故宫张允亮先生编成《天禄琳琅现存书目》一卷，印入1934年出版的《故宫善本书目》中。据张先生的考证，遗存的原作宋本的三十四部中，有二十三部贗本；原作元刻本的六十三部中，竟有四十三部贗本，大抵是将明翻宋本、明翻元本而误判原刻。您看，这比例有多大。更为奇怪的是，有二部清康熙年间仿宋刻本也被审定为宋本，一是《三礼图》（清康熙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一是《班马字类》（马曰琯丛书楼刻本）。所以说版本鉴定不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书估作伪的原因。

脱脱、杨维禎、宋濂都是元末明初的名人，脱脱乃是元至正间的贤相，辽金元三史的总裁官。杨维禎是《铁崖古乐府》的作者，元泰定间的进士，诗名擅一时。至于宋濂，那可是博极群书、孜孜圣学的江南儒学提举，主修《元史》的人物。书估借用名人刻制假印钤于书上，只是小技而已，多了去了，并不稀奇，无非是多骗几个钱罢了。可怜的是，打着“专家”旗号者，却是难以判断。当然，版本鉴定是一门学问，并非几天几月几年就可以掌握的，所以吃一堑长一智，慢慢学吧。

为了一部书而大动干戈，出差京沪，这在当时甚或是现在都是“大事”。那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福建某馆发现了“宋本”《史记》，有关人员想把这个发现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邀功请赏。他们在

来沪之前，就已写好了专文，油印成好几页，介绍如何发现此书、历史价值、考证结果等等，还送了我两份。结果没想到，在上海就受到了挫折，原先的鉴定结果被全部否定，连面子都没有了。出师不利也影响了他们的北上情绪，索性打道回府了。

2007/10/27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指误

抽暇翻阅《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此书为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香港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有图版三十四页。该馆为港大图书馆六所专科分馆之一，以皮藏中、日文书籍为主，善本书不算多，计七百零四种，一万一千四百余册。

该馆收藏善本，始自1932年建馆初期，历年从未间断。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又入藏了罗原觉先生所藏古书一批。这批书我曾经眼。那是1986年初，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研究，年底，即由杨振宁教授介绍，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的安排下，自纽约飞港，鉴定罗先生所藏古书。这批书原来中大图书馆想买下，但因价钱谈不拢而告吹，后来罗氏后人又转售港大冯平山图书馆了。

打开《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先浏览正文前的图版，发现有两种版本文字说明有讹误，索性再看正文书录，版本著录竟然大误。兹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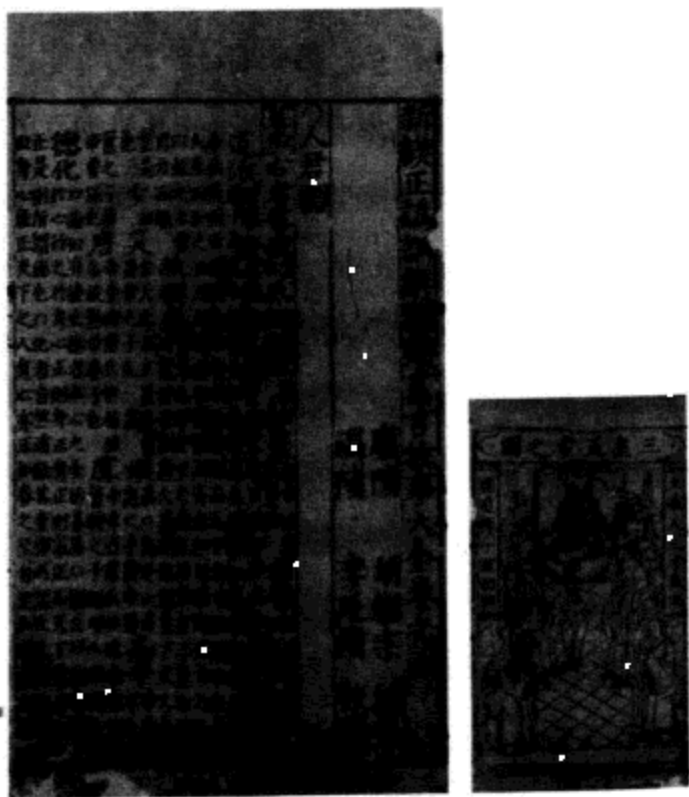
图十七为《新锲正讹训解标类书言故事大全》，正文在一百六十四

页，宋胡继宗編集，明李廷机校释。作明天顺间刻本。四册。半叶十二行二十六字。按，此书为明代类书，人伦物类、天文地理、文章技艺无所不包。也算是传统中医所谓的“观风望气”吧，初一看，这张图版绝对到不了“天顺”，天顺（1457—1464）在正统、景泰之后，成化、弘治之前，共八年，刻书不多，且多黑口，一眼望去，书影没有天顺大哥的气息，面孔倒像万历小弟弟。再一看，不对了。为什么？图版上题“庐陵胡继宗編集 温陵李廷机校释”。呵，李廷机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是入参机务、官拜礼部尚书的人物。李中进士的时间和天顺八年（1464）之间，相差一百一十九年。这天顺间，李廷机的曾祖父可能还没有出生呢，怎么还会有李廷机呢？所以，此书的版本只能是万历间或万历后的版本，而决不可能在此之前。

此本实为明万历余云波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也藏一部，和冯平山馆本同版，也有扉叶，刻“新刻标类金钥书言故事大全。古人事类，藏于二酉，学士家白首穷之，未见豹斑。是犹欲窥金谷名园，不得金钥而入，终为门外汉耳。搜古穷今，博采广茹，欲镜古今得失之原，是书殆入门之金钥也，遂以名篇。余云波梓”。1992年，我曾写过书志，可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四二二三页。最奇怪的是，写书志者曾参考过《燕京书志》，但不知为什么又别出心裁，将版本项改成了“明天顺间刻本”。

原来此书前有天顺八年（1464）陈玩直序，所以写者既不看纸张、字体，也不看其他鉴定的辅助条件，就以序来判断出版年，序是哪年写的，就是哪年刻的，如这样子去鉴定版本，十有八九会错。这部书本传世不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也未著录。

全書乃萬曆卅五年
刻本
卷之八
天
後
刻
本
呢
：
此
左
為
明
萬
曆
卅
五
年
刻
本
1575
1619



圖十七 新撰正論訓解標類書言故事大全
四冊，宋胡鳳字編纂，明李廷機校釋，明天順甲刻本，十二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間（19.3
×11.8），四周單邊或雙邊，白口，雙黑魚尾，亦有單黑魚尾。

《新撰正論訓解標類書言故事大全》實為明萬曆余云波刻本

第二种为《五代史辑注》，书影为图二十七。

初初看到书影，以及书影上的文字说明“清抄本”，但又写上“钤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书影上的字体看，作“清抄本”没错，但“虞山钱曾遵王藏书”的钤印似不真。再看四十九页的正文，《五代史辑注》，清朱彝尊辑。清初抄本。残存九册。为《晋本纪》第九至《五代史》七十二《四夷附录》止。每卷前题“徐无党注 秀水朱彝尊辑注 汾阳田畿校”。

按，此非清初抄本，应为清抄本。藏书印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吴兴刘氏嘉业堂藏”，钱遵王印实伪。此为后人抄朱彝尊辑注之本，再钤上遵王印。一般来说，有钱氏印，即可视作清初抄本，当然前提是印要真。但钱遵王卒于康熙四十年（1701），而朱彝尊卒于康熙四十八年，比遵王晚。

至于田畿，那就别说了，因为田为乾隆、嘉庆时人。《汾阳县志》卷七科目，乾嘉间贡监之列仕籍者三四十人，其中就有田畿。遵王怎么会有印钤在乾嘉或乾嘉以后的抄本上呢？那显然就是书估伪造遵王的藏书印，将之钤在书上，一般人如眼力稍差者就易上当受骗。

实际上《嘉业堂藏书志》卷二的一九七页即著录此书，书名作《五代史补注》七十五卷，版本作“钞稿本”。这篇书志最后有一句话：“伪印不录。”虽然没有说是什么伪印，但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这方“虞山钱曾遵王藏书”。《藏书志》最初是缪荃孙撰稿的，后来又有吴昌绶、董康续纂，吴、董二人对此没有疑义。

说起遵王的这方“虞山钱曾遵王藏书”，还有几句话可以说说。早在1978年，《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苏兴先生的《〈京本通俗小说〉辨疑》，指出《通俗小说》是出于缪荃孙本人拙劣的伪造。其中的根据之一是：“虞



此本唐抄和年... 曰... 皇... 劉氏嘉堂藏

圖二十七 五代史輯注

九冊·清朱彝尊輯·清抄本·錄有「虞山錢曾述王藏書」、「吳興劉氏嘉堂藏」印。

《五代史輯注》為清抄本，而不是清初抄本

山钱曾遵王藏书”的印章是根本没有的，“可能也是缪荃孙拙劣的伪造”。这方印我曾见过，如上海图书馆藏的《省心杂言》。另外见于周叔弢《自庄严龕善本书目》中著录的《龙龕手鉴》（明影宋抄本）、美国收藏家翁万戈所藏《集韵》（宋刻递修本，今存上海图书馆）。此外，在瞿氏《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上也可寻获“虞山钱曾遵王藏书”这方印记。

所以，《五代史辑注》的版本项应作“清抄本”，而不是“清初抄本”。一个“初”字，是不能随便用的，因为一差就是近百年。

2008/1/11

大刀面前舞关公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列位看官见了这个题目一定会笑。没错，我自己有时也会想起这句话。四十多年前，我有一位同事口才不怎么样，但特喜讲话，而且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用的词还会使听者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事后想想，他的话有毛病。诸如什么“马路警察对过”、“一把锁开把钥匙”、“豆子倒竹筒”、“古巴卡特罗斯（卡斯特罗）总理”之类，上面的“大刀面前舞关公”也是他的名言。以至于有同事说，要为他编一本倒装句辞典。

好了，废话少说。下面的故事是真实的，人物仅二位：“关公”为小贩，“舞大刀”者为某作者。我曾拜读国内某收藏类杂志中的一篇大文，题目是“四库遗珍”，写的是作者曾在旧书摊上意外得到一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事。那是一本没有封皮的旧书，书的第一页由于撕破，尚存有半枚朱红方印，上有“文渊”两个篆字，最后一页有“乾隆御览之宝”的玺印。正文第一页上有“钦定四库全书”字样，并书“武经总要后集卷四”。于是作者写道：“本书的刊印水平，是古代雕版印刷中最好的。”

祖尚仁義次以給養至若本朝踐亂邊防禦侮許謀方
 策咸用節廉且用兵責乎有紀高節制也決勝至于無
 形高權變也六師陳訓四方風土是役刑正可備廟筭
 也又若營陣法制器械名數攻取之共守拒之用並形
 用皆應以訓練考是思辨靈氣則德孤虛惟步占餘行
 之軍中圖一不可命司天監楊惟德等參考舊說附之
 子篇共勘成四十卷內制度一十五卷邊防五卷故事
 十五卷占候五卷曰武經總要大前王用兵蓋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已以殺止殺殺之可也以戰去戰戰之可也且出提金
 鼓付之間事取擊成此可以立功責伐謀而無俸勝善
 統矣而無事勇庶戰識為將之體已尚書工部侍郎參
 知政事丁度總領書局適成編從形于奏請賜賜引
 用古用兵之道有愧博古之能聊以冠篇傳之可久

欽定中華全書
 武經總要前集卷一
 宋 曾公亮等 撰

制度一
 選將 將職
 軍制 料兵
 選鋒 選能

欽定四庫全書

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又曰若不擇將以其國
 與敵也由是言之可不謹諸古者國家雖安必嘗擇將
 擇將之道惟審其才之可用也不以遠而遺不以職而
 棄不以詐而疎不以罪而廢故管仲射鈞齊桓公任之
 以霸孟明三敗秦穆公赦之以勝穰苴後於齊微長起
 用於魯張儀之遊傷樂毅之誅魏孫武之瓦合白起
 之世舊韓信之儒法照布之後謀衛青人奴去病假子
 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謝文以參軍擢石唐

726-237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中的《武經總要》(影印本)

并认定：“我的这册书籍，应该是解放前国民党把《四库全书》劫往台湾前，就已佚散在民间的。令人奇怪的是这本书辗转流徙，竟无人认识。不知怎么落入一无知书贩手里，他把它当作近代版的图书贱卖于我。由于其书破烂，还笑我愚。我也是对那半枚朱红方印及书后的乾隆印鉴发生了兴趣，经过一番查询，才搞清它是几百年前皇家之物。浪里淘金，突兀获宝，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且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积累了些古籍收藏的经验，可谓又一收获也。”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他的经验之谈：小贩无知，作者本人慧眼。

津按，这篇文章大误，作者或许不清楚《四库全书》的七个阁本都是写本，《四库全书》从来就没有刊印过。因此“本书的刊印水平，是古代雕版印刷中最好的”之语，就站不住脚了。又收藏的所谓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本，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据故宫藏本全部影印，以嘉惠学林。数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影印本缩版重印，流传才愈广。

查《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著录有《武经总要》，作“清乾隆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帙三十三册。这册影印的文渊阁本《武经总要》在第三十二册中。作者原先以为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劫往台湾前，就已佚散在民间的看法当为子虚乌有。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另根据文中所写《武经总要》的尺寸，应为小开本，那么作者所见当为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而“珍本初集”的子部兵家类中也仅收了《武经总要》一种。看来，作者从小贩处买到的是“珍本初集”的零帙，而且是零帙中的残本。作者空发了一通“令人奇怪的是这本书辗转流徙，竟无人认识。不知怎么落入一无知书贩手里，

他把它当作近代版的图书贱卖于我。由于其书破烂，还笑我愚”的议论。

作者认为的“无知书贩”却是懂点行的，因为是残缺太甚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石印本子，所以他确实是“把它当作近代版的图书贱卖于”作者了。作者本意是捡了个漏，所以高兴异常，但没想到“竹篮子打水”，空欢喜一场。作者的实践经验又差小贩一截，所以他是在“关公”面前舞了回大刀。不过他若总结下经验，查查书，那倒是真正的又一收获了。

2008/1/5



从一件小事而想起的

这些年来，文物字画拍卖公司一家家地冒出来，一些收藏类杂志中的拍卖广告也是多多，这一行业搞得真是很火。虽然我囊中羞涩，但还是很想去这种拍卖文物字画以及古籍善本的现场凑凑热闹的，只是从未有这种机会。然而拍卖前的预展，我见过几次。一次在美国波士顿，某拍卖公司事前在几份中文报纸上大做广告，为之宣传，我去看了，多是明清乃至近代名人字画等等，展品真假都有，鱼龙混杂。那次展览，正好碰到麻省理工学院的郑洪教授，他是台北中研院的院士，小有收藏，有些藏品还不错，我曾在他家见过。2004年时，我在香港，也去看了两场拍卖公司的字画预展，那次印象很差，因为赝品占的比例太大。展场上有日本及东南亚的买家，他们有小声议论。不过，我从他们的表情看，大约也是不太满意的，至于以后的拍卖结果，那就不得而知了。

前年五月，我在上海探亲休假。妹妹约我同去某大酒店，那里正在举行某拍卖公司的预展。展场上的字画颇有看头，我正在欣赏时，妹妹轻声告诉我，拍卖公司有人想和你见面，你见不见。我说，我不认识，

是什么人？他怎么知道我？妹妹也不清楚。

和我见面的某先生原来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这是我从他的名片上知道的。寒暄之后，他说，您的书我都有，我都看过。问他是什么书，原来是《书城挹翠录》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其他的几本他没买。所以我想，他是对古籍善本有兴趣。

于是我们就善本书聊了起来。我说，贵公司为什么只做字画、钱币、邮票和其他文物，却不作古籍善本呢？他说，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懂行的很难物色到，而且货源也不容易去找，所以条件不成熟，也就以后再说了。由此，谈起了人才的培养和有关的出版物，我说，现在有些善本图录印制装潢都好，但无专业人员把关，所以错误总是存在。我举的例子是，《浙江图书馆馆藏珍品图录》中的第一种版本即错，上海图书馆的《馆藏精选》第一种宋本书影却是抄配的一页。我说，我忘记那部宋本的书名了。谁知他马上说，那部书的书名是《春秋经传集解》。这使我为之一惊。我以为不是细读《馆藏精选》且有心得者，决不会即刻说出书中所摄某书之书名的，他绝非一般人物。

我这个人有好奇心，当晚即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询问他的底细。朋友告诉我，此公也是一位藏书家，较低调，有实力，收藏品不多，但质量高，每遇一善本，即细查各种参考书、工具书。在台北时，为了一书之版本，还会跑到“国家图书馆”特藏组去核查其他善本书，非要弄个明白不可。原来，这真是一位在古籍善本上下功夫的人。

培养训练一位古籍版本方面的专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不少古籍的收藏，那是几代人辛苦搜集而成规模的。图书馆古籍部或历史文献部的工作人员，由于自身的努力，近水楼

台先得月，又时时请教有经验的前辈，勤看多查，版本实践不断增多，生手经过二三十年的训练，也可能会成为专家的。

但我更觉得，图书馆之外的一些民间藏书家，在工作之余，玩玩古籍善本和一些有特色的古籍，也很有意思。这类藏家人不多，但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予以支持，他们肯花较多的钱买自己想要的书。他们的鉴定能力绝不亚于在公家图书馆古籍部门的专业人员，这种能力绝非十年内能以达成，因为这是知识和实践，再加上时间的不断积累。有的藏家甚至还能在自家的藏品中选一些做研究，并有研究成果出版，这就比一般的玩家高一个层次了。可以想象，这种藏家再过十年、二十年，或就成为这个领域中几位领军人物中的一个了。

我以为，这种藏家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很强的自我的迫切感，他们不仅肯花大钱，而且肯花大量的时间扑在上面，从不吝啬。我有一位朋友，凡古籍版本的拍卖会，他必会参与，白天看书做笔记，晚上则细查。哪天不摸书，吃饭都不香，真是“迷”了。所以这种实践最能加快人的成才。1978年，我陪顾师廷龙先生去杭州看书，浙江图书馆的副馆长邱力臣曾和我讨论古籍版本人才的培养问题，邱过去曾在四明山上打游击，后在浙图分管历史文献部。记得当时我说了三个条件，一是自己要（想学），二是要有好的导师，三是有大量的古籍版本（包括工具书、参考书）可供实践。今天看来，大致上还是如此。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第一、三条。

解放前，旧书店里伙计出身的小老板很多，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有的仅读过小学、初中，但靠自己做伙计时的努力，勤记、细听、腿勤，肯动脑子，就是翻书都长一个心眼，而老板不大讲鉴定的窍门，因为怕他们“偷师”。不少小伙计对于某书之优劣、版本之异同等知识，更多

地是从去店里买书的学者（或去学者教授家送书）那儿学到的，有的则是通过同行的交流获得的。那是他们将来吃饭的本钱，也就特别用心。而藏家呢，大多也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虽然没有师承，但会时时请教前辈和同行，尽可能地避免识错。

我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潘师景郑先生告诉我：二十年代末他就开始买书，三十年代大肆搜集乡邦文献，抗战期间，尽管物价腾贵，他仍在旧书店买书，总想多保存一些。他说，买书也要花学费，有时买到一部版本，回家后一查，发现问题，甚或藏书章是假的，那就会去想为什么会上当，错在什么地方，如不当回事，以后还会犯错。他说，经验就是从教训中来的。这话一点没错，朴素至极。

大约是因与切身利益无关，比起民间的藏家来说，我就少了再奋发的劲头，人上了岁数，记忆力大不如前，脑子也不大好使，所以再干两年也就想洗手不干了。在图书馆领域里，专搞古籍版本的老人们已经不多，在我之前涉足版本目录的专业人员，仍健在的尚有沈燮元先生（八十五岁）、丁瑜先生（八十四岁），而冀淑英先生、崔建英先生等都已走了好几年了。1960年以后在图书馆里从事此项专业的一些朋友，如骆伟、韩锡铎先生等也已退休，所以我想，待《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清代部分）出版之时，也是我该退休之日，此后我就可安享余下的时间了。

2008/2/16

聪明反为聪明误

读去年一份收藏类杂志，有西安某君写的一篇《收藏印的妙用》，说的是他如何利用版本鉴定知识，根据某书上的藏书印来判断抄本年代的事。文中说：“坐落于唐长安实际寺旧址的西北大学图书馆以藏书丰富闻名，特别是馆中珍藏室所藏数百种珍贵善本书籍更为人称道。其中有一部书叫《五国故事卷下·安禄山事迹》，因系手抄本，有些内容不为他书所载，故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数年前，国务院古籍领导小组曾电函西北大学图书馆，指出原先认定此书为明代抄本的证据不够，要求作以补充。图书馆古籍部负责人就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可以从收藏印入手鉴定抄本年代。”于是某君从书上找出两枚印章，一是“孙胤伽印”，一是“孙江之印”，并从《中国古人名大辞典》（应为《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找到二人简历，认为“既然孙胤伽、孙江二人是明代人，则盖有他们收藏印的《安禄山事迹》自然是明代甚至更早一些的手抄本了”，“通过收藏印，我们断定了一本手抄本的年代。看来，印章的妙用还真不少呢”。

在古籍版本的鉴定中，稿本、抄本、校本较之刻本要难，过去开旧

书店的老板们最怕看抄校稿本了，认为最为头痛。因为，一个看错，或偶然的失误，就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比如将明抄本看成清抄本，将名人批校看成一般人手笔，或是将重要稿本当作小稿本处理，这样一来，价钱上失落很多，亏就大了。那时候，谁不想多赚几个钱呢？（现在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古籍书店卖给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图书内，就有几种没有看出来，如黄丕烈跋的本子，价钱极低。至于收藏印，那内里的学问也很多，一真一伪，价钱就不一样。但是读了上文，给我的感觉是鉴定抄本实在太容易了。

作者从藏书印查抄本之时代，这没有错，因为藏印是属于版本鉴定的辅助条件之一，但不是决定条件，况且藏印还有真有假。作者仅凭印主去查《中国人名大辞典》，无非是证明明代有此二人，但又凭什么来证明孙氏二印是真的呢？没有任何一点证据。如果书上钤有伪造的明初人印，在《中国人名大辞典》也可查到，那可否说抄本的时代应在元末明初，抑或又在宋代了呢？所以，略懂一点版本门径者，如仅凭某条线索来鉴定版本，是很难判断准确的。

文中短短的一段话，就有几个错误。如：“因系手抄本，有些内容不为他书所载，故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抄本都是手抄的，有的抄本内容有价值，有的没有什么用，完全要看书来作判断，至于抄写的年代早晚，要根据字体、纸张以及其他辅助条件，包括藏书印等，来综合判断，决不是几句话可以讲清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写过一篇《抄本的价值与鉴定》（已收入《书韵悠悠一脉香》中），举过不少实践中所碰到的例子。

又文中的“数年前，国务院古籍领导小组”云云，也不准确。时间

上应是1980年，即二十七年前，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对该馆藏《五国故事》的版本作“明抄本”有疑问，故发函西北大学图书馆，请求提供复印件以便鉴定。后来，应该是编委会的专家见到了西大馆寄来的复印件后，认为这并非明抄本，而是一个很普通的清抄本，而且又是残存一半，没有什么价值，不作善本，所以在初审阶段就理所当然地删去了，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以及正式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是没有西大本此一款目的。遗憾的是，此文作者不知道，也没有去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五国故事》为二卷本史部杂史类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仅六部，分别为明抄本（清鲍廷博校，清赵辑宁跋）、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李调元刻函海本（傅增湘校并跋）、清孙潜抄本、清抄本、清光绪翁斌孙抄本（翁斌孙录，鲍廷博校，翁同龢跋），五种皆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又清抄本（清丁丙跋），藏南京图书馆。

那本收藏类的杂志还配发了一幅《五国故事》封面书影，更可证明当年编委会的判断是正确的。书影上有“钱遵皇录过”、“陆敕先借抄讫”、“壬寅仲春初九日阅于剑光阁 唐卿识”，另钤有“吾道在沧州水”、“放情山水之间”、“云泉读过”、“剑光阁”、“孙印胤伽”、“散木居士”等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书估做的假，做得也太拙劣了，没水平。不要说钱陆二人没头没脑的话不通，而且不可能在封面上这么写，更匪夷所思的是钱曾竟会将自己名字写成“钱遵皇”。1990年，谢正光兄送给我一本他笺校的《钱遵王诗集笺校》（香港三联出版），谢兄是专研遵王的，如他知道还有书估将“遵王”写成“遵皇”的事，必定会当笑话去讲。文中还有一句话也很妙：“收藏印中还有一方散木居士印，乃我国著名

篆刻家邓散木的印鉴，此书曾经邓散木收藏，足见其涉猎之广泛，对研究他的生平事迹也有所裨益。”且不说邓氏印之真伪，即是真印，能窥“见其涉猎之广泛，对研究他的生平事迹也有所裨益”吗？如真如此，那太神了！

某君作为博士生导师，作此大文，可能很想将他对版本的鉴定经验写出来，以供大家一起分享，虽然愿望是好的，可惜所写全部错误，大大误导了读者，这可是作者所意想不到的。

2008/3/22



市侩狡诈 诡譎百出

——版本鉴定之一

版本鉴定实在是一门学问，必须要有长久的实践方能掌握，这就是各种版本要看得多，多查工具书、参考书，多请教行家。我在工作中，将书估作伪的例子记录了不少，将来有机会或可作一小结，留给有兴趣的朋友看看，或许有点启示。但我也知道，写这些例子，就事说事，容易使人产生枯燥的感觉，写活泼些的文字反不容易。

先说一个有点趣味的故事吧。2003年岁末，苏州文物市场上惊现一批西汉简牍。如果简牍是真的，那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及艺术价值，还很可能对汉代历史有所补充，对研究者来说，也不啻是一个好消息。当时南京博物院获讯后，即指派两名专家前去苏州，找到了这批简牍的主人，并将简牍带回南京。经过科学的碳14年代测定，可以肯定这是两千年前的古物。但是该院的书画专家总认为这批简牍书法气息不够高古，没有写出汉代书简的神采，但为什么会如此，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没问题”和“吃不准”这两种意见谁也没有占上风。得不到统一，

怎么办呢？总该有个结论才是。于是，南博又派专人将简牍送到上海博物馆求证，他们研究鉴定的结论是：这路东西是盗墓者用不法手段得到汉代棺木板，倒卖后又经人锯割，再请书法高手制作而成。而且这路东西还被倒到了香港，蒙倒过一大批藏家。您说奇不奇，妙不妙，实在是匪夷所思。所以说，当今社会做假文物字画（别的行业也一样）中特有用心者，心计一招比一招强，当然，最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假的总是假的，总有一天会被揭穿，只是时间而已。

接下来，说一说古籍版本中的作伪之例吧。1986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有时间可以去许多地方看图书馆、博物馆。到图书馆当然要看那些珍藏在善本书库里的中文善本了，因为那些善本书，多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国得到的，除了四十年代王重民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时，写出了二馆的善本书志外（王先生离开后所补充的善本书不算在内），其他很少被专家学者所揭示过。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当然是美国东亚图书馆中重要馆之一了，它所收藏的那些中文善本，我曾写过一篇《奇探二酉搜罗富》为之介绍，并收入我的《书城风弦录》中。然而，总体来说，善本书的质量不错，但是著录上却有不少问题。1989年，崔建英先生等在普大葛馆曾对这些善本书中的集部明代别集八十六种作过核查，结果发现王重民先生的《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虽然经过屈万里先生的校订，仍然是“版本误录三十二种，为误定刻年十二种、所定刻年无据七种、刻人误植一种、书名误定及卷数误计四种、两书扭合一种、以残作全二种、以翻刻为原刻五种”，误录率百分之三十七。而在其他各种数据呈现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八十六种善本书，总修订率

为百分之六十点四六，其中属于硬性错误者为二十五种（即不应有的鉴定错误）。崔先生生性耿直，是一位对古籍整理、编目非常执著的专家，对于古籍善本的著录，向以严谨著称，我是赞同他的做法的。

我当年在葛馆也翻过不少书，有几种书着重作了些记录，都是不在崔先生统计中的。兹录出二部，一部可窥古籍图书在流传过程中，书估为图射利，在作伪的技巧上无所不用其极。另一部，也可证鉴定者如稍有疏忽，即会犯“低级错误”，作出令人难以相信的错误判断，足见版本鉴定实不易之事。

《昌黎文式》四卷，元程端礼撰。《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作“明抄本”，“并有明黄淳耀手跋”。正因为是明抄本，又有黄淳耀跋，所以才引人注目。但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发现问题多多。书的内容和作者，倒不必去详写，问题在于版本和黄跋。按，此书楷书抄写，极精，非明抄本，实清末抄手所为，明人抄书绝无是种字体。用纸皆被染色充旧，并有似虫蚀之洞，然非虫蛀，乃人工针锥钻出。明人高濂的《燕闲清赏笺》对书估作伪手法多有揭露，有云：将书“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锥书本子，委屈成眼”。看来，书估真“厉害”，也真下得了手，为了财，什么事都干得出。

书有铃印曰“黄勤勉堂”、“陶庵”、“淳耀珍藏”，又有“金氏家藏”、“熙堂”，使人一看，以为是黄氏自藏。版本鉴定，印章当然是辅助因素之一。但黄氏三印似小木所刻，颇为拙劣，且篆法、刀法板滞，印色污浊。

最妙的是黄淳耀跋。跋云：“岁在丁酉，吾应试于京都，见友人家藏此书，心虽慕之，殊觉此书甚不易得。越三四年，偶于书肆中遇此书，不惜多金，遂购之，但欲参五色笔耳。盖元代程公端礼，其文学与先贤

共辙，所以得入圣庙，与先贤并列。昌黎古文，用五色笔如此批点，遂使后学观此，自无虑其难解矣。陶庵黄淳耀谨识。”初看黄跋，只觉得字体有些别扭，表述呆板做作，图章也不好。

黄淳耀，字蕴生，号陶庵，上海嘉定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南都亡，嘉定遂破，偕弟渊耀缢于西城僧舍，门人私谥贞文。据清徐乘义《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六云：“弘光立，不谒选人。大兵围城，佐侯峒曾调兵食。城破，淳耀与渊耀入草庵。庵僧无等，淳耀方外交也，谓曰：君未受职，可以无死。淳耀曰：‘大明进士，与城存亡，分也。今托上人，死此清净足矣。’索笔书曰：‘进士黄淳耀死于此。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行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没，此心而已。’与渊耀分左右就缢，年四十一岁，暴尸七昼夜而无改色。”淳耀弱冠即有志圣贤之学，晚而充养和粹，造诣益深，诗古文卓然名家，有《山左笔谈》、《陶庵集》。

《书志》云：“黄跋所称丁酉，乃万历二十五年也。”津按，黄淳耀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卒于弘光元年(1645)，年四十一。万历二十五年，淳耀尚未出生，而后一丁酉，则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其已逝去十二年矣。跋中所云“越三四年”，即指黄淳耀崇祯十六年(1643)中进士后之三四年，而此时淳耀又已弃世三年。书志作者及修订者皆未细看，也未细查，见黄跋、黄印，即以假为真，书的版本自然也就定为明抄本了。

《昌黎文式》，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一帙，二卷。著录为唐韩愈撰，宋真德秀辑，元程端礼批点。明弘治秦紘抄本，清张昭潜跋。二十六年前笔者曾去济南该馆阅书，未能于是书摘录笔记。然疑此秦抄本或为估人

觅抄手抄录之底本，又析二卷为四卷，抄竣后再施小技，以瞒世人。

写此段例子时，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笔记上录得一则，那是当年在沪复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时所写下的。山西省文物局藏《史记》一百三十卷，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有清汪由敦跋。十二册。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钤有“汪印由敦”、“谨堂”等印。目录后有汪由敦跋，署乾隆丁未（五十二年）字样。

汪由敦，字师茗，号谨堂，雍正进士。乾隆间官至吏部尚书，文章典重有体，直内廷几三十年。金川用兵，廷谕皆出其手，卒谥文端。但我在查证汪跋真伪时，发现汪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如何能在乾隆五十二年的刻本上写跋？所以汪跋必假无疑。这些都是书估做假。书估一般都不会去做考证，他们只是想收藏家或学者多不会想到会假汪由敦的跋，所以任意去加工。这个例子和上面的黄跋一样，即“人死了还会复活，还能写跋”。书估之信手胡编，令人咋舌。

《兵录》十四卷，明何汝宾撰。《书志》作“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清写底稿崇祯元年（1628）重订本”。此著录极不清楚，看得我糊里糊涂，分不清究竟是稿本还是抄本。如从字面上看，应该是万历三十四年据稿本重新誊写并经崇祯元年重新修订，如果真如此，那应属“誊清稿本”一类，即属《兵录》传世之最早本子。

《兵录》又名《何大将军兵录》，存世最早之本为明崇祯刻本，乾隆间修四库书，列入“记载违谬，语多触犯”，而被“禁毁”。《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二》、《清代禁书知见录》、《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皆有著录。崇祯本经此“打击”，存世当不会多，所知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台北“国家图书馆”（二部，其一为原藏北平图书馆者）、美国

国会图书馆、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六部而已。除崇祯本外，清代因禁网所碍，未见有翻刻，而以抄本传世者，也有数部，均见诸于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

那么葛馆所藏是否为稿本呢？非也，清抄本也。细察此本，抄写甚工，字体似多人所为，又墨色较新，无旧气。卷十四第五十叶、六十七叶“玄”字避讳。据此，是本抄写的时间，应在康熙或康熙之后。《书志》云，诸家序及自序末“各钤印记”。据序末所钤作序者及作者印记，可视作稿本之依据。又见序末有“崇祯元年岁在戊辰仲秋之吉重订于粤之正气堂”一句，就把版本项定作了稿本一类的“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清写底稿崇祯元年(1628)重订本”。然此书实为清人据明崇祯刻本所抄，序后原刻有钤印，抄写者用朱笔细摹，印记共十三方，描绘较为精细。书志作者和修订者大约是瞄了一眼，见到有作者及作序者的印记，未能仔细辨识，所以只当是钤上去的，而导致一个低级错误的产生。

2008/6/8



《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的版本鉴定

古籍版本的鉴定实在是一门学问，这不是几句话或三五篇文章就可以讲清楚的，有些似是而非的版本，要搞清它们的源流也不是容易的事。在我四十多年的版本鉴定实践中，碰到过不少疑难杂症，有的可以请教老师而得以冰释，有的则是隔了多年后，方才获得真知。这当中我也曾有过版本鉴定上的错误，比如《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一书即是。

《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宋林駟撰。别集十卷，宋黄履翁撰。这是一部于“经史百家之异同，历代制度之沿革，条列件系，尚有体要”的书，虽为科举而设，但有宋一代的朝章国典，分门别类，叙述详明，多有诸书所不载者。“决科”者，谓参加射策，决定科第，后指参加科举考试。宋岳珂《愧郗录·场屋编类之书》云：“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

此书元代仅存延祐四年(1317)圆沙书院刻本，存世计二帙，今藏诸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明代有好几个版本，较重要的有宣德二年(1427)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宣德二年建阳书林詹氏刻

本、宣德二年(1427)建阳书林朱士全刻本、弘治二年(1489)梅隐书堂刻本、嘉靖十六年(1537)白珥刻本、万历十八年(1590)书林郑世魁宗文堂刻本。另外又有明刻本二种。这些本子中最难搞清楚的就是明宣德二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对此书也曾有过误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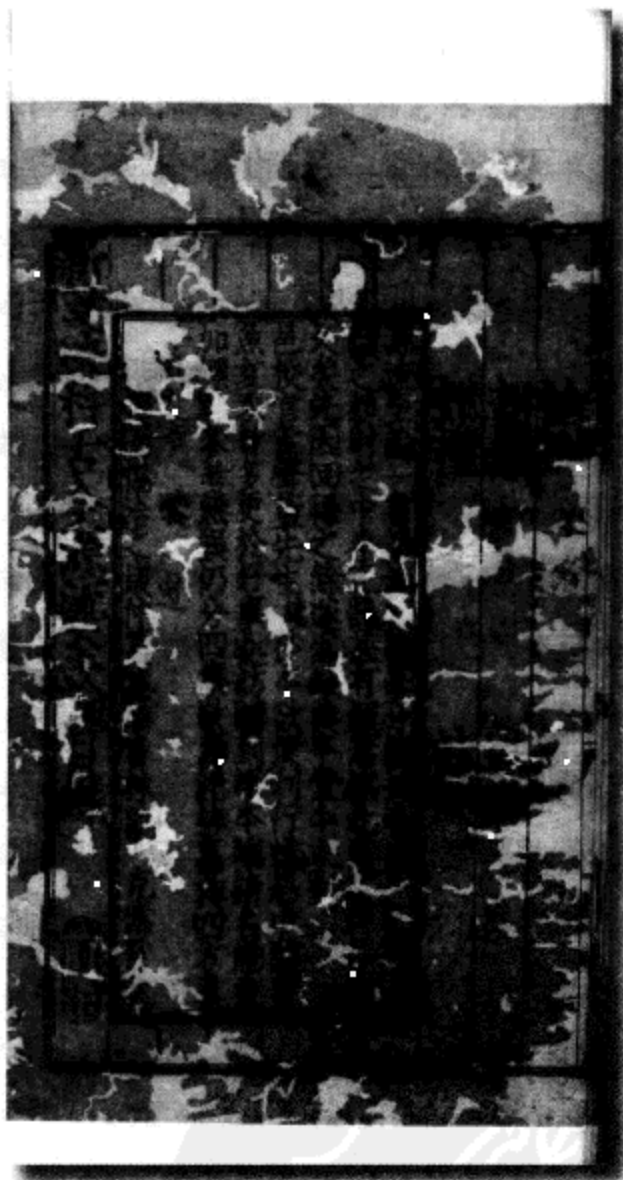
刘克常刻本,半叶十五行二十五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前有南宋嘉熙元年(1237)黄履翁序。前集目录页题“闽川林驹编”。此本目录后有牌记,云:“《源流至论》一书,议论精确,毫分缕析,场屋之士得而读之,如射之中乎正鹄,甚有赖焉。然此书板行于世久矣,先因回禄之余,遂为缺典。本堂今求到邑校官孟声董先生鏊抄本,欲便刊行,惟恐中间鲁鱼亥豕者多,更于好事外访购到原本,端请名儒重加标点,参考无误,仍分四集,敬寿诸梓,嘉与四方君子共之。幸鉴。宣德彊圉协洽之岁仲夏,建阳书林刘克常敬识。”此书之版本应为明宣德二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中有宣德二年刘克常刻本牌记。

刻本之牌记,是一书刊刻之重要凭证,也是后人鉴定版本之重要依据。然而此本在流传过程中,却多为书估在牌记上作伪,或挖去整块牌记,或毁去、剗去牌记中之关键之字,以蒙骗藏家,以至于各种书志、书目、书影均将此明宣德刻本著录为元刻本,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南京国学图书馆《盍山书影》、杨氏《海源阁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稿本)、台北《中央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

上海图书馆所藏此本二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仍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第一部有牌记,“彊圉协洽之岁仲夏,建阳书林刘克常敬识”之“彊圉”前二字,及卷端第一行下“前集”二



明宣德二年(1427)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新笺
决科古今源流至论》



字被挖去。第二部牌记则全被挖去。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曾经李致忠考证，并参考《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认定为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刘克常刻本。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书两部，仍误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傅熹年先生亦曾见过哈佛本，认为作元刻本不妥，云：“此处牌子左行上二字烧去，原应为成化二字。疆圉协洽为丁未，当成化二十三年，则此书为明成化二十三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津按，傅说亦误。疆圉为丁，协洽为未，丁未元代有大德十一年(1307)、至正二十七年，明代有宣德二年(1427)、成化二十三年(1487)。傅增湘曾于北京厂肆见到一本，在牌记上也被书估挖去一字，作“□德”(见《藏园群书经眼录》)。故哈佛本当为明宣德时所刻。估人毁去“宣”或“宣德”字，以充元刻，此举曾使不少人为之眩惑。1992年5月，津在写作《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时，方才修改为明宣德二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

丁丙八千卷楼之刘克常本，旧为清代怡府藏书，丁氏《善本书室藏书记》卷二十著录，编纂者以目录后有“大德丁未建阳书林刘克常识语”，遂认定为元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后此书又为南京图书馆所得，《盍山书影》中所著录者即此本，亦作元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此书牌记上佚去七字，而末行之最重要处被书估动了手脚，使之佚去“宣”字，而且“德”字仅余三之一，给人造成的假象应是“大德”二字，如此明宣德本就成了元大德本了。

台北《中央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此本原也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后来《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著录改为明宣

德二年刘克常刻本，为全帙二部、残帙三部，然而虽贵为《书志》，却未写出任何版本依据。为弄清此书之版本，我请该馆特藏组前主任卢锦堂兄目验查核。承卢兄电告，该馆全帙二部，最初也作“元刻本”，书中目录页后皆有割裂痕迹，也即书估割去之牌记。后在修订馆藏善本著录时，曾参考日本学者阿部隆一著《中国访书志》，并根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中有宣德二年刘克常刻本牌记，方将馆藏各本予以修正。

至于杨绳信编的《中国版刻综录》，是将一些图书馆的善本书目著录图书中的出版者的名号堂阁楼轩等予以排列，再列出版本。不可否认的是，编者本身是不管出版者的时代的，若是书目上著录错误，那《综录》也就依样画葫芦，照搬就是了。所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的《至论》，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杨绳信也就理所当然地将“刘克常”作为条目，列入了宋元版刻类。当然，我相信北图的本子，在刘克常的牌记上，必定被书估有所“加工”，只是北图的编目、鉴定人员一时不察，被蒙骗而作出误判而已。

《至论》的宣德本还另有二种，一是明宣德二年(1427)建阳书林詹氏刻本，一是明宣德二年建阳书林朱士全刻本，在过去的著录中，很多重要学者、专家也有失误。

先说詹氏刻本，美国哈佛燕京馆有人藏，著录原作“元刻本”。此本行款为十三行二十八字，目录页题“闽川林驹编 开化徐珪校正”。前集目录页卷十末之牌记被估人割裂，割裂处粘补甚工。笔者在鉴定此书时，于“元刻”颇有疑问，由于当年撰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时间紧迫（每天三种约三千字），一时又无他证，故在《书志》多写了一句“查天津图书馆有明宣德二年建阳书林詹氏刻本，行款

同此本”，为慎重起见，就将版本项定作“明刻本”。数年后，得天津友人寄来詹刻的书影，经比对，两本确为一版。燕京本所缺之牌记，津图本完好无缺。但仔细一读牌记上的文字，竟同刘克常本，只是末尾文字小异，文作“宣德疆圉协洽之岁仲夏建阳书林詹氏重新刊行”。刘克常本与詹氏本的区别，不仅是行款不同，且刘本卷一第一页有太极图，而詹本则无。

朱士全刻本，半叶十五行二十五字，今藏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行款同刘克常本，但作“元刻本”。此本原藏邓邦述群碧楼，《群碧楼善本书录》卷二则著录作“宋刻本”。邓本目录后有牌记，文字亦同刘克常本、詹氏本，惟牌记下则为“书林朱士全敬识”，又“疆圉”上面二字被割去，并用笔填补“德祐”二字。按元代德祐仅两年（1275—1276），实无丁未年号。另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著录此本，亦误作“元刻本”。《书志》云，此有牌记，上刻“大德疆圉协洽之岁仲夏建阳书林朱士全敬识”。按，“大”字原为“宣”字，当为书估割去“宣”字，并补入“大”字。日本《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有此本全帙，作“明宣德二年朱士全刻本”。所以傅斯年图书馆著录作“元刻本”是错误的。

于此可见，同样一个本子，在不同的书估手上，可以任意在牌记上要弄小技，一本割去“宣德”二字，用心黏纸并填补成“德祐”；一本割去“宣”字，易以“大”字，由明刻而变身于元槧，不仅是上了一个层次，还骗过了大学者王国维、大藏书家邓邦述。

《至论》还有一个版本，是明弘治二年（1489）梅隐书堂刻本，也是易为书估作伪的本子。此本半叶十二行二十二字，原为沈氏研易楼藏书，1980年沈氏将所藏悉数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此书也在其中。此本前

集目录末尾题前原有六行木记，已遭估人割去。罗振常于甲子秋跋云：“《古今源流至论》，凡藏家所有皆元延祐小字本，每半叶二十五行，每行二十五字者，此中字本则罕见著录。惟《邵亭书目》记宋嘉祐刊本，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行款与此本合，然此本形式全如元刻，刻工复良窳不一，盖元时麻沙翻嘉祐本，其行款乃宋刻耳。”罗振常是藏书家，也是书林中人，曾在上海设蟬隐庐，买卖古籍，他的鉴定眼光是很不错的。然而他却将此弘治本看成了元刻本，也是偶然的一次失误。而台北故宫的版本专家，因此本之木记被割去，未审所云，只好先依据前人之鉴定，“姑定为元刻，以俟后考”。津按，此弘治梅隐书堂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有残本六册，为别集十卷，旧时著录也作元刻。是本河南省图书馆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均有全帙。

刘克常本、詹氏本、朱士全本三本孰先孰后，是很难得出结论的，因为每本都有牌记，或为当时建阳书林竞相翻刻此书，专售举子，有利可图。这三种明宣德刻本，之所以容易被误认为元刻本，是由于这些本子都是黑口，字体也是小字，故有人认为区别元、明刻本在有无太极图，但此书元刻本有太极图，明刻本中有两种也有太极图，所以这种区分并不准确。

由此想到的是，在刻本的鉴别中，最难鉴定的是元刻本。元代的时间较为短暂，上接南宋，下逮明初，对于明初的版本，稍一不慎就会错判。当然这也不排斥有些藏书家将自己的藏本往高处看，而对于书估来说，明初本是一个价钱，元刻又是另一个价位，于是想方设法作伪拔高，以图卖个善价。举例来说，《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为明宣德九年（1434）朱氏尊德书堂刻本，此本目录下镌牌记“宋礼部员外

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李焘编 书林增人音释批点校正重梨 大德甲寅朱氏尊德书堂印行”三行。按,大德无甲寅,此牌记“大”字,系后人剝去“宣”字后重加,故为宣德本。

宣德仅有十年,刻书不多,传世也少,又由于上距元末仅六十余年,书口皆为黑口,刻书风气未有大变,且有牌记,因此宣德刻本较易为书估作伪而成元刻本。

人品大美书福最厚 学识专深著述三难

或许是上天注定，文立幼时即因好读书而喜版本之学，但生于寒微之家，地处素无藏书风气之隅（晚近虽有罗雪堂先生隐居旅顺，然其大云书库早已但余黄鹤楼，文立年初所得《农学》、《教育》两丛书即其子遗），遭逢中华文化凋零飘摇之世，匪但宋槧元刊不得见，即晚清民初线装书亦缘悭一面。稍长得略搜读近世名家流略著作善本书影图谱，亦仅屠门大嚼，实类《红楼梦》贾宝玉所谓意淫耳。而世事竟有出人意表者，当今书福最富的古籍版本学大方家沈津先生一昨漂洋过海，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传来指示，命为即将出版的版本学新书作文。文立受宠若惊，宁担佛头着粪之实，不避不自量力之讥，虚与委蛇假作推托后立即满口应承，于是遂有下面这篇文字。

文立敢而且愿作此文，不是狂妄到自以为可与沈先生较量版本学（此书每篇文章在“书丛老蠹鱼”博客上刊出时，文立都曾认真拜读，这次又逐篇再读，与读他前二本类似著作一样，实在有大收获，博我多闻），而是借此机会谈谈我所认识的沈津先生，进而总结一下我读沈先生文章

得到的教益。虽然当今红透整片天的大学者曾妙语连珠，以为吃鸡蛋不必认识母鸡，文立服膺的还是老祖宗心法：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文立固执认为，透过文章可以看到作者感知作者，同样，不了解作者也就不能真正读懂他的著作。

但讲到沈先生人，文立又似乎犯了难。何以故？文立与沈先生至今未有一面之雅，只是越洋电话、电子邮件与电脑博客三电交流，而且通讯虽称频繁，也还只是一年多不到两年。这样的交情竟敢来谈人论文，怕只会惹识者嗤笑罢。文立与沈先生定交颇富戏剧性，是他人格的美善感染促成，文立本来就谬以知人识人自负的。

闲话叙毕，我印象中的沈先生究竟如何呢？大约说来，关于人品者三，关于学品者四。

沈先生是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谦谦君子。

这是文立得以上交沈先生之因缘。两年前，文立在互联网上曾刊载过一组读书杂文《三不四勿之居忧书录》，其中四篇都不假辞色痛斥某些所谓学者之荒谬，唯独关于沈先生《书城风弦录》的笔记是补其文小小未及的。谁知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沈先生读后，竟辗转打来电话亲口称谢。因为小文提及有几篇文章可惜看不到，沈先生随后又专函寄来复印件。这谦虚诚朴的态度很使文立意外，感慨不已。

沈先生是不负师恩乐于助人的仁义君子。

小文所以愿意补充沈先生大作的不足，除开他写的罗振常恰巧是文立研究的雪堂先生季弟，几乎被人遗忘的民国重要书商和有特色的学者词人，彼文似是第一篇专门翔实的介绍外，还因为从文中可以窥见沈先生态度之严谨；更重要的是，此前文立曾买得沈先生所编著之七十万

字《顾廷龙年谱》。沈先生是顾先生亲传二弟子之一，四十年跟随左右，濡染极深，在顾先生晚年率先为搜集整理文集，顾先生辞世又受命撰写年谱，资料翔实为晚近同类著作之冠，一代文献学大家一生行实得此不朽。这样不负师恩汲汲为谋信今传后的君子，一向是文立私心倾慕敬重的。折节与文立下交后，凡读书读报遇到与雪堂相关资料，不论多琐碎，一定越洋电话赐示，文立裹足一隅见闻极狭，沈先生每每代为扫描。

沈先生是实事求是、不徇虚情的笃实君子。

但同时沈先生并不是一团和气的烂好人，不是孔子所痛心疾首的乡愿，而是善善恶恶自有是非的笃实人。生活中事文立未亲见姑且不说，学术上沈先生通过书评激浊扬清，态度之严正，不能不说是当下学术道德严重缺失的浑浊泥潭里的朝阳鸣凤。近年有位学者出版巨著，介绍日本见存中国古籍，沈先生著文据实历举其版本学之不足，丝毫不假借。因为这位学者居心甚佳、费力亦甚笃，是否写此文是否发表，在沈先生曾颇费心思，不耻下问、反复询及刍蕘，可征用心之纯与慎。批评一般学界不良风气更不假辞色，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插图竟将翻刻低劣字体全无形似的民国假本认为雷峰塔真本，像某博士导师作文介绍从藏书印考证版本却不幸全都讲错，这对端正学风有大裨益，非但改正知识错误而已。然而沈先生同时有另一面，怀念师恩诸文不必说，《〈萝轩变古笺谱〉背后的故事》记前上海文博事业主事者方行先生之行事与品格，别人如何不知道，文立读后不胜唏嘘望风怀想。两者联系起来看，才可明了沈先生淑世之一片苦心。

沈先生是书福丰厚的幸运者、抢抓机遇的有心人。

以上讲的是我印象中沈先生其人。关于学，沈先生成为古籍版本学

家以及独具特色之文献学家，书福厚与手脚勤，因缘际会与刻苦自持，是互相依存的两面。

书福丰厚是说沈先生因缘际会，先后得在国内外一流图书馆典守中国古籍善本，沉潜含玩五十载，又躬逢盛会，始终参与编纂全国古籍善本书目，达八年之久，经眼不少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美国重要古籍公藏（此时私家收藏早已不足道矣），古籍史上少有，我戏称为古籍善本巡回使。旧时中国藏书家版本学家文献学家没有一人书福超过他。沈先生过眼检视之古籍善本究竟多少？他自道二万部。“文革”前期他就曾亲手逐部翻检过上海图书馆藏全部古籍善本万四千种，近年更主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书志就写出两千多篇。故我估计即便是善本也当然不止此数，何况不是善本的一般古籍呢。真的是地球人都知道，版本学完全是眼学，真正拼的就是实践。心眼里有这两万部善本打底，沈先生就有了研版本学的首要条件。

书福厚只是外部因缘，案马克思主义观点，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沈先生善于抢抓机遇、勤于翻书、刻苦自持是成功的内因。通过恩师顾先生耳提面命，沈先生养成一生肯下苦功笨功硬看到底的好习惯。据自述随手略举几例：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曾应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前馆长钱存训教授之邀，到馆一星期作一场演讲，余时早九晚五全在善本书库内，但中午出库吃个汉堡包。哈佛燕京图书馆书架空间追不上陆续采进的新书，大量旧存图书不断移往后备书库，沈先生职司之便，每在移书前赶快翻检一番。手脚勤还包括搜集与写作之勤奋刻苦。为搜集翁方纲题跋书札，先后留心四十年，最终囊括千三百篇计百万字。为顾先生写年谱历时一年，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投入，仅复印的资料即与

书桌比肩。

沈先生是踏实治学龟勉胜常的苦学者。

成器晚是沈先生作为学者专家的显著特色。老师顾廷龙先生是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年岁小成名晚的叔叔，服膺侄子晚成堂之自励，曾以小晚成堂自署，更以此教导沈先生。沈先生牢记顾先生教诲，在五十载工作中持之以恒默默摸索积累总结提高，勤于看勤于问勤于记诵勤于札记，前二十年都在苦做功课，后二十年开始著述，终于不负期望，在版本学及相关领域成家立业。晚近为“哈佛燕京”作善本书志，竟不打草稿秉笔直书，两年完成宋元明部分百五十二万字，沈先生自称是累三十年之功写一志！而一旦豁然开朗，工作之余抽空作文，即能抽丝剥茧源源不断，臻著述难之佳境。此难是难得之谓，非艰难之谓也。其难一在量多，二在业专，三在质精。其专精留待下文，其多则已有五百万字，超额完成预计的三百万字，用目下时髦的政绩语言，翻一番指日可待，能不欢喜赞叹为业绩彪炳乎？

沈先生是著述严谨扎实切用的专门家。

沈先生版本学首要特点是体例严。他不遗余力撰写善本书志，有目共睹。这有皇皇巨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宋元明部分）、《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及即将出版之《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清代部分）为证，沈先生自述其模式是：记录书名、卷数、撰著者、版本、册数、行格字数、版框之高度、序跋、书之大体内容、版本源流、刻工姓名、收藏情况、钤印等项，既是古籍详细记录，也为读者提供足够信息，还为他馆编目校核提供依据。因为太专业，文立惭愧不敢妄说，以俟专家。

其次是眼界宽。沈先生研究古籍，注视领域极为广泛。翻检他的专门论集《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可见除开书里的目录文献学、书外的版本学、书人书事见闻故实流传收藏这些旧有范围外，沈先生更着眼图书之工艺学即印刷装帧纸张册数等，以及销售学即书价销售渠道牌记广告等新兴领域。也举一例。古籍价格到底几何，旧时虽有美姬良马换《汉书》之类的记载，但着眼点是藏家爱书之痴迷，惊艳以外更寓有惋惜之微意，唯独缺乏经济眼光。沈先生则关注真正图书价格，依据亲手翻检所得专文探讨，非但饶有趣味，更有历史价值。

第三是腹笥厚。文立史料癖积习深中骨髓，读沈先生文章，不管论文还是随笔杂文，最深刻的印象是资料细密扎实，读来兴趣盎然，的的如山阴道上，奇花异草应接不暇，又如追踪探源长江大河，远源支流挹注不尽，每每惊喜如逢故人。这源于沈先生读的书真多，记的材料真博，更因为他绝不就书谈书，总要上下勾连左右逢源，文章遂因此而丰厚饱满，博我多闻启我深思。

第四是用力专。这里的意思是除版本学这职业外，沈先生还有专门研究方向，并也取得相当成就。这就是翁方纲研究。版本学旧时被部分专门学者贬称为书皮子学问（这当然是所谓知识的偏见。典型的就是洪亮吉《北江诗话》里对藏书家有浓厚偏见的分类），因此顾先生教导沈先生，除版本学外，还要找个专业研究项目，发踪指示他研究翁方纲。沈先生从一九六〇年代开始，历经四十年，终于出版《翁方纲年谱》与《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并及相关专题论文，成为翁方纲研究专家。

沈先生是承先启后推己及人的慈悲人。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沈先生之存心善。除专业著作外，着力撰写学术

普及读物，结集《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老蠹鱼读书随笔》、《书丛老蠹鱼》多部，深入浅出具体入微地介绍古籍善本近今文献，记述书林典制书海见闻书人故实，将五十年沉潜书海的难得心得与天下共。文立最感兴趣的厥有两端，其一是发潜德之幽光，泼墨描绘郑振铎柳亚子等先贤抢救典籍捍卫民族文化的大智大勇，委婉记述顾廷龙等先进学者的经历经验。其二是沈先生还充分发挥见识广机遇好的特点，逐一撰文介绍国内外各名馆馆藏特点，主编《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推广开来又编辑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便利国内学者使用。

沈先生既然晚将末契托后生，文立自然不能当面输心背面笑。沈先生治学也仍有不足之处。关于版本学，文立惭愧不敢置喙，其余如引古籍断句或不无小误，行文或亦有略伤瞥累处，但这都无伤大雅。惟有一件事，文立颇有些沾沾自喜的是，编《罗雪堂合集》时曾发现一种五色分印本书，未曾想象沈先生这样于古籍版本见多识广的学者，竟也未之见未之知。古语书囊无底，信然信然，则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自傲的呢！

先哲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则沈先生庶几为当今有大美的古籍学者。文立半生碌碌，屡次碰壁，虽尚未头破血流，却也如鲁迅先生一样，鼻子是早已碰歪了的。但有一点颇自幸，就是得上交几位人品学问并臻双美的学者，沉潜游泳益我良多，在国学陵替的今日，不能不说是可遇不可求。首位当然是我的老师罗鯁翁（继祖）先生，沈津先生则是最近的一位。嗇于彼者或丰于此，这应该是仁慈上苍对我的补偿罢。这也就是文立不推辞且甘冒僭越之讥，为沈先生新书作文的原因。同时更期望沈先生再接再厉，系统总结一生对古籍的丰富阅历

和经验，写出无愧眼福更无愧时代和历史的新《书林清话》。文立以为，当今寰宇，能写好这样一部承先启后专著的，沈先生或即是不二人选。但老实说，为古籍爱好者研究者欣赏者甚至是买卖者提供真正的枕中鸿秘倒还是其次，文立私心是盼望得以快读欣赏，弥补自幼未能得到的满足，哪怕临老有机会作一次古籍的视觉饕餮也好啊，这当然又将被坐拥百城的博雅君子嗤笑了。

新正第一戊子小大雪节间，晚学蓬莱萧文立
于莲湾介堂僦居

